

凯丰传



张学龙◎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K A I F E N G Z H U A N



萍乡市图书馆惠存

张序正 2010.8.10

凯丰传

张学龙◎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K A I F E N G Z H U A N



策 划：贺维林

执行策划：李久龙

何柏桂



M U L U

目录

第一章 走出乡关/3

- 一、大雪里降生/3
- 二、嗜读如命/6
- 三、学生领袖/13
- 四、第一次婚姻/20
- 五、壮志凌云/23
- 六、心系武汉/27

第二章 在莫斯科寻求真理/37

- 七、虎口脱险/37
- 八、精英际会/43
- 九、意恐迟归/48

第三章 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51

- 十、入党/51
- 十一、志同道合/58

十二、情真意切/62

十三、不屈于香港铁窗/67

十四、第二次婚姻/74

第四章 出生入死在中央苏区/83

十五、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3

十六、大难临头抱成团/96

十七、赣南的冰刀霜剑/101

第五章 万水千山长征路/108

十八、出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108

十九、血战湘江/111

二十、遵义会议/118

二十一、孤军作战建大功/129

二十二、反对分裂/134

第六章 陕北的冬夏/141

二十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41

二十四、敢于斗争/148

第七章 稳坐“波涛汹涌”的长江局/157

二十五、在国共合作中明方向/157

二十六、站在正确的立场上/164

二十七、自古忠孝难两全/169

第八章 雾都重庆擎明灯/172

二十八、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172

二十九、怜子如何不丈夫/177

第九章 在延安大显身手/181

三十、协助领导整风运动/181

三十一、提出整顿“三风”/187

三十二、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191

三十三、提出宣传毛泽东主义/200

三十四、婚变风波/203

第十章 东北的紧张岁月/211

三十五、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211

三十六、在《七七决议》下组织领导土改/218

三十七、严己宽人/222

三十八、拂晓中的哈尔滨/226

第十一章 殚精竭虑于中南海/231

三十九、入主东北重镇沈阳/231

四十、奉调进京/239

四十一、参与中央重大事项的决策/242

四十二、艰苦朴素地生活/246

四十三、功记人民心中/250

后 记/254

为了理想和信念，
男儿到死心如铁。

——题记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走出乡关

第一章

一、大雪里降生

一场鹅毛大雪像筛糠一样纷纷而下，下得相隔几步远就看不清人的面目。

一整夜过后，整个世界就被雪覆盖了。这时候鸟瞰整个江西省萍乡县老关乡，平日里婀娜多姿的山岭沟壑，全变成了一条条银蛇和一头头蜡象。银蛇蜡象静静地卧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正全力抗御着季节的严寒呢。

“哇！……”一阵婴儿啼哭声从一个屋场里传出，洪亮地告诉人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诞生了。

婴儿不满天地间冷得这么厉害，抗议的哭叫声一阵紧似一阵，像哪吒翻江闹海一样，使沉寂无比的何家大屋顿时有了生机。

何家大屋背北向南，大门正对着一座叫王公岭的高峰。高峰左右，连着几座波涛般起伏的山岭，远远看去，酷似一个硕大无比的笔架放置在天庭下。有位云游天下的和尚曾站在何家大屋的门前说，这里应该出大文人。何家大屋坐落的地方叫三角池。所谓三角池，就是门前有口三角形的池塘。三角形池塘四周是田野、丘陵，

丘陵上长满了华盖般的樟树、兵阵般的杉树和松树。何家大屋连片的砖瓦房，就隐藏在茂密的树木之中。透过树林，可以看见朱红的大门。大门上有块汉白玉制成的门楣，门楣上阳刻着四个骨感十足的柳体字：耀祖光宗。

从何家大门进去是前厅，前厅与后厅隔着一个鱼池大的四方天井，天井左右是两个与前后厅一样大的侧厅。四个小厅加一个天井，格局颇像大排笔写的一个“+”，即阿拉伯字的加号。何老爷何志存懂得洋码字，对这个加号偏爱有加，逢人就问：“懂不懂这一横一竖的意思？……不懂吧？我告诉你，加号表示添福添寿、多子多孙、招财进宝、步步登高。天下人家，哪个不图只进不出、只上不下、只前不后、只热不冷……”加号寄托了何老爷太多太多的期待。

“恭喜何老爷，您又添了一个胖孙子！”

当接生娘以恭维的笑脸向何志存道完喜后，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起来，左邻右舍的道喜声就传了进来，进进出出的脚步声也密集了起来。一时间，村里的寒冷散去了许多。

婴儿的爷爷何志存何老爷站在大厅中间，红光满面，拱手作揖，一一答谢前来贺喜的客人，连声说着：“同喜同喜。”

何志存戴着镶有红宝石的貂皮帽，穿着藏青哗叽棉袍；脑后垂着一条灰白色的辫子，胸前掩着麻丝似的胡须；适中的身躯，白净的皮肤，加上慈眉善目，给人一种亲和感。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何志存拥有四百多亩良田、一家大商铺、五个儿子、多个孙子孙女。在方圆数十里的老关地面上，何家是个人丁兴旺、财源广进的大户。

何志存的儿子、新生儿的父亲何秋美，似乎与产房中的母子没有任何关系，站在墙边，认真巡看着年历。最后他的视线落定在一行文字上，并轻轻念道：“农历一九〇六年正月初九，公历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号。”念完，又自言自语说：“天冷地冷的，这个时候生出来，莫不是来受苦的吧？”

这些年，何秋美苦事连连，已经苦怕了。现任妻子之前，他已经娶过两个妻子，一个叫黄氏，一个叫颜氏。黄氏娘家离何家十里远，为下埠乡马迹塘。黄氏族人会读书，出人物，有个叫黄爱堂的，时任淞江县（现在的上海市）的知县。黄家非常富有，可惜黄氏命不好，为何秋美生下一个男儿就得病死去。继任颜氏，家境也很殷实，但哥哥横行乡里，名声很坏。可能是老天存心让兄债妹偿，颜氏嫁往何

家没几年，也暴病逝去。吸取了前两次娶富家女当儿媳的惨重教训后，何志存第三次给何秋美娶亲时，就选了贫家女子金氏。这一选择果然有效，金氏进门第二年，这不，就顺产了一个胖小子。

何志存见何秋美独立一边，没好气地说：“字不认得几个，还在那里看，不去你岳父家报喜呀？”

何秋美的谱名为何启期，是何志存五个儿子中的老三。何秋美瞥了眼何志存，冷冷地说：“先给你孙子取个名字吧。”

何志存说：“起什么起？不早跟你说过了吗，是男儿就叫何克全！”

何秋美问：“何克全？为什么叫何克全？”

何志存反问：“为什么不叫何克全？他哥哥叫何克万，他就该叫何克全。要是何克全再有弟弟，就取名何克贤。你想想，要是把他们兄弟名字后面的三个字连起来，不就成了万、全、贤？多好！”

“爸！”何秋美转过身来说，“我觉得克字不好。你想想，克万出生没多久，他妈为什么会突然死去？他的后妈进门没几年，为什么也暴病突然死去？我看问题就出在那个克字上。已经有个克万，还要个克全，莫非克了一万还嫌不够，还要克掉全家人？”

“混账话！”何志存狠瞪儿子一眼说，“哪有你这么看名字的？简直半个睁眼睛！告诉你，克万众者为将军，克全部者为大帅，克贤人者不是状元就是榜眼，再不济也是个探花。克是什么？制伏也，战胜也。我们萍乡乾隆朝出了个探花刘凤诰，当今光绪朝又出了个榜眼文廷式，现在就差个状元郎了。为什么这个状元郎就不能出在我们何家？……”何志存读过不少书，平时喜欢说古论今，常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加上早成了当地的富翁，在乡土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近些年来，十里八乡有什么婚丧喜庆、纠纷诉讼，总是请他到场，求他解个难、拿个主意什么的。久而久之，他的话在当地也就有了一言九鼎的味道。现在何志存认定的事，何秋美知道十有八九变不过来，说了也白说。何秋美要出门去。

何志存喝问：“去哪里？”

何秋美说：“今天是正月初九，年也过得差不多了，听说老关街上来了不少反清复明的外地人，乱得很，我怕商铺在外来人面前吃亏，看看去。”

何志存又喝问：“人宝贵还是商铺宝贵？万贯家财无人继承，赚钱有什么用？”

④

先别去街上，先去你老丈人家报喜。”

何秋美说：“不能让别人去吗？”

何志存说：“如果你能替你婆娘生儿育女，就让别人去；要是不能，就得你去。两个儿子的父亲了，连这点礼数都不懂！”

这时，何秋美的大嫂从厨房出来，将一只篮子交给何秋美。篮子里盛着一壶酒，一块肉、一挂鞭炮、两包果子。

“慢点！”何志存走上前来，将锡壶嘴上的棉团拔下，扔到一边，埋怨大儿媳说：“都是养崽变世的人了，连个报喜的规矩都不懂。”

赣西与湘东地面上，报喜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为了避免直接说生男生女的尴尬，是男儿不堵壶嘴，是女儿则把壶嘴堵上。

何秋美接过篮子，很不情愿地走出门去。

二、嗜读如命

老关过去叫插岭关。插岭关的来头，就在于赣湘两省交界处有座南北走向的石头山。石头山把江西、湖南截然分开，插进两端的大山里。边民为了方便进出，日积月累地把石头山凿开一道口子，让车马行人自由进出。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吴国为防止强大的楚国的骚扰，在进入关口处砌了一堵城墙，设了坚固的城门，驻军把守。由于插岭关年头太久，石头兵马道上留下了许多条很深的车辙。

明朝初年，朱元璋来到这里体察民情，望着高高的城墙和城墙上癣疥似的青苔，感叹城关所历的沧桑，长叹一声说：“真是一座老关啊！”

萍乡县令马六绪，被皇上金口玉言醍醐灌顶后，眼珠子滴溜儿一转，立即令人把城门上的“插岭关”三个字凿下，代之以镏金的两个魏碑字——老关。自此，老关的地名一直沿袭下来。

到了二十世纪的初期，老关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集镇。

老关成为赣湘边界上的经济文化大镇，并不是因为这里有座古老的关口，而是这里有条刚建不久的铁路。这条铁路，是借西洋人的钱建成的。铁路横贯东西，接连两省，是赣西湘东人员和物资快速流向长沙、武汉和长江流域的主通道。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世界列强纷纷觊觎中国。一八九四年，中国与日本

在黄海上打的那场甲午海战，把中国打进最最黑暗的时代。这一仗，中国吃了大亏。日本于一八九五年春天硬逼着大清朝派李鸿章，在一个叫马关的地方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了拯救江河日下的大清颓势，康有为联络在京十八省举人，策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公车上书”活动。在激愤中，康有为连夜写下两万字的《上清帝书》，振聋发聩地呼吁大清上下，包括光绪帝在内，好好检讨自己，在卧薪尝胆中思变图强。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光绪下达“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并向慈禧太后摊牌说：“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洋务派借此机会，师夷制夷，大兴实业，以达到与维新变法派殊途同归、振兴中华的目的。他们大兴煤铁业，希图以自炼钢铁，造出坚船利炮，与洋人一决雌雄。洋务领军人物之一的张之洞，凭借湖广总督的身份，先在湖北大冶建铁矿和煤矿，继而在汉阳建造了炼铁厂。可炼铁厂所炼生铁出炉后，叫张之洞傻了眼，全是“夹生饭”，根本不能作炼钢之用，原因是炼铁的焦炭火力不够。张之洞无可奈何，只能把铁厂拱手让给盛宣怀，让他接手自己的事业。其时，盛宣怀的电报、轮船、机织业等已在上海等地酿成了大气候。接手铁厂后，盛宣怀派人四处找好煤，结果在江西萍乡找到。一八九八年，盛宣怀利用德国的贷款和技术，建成了安源煤矿。可是优质煤从萍乡运到武汉，要走一千多里路，仅靠萍乡河又窄又浅的水道运到湘江，根本不能满足铁厂的需求。于是，从一八九九年开始，盛宣怀向德国人借款，建成了萍乡至湖南株洲的萍株铁路，使萍煤在湘江边上船，直达汉阳铁厂。老关是萍株铁路的必经之地，又设了上下货物与旅客的火车站，因此，这个集散地就给老关带来了无限商机。与此同时，火车又把长沙、武汉等地的许多新思潮、新信息带进萍乡，使得萍乡人的思想在闭塞的江西率先开化起来。

何志存何老爷凭着那颗精明的脑袋，抢得商业先机，在老关火车站的对面设了店铺，将一条滚滚财路尽收店铺之中。

自商铺建成以来，何志存赚了钱、买了田，也见证了发生在近代历史上许多有影响的大事件。

何克全出生的这年，即一九〇六年初夏，南方爆发了一次继太平天国之后的农民大起义。起义的策划者是中国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黄兴。由于康梁维新变法失败，他们转而拥戴光绪帝君主立宪的主张，继续中国的皇权统治。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与康梁的保皇势力分庭抗礼，提出“民族

④

主义推翻满族统治，民权主义建立民国，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这个主张得到进步人士和民众的积极响应。这次由黄兴策划的起义，就是揭“三民主义”之竿而起的。起义军以萍乡、浏阳、醴陵为中心，其声势席卷江西省的宜春、万载、修水和湖南省的衡山、湘潭、平江等十多个县，震惊了大清上下。由于清军全力镇压，起义军最后失败。何志存的商铺在战火中遭到损毁。但从这一年起，满清王朝的丧钟开始敲响。

何克全五岁那年，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省相继响应，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革命胜利的成果不久却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何志存的商铺在赣湘军阀争夺萍株铁路和萍乡煤矿的战火中惨淡经营，每况愈下。

俗话说：崽大爹难做。何志存年事已高，加上创业持家心力交瘁，不得不让他的大家庭解体，实行分灶吃饭。他给五个儿子每人分了五十亩水田，一幢房子。何秋美因为少分一些钱，便以接下街上的商铺为弥补。到一九一九年夏天，何家商铺与一九〇六年何家商铺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房子旧了，木料脆了。

“全伢子，手作痒是吧？在那里画什么画？”铺外，何秋美将买东西的人打发走后，问何克全。

何克全正全神贯注地站在木板墙边，似乎一点也没听到何秋美的招呼。

见儿子把他的问话当耳边风，何秋美不得不转过身来，向何克全看去。原来，何克全正在画一幅画。只见那画成的牛的右边站着一只龇牙咧嘴的狼。狼的前面，一只小狼越过牛脖子界线，正在啃着牛的身子。

何秋美瞧了老半天，也没看懂这画表达什么意思。他以为何克全吃饱了没事，在“鬼画桃符”打发着时光呢，于是不悦地问：“听到没有，全伢子？”

何克全在父亲的呵斥中醒来，见父亲正在责备自己，就说：“爸，你莫吵，我在做正事。”

“正事？”何秋美不屑地一笑，说，“什么正事，画在墙上的饼能当饭吃吗？”

何克全停下笔，不满地望着父亲说：“爸，你就知道吃，却不知道世上还有比

吃更紧要的事情。”

“哟嗬！”何秋美的声音高了八度。他今天真是眼界大开了，没想到从乳臭未干的儿子嘴巴里竟然吐出比吃还紧要的事情来。今天他倒想听听，这世上哪件事比吃饭更重要。在何秋美的心目中，只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却从来没听说有比吃饭更大的事，于是问：“全伢子，你跟我说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填饱肚子更要紧？”

何克全指着图画，指头在上面敲了敲说：“这就是最紧要的事情。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幅中华民国的形势图。”

何秋美不懂装懂地点了下头说：“我知道，这不是旧式的，旧式的在你手里，你用粉笔照着画的就是新式图。”

何克全大声说：“错了！不是新式图，是形势图。形是什么？就像人的轮廓和桌子的轮廓一样，中国也有轮廓，那轮廓线就是全中国的平面形状。那势是什么？就是国家是强势还是弱势，强势可以战胜别人，弱势被别人欺负。”

何秋美被儿子这么一说，一下钻进了云里雾里说：“哦，我知道了，中国现在的形势牛皮得很，把一只小狼都吞进喉咙里去了。”

“不！”何克全根本不给父亲脸面，大声纠正说，“中国的地形图虽然像头牛，但它是一头菜牛。菜牛是什么？就是被别人当菜下酒的。你看，我们国界外站着的这只狼是什么？就是日本！这只小狼进到我国国土上，就表示日本霸占了我国的领土。”

何秋美一听国外的事，头脑就像成了糨糊，只能傻傻地望着儿子。

何克全平时不太说话，今天因国势衰败气得不行，话就多了起来。他放开嗓门说：

“日本人为什么敢侵占中国的国土？这是‘巴黎和会’欺负人。什么叫‘巴黎和会’？就是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打了败仗的德国和奥地利向英国、法国、美国签字投降，结束了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年一月，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几个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他们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的事实，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的要求。‘和会’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卖国的北洋政府打算在条约上签字。五月

④

四日，也就是上个礼拜，北京大学和另外一些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他们高呼‘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何克全越说声音越高亢，越讲情绪越激愤。

很快，他的声音引来了不少路人驻足围观。

何克全七岁进养正小学读书。养正小学属新式学校，由何、刘、颜三家联办，设在建于三百年前的斌公祠里，与何家隔垅相望。学校请的先生都经过乡试，教学水平比较高。养正小学主要教授珠算和历史。四年以后，何克全考入萍乡西区高等小学。

何克全对珠算不感兴趣，认为那是生意人上的课，是教生意人怎么锱铢必较去算计别人。

他喜欢历史。喜欢历史上为民请愿、刚正不阿的文臣，喜欢历史上慨洒热血、以身许国的战将，喜欢听与国家命运相关的课程，如鸦片战争、三民主义，等等。

西区高等小学是萍乡县办得最好的学校，设在老关乡公所附近，离火车站不远。课余和节假日，何克全经常来父亲的商铺转悠。

平日里，何秋美很怕何克全和他的哥哥何克万来商铺。兄弟俩来商铺没有别的事，一来就巴掌向上——要钱。时局动乱，商铺生意很不好。大儿子何克万已经娶妻生子，第三个儿子何克贤也在读小学，家境越来越困难。不曾想，这个时候何克万居然染上了赌钱打牌的恶习，常常把大把大把的钱拿出去，然后把两只空手带回来，气得何秋美只想在自己头顶上砸个大洞出气。

何克全要钱则不同。他拿着银元出去，却搬着一摞摞的书报回来。何克全爱书如命，见书就买，如《左传》、《论语》、《孟子》、《古文观止》、《诗经》、《唐诗》、《资治通鉴》、《说岳全传》等，不吃不喝也要将它们往家里搬。他不光买书，而且如饥似渴地阅读，冬天热水洗脚，常常因看书入迷把半桶热水洗到冰凉才肯罢休。

何秋美一直不相信儿子读得懂老书，以为他是猪鼻子栽葱——装象。有一次，他指着书上一个多笔画字问何克全：“这字念什么？”何克全看了眼，说不认得。何秋美讥笑说：“看看，一个不识几个字的人，还装模作样当书生。”

何克全说：“爸，你为什么专挑笔画多的字考我？”

何秋美说：“笔画少的字你也不一定认得。”

何克全说：“这有可能，因为《康熙字典》有十三万个字，四角号码新辞典也有五万多个字，一个人哪怕每天认字，一生怕也认不完。一个人为什么要认得所有的字呢？能认识五百个常用字，就能读懂一篇文章的意思的百分之七十；如果能认识常用字七百个，就可以读懂文章意思的百分之九十。长字读一截，宽字读一边，一篇文章里有些字即使认不出来，也不会影响我读懂它的大概意思。”

“你……”何秋美被说得哑口无言。

见围观者越来越多，何克全情绪更激愤了说：“……中国为什么老被外国欺负，就因为原来的满清政府腐败，就因为现在的北洋政府无能……”

何秋美见儿子奚落现在的政府，锋芒直指达官显贵，知道这事不是闹着玩的，俗话说得好，祸从口出啊，他赶紧采取措施来封儿子的嘴巴：“全伢子，你活得不耐烦是不是？一双脚还没走出萍乡，懂得什么中国、外国？懂得什么腐败无能？尽是狗咬蚊子——随口撩！”

何克全在后来的自传中记述了这件事：“在高小第二年的时候，当时学校也发生过一次反对‘巴黎和会’和收复山东权利的运动，绘了许多日本人侵略中国和利权外溢的画。这大约是五四运动时的事。当时我跟着人家去开会……”

此时，他不满父亲对他的干涉，大声争辩说：“爸，我的脚虽然没有走出萍乡，可我的眼睛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全省、全国、甚至世界，我的眼睛从书本上还看到中国两千年来所发生的很多大事情。”

何秋美说：“纸上说的，书上写的，都是文化人瞎编出来的。”

何克全说：“你说得不对，有的东西能编，有的东西不能编，比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可以编，但是《史记》、《二十四史》不能编，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巴黎和会’也不能编……”

何秋美见儿子跟自己抬杠，知道没文化的自己谈古论今肯定不是儿子的对手。出于对儿子的爱护，不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因指责当局授人以柄，何秋美便拿起木棍，指着何克全说：“全伢子，你身上的奶腥味都没脱尽，就胡说八道国家的大事，我打你！”

何克全全然不顾父亲的威胁说：“爸，你不过问国家的事也就算了，还拿棍子来打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我看你是吃了国家饭、不理国家事的糊涂虫！”

“哈！”围观者哄堂大笑起来。

何秋美气急败坏，棍子一举，就冲儿子打来。

“他爸！”何克全的母亲金氏一步上前，抓住棍子说，“有事说事，怎么打人！”

何秋美使劲挣着金氏抓住的手说：“再不打人，政府的枪子就要打我跟你了！这个孽障！”

金氏死死抓住木棍，大声喝令儿子说：“全伢子，还不快走！”

何克全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对金氏说：“妈，人长着嘴巴，除了吃饭、喝水，就是说话。君子动嘴不动手，有理可以说服人，用武力压制人，不算什么本事。爸这样做，跟北洋政府镇压学生一个样，蛮横霸道！”

“说得好！”何克万刚从赌场上出来，见弟弟对抗父亲，赶紧凑进来说，“何秋美家成了阎王殿，哪里还是人生活的地方？大儿子打几手麻将挨打，二儿子画一幅画也挨打，儿子们都成何老倌子的出气筒了！”

何克全正色说，“哥，你挨打活该！嫖赌逍遥，何家能经得起几回折腾？再像你这样混下去，全家人都得出去讨米！”

“噢！”何克万本来想拉弟弟一起对付老头子，没想到弟弟不领情，竟当着众人的脸教训起大哥来，这使他不得不赶紧掉转枪口。他走到何克全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全伢子，你算什么东西，敢教训你大哥？！告诉你，赌钱败家，最多让家人讨米，可一天到晚骂政府的人，到时可得叫全家人跟着掉脑壳！”

何克全说：“为了国家，掉个脑壳要什么紧？谭嗣同说得好：‘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何克万说：“你不要紧我要紧，我还要留着脑壳吃香喝辣呢。”

何秋美见二儿子不服管，大儿子管不服，当着这么多人让他下不了台，索性扔掉棍子，噌地操起案板上的剔骨刀，递到何克全面前说：“小祖宗，你先把老子杀了，免得今后让我死在别人的手下！”

金氏从没见过丈夫动这么大火，不识字的她这才知道儿子这画真会惹来是非，于是，赶紧冲着何克全说：“全伢子，想气死你爸吗？快给我回家去！”

何克全这才闭住嘴。

何克全可以跟父亲顶牛，却不愿让母亲生气。母亲出身贫寒人家，在较富有

的何家没什么地位，更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不能让母亲因为自己的原因遭父亲的打骂。

何克全丢了粉笔，平心静气地对父亲说：“爸，中国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正因为这样，才经常遭受外国人的欺负，我真为你这样的人感到悲哀。”

三、学生领袖

一九二〇年七月，何克全以优异成绩考入萍乡中学。

萍乡中学早期叫鳌洲书院。鳌洲书院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坐落在萍乡县城小西门的鳌头洲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哪个不企望在求取功名中独占鳌头？所以这座书院就起名为鳌洲书院。

一八九八年，清廷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和萍乡知县顾家相等筹资重修学校时，将鳌洲书院更名为萍乡学堂。

萍乡中学是江西西部最好的中学，不少北大毕业生都来这里任教。因为教师思想前卫，教学方法先进，所以学校自由空气相当浓厚。教师在国文教学中，力倡白话文，摒弃文言文；思想上追求新潮，教法上力争适时，使学生对新事物充满兴趣。在当时的校园里，师生有追随胡适的，有追随无政府主义的，有追随社会主义的，有倡导国民促进会的。有的师生还力主萍乡中学应该向安源煤矿学习，说安源煤矿能建立工人俱乐部，萍乡中学为什么不能建学习俱乐部？

为什么一所中学要向一个煤矿学习呢？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是一个将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伟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斗争的需要。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一大”代表毛泽东来到安源煤矿，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下煤井、进锅炉房、上火车头，与工人们交朋友、结兄弟，毛泽东惊喜地发现，安源煤矿和安源铁路湖南籍工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工人因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深重，反抗精神特别强烈。在考察完回湖南后，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先后派从法国、苏联留学回来的李立三、刘少奇，到安源煤矿和铁路开办工人夜校、组织社会团体、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的秋天，当安源的共产党员

④

和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发展到可以跟煤矿、铁路当局分庭抗礼的时候，毛泽东及时作出部署，由李立三在幕后、刘少奇在前台发动了一次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由于有路矿工人的强大势力，有全国各地工人俱乐部的强烈策应和声援，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罢工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俱乐部使产业工人在铁路和煤矿中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安源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李立三、刘少奇多次来萍乡中学的讲演，使得师生受到了极大鼓舞和激励。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作为工人领袖的神奇魅力，在何克全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追随这些有胆有识的领袖，为劳苦大众争权益，为平民百姓谋幸福，为人类的解放作斗争。

“罗校长，”一九二四年初冬的一天，何克全走进罗运磷的办公室，手捧着一本杂志，恭恭敬敬地递到罗运磷手里说，“谢谢您借我这本《新青年》。”

罗运磷放下报纸，接过杂志，问：“好看吗？”

何克全说：“白话文加标点，读起来不费解，像行云流水一样顺畅，可以节省好多读书时间。《新青年》文章特别新潮，思想非常激进，很适合青年学生阅读。”

“是吗？”罗运磷示意何克全坐下，并给他泡了一杯茶。

罗运磷生于一八九六年，大何克全十岁。罗运磷一九一六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运动前，他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城里到处演讲，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五四运动中，他和讲演团的其他同学，不顾军警的阻挠干涉，直接揭露帝国主义把巴黎和会变成分赃会议的恶行，呼吁国人要为收回青岛主权而斗争。一九二〇年演讲团总干事邓中夏离职，罗运磷接替，之后，演讲内容扩大到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社会改革的必要性等。罗运磷一九二一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萍乡，创办了上栗女子学校。一九二二年受聘萍乡中学校长。在萍乡中学，他既当校长，又教国文；既是实行白话文教学的力推者，又是号召学生争做新青年的首倡人。他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充分发表不同看法和见解的授课方式，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何克全说：“文章加标点，还可以避免读者对文章产生歧义。”

“哦，”罗运磷非常欣赏地望着何克全说，“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

何克全受到鼓励，一点也不拘束地说：“比方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过去我们一直是这么读，如果加了标点，就可以读作‘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而这两种不同的读法，却使文章的意思完全相反起来。前者的意思是，让平民百姓只能听任统治者像使用牲口一样呼来唤去，而不肯让他们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后者却不是这样，它的意思是，平民百姓知道怎么做，执政当局就该让他们自由自在去做；如果他们不懂得怎么做，当局就该教他们文化，让他们懂得怎么做。”

“好！”罗运磷以手击案，眼中放出惊喜的亮光。

何克全一九二〇年九月入萍乡中学，罗运磷一九二二年到校，只当过何克全两年多的老师。尽管师生关系时间不长，但罗运磷对这位特别喜欢看书读报的学生一直暗中关注，必要的时候，还会给他一些思想上的启迪和点拨，让他的所思所想朝着他所希望的正确方向发展，朝着更高的层次攀登。此前，尽管罗运磷认为何克全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但他无论如何没想到，何克全在研究使用标点符号时，竟能把两千多年来人们普遍认定的读法读出如此截然相反的意思来，这是对约定俗成的读法的一次大颠覆啊！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十八岁的学生敢于突破已有定论，读出如此大胆的新意来呢？

“校长，”何克全不待提问就说，“您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给古文标点？学生认为，这样加标点，孔圣人是会允许的，孔圣人讲仁者爱人，他老人家总不会允许统治者把平民百姓当牲口来使唤吧？就算孔圣人不同意我的解读，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变过来呢？‘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没什么文化的安源路矿工人，尚且敢喊出这样的口号，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安源工人学习，大胆地向腐朽落后的教学制度宣战呢？”

罗运磷为有何克全这样的学生激动得不能自己。是啊，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劳苦大众身上套上的枷锁实在太多，该是砸烂这些枷锁的时候了。罗运磷兴奋地问：“克全同学，由此看来，你同意我所提倡的白话文，同意我和黄道腴老师所倡导的校园风气喽？”

“是的，您和黄道腴老校长上的课，同学们都喜欢听。您来萍乡中学当校长，同学们的心情舒畅多了，心理压力减轻不少。”

“真的？”

“校长，我是同学们选出的学生会干部，我作过调查，这是真实情况。”

罗运磷站了起来，在房间踱步。

④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党的组织发展很快。那一年夏天，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已经密派李味农来萍乡中学发展党团组织，李味农的公开身份是教导主任。通过李味农的影响，罗运磷已经向中共湖南省委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党的组织。罗运磷了解到，由李味农指导成立的共青团小组中，成员已包括张国焘的弟弟张国庶等人，何克全是培养对象。何克全等人还在黄道腴的指导下，暗中组织了“新青年研究会”。作为一校之长，罗运磷为自己的学生积极接近这种组织高兴，他希望萍乡中学能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培养和输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可是，任何进步事业，总会遭遇反动势力的阻拦。北洋政府在萍乡的代言人——萍乡县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让萍乡中学采用白话文教学，禁止学生读《新青年》、《向导》之类的进步书籍。不久前，他们还查处了“新青年研究会”，已经对黄道腴和何克全等人发出了严重警告。官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前，李立三以办夜校、为工人扫盲为名，取得县政府的批文。没想到，这个公开的工人夜校暗地里却演变成了工人俱乐部，成了共产党人开展工人运动的坚强堡垒。由于路矿工人队伍的壮大，远离大都会的安源，竟引发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大罢工。罢工的胜利，使萍乡安源成了激进的无产者的集结地。一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已经够萍乡县政府受用的了，如果再让萍乡中学以白话文教学开始，闹出什么组织来，北洋政府在萍乡的代理人就得丢饭碗啊！县教育局昨天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萍乡中学不放弃白话文教学，黄道腴等教师就得卷铺盖走人。罗运磷是个有着远大理想的校长，决不能让萍乡中学刚刚掀起的革命热潮就此偃旗息鼓，他要让萍乡中学的革命组织越做越大，越做越强。为此，罗运磷正在思考着怎样对付县政府的刁难。这时，何克全的出现，让罗运磷看到了解决这场危机的希望。罗运磷想，如果把学生喜欢的新式国文教学将被取消的消息告诉学生们，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学生们一行动，县政府还敢动手吗？众怒难犯啊。想到这里，罗运磷不再犹豫，来到何克全面前说：“克全同学，你和同学们认为好的东西，可有人认为是不好。”

“哪些人？”

“就是取消‘新青年研究会’的县知事夏家鼎和县教育局局长。”

“是吗？”

“他们刚才派人来了，通知我们从明天开始，重新回到文言文教学中去。”

何克全吃惊地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做？”

罗运磷说：“不让我们进行白话文教学，只是表面现象。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不让学校发生像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那样的事，不允许同学们汇入到时代大潮之中去。”

何克全问：“安源路矿工人受压迫最重，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有什么错？”

罗运磷说：“就是！不让弱势群体说话，不让学生学习新事物，看来，我们得向安源工人学一学，来一次大反抗。”

何克全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校长，我早就忍不住了，我们组建进步组织，他们取缔。我们以白话文教学，他们不同意。我们看进步书籍，他们查处学生。前不久我和刘型、张国庶等同学要求成立‘萍乡县国民会议促进会’，他们说我们图谋不轨，简直欺人太甚！校长，我马上组织同学，找县教育局的头头说理去！”

罗运磷说：“好，只要同学们敢站出来，我和老师一定支持你们！”

教育局设在县政府内，县政府位于县城中心一个叫凤凰池的地方。

听到学生来局里请愿，县政府知事夏家鼎急忙请求北洋军张宗昌部将大门守护起来。夏家鼎是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来萍乡上任，是民国以来萍乡第十一任知事。任萍乡知事时间比前十任长，直至一九二四年底才离开萍乡。一九二六年一月，县政府长官才由知事改称县长。

面对义愤填膺的几百名学生，夏知事站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后的桌子上，握着洋铁皮卷成的大喇叭，大声劝告说：“同学们！同学们！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现在是国家动乱、民不聊生的时期，本知事作为一方之父母、萍乡之牧人，为了萍乡的稳定，为百姓的安康，殷切希望大家不要受居心叵测之人的煽动和调唆，赶紧回到课堂上去……”

何克全站在学生队伍的最前面，将指向他的刺刀拨到一边，指着夏家鼎大声发问：“国家遭劫，军阀混战，人民涂炭，请问夏知事到底是谁的责任？”

望着这位身材不高、气势凌人的学生，夏家鼎一时语塞说：“这个……”

何克全不给夏家鼎一点喘息的机会，逼视着说：“夏知事，是你们的责任！你们是国家的蛀虫，你们是人民的刀俎！作为萍乡的未来，中国的未来，我们青年人

④

从现在开始，必须学习白话文，追求新思想，建立新组织，让一切阻挡历史进步的人滚出萍乡去！”

张国庶立即策应何克全，带领同学们高呼口号：

“我们要白话文！”

“我们要建立国民会议促进会！”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

市民听到动静，纷纷从大街小巷跑过来，围着学生看热闹。

这时候，从萍乡中学前来这里声援抗议活动的学生越集越多。

夏家鼎恼羞成怒，指着何克全说：“这位同学，你可要对刚才所说的话负责！”

何克全说：“我当然负责，不负责我今天就不来县政府了。”说完这话，何克全转过身来，面对全体同学号召说：

“同学们，现在是我们向萍乡中学负责的时候了，冲进县政府，把那个该死的教育局砸了！”

“上！”张国庶、刘型应声而动，他俩手臂一挥，带领学生向大院中冲去。

北洋军原以为有刺刀、枪弹在手，就能吓阻这些学生，没想到学生们毫无畏惧，他们迎着刺刀，直扑过来。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学生和市民，士兵们乱了阵脚，他们担心学生和市民组成的人流会将他们撞倒，踩成肉饼，急忙闪到一边，让学生进了院子。

学生们冲进教育局，冲进局长室，砸桌子的砸桌子，劈凳子的劈凳子，撬门板的撬门板，拆窗户的拆窗户，抗议声响彻半座萍乡城区……

第二天，夏家鼎带着教育局局长、警察局局长等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来到罗运磷的办公室。

夏家鼎将文明棍猛敲在罗运磷的办公桌上说：“罗运磷，三番五次叫你去县政府，为什么不去？”

罗运磷说：“我寻思再三，认为没有必要。”

夏家鼎问：“为什么？”

罗运磷说：“知事叫我去，无非叫我处理学生。可我认为，学生这次行动实属迫不得已。官逼民反嘛，我的学生是被逼成这样的。”

夏家鼎问：“谁逼的？你说！”

罗运磷指着教育局长说：“你问他。”

夏家鼎瞥了眼教育局长，说：“他无非叫学校放弃白话文教学，这有什么错？”

罗运磷说：“当然错了。白话文教学已经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什么我们还要像当年保留那条该死的长辫一样，在教学上抱残守缺，复古那些‘之乎者也’？”

夏家鼎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文言文教学是北京政府规定的，全国一致，萍乡中学怎能例外？教育局局长要求执行教学大纲，没有错！”

罗运磷说：“既然你们认为没有错，那我就只能让学生们向你们表示抗议！”

“罗运磷！”被顶撞的夏家鼎恼羞成怒地说，“我看这校长你是不想当了！”

罗运磷说：“强迫学校死守旧制，不思改革，这样的校长不当也罢。”

夏家鼎说：“那好，现在你就给我滚出去！”

“不行，萍乡中学不能少罗校长！”一个声音传进来，只见何克全大步闯进校长室，直接走到夏家鼎面前说，“夏知事，昨天的行动不关校长的事，是我一手策划的！要处理就处理我，开除也好，坐牢也好，随你的便！”

夏家鼎来校的行踪被何克全发现后，他一直跟在他们后面。校长室内发生的一切，已被窗外的何克全看得一清二楚，他不能让罗运磷离开学校，坚决不能！因为有罗运磷在，萍乡中学要求进步的学生就有一棵大树遮风挡雨。

学生们当下最需要的是罗运磷的呵护啊。

何克全的出现，让罗运磷吃了一惊。昨天砸了教育局，罗运磷就叫何克全赶紧回乡下避风头，等风头过后，再通知他回校上课。没想到何克全竟没有离开学校。

夏家鼎正愁不好下台，见何克全突然出现，赶紧表态说：“好！很好！看来何克全是个敢作敢当的学生。警察局局长，将何克全带走！”

警察局局长一挥手，四名警察冲了上去。

“慢点！”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来人身穿长棉袍，颈绕长围巾，一副学者模样，此人就是萍乡中学资深教师黄道腴。曾经是萍中学生的张国焘，在他的《我的

④

回忆》一书中对黄老有过记述，他称赞黄道腴说：“学堂里一名聪明的、有不同见解的地理老师……”黄道腴笑着对夏家鼎说：“夏知事，你最好冷静地处理好这件事。”

夏家鼎问：“为什么？”

黄道腴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窗外可是集合了萍中的大量学生，青年一旦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心至终身坚如铁啊。”

夏家鼎转头一看，就见窗玻璃上紧贴着很多学生的脸。那些学生的鼻子和嘴唇，早被窗玻璃挤扁了，他们就像要破窗而入，向他冲来一样。在那些学生的背后，一层又一层地缀着许多学生，他们紧握双拳，怒视着室内。

黄道腴说：“夏知事，学生做的事有错吗？我看没有错，要是逼急了，他们要像安源工人一样对付你，这事恐怕就很难收场了。”

听到“安源”二字，夏家鼎的气焰顿时收敛了许多。

是的，前年安源大罢工，也是这样一种局面：室内针锋相对，室外万人声援，矿工紧紧围在安源煤矿办公楼外，几天几夜，闹得一个旅的北洋军都奈何不了。前任知事范子宣，因为妥协解决大罢工危机，心力交瘁，丢了知事的帽子。如果萍乡中学再来一次几天几夜围困县政府，他这个知事就得乖乖卷铺盖，像范子宣一样走人啊。

见夏家鼎已经动摇，黄道腴立即满脸笑容说：“夏知事，你很久没有来学校视察工作了，今天来了，就好好看看吧。等下罗校长为你准备一个工作餐，我们喝上两盅，好好研究一下今后怎样进一步以白话文进行教学。”

夏家鼎如鲠在喉，两眼充血地盯着黄道腴说：“谁有工夫跟你们闲扯？告诉你，管好你的学生，别没事找事。何克全带头砸教育局，这事不能就这么了了！”

夏家鼎说完，带着随员气急败坏地走了。

四、第一次婚姻

何克全砸县教育局那一天，何秋美通过媒人，已经给何克全相好了媳妇。

这女子姓孙，因为在家排行第二，叫孙二妹。孙氏是老关渡口村孙家冲人。孙家离何家相隔不过五里远。这女子一九〇七年生，小何克全一岁，因家境不太好，没有进过学堂门。

就在这个时候，为保何克全不被县教育局开除学籍，罗运磷叫何克全回家暂住。

何克全走进家门，何秋美以平日里难以见到的高兴劲迎着儿子说：“克全，你回来得正是时候。”

何克全十分莫名其妙，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待过他，尤其是对他的称呼，一下子将“全伢子”改成了“克全”。

何秋美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说：“别懵头懵脑的，听你妈跟你说去。”

“克全……”金氏把儿子叫进卧房，把家里已经为他相好了媳妇的事告诉了他。

何克全听完，一屁股坐在凳上，目瞪口呆地望着母亲。

这时的何克全，哪有心思娶妻生子啊！

他是个有志青年。

他要当引领时代潮流的一员。

他要向一九一四年离开萍乡中学的张国焘学习，去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去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

通过多种渠道，何克全得知，学兄张国焘在外面已经成了气候。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学兄张国焘就是带头人。听说现在中国共产党里，张国焘成了领导人之一。可以预见，将来的张国焘将会被写进中国历史的进程中。

何克全埋怨母亲说：“妈，你怎么这样糊涂，不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定这种事？”

金氏说：“你已经十八岁，应该成家立业了。”

何克全说：“妈，你和爸爸知道我眼前的事业是什么吗？”

一直躲在门外偷听动静的何秋美，见儿子不肯接受他的意志，推门而入，正色说：“你眼前的事就是娶亲生子，买田起屋！”

何克全说：“爸，你简直是老鼠眼睛。”

何秋美问：“说我只能看到一寸远？”

“当然！爸，老实说，我不想跟你一样，一生一世就缩在小小三角池里，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莫非你能漂洋过海，大闹天宫？”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哈……”何秋美后仰着一阵大笑，大笑之后，指着儿子说：“我没时间跟你操牙劲，回答我，到底同不同意娶亲？”

何克全干脆利落地回答：“不同意！”

何秋美平日确实不肯给儿子以笑脸。“子不教，父之过”，教子就得严厉，就得威逼。今天，他之所以讨好儿子，就是想通过这一个笑脸讨得儿子的欢心，以便让娶亲之事顺利地进行。现在看，一团和气终究解决不了问题。何秋美是个能掐会算的角色，早就想好了对付儿子的手段，于是说：“全伢子，不娶亲可以，从明天起，你不要读书了，跟我下田当牛做马去！”

何秋美说完，两手一背，转身走出门去。

听着父亲撂下的话，何克全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望着儿子一下呆成个木头人，金氏吓坏了。金氏知道，不让儿子上学，等于要他的命！儿子怎能不上学呢？金氏赶紧把房门关上，把儿子按在凳上，安慰说：“克全，妈让你上学，妈让你上学，别听你爸的，啊？……”

听着母亲的安慰，何克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知道，母亲心疼也只能是心疼，母亲于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因为家里针眼大点的开支，都捏死在父亲手里。

若按原来的脾气，何克全是要冲出房门，跟父亲理论去。赣西话说得好，“一千斤的牛牯不喝水，非得要它喝，这是哪来的道理？”但何克全比以往成熟多了。家里的窘迫摆在那里，大哥不但不承担养活妻子和四个儿女的责任，而且在赌场上越陷越深，把爷爷分下来的田地输得所剩无几。自己和弟弟又坚持读书，读书的钱从哪里来？父亲这些年来，额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多，他不能不面对家里的现实情况啊。

见儿子不说话，金氏说：“……克全，你爸要是有办法，决不会让你离开学堂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就听妈一回，先把媳妇娶进来，让她替你为家里做事，你再去学校读书好吗？”

何克全知道，因为自己砸了教育局，学校一时回不去。即使回得去，因不愿娶亲，父亲不再给学费，他的理想、抱负可真的就止步在三角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真是无法违拗啊。权衡再三，何克全长叹一声，对母亲说：“妈，这世上难道真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吗？”

金氏见儿子口气已经软了下来，喜出望外，赶忙告诉儿子说：“克全，其实你爸爸很有眼力。那孙家妹子长得可好了，细皮嫩肉，桃嘴凤眼，一身的灵秀，一脸的富贵相……”

三角池又下了一场大雪，但因为有了何克全和孙氏的这场婚礼，何家屋场的热闹让人忘了现在仍旧处在天寒地冻的隆冬里。

闹完新房的人走后，在两支红烛的照亮下，何克全走到贴有大红喜字的窗台前，伸出手来，拿起新娘陪嫁的新剪刀。

何克全手持剪刀，转过身来，一步一步地走向孙氏。

已经掀开红盖头，正在床沿坐等着何克全亲热的孙氏，见何克全以这副模样逼近她来，惊得抽了口凉气，脸色刹地白了，说：“你……”

何克全一句话不说，走到床边，蹲下地去，左手抓起孙氏的脚，右手抬起剪刀，“咔嚓”几下，把孙氏脚上紧裹着的布带子全部剪断，剪完左脚，再剪右脚。剪完之后，他将脚带子搅成一团，猛力摔到门角处。然后，“噗、噗！”两口吹灭那对红烛。他抱起孙氏，不容违抗地说：“封建社会的三寸金莲，叫它滚远些去！”

孙氏偎在何克全怀里，筛糠似的哆嗦着说：“你吓死我了……”

何克全用剪刀剪断的是裹脚的带子，却没有剪断父亲给他做主与孙氏的婚姻。

而孙氏在何克全的拥抱中认定，从这个晚上开始，自己的一生已经铁定跟了何克全。

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对这位美丽纯洁的贫家女子来说，什么是前途，什么是命运，她没有能力预测；换成何克全，同样也无法预测。孙氏只能认定眼前所发生的事，丈夫接受自己，就是人生的最大幸运啊！

五、壮志凌云

一九二五年的六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当年二月，上海二十二家日本纱厂的工人联合罢工，抗议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工人。这次罢工，在中共中央组织的罢工委员会的指挥下，赢得了胜利。当工人们按劳资双方的协议复工后，日本资本家却违约开除工人和克扣工人工资，于五月十五

④

日枪杀了带领工人进行说理斗争的棉衣七厂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工人数十名。中共上海地委当晚即派李立三深入工厂，指挥行动，定于三十日组织学生和工人到租界里举行更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于五月二十六日通电，表示“拟设法予以援助”。

没想到，当五月三十日上午学生在租界内声援工人时，被英国巡捕拘捕了一百多人。下午，被激怒的万名群众走上南京路，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面对群众突然开枪，致使十多名工人、学生被打死，受伤者不计其数。于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在大上海掀起，随之席卷全国。

萍乡原本就是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李立三锋芒初露的大舞台，此时的萍乡人民怎能袖手旁观？

“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受难同胞！”

“向帝国主义讨回血债！”

“工商联合，一致对敌！”

“抵制日货！”

“反对奸商！”

.....

一场抵制日货、抗议奸商的活动，如火如荼在萍乡城区进行着。

萍乡中学学生冲锋在前，积极声援反帝运动，声援从安源走出去的工运领袖李立三。

一九一四年以前，安源煤矿用的是德国资金和德国技术人员。之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资金和技术人员全部回国。早已觊觎安源煤矿的日本乘虚而入，将开矿技术和资金收支把持起来。他们通过长江水道和萍（乡）株（洲）铁路，将日本货源源源不断运进萍乡。

这天，设在萍乡西门的火车站站满了学生。这些学生以何克全、张国焘、钟邦武、贺庆仁为首。他们戴着“萍中学生会”袖章，手拉手，肩并肩，将一列列开往安源的火车拦下，将那些写有日、英文的货物全部掀下火车。

何克全站前货场的桌子上，向围观的市民大声宣传抵制日货的重要意义。

何克全没有因为带头砸教育局被开除学籍，他受到了罗运磷等人的重点保护。

何克全说：“同胞们、乡亲们，北京在行动，天津在行动，汉口在行动，长沙在行动，南京在行动，全国六百多个城市都在行动，都在抵制日货！中华民族这个时候不觉醒，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觉醒？中华儿女这个时候不作斗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作斗争？萍乡无论男女老少，无论阶级高下，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向帝国主义发起猛烈进攻！……”

在何克全的身后，那些从火车上、货仓里搜出来的日本货和英国货，摞成一堆堆，被浇上煤油，被大火吞噬着。那团团烈焰腾空而起，像一面面撕裂的赤色大旗，哗哗作响。在赤色火焰的衬托下，何克全演讲中的一字一句是那样的激昂和愤慨。

何克全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爆发后，萍乡又开始了抵货运动，学生会也成立了，当时我也参加学生会的工作，没收仇货，每天都到车站上去检查仇货，并组织宣传队……”

在这场反帝运动中，何克全激情四溢，心潮逐浪，思想得到了升华，意志得到了锻炼。

面对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运动，他开始思考中学毕业后的去路。在填报志愿时，同学们个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主苍茫大地沉浮，非我辈莫属”的气概。有的同学主张考北京大学，有的同学主张考上海交通大学，有的同学主张考广州黄埔军校……

在同学们的争论中，何克全悄悄离开教室，来到教学楼旁边寂静的大樟树下，面对两里远的萍乡城，作冷静的思考。

他知道，自己别说去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名校就读，就是能不能继续上学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问题。今年春天，祖父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人世。为祖父办完丧事后，何克全向父亲索取住校的伙食费，准备返校读书。

父亲面对他，什么话也不说，把他带到厨房里，带到正在转动着的石磨旁边，让他看着石磨和石磨边的人。

石磨被母亲金氏和妻子孙氏推动着，正在“嗡嗡”地作着一圈又一圈的旋转。磨扇上放着米糠和薯丝。米糠伴着薯丝，被母亲精瘦的手一点一点地拨进漏孔里，通过上下磨扇的磨碾，变成粉末，再从四周的缝隙中小瀑布般地流下来。何家败落了，已经沦为贫农。家人和村里绝大多数人一样，过上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唉，糠菜半年粮，什么时候能吃一顿饱饭啊！”“唉，新三年，旧三年，缝

④

缝补补又三年，什么时候能穿一身不打补丁的衣裳啊！”……在乡下，何克全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些。

何秋美说：“看到了吗？这个月，我们全家吃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你好意思要伙食费去学校读书？看看你媳妇的肚子，孩子就要出生了，你得为怎样当好一个爹想一想了。”

望着妻子隆起的腹部，望着妻子蜡黄的面孔，何克全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转过身去，走进自己的卧房，抓起梳妆台上那只花瓶，恨恨地砸向台上的镜子。

“咣”的一声，镜子全碎了，玻璃散落一地。

他恨镜子中的他，恨他为什么这么早就结婚。

听到镜碎的响声，母亲慌忙跑进卧室，见地上被打碎的镜片和玻璃，指着何克全的头低声喝问：“为什么拿你媳妇的陪嫁品出气？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孙氏也随母亲走进卧室，在母亲训斥何克全的时候，她赶紧打开陪嫁的箱子，哆哆嗦嗦地从中搜出一包东西，走到何克全面前，将那东西塞进他的手里。

何克全很是不解地接过东西，在孙氏眼色的示意下，打开一看，一股暖流顿时扩向全身。原来，这是五块银元，是妻子娘家人打发给她的出嫁私房钱。人们都知道，这私房钱是女人嫁到男人家的救急钱，不到万不得已，女人是不能动它的。何克全望着妻子，眼睛湿润了。

孙氏没说一句话，拿来扫帚和灰斗，把击碎了的花瓶和镜子，一一扫进灰斗中。

母亲指着孙氏，流着眼泪冲着何克全说：“看看你的媳妇吧，你好意思吗？遇到不能上学的困难，就摔东打西，这东西不是钱买回来的？”

孙氏说：“妈，男人想有出息，就得读书。您别说他了，让他走吧。为忙爷爷的后事，他已经在家耽误好几天功课了。”

听到母亲的训斥，看到妻子拿出的私房钱，何克全真正感到自己愧对家庭和妻子。他暗自发誓，等自己将来事业成就之后，一定好好报答父母和妻子。

其实何克全哪能不知道，只有丰厚的土地才能长出参天大树，只有肥沃的田野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名校出人才的概率，那是要比普通学校大得多啊！他何尝不想去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大大学校！可家里这种状况能有选择的余地吗？

就在这时，眼前突然飞出一只云雀，云雀从荆棘里冲出，双翅一收一展，直刺湛蓝的天空。也就眨眼工夫，它像一支箭，钻进了白云之中。或许是受了云雀的启示，何克全毅然转身，走进教室，拿起毛笔，在墨砚中蘸上墨汁，在报考学校的选择栏里，端端正正写上：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后来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汉大学。

当时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费比较低，国家对读师范类学校的学生给予生活补贴。

六、心系武汉

一九二五年九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资助下，占领了东江大片地区，并向七月一日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发起进攻，使得广州城一片白色恐怖。

九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苏联罗加觉夫将军为顾问，率领三万大军，发起第二次东征。东征军十一月初收复潮州、汕头。陈炯明逃往香港，其军队在福建遭全歼。国共的成功合作，使得数十年散沙一般的广东全境得到统一。广东的统一，使国民革命军北伐具备了物质基础和军事势力。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革命势力迅速扩大到了长江流域。

武汉，作为长江与汉江的交汇点和京广铁路的纵贯处，是中国中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革命精英汇集的大都会，更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开展得最为活跃的地方。工人运动在武汉的汹涌澎湃，使大学校园放不下平静的课桌。这期间，一九二五年秋季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何克全，在后来的自传中说：“当时就不喜欢上课，而喜欢看《语丝》、《莽原》，有时也看《向导》……”武汉大都会所拥有的大量书刊，满足了何克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书刊的阅读，加速了何克全知识的丰富和思想的激进。与此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展的革命活动十分活跃。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全国汹涌澎湃地展开，农民运动在长江流域波澜壮阔地推进，这给何克全以极大的精神感召和鼓舞。

④

何克全认为，这种时候，青年如不投身火热的斗争生活，而坐在教室里死读诗书，将会被时代唾弃。因此，何克全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活动。在对盘踞武汉、极端仇恨武汉革命运动、屡次利用租界制造事端的英帝国主义斗争中，他带领同学，英勇地参加了“反英大集会”，参加了“对英经济绝交、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收回租界”的大游行、大示威。并且他以手中的笔墨，在校园的黑板上、校刊上，在全国最受青年欢迎的杂志上，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檄文。他担任校刊的主编，组织编印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稿。

山雨欲来风满楼。

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北京逝世后，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率先跳出来反共。

对于戴季陶的反共言论，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萧楚女等先后发表文章，给予坚决驳斥。

借广州黄埔军校起家的蒋介石，在江浙财团的支持下，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委，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与汪精卫并列成为军政领袖。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调动军队，扣留了中山舰，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押了黄埔陆军学校和第一军里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这样一来，担任国民党政府部长的共产党员被全部停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丧失了地位，蒋介石趁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随着蒋介石反革命阴谋步步得逞，种种反动逆流向着摇摇欲坠的国共合作最后的堤坝汹涌扑来。

何克全在回忆中记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湖北首脑、原北洋三省巡阅使肖耀南就来了个反赤运动，把许多当时左倾的杂志全都禁止。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揭露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登在北平出版的鲁迅办的最后一期《莽原》上，用的名字是未名。当时高等师范也办了一个校刊，我也写了几篇文艺作品登在上面。”何克全所说的那篇以“未名”笔名发表的文章，其实是写给鲁迅的。革命文艺旗手鲁迅接到这封信后，将它作为书信体文章，以特别醒目的标题，郑重刊载在《莽原》上，文章的名字就叫“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这篇文章以辛辣的笔调和讽刺的意味写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上和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样，一

切尽有，可也有一二十种；而办学者虽说不上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上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购买《莽原》。主任将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评议，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因为主任敌不过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我喜欢看《莽原》，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怕他们取消订购。‘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书的本子，就要被塾师（也就是当时‘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至打手心一样。……”这篇文章对武汉以及全国反抗反动派禁止宣传社会主义的行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给青年学生以很好的启迪。

一天，为蒋介石国家主义摇旗呐喊的陈启天，来到武昌中华大学，给武汉高校的师生演讲。何克全和部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同学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集合学生队伍，来到会场。当陈启天讲到必须无条件拥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时，何

3867

何克全

2122 4021 3010

國立武漢大學學生學籍表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 | 991 | 姓名 | 何克全 | 原名 | | 性別 | 男 | 籍口 | 江西省萍鄉縣 | 入校年齡 | | 入校年月 | 年 月 | |
| 永久通訊處 | | | | | 臨時通訊處 | | | | | | | | | |
| 學歷 | 武大 | | | | | | | | | | | | | |
| 入校所在院系 | 年 月 起 | 年 月 至 | 年 月 起 | 年 月 至 | 年 月 起 | 年 月 至 | 年 月 起 | 年 月 至 | 年 月 起 | 年 月 至 | 年 月 起 | 年 月 至 | 年 月 起 | 年 月 至 |
| 休學事由及年月 | 年 月 起 | 年 月 止 | 年 月 起 | 年 月 止 | 年 月 起 | 年 月 止 | 年 月 起 | 年 月 止 | 年 月 起 | 年 月 止 | 年 月 起 | 年 月 止 | 年 月 起 | 年 月 止 |
| 離校年月 | 年 月 | 離校事由 | | | | | | | | | | | | |
| 離校後之通訊處 | | | | | | | | | | | | | | |
| 歷次繳校證件情形 | 第一次 | 呈報文 號及年 月 | 第二次 | 補件文 號及年 月 | 第三次 | 補件文 號及年 月 | 核示文 號及年 月 | 核示文 號及年 月 | 核示文 號及年 月 | 發還年 月簽字 | 發還年 月簽字 | 發還年 月簽字 | 發還年 月簽字 | |
| 畢業年月 | 年 月 | 畢業後通訊處 | | | | | | | | | | | | |
| 補考科目 | 不能畢業原因 | | | | | | | | | | | | | |
| 畢業年月及文號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領取者 簽發 年 月 日 | |
| 家長姓名 | 原名 | 職業 | 通訊處 | | | | | | | | | | | |
| 保證人姓名 | 原名 | 職業 | 通訊處 | | | | | | | | | | | |

凱丰在武漢大學的學籍卡

④

克全和部分同学冲上讲台，掀翻演讲台，扯下欢迎陈启天的横幅。学生们在何克全的组织指挥下，推的推，扯的扯，将陈启天轰出了会场。

肖耀南闻讯大怒，指挥军队包围会场，命令抓捕学生。

何克全见状，果断指挥同学四散撤离，同时自己也机智地甩脱了官兵的抓捕。

这事发生后，部分同学被军队羁押。何克全又策划了一场营救被捕同学的行动。由于营救行动声势很大，肖耀南在社会舆论的高压下，不得不放出全部被捕学生。

与肖耀南斗争胜利后的一天，广东同学徐祥沐，邀请何克全到武汉名胜龟山游玩。

龟山古时叫翼际山，山不高，形状圆圆的。从高处往下看，就像一只石鼯趴在长江与汉江之间。过去的翼际山演变成今天的龟山，与江汉两水的长期冲刷击打着密切的关系——时间可以改变一切物体的形状啊。

徐祥沐向何克全说，邀请他游龟山是受国民党组织的委托，要为国民党组织物色青年才俊。徐祥沐说，他想参加这个组织，也想邀何克全一起加入。徐祥沐首先表白说，他之所以邀何克全参加，就因为耳闻目睹了何克全在校的所作所为，认为在这社会变革、风雷激荡的年月，何克全如果加入国民党，一定会有大前途。徐祥沐还向何克全讲述参加国民党的种种好处。

何克全确实想参加一个组织。这些年的社会实践使何克全认识到，任何个人的力量，什么时候都大不过组织的力量。家乡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其实是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胜利。两次东征的胜利，其实是国共两党成功合作的胜利。人多力量大，人多力量强啊！

登上龟山，远远望去，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风物尽收眼底。向东看去，有块形状如船头的大石头，兀然矗立在长江中。那石头嶙峋峻峭，像一条拴船的石础，又像一段拦水的石堤，它的岿然挺立，使得奔腾的长江水在它面前撞得涛声如吼，浪花飞溅。

国民党正处得势之时，很多人趋炎附势地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何克全是个热血青年，何尝不想为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母亲、妻子出人头地啊！

去年，他以优异成绩考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被何氏家族人特别看重。十里八乡的何姓族人，都来贺喜，说何秋美夫妇生了个好儿郎，为何氏家族争了脸。

何秋美过去对何克全读书一直持反对态度。这一次何克全把动静闹大了，闹得大学的红榜上都有他的名字，这就让何秋美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件事。他想，如果不让儿子去武汉读书，遭族人的谴责和唾弃是肯定的。在老关地面上，有哪个后生被国立大学录取过？这等于金榜题名啊！他敢不让儿子上学吗？与此同时，他又从另一个方面想，如果儿子读了书，做了官，赚了钱，那点学费又算得了什么呢？“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啊。何秋美这回乖乖地进了老族长家，请老族长到家吃了一次饭。据何克全母亲后来讲，那餐丰盛的酒菜，是何秋美赊来的。何秋美的用意很简单，就是想用好烧酒浇热老族长的心，让老人家出面，召集各房房长开会，议定由祠堂出会费，供何克全进大学读书。

老族长何庆泉年纪虽大，心里明白，对后生考入大学也非常关心和高兴。吃请的第二天，他拄着龙头拐杖来到祠堂里，专为何克全上学问题开了一次会。那天，当他把话说完，让大家发表意见时，少数房长不同意祠堂出钱。何庆泉问这些人为什么不同意？有人说：“祠堂的会费除了供人读书，还有更重要的开销。”何庆泉问：“什么重要开销？”有人说：“这年头婚丧喜庆、天灾人祸都得花大钱。”何庆泉不屑地说：“婚丧喜庆算什么？什么都算不上！古人说得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男儿‘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一个祠堂里没有几个读书人，能让人看重吗？醴陵城里，南门张家是大姓，北门姚家也是大姓。张家读书人多，姚家习武者众。俗有‘南张北姚，无事莫撩’的说道。说是有一年，张、姚两姓发生了大对抗，姚家人把张家人打了，而张家人把姚家人告了，结果姚家人吃了亏。为什么？因为张家笔杆子比姚家的木棍子厉害，所谓‘姚家喊声打，张家都犯傻。张家告一状，姚家死一半’，就是这样来的。懂不懂？”那些持异议的人听了何庆泉的说道，加上畏惧族长的威严，担心将来有大事求于他，就都收回了异议。

离开三角池那天中午，何庆泉用祠堂的钱为何克全做了五十桌酒席。那丰盛席面，那热闹场面，让与何克全同龄的后生羡慕不已。

那天，何秋美把何克全送上火车后，反复叮嘱说：“克全，你是何家第一个出远门的人，要好生读书，不要让全族人看你的笑话，不要让老族长和我下不了台……”

至今，父亲对他说的话依旧余音在耳。

面对徐祥沐的动员，何克全真想加入国民党——他要报父母养育之恩，他要谢

何家祠堂人慷慨相助之意。

但这些年来，何克全经过与国共两党的密切接触，感觉国民党和共产党大不一样。国民党里集中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共产党却为劳苦大众说话。共产党人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列，得到劳苦大众的广泛支持和衷心拥护。有人说，资产阶级的嘴唇是红的，无产阶级的骨头是白的；资产阶级的牙齿是白的，无产阶级的血是红的。何克全认为这话形容得相当准确。经过这些年的阅历，何克全具备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他认为，一个得到劳苦大众拥戴的组织，才是最有前途的组织。水载舟，风鼓帆，人心向背决定事业的成败。因此，共产党组织深深地吸着他。

为了不扫同学的兴，何克全想好后对徐祥沐说：“祥沐，谢谢你的邀请，加不加入国民党，眼下我还没有考虑好，等我考虑好了以后再告诉你行吗？”

徐祥沐说：“抓紧考虑，考虑好了赶快告诉我。”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师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烈火，熊熊火焰燃烧着黑暗的世界。贫苦农民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形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北伐军进军江西之前，放了暑假的何克全匆匆回到离开整整一年的家里。

刚放下行李，何克全立即投身筹建农协的工作。他要先声夺人，在萍乡先把农会建立起来，以配合北伐军攻占萍乡。

在封建特权统治几千年的农村，要使“一切权力归农会”谈何容易？土豪劣绅哪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泥腿子哪敢当家做主？

何克全不畏艰难。他把湖北、湖南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写成通俗易懂的演讲材料，油印成宣传单，去田头地角和夜校作动员，让传单一次又一次散发到农民的手里。他四处给农民说：“大家不用怕。湖南农民协会已成燎原之势建起来了。农会一建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吓得四处躲窜逃命。他们中间的头等人逃到了上海，二等人逃到了汉口，三等人逃到了长沙，四等人逃到了县城。他们以为城里很安全，可当他们被追捕他们的人抓回乡下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在四面楚歌之中。去年，连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都被革命气势吓得跑出了长沙。我们还怕什么呢？革命军马上就进到江西。我们萍乡不能落后啊！……”

白天忙不过来，何克全晚上打着杉皮火把，走村串户，继续做贫雇农入会的动员工作。在他的带领下，萍乡第一个乡农会终于建立起来。何克全亲自担任农会的宣传干事。他组织编小报、办墙报、写标语、搞演讲，为农会工作造势；他组织农会会员，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恶霸进行清算，给恶霸戴高帽子游垄，送他们去县政府，叫县里判他们的罪，让受欺压的人扬眉吐气、拍手称快；他组织农会会员迫使地主、富农给农民减租减息，给穷人开仓放粮，使乡亲们参加农会的热情日益高涨。

一天，不识字、更不识时务的族兄何克化请何克全写个买田的田契。

何克全说：“我不写。”

何克化问：“你上了大学堂，成了识字先生，为什么不写？”

何克全说：“田地用不着买了，以后人人有田。”

何克化迷瞪瞪地望着何克全，不解地问：“人人有田？穷人有？老人小孩都有？”

何克全说：“对，耕者有其田，人人都会有田。你想想，你买了穷人家的田，穷人家就没有田，就没有饭吃。眼下的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土地革命。”

何克化问：“这么说，你在乡上做事，就是做人人分田的事？”

何克全说：“对，下一步就要分田地……”

盛夏的赣西，正是抢割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春争日，夏争时”，农民像耕牛一样，披星戴月地忙碌在田间地头。

母亲见儿子一天到晚往乡上跑，就说：“克全，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放假回来了，能不能帮家里做点事？你哥因为你不下田，他也不肯帮你爸爸。”

望着忧心忡忡的母亲，何克全第一次在家久坐了一会儿。他不是没看到老父亲每天傍晚扛着泥巴兮兮的犁耙，牵着气喘吁吁的耕牛，筋疲力尽地从田野中归回。有时与父亲擦身而过，他还嗅到父亲身上散发出的浓烈的汗臭味。父亲尽管累成这样，却依旧默许他穿着鞋袜在家作文章，默许他坐在大树下读课文。但父亲不同意他去乡上闹农会。“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爷爷咽气时，对父亲反复念叨这几句话，为了让父亲清楚这几句话的意思，爷爷一字一句给父亲作着解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亲相信爷爷的话不会有错。父亲不许他去闹农会，自然有他的道理。父亲认为，田是人家买的，或是人家开垦出来的，没田的人去分有田人家的田没有道理。像自己，原来有五十多亩田，就因为大儿子

④

不争气，几乎全部输光了。总不能自己输光了，还死皮赖脸向人要回来吧？此一时彼一时，分人家的田地搞得不好就是掉脑壳的事啊。为此，父亲已经对他骂过好几回，甚至还要动手打他。

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为了减少家人对何克全的埋怨，身怀六甲的妻子孙氏把一岁多的女儿何明清交给母亲，自己像男人一样，下田割禾，弯腰插秧，累得腰也直不起来。

母亲不能让儿媳妇没日没夜地干活，怕怀着孩子的儿媳发生意外。

孙氏说：“克全名下有三张嘴巴吃饭，我不做事心里不好过。”

何克全想挤出时间，帮帮家里，但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使他有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他认为，家里的事再大、再忙，也大不过忙不过发动农民办农会的事。天已经降大任给他们这代年轻人，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小家，在一旁当看客。但这种感觉他无法跟家人说，说也说不清楚，说了反倒会让家人担惊受怕。与其说不清楚，还不如不说，他想将来以革命胜利的果实，来证明今天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何克全对母亲说：“妈，您和爸，还有您儿媳妇为我吃的苦、受的累，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您和爸应该相信我，儿子不是拈轻怕重的人。儿子今天做的事，是正事、大事。儿子不会给你们丢人现眼。”

母亲不知道三角池以外的事，但她相信，已经二十岁的儿子比他爸爸知道得更多，他的选择肯定有道理，肯定有意义。

这年九月五日，北伐军进驻萍乡。九月十四日，萍乡县署组织十二个界别、一万四千多人集聚安源，欢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视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萍乡。

何克全参加了这次集会。何克全因组织乡农会有功，受到了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接见。何克全也是第一次在安源见到蒋介石。

新建的国民党在萍乡西区的党部负责人，见何克全没日没夜地工作，又是国立武汉大学学生，就把申请表送到何克全手里，动员他加入国民党。

何克全和在武汉一样，接过表以后，以“没有考虑成熟”为由，将表送还给了负责人。

就在过完暑假、准备返校之时，何克全却因劳累过度，病倒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吐血。

何克全没患病之前，何秋美听到武汉那边“乱得很”、“肯定出大事”的消

息，担心儿子返校后闹出大事来。这时，见儿子患了病，就以必须治好病才能返校为由，将何克全强留在家里。

那天，何秋美当着何克全的面，郑重其事地给妻子和儿媳交代说：“你们听清楚了喽，要是克全没治好病就回汉口，你们别想有好日子过！”

母亲和妻子畏惧父亲，不敢多言，只能日夜轮流着看住何克全。

何克全想走走不成，悄悄离家又怕连累母亲、妻子。他只能拼命熬药、吃药，争取早日把病治好。当时民间流传一种墨汁能治“吐血”病的说法，说墨汁里含有麝香，喝下去不久就会凝固，可以止血。何克全为治病，不问喝下墨汁有没有用，认认真真地磨墨，认认真真地把大碗墨汁喝下去。可欲速则不达，病情并没有因他的努力而得到好转，身体虚弱得连路都走不动。

转眼到了一九二七年二月，老同学徐祥沐给何克全寄来了加急信，叫他赶紧返校，说武汉的革命形势好得很，再不返校，就会错过实现人生理想的难得机会。

何克全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所看过的书籍告诉他，机会稍纵即逝，多少仁人志士就是在历史进程中的瞬间抓住了机遇，趁势而上，结果成为大海强龙、人中俊杰。

第二天凌晨，何克全悄悄起了床。

借着昏黄的油灯光，何克全背起从学校带回的书籍，走近熟睡中的女儿，在她小脸上恋恋不舍地亲了一下。当他把目光转向妻子，想向妻子作一次目视的告别时，他大吃了一惊。他看见妻子正大睁着眼睛，依依不舍地望着他，眼泪正急促地往外淌着呢。

原来，妻子并没有睡着，她知道他要离开，正在密切关注着他。

他正要向妻子说几句歉意的话时，身后响起一声低沉的喝问：“克全，我和你媳妇真的拴不住你吗？”

说话的是母亲。

母亲披着衣，趿着鞋，拎着一只布袋，愁容满脸地站在他的身后。

何克全转过身来，迎上前去，叫了声：“妈……”

母亲说：“这个家是不是太小了啊？”

“妈，”何克全说，“您是要儿子做一只麻雀，还是做一只雄鹰呢？”

母亲认认真真地审视着儿子的脸，良久之后问：“麻雀，屋檐下、蓬蒿里、田野上到处是；雄鹰呢，只有天上才有，是不是？”

“嗯。”何克全点了点头说，“妈，儿子的心早在天上了。”

母亲走上前来，伸出手，抚摸着儿子消瘦的脸庞、肩头和臂膀，泪光闪闪地说：“儿呀，你的翅膀长大了、长硬了，屋檐下、蓬蒿中，真是装你下不了喽……”

何克全“扑通”一下，跪在母亲面前，仰望着母亲说：“妈，你就让我远走高飞吧！”

见从未跪过人的丈夫今天突然跪在母亲面前，妻子孙氏知道，丈夫离家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于是，她下了床，哽咽着劝母亲说：“妈，您就让克全走吧。您不是常说，海大了好跃鱼，天高了好飞鸟吗？”

母亲疼爱地望着儿媳妇，手在她肩上拍了拍，之后，走近儿子，将儿子的头搂进怀里，无声地抽泣起来，那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嗒嗒”地砸在儿子的背上。良久，她把儿子扶起，把那只装满茶叶鸡蛋的布袋，塞进儿子的行囊里，叮嘱说：“儿啊，别忘了你的媳妇。这是她昨天夜里特地给你煮好的，说是给你路上吃。”

“什么？！她昨天就给我准备了鸡蛋？可见她昨天就知道我要走啊！”何克全内心一阵惊愕后，一种愧对妻子之情、亏欠妻子之爱顿时涌上心头。何克全眼含泪水，望着妻子，认认真真地望着。妻子进门一年多，因为怀着女儿，经常干重活，使她变得比实际年龄要老气很多很多了。

妻子从枕头里取出五块银元，装进何克全贴身的内衣里说：“走吧，去晚了赶不上去株洲的火车。”

何克全没有动，依旧望着孙氏。

在孙氏的记忆里，被丈夫这样认真地关注着的时刻，她从来没有得到过。

她不知丈夫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看她。

当何克全的视线就要从孙氏的脸上离开那刻，他把银元取了出来，还到孙氏手里，紧握着孙氏的手说：“这钱你留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说完，接过母亲为他准备的背包，一抹眼泪，推开妻子，惜别母亲，大步走出卧室，走出厅堂，扑向门外黑暗一片的旷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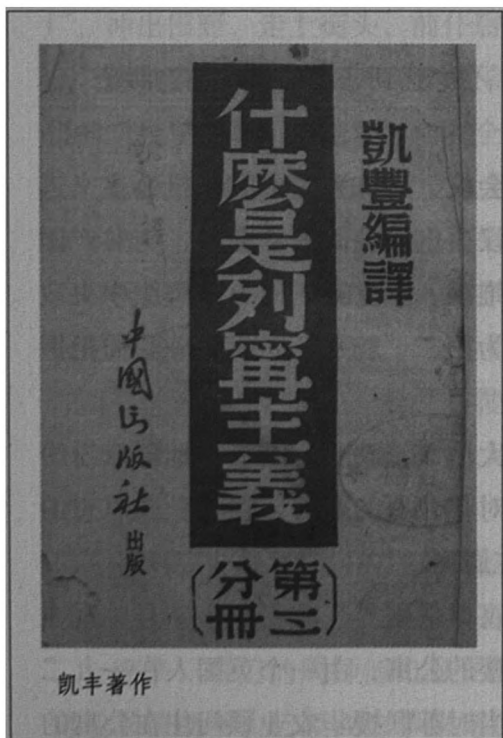
“克全！”

“孩子他爸！”

何克全的身后是母亲和妻子难舍难分的呼唤。

在莫斯科 寻求真理

第二章



七、虎口脱险

何克全回到武昌后，徐祥沐叫他给本校的校刊写文章，为革命形势叫好。

何克全满怀激情地投身到了唤起工农大众的繁忙工作中。

他根据自己在家乡发动农民办农会的感受和体会，总结出许多值得推广的经验。他认为，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的分析是正确的。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论述，点到了要

④

害，指出了当前中国革命必须采取的手段……何克全据此夜以继日写下了好几篇文章，在报刊发表。这些文章像战斗的号角，让工农群众读了热血沸腾；像檄文，让反动派读了不寒而栗。

一九二七年三月，何克全由陈洪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洪时也是萍乡人，当时就读于武昌美术专科学校。陈洪时后来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再后来叛变革命。

汹涌澎湃的工农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形成向反动势力大本营发起全面进攻的势头。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做好反革命政变准备之后，在上海指使青洪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袭击了工人纠察队。随后，蒋介石以“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对革命群众大举屠杀。

同年七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之后，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开进武汉，准备对共产党人动手。

夏季的武汉，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汉口实行戒严。何键在市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市党部被捕者达一百多人，重要人员都被杀害。

这时，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在革命高潮时加入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人里，不少感到悲观失望、前途渺茫。

怎么办？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建议下，会议决定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的革命问题。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织中央政治局。“从此独秀即不视事。”鲍罗廷树瞿秋白为第二“舵手”，代替陈独秀把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航向。

蒋介石对革命的叛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北、湖南等地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面对蒋介石的屠刀，在瞿秋白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党领导军事暴动已成必然，并且迫在眉睫。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现在的鄱阳街一百三十号）召开。这是一幢西式三层楼的公寓，由一个英国人在一九二〇年修建，取名怡和新房。租住者多为外国人。当时苏联援华农业顾问住在公寓的

二楼，一楼是外国人开的商店。这个会议地点，由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邓小平选定。会议由于代表到得不齐，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为政治局五常委中的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领导南昌八一起义后，正在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出席会议的常委有李维汉、张太雷，中央委员有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龙、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等。这次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一次猛烈开火，宣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束，同时确定了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总方针。

这年五月，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何克全被安排在大会秘书处工作，主要撰写大会文件，采发通讯文稿。同月，何克全担任共青团国立武汉大学支部干事，六月担任大学团支部书记，七月担任共青团武昌山前区区委宣传委员。为在校园内、社会上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让自己在武汉三镇更加具感召力，何克全在给各大报刊撰写文章时，署下的全是何克全的真实姓名。文章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真实面目的犀利文风，直指蒋介石卑鄙手段的激愤用词，激起了工人、学生、市民对国民党右派的无比愤慨。那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号召工人、农民、学生向反动势力开战的笔墨，激励着革命群众揩干身上的血迹，冲出校园，冲出工厂，冲出田野，走上街头，前仆后继地进行战斗。

当武汉三镇进入军事暴动准备阶段时，党组织派出便衣军事教官，在已经放暑假的学校里进行军事培训。何克全成了国立武汉大学学生军事训练的组织者之一。

那天，军事教官的共产党人身份不幸暴露。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防身手榴弹和整个国立武汉大学党团骨干的名单。

手握名单后，一场对号入座抓捕党团骨干的行动在武汉阴谋地进行着。

教官被抓的那个晚上，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闯进国立武汉大学，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搜捕。何克全被排在搜捕对象的首位。

国民党军蹬开集体寝室门，用刺刀挑开学生的蚊帐，叫学生赤身裸体地站在电灯下，接受检查。

一个军官命令看门的周师傅，提供本寝室学生的花名册。

当军官接过花名册，阅遍所有名字后，却没有看到何克全的名字。

原来，看门的周师傅出身受苦人家，最恨眼前这个黑暗的社会。他在何克全的启发和帮助下，已经成为学校党组织预备吸纳的对象。下午教官被捕，何克全马上

④

对周师傅作过交代，叫他随时准备应对敌人上门的搜捕。周师傅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情急之中，就将本寝室的学生花名册藏匿，将一本即将入校的新生花名册给了军官。

军官用驳壳枪头顶着周师傅的鼻子，威胁地问：“都说何克全住在这间寝室里，花名册上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快说！”

周师傅沉着应对，不紧不慢地说：“这座大楼有几十个寝室，长官可能走错楼层了。”

“我会走错门？”军官迷茫地望了下寝室，将信将疑起来。

周师傅不失时机地建议说：“你们要抓的人可能在楼上，要是不快些去，他们听到动静，是会开溜的。”

军官用枪在周师傅鼻子上猛力一推，说：“要是跟我要说谎扯白，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周师傅笑了笑，说：“长官，我会老老实实在这里等着你来收拾的。”

“走！”军官手枪一挥，带着部下往楼上冲去。

国民党军一走，何克全向同学们说了声“快跑”，之后，抱起衣服，拉上周师傅，跳出后窗，冲进了风雷交加的暗夜之中。

八月一日凌晨，由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李立三、贺龙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九月九日，中央特派员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军从萍乡安源、铜鼓、修水出发，按照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命令，全力进攻长沙。由于敌军势力强大，起义军进攻受挫。毛泽东率领部队，经由萍乡，进入井冈山。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一场由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剿杀”从此开始。

何克全上了被缉拿对象的名册。

一沓印有何克全头像的通缉令，送到萍乡县保安团老关分团的团部。

分团长魏焜鸣接到通缉令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盯着通缉令大咽口水。保安分团不军不警，不官不民。政府下拨的经费少得可怜，当地有钱人又舍不得

“赞助”，老百姓更是以命相搏，对抗保安团的搜刮。保安团官兵嘴里常常淡得流清水。官兵为几个薪水钱，常常愁得脑壳发胀。但是上头下达的任务半点不能打折扣，上头一不高兴，就说“老子毙了你！”魏炽鸣成了上头的“出气筒”。这下好了，魏炽鸣想，毛泽东被逼得钻进深山老林，当“土匪”去了。何克全这“愣头青”一定会潜回老关，自投罗网。有何克全这条漏网大鱼到手，今后就不愁钱的来路。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魏炽鸣先把通缉令压下，他要张网以待，活捉何克全。

浓烈的霜冻和刺骨的寒风，把潜伏在三角池的保安团团丁冻得像风中的枯叶直打哆嗦。一班又一班趴在地上的团丁们，大骂何克全说：“有吃有喝有婆娘，革什么命，造什么反，害得我们一个个就要冻成冰块了。”团丁们潜伏的夜里，除了听到何克全的孩子的哭声，何克全妻子哄孩子的声音，其他动静一点听不到。这一切说明，何克全根本没有回家。

魏炽鸣在分团团部熬夜烤了一个月的火后，再也沉不住气了。这天早饭后，他带着团丁来到何家大屋，把通缉令拍在何秋美手里。

何秋美面对通缉令，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魏炽鸣说：“何老倌子，没想到吧，你儿子出息了，出息大了。去年回到老关，带头办农会，分有钱人的家产，给有钱人戴高帽子，送有钱人去县城蹲大牢。我家老父亲差点被他送上断头台！他把萍乡西区搅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还嫌不够，还跑到武汉去闹大动静。这下好了，你何秋美家遭报应了。快把儿子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可要进屋搜查！”

何秋美对眼前出现的事，虽然感到突然，但细细一想，又不奇怪。何克全砸教育局、闹农会，就给了何秋美很是不祥的预告。如今去了武汉那样的大码头，他若不出事，那才不正常呢。想到这里，何秋美凄然一笑，说：“魏团长，这话从哪里说起？我家克全今年二月离开家，就再也没回来过，你要我从哪里去找人？”

魏炽鸣问：“真的没回来？”

何秋美说：“老天爷在上，我何秋美要是说了谎，天打五雷轰！”

魏炽鸣眼珠子骨碌一转，说：“你别把誓发早喽。”

何秋美说：“魏团长真不相信，可以进屋搜查。”

魏炽鸣知道何秋美说的是实话，知道搜了也是白搜。可是上头催得紧，他得对

④

上头有个满意的交代，于是说：“何老倌，你儿子在武汉干得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为萍乡人争了脸，已经上了国民政府的黑名册。子不教，父之过，今天只能请你跟我去一趟保安团！”

魏炽鸣想通过对何秋美的羁押，让何家把消息告诉何克全，让何克全回来打探父亲情况。他想兵不血刃，一举将何克全捕获。

何秋美说：“魏团长，你这样做就不讲理了。”

“为什么？”

“买肉的欠账，你问买肉的人。儿子犯事，哪有让当爸的去顶罪的理？就说你魏团长吧，你要是犯了事，人家能把刚死的爸从土眼里挖出来鞭尸吗？”

“什么？你敢骂老子，老子毙了你！”魏炽鸣一巴掌打过去，直打得何秋美像只陀螺，在原地转了两个圈。“把何老倌子带走！”

团丁像猎狗一样，一拥而上，将何秋美五花大绑起来。

“慢点！”正在给女儿哺乳的孙氏，见公公要被带走，将小女儿交给婆婆，对魏炽鸣说，“老总，何克全的去向我知道。”

魏炽鸣盯着孙氏，半信半疑地问：“你知道？”

孙氏说：“我是他婆娘，当然知道。”

“知道快说！”

“在这里不好说，我去你们那里说。”

“好，放了何老倌子。带何克全婆娘去团部问话！”

两个女儿见母亲被人带走，大哭大叫起来。

何秋美见状，抓住魏炽鸣的手说：“孙氏从不出三角池的地面，她哪里知道何克全在哪里？你们不能带她走！”

魏炽鸣当然知道，孙氏知道的事不会比何秋美多，但他更知道，关押孙氏，会比关押何秋美效果好得多。因为何克全刚刚出生的小女儿还在吃奶，小女儿对母亲的需要，就像是受旱的禾苗需要雨水浇灌一样迫切，这样更容易把何克全召唤回来。魏炽鸣一掌推开何秋美，喝令：“把孙氏带走！”

孙氏根本不知道何克全的下落，可她不想看到公公因为丈夫而受到折磨。她要替公公承受这场飞来横祸。

孙氏认为，丈夫不住家，当儿媳的就该挺身而出。尽管何克全和她成为夫妻是

父母包办的，但他们毕竟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在家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孙氏已将为人之妻之道熟记在心。在她心中，今生今世必须从何克全而终，除此，别无选择。

来到老关保安分团，当魏炽鸣问何克全的去处时，孙氏说根本不知道。

孙氏被打得得浑身是伤，昏死在审讯室里。

昏死的孙氏，梦见何克全骑着快马，带着队伍，正向她奔来。他把她从死里救出后，抱着她和两个女儿，登上火车，登上轮船，前往武汉。他对她说：“那里是人间天堂，我要让你和女儿享尽天下的荣华富贵！”……

“克全！克全……”当孙氏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家门前的土坪里。公公和婆婆正搂着一身是血的她大声呼唤着呢。

八、精英际会

就在保安团潜伏在何家门前、孙氏遭受保安团拷打的时候，何克全经党组织决定，秘密来到上海。之后，他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同志一道，经党中央派遣，前往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深造。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创办的。创办之初，叫“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习惯上称“中山大学”或“中大”。中山大学坐落在市郊，莫斯科河西岸的活尔洪大街十六号，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四面环抱的四层大楼，很像一个方桶，中间绿树成荫、幽雅宁静，后面是一个篮球场，冬天可以改为溜冰场，左边有个排球场。大街对面是莫斯科一个大的基督教堂，顶上由六个金黄色圆顶组成，蔚为壮观。教学楼前有一个宽阔的广场，教堂西侧是一个漂亮的公园，环境优美，是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场所。

中山大学创办的当年九月，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其中就有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傅钟、孙冶方、沈泽民、俞秀峰、张琴秋、董亦湘、杨尚昆、朱瑞、左权、乌兰夫、邓小平、徐冰等。在这里，也为国民党培养了一批上层的领导人物，像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都

在这里学习过。

何克全是第三批中国留学生。这批学生以产业工人为主，大都经过大革命时期血与火的考验。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到达时，恰逢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与中共旅莫（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夏天，中山大学的领导发生了变化，副校长米夫利用“党务派”和“教务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中共旅莫学生会主席王明的共同策划，搞垮了校长阿古尔，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校长。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王明为代表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集团。

当年九月，孙冶方、陈启礼等少数同学因暑假期间打工挣了些钱，被同学开玩笑地逼着买肉做中国菜吃。那天，趁暑假结束就要开学的机会，孙冶方的小屋里又挤满了江（苏）浙（江）同学，其中也有湖南同学左权、陈启礼等，大家嬉笑打闹，亲如一家。不料，这情景被从窗下走过的学生会干部王长熙看见。王长熙为了讨好王明，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王明，并添油加醋地形容他们是“江浙同乡会”。

王明立即放下《资本论》，去校长米夫那里汇报。

原来，不久前，对共产主义很感兴趣的蒋经国，也来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学校学习，中山大学几个江浙籍学生给他写了信，开玩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选你当会长，希望你这个会长以后经常接济一点钱。”因是半开玩笑的信，蒋经国看完并没在意，随便扔在抽屉里。没想到这封信被人发现，送到了王明手里。蒋介石的儿子要当江浙同乡会的会长，这还了得！

王明一九〇四年四月九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一个贫苦小商人家里，贫困的童年生活，激发了王明有朝一日要出人头地的愿望。一九二四年，他怀揣着母亲零星积攒的七块大洋，走出皖西山区，进入武昌商科预科学习。刚满一年，他来到莫斯科，开始留学生涯。在校期间，王明除了对俄语和马列主义感兴趣，其余时间大都用在跟米夫套近乎上，为此，一九二六年九月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自上次把来自蒋经国手里的信件转交给米夫后，米夫就叫他多搜集一些证据，以便向“江浙同乡会”出手。身为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的米夫，为什么要打击江浙同学呢？原因是，不少江浙学生反对他当校长，认为他的校长职务是通过挑拨原校长和书记的关系得来的，很不厚道。米夫要拿政治问题的“铁证”，搞臭反对他的中国学生。

米夫接到王明的报告，决定立即由中山大学支部局成立调查组，展开对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调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调查结果认定：“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结果，十二名江浙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受莫须有罪名打击的同学，不甘王明以恶劣手段置他们于死地，义愤填膺地来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住处，申诉了这一冤案，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和张国焘，在广泛听取同学汇报后，派邓中夏和余飞到中山大学调查。

米夫、王明对调查人员制造障碍，不予合作。

瞿秋白不得不亲自到校，一一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联合审查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审理。审理结果是，摘去了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的同学们的“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这件事平息后，为了避免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瞿秋白、张国焘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建议：米夫不宜再任校长，该职务应由鲍罗廷担任。

没想到瞿秋白、张国焘对米夫不满的议论传进了米夫的耳朵，从此以后，米夫越发加深了与中共代表团间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中山大学斗争的愈演愈烈，直到后来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九二九年，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对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在支部局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斗争，米夫要借此机会，整掉一批反对他们的人。他们给这些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并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总后台。

在一次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秦邦宪（博古）受米夫的指派，批评张国焘是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山大学的正常斗争开展。

一九二九年上学期结束时，中山大学所在地联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按照米夫的要求，在一次党员大会上猛烈抨击中共代表团和一些学生。中共代表团代表张国焘当时在场，他毫不妥协地回击了芬可夫斯基等人的指责，支持多数同学反抗米夫和王明。芬可夫斯基批评中共代表团的时候，与会的大多数同学以吹口哨、跺脚

来表示抗议，闹得会场灰尘四起，混乱不堪，使得大会开不下去。

苏联“老大哥”芬可夫斯基哪受得了中国“小老弟”的嘲笑，当场拍了桌子，叫学生滚出去！

几个被冤的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冲上讲台，要把芬可夫斯基赶下台去。

张国焘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劝阻这些学生。在劝阻这些学生时，台下的何克全走上台来，帮助张国焘做劝解工作。何克全认为，既然代表中共代表团的张国焘要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肯定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他没有理由保持沉默。没想到，身材中等、俄语说得不够流利的何克全的这一行为，引起了秦邦宪的特别关注。

秦邦宪一九〇七年生于江苏无锡，小时候在老家无锡上小学，十七岁在江苏省立第二技术学校毕业。一九二五年到上海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作为第二批中共留学生赴莫斯科留学。今天在米夫的安排下，秦邦宪坐在了主席台上。他的座位正好挨着张国焘。骚动平息后，趁芬可夫斯基继续讲话的时候，秦邦宪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别看何克全平时不说话，关键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

张国焘问：“是吗？”在武汉，张国焘从报纸上对何克全有了一些了解，来到莫斯科后，终于认识了这位来自萍乡的老乡。他乡遇故人，便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在一起回忆家乡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但是一谈到“江浙同乡会”的事情，何克全就三缄其口，说自己刚到莫斯科，情况不熟。为此张国焘对何克全不站在中共代表团一边感到失望。可万没想到，这个看似中立的何克全，今天居然冲上讲台，来劝阻冲击芬可夫斯基的同学。这种行为，看似听从张国焘的指令，实则是在帮米夫的忙。因此，张国焘对何克全的行为有些不悦。

秦邦宪说：“克全同学在武昌中山大学当团支部书记时，总是做出些叫进步学生由衷赞叹的事。那次叛徒供出在校党团员的名单，要不是他事先有准备，不知多少同志要被抓走。”

张国焘说：“不这样，党组织怎么会让他来莫斯科深造呢？”

秦邦宪说：“同样来莫斯科，何克全却跟有些江浙学生不一样，非常珍惜学习机会，一有时间，就找我和米夫请教理论上的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简直称得上是孜孜以求、废寝忘食地钻研。”

张国焘知道，秦邦宪是想通过称赞何克全，以使自己对他产生好感。张国焘是党中央要员，也是中共一大会议召开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他的一句话，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张国焘说：“光在米夫那里找理论恐怕不行吧？中国不是苏联，没有那么多平原草场，更多的是高山大岭，山路怎么走？大岭怎么绕？山头怎么登？能从米夫嘴巴里找到吗？”

秦邦宪问：“你的意思是，克全和我们还得多向中共代表团的领导请教？”

张国焘说：“我可没这么说，就是说了，你们也不会听。一个‘江浙同乡会’，米夫说是反党组织，王明和你不也跟着说是反党组织吗？”

听张国焘这么一说，秦邦宪的脸热了。

张国焘因为秦邦宪在中山大学斗争中偏向米夫一边，很是不满，他想给他一点颜色看，让他领教一下他的厉害。

尽管局面尴尬，年轻的秦邦宪不去计较，仍旧谦卑地说：“国焘同志，克全同志表现这么出众，我想介绍他加入党的组织，您看他够不够条件？”

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张国焘今天不想让秦邦宪下不了台，毕竟党的事业需要年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年轻人，秦邦宪毕竟在帮助自己的同乡何克全，于是说：“既然对何克全感兴趣，你就当他的介绍人吧。”

秦邦宪很是乐意地说：“国焘同志，从今开始，我将根据您的指示，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他早日加入先锋队组织，眼下我党就缺少何克全这样的笔杆子啊。”

在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上，瞿秋白、邓中夏始终坚持原则，跟米夫、王明的斗争依旧毫不妥协地进行着。一九三〇年春，米夫通过共产国际这个总后台，终于击垮了瞿秋白。那天，米夫以胜利者的姿态，把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叫到他办公室，宣读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完全站在米夫、王明小宗派的立场上。这样，瞿秋白被迫撤销了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职务，让后来转向米夫的张国焘接替。

瞿秋白、邓中夏、余飞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回国。

瞿秋白回国之前，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代表团与共产国际关系，曾派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做米夫的工作。但在既成事实面前，迫于“老子党”的压力，周恩来也无力回天。

这场历时三年之久的斗争，使多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卷入其中，为接下来的党内

④

斗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一九三〇年夏天，何克全在中山大学毕业，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即将回国的学生赴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进行军事训练。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也就是蒋经国曾经就读的大学。

训练结束时，一九二九年三月跟王明一起回国的秦邦宪给中山大学米夫写信，推荐何克全进莫斯科少共国际学校，接受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培训。

米夫对何克全作了安排。

进入少共国际学校不到三个月，何克全肺病发作，大口吐血，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九、意恐迟归

日子就像水车上的龙骨，转过一轮又一轮。

三伏天里，每当孙氏和金氏挽着衣袖和裤筒，双手作揖一样通过水车叶片把水挽进稻田里时，孙氏经常抬起头，往大路上望去。她希望看见何克全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接过她手中的车拐，叫她到一边歇息去。

过日子，女人不能没有男人。

男人是堵墙，可以为女人遮风挡雨。男人是棵树，可以让女人扶着站立。男人是张床，可以让累了的女人躺下来歇息。读书人说，男人的男字是由田字和力字组成。在孙氏看来，造字人真是琢磨透了女人的心，田里的事不能缺少男人啊。

日子就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不断地穿过三百六十五条经线，将人生的纬线无情地织进了它的中间去。每当听到秋叶飘落地面发出声响的时候，孙氏的脑海里总会出现何克全的身影，而且情不自禁问：“你在哪里？”“你可加衣服了？”好几回，因产生幻觉，深更半夜的孙氏竟要去给何克全送棉衣，好在金氏时时关注，才没让她走出家门。

“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

每当大女儿何明清、小女儿何淑英问孙氏时，她只能找理由，哄她们说：“爸爸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给爷爷、奶奶赚钱去了。”

何明清、何淑英问：“爸爸赚了那么久的钱，买了那么久的东西，怎么还不回

来？”

她说：“爸爸赚的钱太多太多了，一个人背不动，他在外面等你们长大，等着你们长大后去帮他背回家来呢。”

夜深人静，哄得两个女儿不哭不闹之后，孙氏形只影单地躺下，时时抱着枕头嘤嘤地哭泣。她不怪丈夫不给她体贴，不怪丈夫不回家看望他的女儿，不怪丈夫不给家里寄钱寄物，因她知道，丈夫在外不是赚钱，而是造反，造那些靠收别人租子的人的反，造那些欺压穷苦的人的反。造反的人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好多人连命都赔了进去。不久前，老关街上杀过一次人。那些被杀的人，脑袋被按在砧板上，一刀一颗，装满两谷箩。后来由保安团挑着去萍乡交差。保安团的人说：

“这些被杀的人全是‘黑杀党’。他们经常夜里出山，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孙氏听说的“黑杀党”，就是被国民党赶上山去的共产党和红军，他们经常趁夜深人静时下山，专杀土豪劣绅，把没收的钱粮分给穷人，少部分带走自己用。有人告诉她，何克全就是“黑杀党”的头头。她知道，一个靠晚上出来生活的人，不可能回家看她。她不希望丈夫冒死回来，只希望丈夫给她写封信，报个平安就行。可丈夫一九二六年走后，杳无音信，就像石头沉进了大海。

一九三〇年的冬夜，从来不进儿媳卧房的公公何秋美，拖着一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双腿，走进儿媳的卧房。

何秋美对孙氏说：“克全家的，你出门吧，何家亏待你了。”

“出门”一词在赣西，是改嫁的意思。

孙氏知道，“出门”的话要从公公嘴里说出来，那是他对何克全已经完全绝望的表示。公公是个要面子的人，儿子如果还有一线希望回来，他是不会让儿媳出门的。

金氏也跟进来，劝说道：“儿媳啊，你还年轻，既贤惠，又勤快，还可以找个好人家，过上舒坦的日子。你走吧，我们不怪罪你。清清、英英你想带走就带走，不想带走就留下。你到何家七年了，我跟你爸不能让你跟着我们受一辈子的苦啊。”

面对把自己当女儿看待的公公、婆婆，孙氏眼泪像涌泉般流下。她问公公婆婆说：“克全真的回不来了吗？”

何秋美爱恨交加地说：“肯定死了，回不来了！”

④

孙氏说：“爸，我不相信，我们乡下人对失去音讯的人，不是常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吗？没听到克全不在人世了，我们就不能说克全回不来了。”

何秋美说：“傻孩子，别管他回不回来。你守了他七年，他就是回得来，你出了何家门，我谅他也不敢在你面前说一句责怪的话！”

金氏说：“是啊，孩子，一个不顾家的男人，就该让他一生打单身去！”

孙氏和何克全，尽管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孙氏从和何克全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感觉何克全还是承认她这个妻子的。新婚之夜，何克全剪开她的包脚带，让她把双脚解放出来，她就知道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心里是疼爱女人的，她打心眼里感激他。七年前，何克全把她塞进口袋的银元重新还到她的手里，她就知道，在何克全这个身无分文的男人的眼里，是有她这个女人家的。男人，其实不要说很多话，不要给很多的笑，只要从他的一两个举止中，就知道他对人的好恶。孙氏坚信，何克全一定会回来，即使不回来，有何克全给她的上述的几个举动，她就没有理由离开何家。为此，她对公公婆婆说：“爸妈，我该给菩萨敬香了。有菩萨保佑，克全会回来的。”

何秋美再一次劝导：“孩子，那家伙不值得你守，你出门吧。”

孙氏不再搭理何秋美，独自走出卧室，去厅堂的香案上取香，当香取出后，她将桐油灯盏点燃，将香倒着伸向桐油灯火。慢慢点燃后，她双手握着，对着山墙上挂着的何克全祖父祖母的画像，作了三个揖，在心中祈祷祖父祖母的在天之灵保佑何克全平安。

闻着厅堂慢慢散发出的檀香味，望着如此倔犟的儿媳，金氏失声哭了。

何秋美也被感动得眼泪直流。良久，他长叹一声骂道：“何克全，你这家伙作什么孽喽！”

上海

在白色恐怖中的

第三章

十、入党

一九三〇年十月初，被父母和妻子牵肠挂肚的何克全踏上了黄浦江的码头，回到了离别三年的上海。

那天黄昏，秦邦宪临风伫立在码头上。他穿着浅灰色西装和锃亮的皮鞋，脸上那副黑框圆眼镜在夕阳余晖下一闪一闪的像在放电。头上那片永远也梳不弯的黑发，被海风吹得如同劲草一样不屈地抖动着。

秦邦宪是来迎接何克全的，他对何克全的盼望真有些望眼欲穿。

当何克全兴奋地登上码头时，秦邦宪迎上前去。

两位莫斯科的同窗紧紧地搂抱在了一起。良久，他们松开双臂。秦邦宪把自己的披风脱下，给何克全披上。

望着比自己小了一岁，却像亲哥哥一样体贴自己的秦邦宪，何克全十分感动。他过意不去地把披风脱下，要还给秦邦宪。

秦邦宪重新给何克全把披风披上，说：“刚从轮船上下来，别凉着了，这里深

④

秋的气温，不比莫斯科高到哪里去啊。”

何克全全身热了，这使他想起一九二七年离家那天夜晚，母亲给他装鸡蛋、妻子给他塞银元的情景。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抬头西望，因为父母和妻儿就在他所向往的地方啊！

秦邦宪为何克全提着行李箱，抚着何克全的背部大声说：“走，先去湘菜馆，解决一下饱肚子的问题。”

何克全把视线收回说：“你是江苏人，不是不吃辣椒吗，为什么去湘菜馆？”

秦邦宪说：“今天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请你的客，当然得先照顾你的口味喽。”

何克全更加感动了。革命在外，浪迹天涯，虽然没有在家时家人照顾得那么周到，但党团组织这个大家庭，也是非常温暖的。今天，秦邦宪不但亲自到码头迎接自己，还把他的冷暖饥饿考虑得这样周全，真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啊！

在路边僻静的菜馆里，秦邦宪点了辣椒炒腊肉、辣椒炒焙鱼、辣椒炒香干豆腐和一碗三鲜汤。

秦邦宪一边吃，一边向何克全介绍着国内的情况：“克全啊，国内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不多。你这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又经过少共国际学校培训，从现在开始，可要担当大任了。”

何克全说：“邦宪，尽管你比我小一岁，可你是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在你面前，我只能算个学弟。回到国内，我得向实践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秦邦宪说：“当然，都说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嘛。不学习不行啊。过去你所佩服的李立三，就因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不够，又不听共产国际的话，前几年里，他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大损失……”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由于军阀混战，蒋介石等人无力顾及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党和人民的力量借此机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党员由六大时的四万，迅速发展到十二万。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发展到十多个军七万多人，建立了湘赣、闽西、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三百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并深入进行了土地革命。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的中共中央这时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错误地判断了反动统治的危机。一九三〇年六月，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

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脏，单只斩断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脏，还不能置它于死地。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于是，一系列军事行动由此开始。与此同时还发动了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将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动员回国，投入战斗。李立三的一系列“左”倾盲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损失。当时，远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瞿秋白头脑比较清醒，收到文件后，一针见血指出：“李立三发疯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命令立即停止各地冒险暴动。同时，派已经卸下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的中共总书记瞿秋白随周恩来回国，并责成李立三速去莫斯科汇报情况。

瞿秋白、周恩来八月回国，并于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会上，与会者以“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造成的惨重代价为依据，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指责和批判。

在血的事实面前，李立三受到震撼，冷静了许多，不得不作出深刻的检讨。

.....

秦邦宪对何克全说：“李立三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原名李隆郅。为了便于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在离开长沙到你家乡安源煤矿之前，毛泽东建议他把隆郅改为立三，把名字中的繁杂笔画尽量减少，好让工人记住他的名字。李立三在安源，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办事，确实干得很出色。但是近些年来，这位老兄的脾气越来越火爆，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他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恨不得一个早晨就把整个旧世界掀翻。那次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会前，斯大林接见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时，斯大林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处在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在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李立三不信这个邪，更不顾斯大林是共产国际的领路人，当着斯大林同志的面大声表示异议说：‘中国革命现在还是处于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着工人、农民的斗争！’……”

何克全认认真真地听着。

秦邦宪说：“结果呢？他所发动的一系列迎接红五月的罢工、暴动，被碰得头破血流，使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上个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被撤销

了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何克全当然知道党内近期所发生的事，但他想了解得更为详细一些，想通过对情况的掌握，更好地为党工作，让自己进步得更快。他问道：“听说李立三作出决定的前前后后，远在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曾经向他提出过不同意见？”

秦邦宪给何克全碗里夹了块肉，示意何克全多吃些，回答说：“是的，李立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部署，同毛泽东坚持先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的主张是根本对立的。钻山沟的毛泽东不同意攻打大城市，说那样会把三年来积攒的一把本钱打光。可李立三不再是当年毛泽东派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留法学生，他以为自己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一跃千里、独往独来了。他不但不听毛泽东的劝阻，相反还挖苦毛泽东在江西的游击战争是‘逃、跑、走’。”说到这里，秦邦宪揶揄一笑：“嘿嘿，这两个湖南老乡，真是针尖对上麦芒了。”

何克全点了点头。

秦邦宪说：“今年六月十五日，李立三居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实际上是毛泽东，去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中央新的路线到达红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毛泽东迫于中央的压力，加上久居山里，也怕对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了解不全面，而贻误战机，不得不和朱德接受中央的命令，在军事上参与了攻打长沙和南昌的行动。但是，毛泽东根据江西的实际情况，在所谓执行的过程中，竭力保存自己的实力，避免了红军在整个中央部署的行动中遭受大的损失。听江西苏区回来的同志说，在这次行动中，根据地不但保住了，而且有所发展。我不知道毛泽东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那以后听是听，做是做，号令怎么统一？如果是错的，那江西的根据地又怎么保得住？”

何克全叹了口气说：“李立三过去是我非常敬佩的人。他是我老家相邻县湖南醴陵人。他和刘少奇在安源时，一个在幕后，一个在前台，闹安源大罢工时组织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那时，我还在萍乡中学读书，我们学校的师生都跑去安源看热闹，我们真被他们的勇敢行为所感染了。没想到，他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就这样草草地离开了在中央秘书长的工作岗位。”

秦邦宪见何克全有些伤感，便及时警醒他说：“李立三败走麦城，你不应该感到失望。”

何克全抬起头来，望了一会秦邦宪说：“我……当然不会。”

通过莫斯科三年的学习、培训，见了世面，长了知识，何克全自我感觉成熟了许多。特别是通过反托洛茨基的斗争、“江浙同乡会”、中山大学校园风暴和中大清党运动等，何克全目睹了米夫代表共产国际处理瞿秋白等人的过程，认为共产国际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依靠和保证。特别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事先的制止，证明了共产国际有先见之明。

这次离开莫斯科，米夫私下里告诉他，鉴于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在处理李立三的错误问题上过于宽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非常生气，认为他们和了稀泥，搞了调和，说李立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居然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还继续选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是共产国际不能容忍的。因此，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米夫将来中国指导工作。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写了《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一封信》，信中主要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表示强烈不满。这封信已经由回国的沈泽民等带上了路。何克全肯定地认为，一场问责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的斗争即将拉开序幕。

刚刚二十四岁的何克全，已经做好了与犯有调和错误的中央领导作斗争的准备。因此，当秦邦宪谈到李立三时，何克全毫不含糊地说：“李立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我怎么会为他失望呢？人类社会是个大舞台，总在上演着优胜劣汰的悲喜剧。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秦邦宪很是惊喜何克全这种态度。面对着这位头上立有永远也压不弯的头发、脸上有凸显颧骨和身上尚存些许稚气的同学，秦邦宪认为何克全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同志。自己需要他，王明需要他，王明的需要说穿了也是当前共产国际的需要，也是当前中共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啊。

王明、王稼祥和秦邦宪一九二九年回国时，恰逢李立三执掌中央大权。米夫虽然电示中共，要重用王明，但李立三鉴于王明阅历浅，又没经历过大革命锻炼和考验，因此只安排他在沪东、沪西区委做些宣传工作，为《红旗》杂志采访些稿子。

为此，王明认为李立三对他大材小用，不仅大发牢骚，还跑到当时任全总党团

④

书记的罗章龙那里大诉其屈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当领导。对这一点，你要认识清楚。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不懂马列，十分幼稚，一贯右倾，需要从上到下进行改造。”

当李立三进行“左”倾冒险时，王明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马上公开改变对李立三的态度，当即追随李立三。李立三见王明在自己面前低了头，就将他调到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当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的反对时，王明便又见风使舵，和秦邦宪、王稼祥一道，利用李立三七月九日召开政治会议的机会，引经据典，对李立三、向忠发进行了猛烈抨击。

对此，李立三、向忠发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予追随王明的秦邦宪、王稼祥严重警告处分。

之后，王明被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王稼祥被调往香港工作。秦邦宪还算走运，继续留在中央机关。

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李立三进行批判，王明当然高兴。但没想到的是，主持会议的竟是瞿秋白。而瞿秋白宽容了李立三。

王明认为，瞿秋白在中央是座山。有这座大山压在头上，他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看看吧，明明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了，瞿秋白却不撤销李立三给予他的留党察看的处分。

王明对瞿秋白公开表示不满。

瞿秋白没有计较，出于对年轻人需要加强磨砺和锻炼的考虑，决定让王明去江西苏区工作。

王明为此恨得咬牙切齿，认为这是瞿秋白报复他，要置他于死地……

那天，王明找到秦邦宪，在秦邦宪的住所里摔杯子、拍桌子，大骂瞿秋白借机整人，说他今生今世跟瞿秋白没完。

秦邦宪等王明发泄完后，给他倒了杯凉水，叫他冷静一下。

秦邦宪说：“老同学，你的脾气太躁了？”

王明一口气喝完水，将杯子往桌上一顿说：“是瞿秋白把我推在火炉上烤，我能不躁？”

秦邦宪见王明依旧控制不住自己，就说：“你如果不冷静下来，那就马上去江西赣南，去找那个从井冈山上下来的山大王毛泽东，我给你开介绍信。”

王明这才把嘴闭上。

秦邦宪说：“你刚回来，不知道上海的情况起了变化。”

王明眼睛一睁，问：“变化……什么变化？”

秦邦宪推了下眼镜，不紧不慢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是给李立三错误定性的，说李立三犯了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信里对刚刚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很不满，说瞿秋白犯了‘调和错误’。”

王明两眼一亮，一把抓住秦邦宪的手问：“这信到了吗？现在在谁的手里？”

秦邦宪推开王明的手说：“在夏曦、沈泽民、陈昌浩手里，他们正在回国的路上……”

“在他们手里？！从莫斯科到上海得走多长时间！等他们的信到达时，我早就到了江西的大山沟里喝上毛泽东煮的南瓜汤了。”

秦邦宪说：“为什么非得等他们到来？何克全明天就到上海。我想，作为米夫信任的人，他对共产国际那封信的内容肯定知道很多。明天我去码头接他。”

“何克全回来了？”王明桌上一拍说，“好，太好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接他。”

秦邦宪说：“你去做什么？你是江苏省委的宣传干事，以什么名义去接他？不怕别人说我们搞小宗派吗？”

“这……”

“心急吃不得热汤丸，一切由我这个还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学来办理。”

……

秦邦宪给何克全的杯里加了些茶水说：“眼下，中国革命就靠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了。本来想在莫斯科介绍你入党，因为我和王明突然回国，把这事给耽误了。这次回来，马上解决这件最紧要的事……”秦邦宪说到做到。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他的介绍下，何克全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秦邦宪接着问道：“听说共产国际给中央来了一封信？”

何克全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充分信任，以及对秦邦宪的感激之情，就把从米夫那里获得的消息告诉了秦邦宪。

秦邦宪兴奋地说：“克全，你先住古拔路我的住所。床铺等一应生活用品，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以后还有好多事我们在要在一起商量，走吧。”

④

何克全感慨地说：“邦宪，三年前，我在上海板凳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去了苏联，对大上海可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两眼一抹黑，还得靠你指点喽。”

秦邦宪说：“有共产国际给我们指路，我们还怕不能在茫茫夜海中找到走向胜利彼岸的道路？”

何克全说：“一定能找到，我们！”

十一、志同道合

获悉共产国际来信的内容，王明神气十足了。他不但拒绝去江西，而且擅自离开江苏省委，搬到离中央办公地不远的斗鸡桥边住下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和秦邦宪经过一番密商，联名向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把李立三的问题定性为“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并指出“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对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失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

四天以后，王明和秦邦宪感到第一封信还没有把事情说透，又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第二封信。信中最后写道：“一、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在王明、秦邦宪的呐喊下，不少干部和工人都卷入了反三中全会的浪潮里，使得中共中央领导的威信急剧下降。特别是十二月米夫的到来，把反三中全会的狂潮推向了高潮。在这期间，王明被米夫重用，破格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十二月十六日，由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取消对王明、秦邦宪、王稼祥处分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米夫突然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早已拟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提交大会讨论。

王明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党代表，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也列在名单中。

在这场斗争中，米夫强行通过了这个名单。结果政治局委员被确定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政治局候

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中央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总书记是向忠发。在以上人员名单付表决，有人提出周恩来应退出政治局，但因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意见，周恩来得以继续留任政治局。

瞿秋白、李立三从这次会议起，永远离开了中央决策中心。

在后来的半年里，向忠发虽然是总书记，但实际上是一个摆设。当年六月，向忠发被国民政府逮捕。王明正式代理中央总书记。

在这段时间的党内斗争中，何克全由于刚从苏联回国，充分相信共产国际，以至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时正是反立三路线，我参加了反立三路线。”在当时，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只是米夫和王明借机兜售他们的“私货”，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强行夺取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权。

在与李立三作斗争的过程中，团中央派何克全去香港，对广东省的共青团工作进行全面巡视。

度过一九三一年党内斗争风刀霜剑的严冬，三月的上海，春天的气息已经来到了大街小巷。

外滩上的春花正在吐蕾，黄浦江边的新草正在泛绿，大街上的法国梧桐上已经有小鸟在放声歌唱。

这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届四中全会在这里召开了。作为从事共青团领导工作的何克全，专程从香港回来上海，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何克全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会后不几天，何克全被任命为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

在肩负重担、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就任的那一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秦邦宪依依不舍地对何克全说：“克全，本想留你在团中央工作，但蒋介石去年十月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已经腾出手来，调集十万大军，任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实施了对毛泽东、朱德的第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到去年底，在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和‘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的战法指导下，居然不可思议地歼灭了包括国民党第十八师主力在内的一万五千人，缴获枪支一万二千条，

④

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据情报反映，从今年二月开始，蒋介石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湘、鄂、赣、闽的部队，准备发动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中央考虑，香港、广州离赣南近，便于我们在粤、港筹集的军火、物资取捷径直接进入赣南。同时，还便于我党干部取道香港进入赣南。因此，中央决定你去那里工作。对组织的安排没什么意见吧？”

何克全说：“没意见。现在我就想怎样把团省委书记当好。”

秦邦宪说：“这就好，香港一八四二年被英国占领后，已经被帝国主义经营了将近九十年。在那种地方开展地下工作，险象环生，风云多变，得格外小心喽。”

何克全说：“通过前段时间对香港、广东的巡视，我认为，越是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越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置之死地而后生嘛，我已经做好了严酷斗争的准备。”

秦邦宪说：“那就好。香港是早期工人运动的爆发地之一。一九二二年初，为解决物价飞涨和海员工资太低的问题，香港一百二十三艘轮船和六千五百多名工人进行了大罢工。尽管港英当局进行了血腥镇压，但由于有中共广东省委的声援，香港从此拉开了反抗港英统治的大幕。广东作为第一次国共成功合作的地方，是我党开展农民运动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一九二四年成功平息由英国支持的商团叛乱的地方，还是广州起义的爆发地。在那里，国共两党创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眼下已成为国共双方拼杀的领军中坚。在那里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也成了国共对垒中的铁血骨干。相信你在那里能做出大成绩来。”

何克全信心百倍地点了点头，之后，悄悄地问：“听说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已经从莫斯科回来了？”

秦邦宪说：“他以留学德国回国、途经莫斯科为名，乘东行列车，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大连，之后，再搭日本的轮船到达的上海。”

何克全问：“他现在还在上海吗？”

秦邦宪摇了摇头，说：“昨天（四月一号）已经走了，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跟陈昌浩一起走的。国焘扮成大老板，昌浩扮成他的伙计，在杨树浦码头搭去武汉的货船，离开了上海。”说到这里，秦邦宪话锋一转问：“是不是想你那位萍乡大哥了？”

何克全说：“是的，在异国他乡莫斯科，他曾认我是他的同乡。”

秦邦宪点了点头，之后，转了话题说：“克全，离家这么久，没想过家吗？”

何克全：“当然想过，可我们这些整天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现在真是有家回不得呀。”

秦邦宪说：“不回家更好。当地熟悉我们的敌人，见我们没回去，还以为我们死了呢。我们一死，家里人就少遭好多罪。”

何克全点了点头说：“到了香港，我想给家里写封信，给他们报个平安。”

“不能写！”秦邦宪当即劝阻说。

“为什么？”

“国民党对来历不明的信件查得特别严格，搞不好就会给家人招来麻烦。”

何克全脸色骤然变了，他想起一件事来，说：“去年回国时，因为书籍太多，带不动，我通过第三国德国，往家里寄过一大包书，会不会……”

“什么？！”秦邦宪跟着大惊失色地说，“克全啊，你给家人添麻烦了。你不想想，在赣西那个小山村里，有谁能从国外寄东西回来？”

“是啊！”何克全顿感自己太欠考虑，懊悔不及地说：“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怪就怪自己惜书如命，特别是马克思、列宁的典籍，感觉非常重要，回国后还要照着它的启示和教导去做，舍不得丢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园里。”

秦邦宪说：“你妻子肯定被敌人抓了。在敌人面前，如果她不宣布跟你脱离夫妻关系，肯定会被敌人杀害的。”

何克全急问：“你怎么知道？”

秦邦宪告诉说：“去年十一月，也就是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指挥江西红军反蒋介石‘围剿’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抓获。为了从杨开慧的嘴里获得党的机密，敌人使用了包括老虎凳在内的刑具，对杨开慧进行残酷折磨。杨开慧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儿女，坚决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最后，敌人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要求杨开慧刊登一则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就放她出狱。可杨开慧说，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女子到死心如铁。我这个共产党人，从不动摇自己的信仰。要我跟毛泽东离婚，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敌人恼羞成怒，将杨开慧杀害在长沙郊外。”

何克全听了，忧心如焚地望着家乡的方向，似乎听到妻子和父母在敌人的摧残下，正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叫喊。

十二、情真意切

一束阳光从铁窗口射进来，照在孙氏的脸上。这张原本白嫩细腻的脸，经过岁月之轮的碾压和摧残，已经变得分外粗糙。黏着草屑的乱发，半掩着孙氏的脸。她的嘴角和鼻孔流了不少血，那血已经风干，有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褴褛的衣衫明显是被打烂的，上面凝固了不少血迹。孙氏已经睡着，睡得很沉很沉。昨天夜里，孙氏又遭了一场折磨，保安团叫她说出何克全到底在国外做什么。

原来，何克全通过德国邮寄的书籍已被邮递员送到何家。

初见这么一大包东西，孙氏和她公公婆婆就像看到何克全突然回到身边一样，欣喜若狂地将大包抬进屋里，把大门紧闭起来。

因为邮递员告诉说，这东西是从国外寄回的。

全家人以为何克全在国外发了大财，寄回了金银珠宝。

当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包裹打开时，全傻了眼，里面包着的全是书籍。除了书籍，连一件家里用得着的东西都没有。这些书，除几本封面上写有“何克全”三个中国字外，其他都是印得整整齐齐的像豆芽菜一样的外国字，谁也认不出来。更不可思议的是，翻遍所有书籍，竟找不到何克全写给家人的只言片语。

何秋美破口大骂了：“祖宗啊，看看吧，这就是我何秋美生的儿子！四年多了，就寄回一堆书，一堆只有神仙才看得懂的天书，我真是白养他了！”

金氏也跟着埋怨说：“克全真不懂事，在外再赚不到钱，买几粒糖块，放在书里，给婆娘、崽女吃，也是当男人当爸爸的一点心意啊！”

何秋美说：“他出生时我就说过，天冷地冷地来到这个世上，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六岁的何明清听到奶奶提到糖，吵了起来说：“奶奶，我要糖，我要爸爸寄回来的糖！”

四岁的何淑英也跟着叫：“我要糖，我也要糖嘛！”

听到孙女吵闹，何秋美气不打一处出，将旱烟筒往地上一摔，恨恨地对金氏说：“书能当饭吃吗？赶紧抱到灶屋里，烧了！全都烧了！眼不见，心不烦！”

金氏说：“书又不咬人，烧它做什么？好歹也是克全从国外寄回的，给家报了平安。没有这些书，你能知道克全还活在世上吗？”

何秋美不想听金氏唠叨，径直前来，抱起书，往厨房里走去。

“爸，”一直待在一边的孙氏，这时站了起来，拦住何秋美说，“这东西不能烧！”

“为什么？”

“克全大老远把它寄回来，就是告诉家里人，这东西很珍贵，很值钱。说不定在他心里，这东西比汇票还重要呢。”

何秋美耐着性子说：“孩子，爸不把它烧了，出不了心里这口闷气啊！你想想，你为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气，挨了多少保安团的打。他倒好，一人吃饱，在外逍遥，是人吗他？”

孙氏说：“爸，克全是做大事的男人，做大事的人就有做大事的脾气。你想想，一天到晚只知道在房前屋后转悠的男人，能读懂这些外国的书吗？”

何秋美说：“读得懂外国字的人就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要钱去买？肚子里越有墨水，就越应该懂得孝敬父母。肚子里越是有学问，就越应该懂得看重婆娘、崽女。像他这样，连几个字的信都不给家里写，还做得成大事？烧，全都烧了，不烧了它我这爸白当了！”何秋美推开孙氏，往厨房走去。

孙氏紧随上去，拦住何秋美，两腿一弯，跪在何秋美面前说：“爸，克全一走，什么都没给我娘女仨留下。你就给我们留点念想吧？这些书克全都摸过、读过，磨得那样破旧，上面还留着他的气味。你就让我每天闻闻他的气味吧，啊？”

面对苦苦哀求的儿媳，何秋美进退两难了。

是啊，孙氏进到何家以来，给她带了什么？不是带给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就是一次又一次流不尽的眼泪。尽管如此，孙氏无怨无悔，恪守妇道，认定丈夫一定在做大事，一定能做成事。何秋美抱着那些沉甸甸的书籍，仰天长叹说：“老天爷，你真是造孽啊！”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狗叫闹了起来，随之有人在粗暴地踢门：

“何秋美开门，快开门！”

“再不开门，我们可要砸了！”

听到恐吓声，全家里人都不敢做声。

孙氏首先从呆状中醒来，只见她扯过身边的米箩，将何秋美怀里的书籍一把夺

④

过，塞进米箩里，再将米箩移到散落在地下的书堆边，将书全部拾进箩里。之后，她蹲下地，将米箩一举，扛着米箩快步往大厅后面奔去。

不等何秋美在孙氏的举动中缓过神来，门被撞开了，魏炽鸣在团丁的簇拥下，气势汹汹地来到何秋美面前，逼问：“何秋美，大白天关着门做什么？”

何秋美说：“我家的门，还由得你管关还是不关？”

魏炽鸣扫了一遍厅堂，阴阴一笑说：“敲了半天门，为什么不开，怕是在屋里藏匿金银珠宝吧？”

何秋美知道，魏炽鸣是冲那些书来的，于是说：“金银珠宝跟何老倌是冤家对头，它肯进何家的门？现如今金银多得用不完，只能藏起来、埋起来的，除了魏团长你们这些官儿们，哪个有这能耐？”

“那你关着门做什么？”

“我怕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家伙抢了我的屁去！”

“啪！”魏炽鸣一个耳光扫过来，打得何秋美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

“爷爷！”何明清、何淑英吓得大声哭叫起来。

金氏把两个孙女搂进怀里，大声问：“为什么打人？是不是我们何家欠了你们什么？”

魏炽鸣说：“对，你们何家就是欠了国民政府的债，而且是大债，天大的债！赶紧把那包东西交出来！”

金氏问：“什么东西？”

魏炽鸣说：“就是那只邮包！那只邮递员送来的邮包！”

金氏问：“哪个邮递员给我家送过东西？我不知道！”

魏炽鸣说：“别想要赖？乡邮员送包裹的单子上，还留着何老倌按的手印呢，敢说不知道？”

金氏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年头，我们按的手印多着呢，今日一个捐，明日一个税，后日还要给你们跑腿费，我们的手指都被按脱皮、按出血来了！”

“死老太婆，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上，把她的小孙女抱过来。今天不把东西交出来，就把她送到萍乡警察局喂狼狗！”

“敢！”何秋美怒发冲冠，一脸杀气地操起一把刀，举过头顶，冲向魏炽鸣，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吼道，“老子跟你拼了！”

“爸！”孙氏闻声，从厅堂后面跑出来，她抱着一个包袱，给金氏使了个眼色说，“不就几件旧东西嘛，他们想要他们拿去，犯不着跟他们较劲！”

魏炽鸣抢上几步，夺过包袱，双手一掂，感觉不对，用力一抖，几件旧衣服散落到地上。

魏炽鸣逼视孙氏问：“就几件衣服？”

孙氏说：“你不是没长眼睛。”

魏炽鸣说：“狸猫换太子，骗鬼去吧，给老子搜！”

团丁又一次翻箱倒柜，却又一次一无所获，最后，只好把孙氏抓到保安分团进行逼问。

.....

魏炽鸣走进关押房，把手伸向孙氏的鼻孔，当感到孙氏还在呼吸时，抬脚就向孙氏踢去，吼道：“装什么死，起来！”

一阵痛感使孙氏慢慢睁开眼睛来，见是魏炽鸣，孙氏不屑地把头别向一边。

遭到孙氏的蔑视，魏炽鸣火冒三丈，又一脚踢到孙氏身上说：“不想理我？不想可以，先把共产国际的宣传品交出来，不然，老子叫你永远待在这里。来人！把这个死不开口的共党婆娘‘称半边猪’！”

“称半边猪”，就是把人的同一边的手脚分别吊起，悬到梁上，进行折磨。若是被悬在梁上的人不肯交代问题，就将他放下，将吊手脚的绳子解开，吊在他的大脚趾和大拇指上，再将他扯上梁去。被悬的人还不交代，审问者就往下撕扯被“称”人另一边的手脚。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人因经不起身体被撕裂的痛楚，都会老老实实招出心中的秘密。

保安分团副团长纪在兴，见团丁们要“称”孙氏，叫住了他们，之后，把魏炽鸣拉到一边，提醒说：“团座，团部办公经费可是吃紧得很哪。要是把这女人弄死了，上个月你欠的赌债和风流债，还有这个月的烟酒钱，可就没有来路了。”

魏炽鸣瞪了眼纪在兴，说：“上头逼得这样紧，这婆娘不开口，别说到时还赌债，就连我们现有的饭碗都会被他们砸了去！”

纪在兴笑了笑问：“他们会砸你的饭碗吗？”

魏炽鸣反问：“为什么不会？”

纪在兴不屑地说：“老关这地方，是江西跟湖南的结合部。共党的‘黑杀党’

跨省活动十分频繁，经常有为党国办事的人被暗杀，县里哪个敢来这个要命的地方当团长？这是不会影响你饭碗的原因之一。其二，何克全寄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谁也没见过。谁能认定这东西就是共产党的宣传品？听那些懂得外国字的人讲，这东西是从德国寄来的。在德国，共产党可是没有太大的市场。何克全去了德国，不一定就是共产党。你想想，如果上头已经认定何克全的确切身份，这婆娘还能活到今天吗？有以上两条，你就放心当你的分团长吧。”

魏炽鸣听后，眼睛像鸡啄米一样一阵急眨，认为纪在兴这话说得有道理，就问：“你的意思是……”

纪在兴眼珠子阴阴转了一转说：“何秋美不是有田产吗？就叫他拿出几亩田给保安团，让他赎回这婆娘去。之后，你将这些田一出手，换成袁大头，不就解决你还赌债、风流债的急需了？”

魏炽鸣就像眼前突然掉下块狗头金，大睁着眼睛对纪在兴说：“亏你小子想得出来！”

纪在兴继续道：“另外一条更重要。”

魏炽鸣说：“还有更重要的？说，快说！”

纪在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何秋美送来的田被我们花销完了，我们还可以找条理由，再把孙氏弄进来，叫何秋美再拿东西来赎。”

魏炽鸣大叫：“要是何老馆子的田没有了呢？”

纪在兴说：“田完了还有土，土完了还有山，山完了还有何氏家族人的田地。过去讲，一人犯法，九族株连。现在是非常时期，难道何氏家族不该为他们族里出了个大人物付出代价吗？在平头百姓那里，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财源。”

魏炽鸣一拳击在纪在兴胸脯上，大声骂道：“妈那个巴子的，你小子今生今世不短命，下世都得变畜生！”

纪在兴奸诈地笑着说：“这年头，不想点办法，能活得下去吗？上方贪得无厌，下方也得活命。上方当阎王，下方就得变恶鬼。都说老百姓是衣食父母，不吃他们还能吃谁去？”

“你妈怎么生你这么一副好舌头？这话说得蒋总司令都得给你颁大奖！”魏炽鸣一声大叫：“来人，去请何老馆家里的人！”

纪在兴说：“不用叫，何秋美就在门外，急着等救儿媳妇出去呢。”

十三、不屈于香港铁窗

五月的香港，热得只能穿着短袖衫。

热风带着大海中的腥味，一阵接着一阵地刮过来，将郊外的椰树林、荔枝林、芒果林摇得沙沙作响。

天空碧蓝如洗，大朵大朵的云彩正缓缓移动，仿佛一队队天兵天将在搬运着一车又一车沉甸甸的雪白棉花，去玉皇大帝那里邀功请赏。

拥挤的街道上，到处是穿着薄衣单衫的男女。在他们头顶和身边的建筑物上，悬挂着鼓钉一样密集的广告牌，招贴画上展示着的，净是些袒胸露背的女人和西装革履的男人。商铺喇叭里的叫卖声特别刺耳，歌厅留声机里的音乐分外激情。汽车行进中的鸣叫，在大街小巷里不停地打着惊叹号。

已经化名为凯丰的何克全，坐在临街的办公地点里，无心顾及身边繁华多姿的初夏。

由于何克全在武汉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名单，加上从苏联回国后，已被反动派获悉。为了隐蔽身份，使“何克全”这个姓名在大众心目中完全消失，经党组织批准，何克全取了“凯丰”这个化名。

不少人认为，何克全这是取了河南省开封市的地名为化名，凯丰是从“开封”的谐音演变而来的。其实，何克全的人生与河南开封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没去过河南，为什么要选个北方地名为自己的化名呢？况且何克全本人也没有说过他化名来自地名开封。因此，将凯丰这一化名说成源自开封是没有道理的。何克全是位大知识分子，当然知道“开封”的反义词是“关闭”。何克全的老家是萍乡老关，他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因此取了家乡“老关”的反义词“开封”作为自己的化名的。而“开封”还表示，自己已经走出封闭的家庭、家乡，在异地他乡从事着革命活动。

凯丰刚往中央苏区送走一批熟悉无线电技术的青年，以供军事斗争的急需。此时，他握着电话筒，正在调拨一批子弹和药品运往赣南。

一九三一年初，苏区领导机构发生了变化。一月五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任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到达之前，书记暂由项英代理。项英代行苏区中央局书记后，

④

根据中央批示，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委。四月中旬，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六届四次会议精神。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在决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时，面对敌二十万我三万的强弱局面，项英主张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使敌人的包围落空。毛泽东表示反对，主张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军民联手，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敌人的“围剿”。朱德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支持。在项、毛争执不下的时候，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大家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结果，在第二天继续的会议上，彭德怀、林彪、滕代远、黄公略、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等红军将领都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的部署，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胜利。两个多月的战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多支，取得了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完全胜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何应钦吸取第一次“围剿”惨败的教训，调集二十个师加三个旅共二十万兵力，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向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全力推进。

江西苏区的严峻形势，使凯丰不能不忘我地工作。

从上海来到香港，出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后，凯丰立即召开团省委负责人会议。在会上，他对共青团四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传达，要求广东被破坏的共青团组织立即恢复，还没有建立团组织的地区要求马上建立；并要求各地团组织在确保政治上可靠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团员，壮大团的工作队伍。会议结束后，凯丰不顾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四处都是白色恐怖的局面，冒着生命危险，分赴广东各地秘密指导共青团工作的开展。

在共青团广州市委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会场突然被敌人包围。三十名与会团骨干面对紧急形势，操木棍的操木棍，举凳子的举凳子，要冒险冲出敌人的包围，掩护凯丰安全脱险。

负责凯丰安全保卫的史志刚，则拔出手枪，想杀开一条血路，把敌人引走，让凯丰趁机转移。

凯丰喝住了大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叫大家保持镇静。吩咐停当，只见他快步走到窗子边，将那块垂在窗边的大红窗帘“哗”地拉上。随即，就听得街道

对面的楼上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枪口指处，一名特务应声倒地。街头敌人看到自己人倒地，惊得脖子一缩，同时趴倒在地上，将惊悸的目光投向那楼上。

“哒……”“哒……”这时候，那楼上响起了连发枪声，而且动静越闹越大，间或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

特务头子不敢迟疑，手枪一挥，指挥特务向那楼上猛冲过去。

凯丰见敌人转移了目标，一声“快走！”，指挥团干部们四散脱险。

当最后撤离的凯丰来到另一个秘密会址时，转移的团干部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一位青年惊奇地问：“凯丰同志，那楼上的枪手是你预先埋伏好的吗？”

凯丰点了下头，说：“对敌人斗争，就得未雨绸缪，多长个几个心眼。”

青年问：“那楼上怕有好几位同志吧，枪弹声响得那么厉害？”

凯丰摇了摇头，说：“就一个同志，一支手枪。那些密集的枪弹声，全是放的大小爆竹。我的老家萍乡，有生产爆竹的历史，乡亲们经常用爆竹驱邪去魔。我就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敌人。”

“哈……”青年们被何克全的话逗乐了。

说笑间，一位女青年走进会场，女青年打扮得干练利落，鸭蛋形脸上有两弯柳叶眉，一对眼睛异常地明亮，红润的嘴唇配着洁白的牙齿，给人以灵巧奔放的感觉。

凯丰把女青年让到众人面前说：“介绍一下，她就是刚才掩护我们转移的同志，大名廖似光。”

在场者瞪大了眼睛，他们简直难以置信，这就是那位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把敌人吸引过去的勇士。在把敌人引开后，她自己又能安全脱身。

“继续开会吧，我给大家倒茶。”廖似光就像回到自己家里，招呼大家坐定后，手脚麻利地忙了起来。

廖似光，广东惠阳人，受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启大的派遣，在凯丰身边工作。为了隐蔽战线工作方便，组织决定廖似光以凯丰妻子的身份，掩护协助凯丰工作。

……

在共青团广东省委香港办公地点，凯丰办公桌的对面就是廖似光的办公桌。外间房子，是秘书兼警卫史志刚的。史志刚来自海南岛琼崖县，青年骨干。凯丰、廖

④

似光平时都称史志刚为小史。

工作尽管紧张忙碌，但为安全起见，人手安排得极少，因此，闭省委工作只能没日没夜地进行。

这时，凯丰感觉饥饿难挨，一看怀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正要叫廖似光和小史去街上吃饭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廖似光：“似光，秘书长林汉文今天怎么不见人影？”

廖似光也有些纳闷，寻思了一下说：“是啊，我正想问你呢，会不会是去了谢启大书记那里了？”

凯丰说：“谢书记昨天去了广州，林汉文是知道的。他今天怎么会去找谢书记？”

廖似光说：“会不会去了省委其他同志那里？”

小史说：“我刚从省委取文件回来，没看到林秘书长呀。”

廖似光说：“这就奇怪了！你不是经常给我们重申地下工作的纪律，外出半天以上必须经你批准吗？”

“这不正常。”凯丰紧张起来，他以特有的警惕吩咐廖似光和史志刚说，“赶紧处理机密文件，林汉文可能出事了！”

搬到这个临时办公地点的时间不很长，文件不多，三人手脚并用地抢起时间来。就在他们紧锣密鼓收拾东西准备转移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凯丰对廖似光和史志刚使了个眼色。

他俩急忙抓起几份本想带走的文件，溜进卫生间。

廖似光三下五除二将文件撕毁，扔进便池。史志刚一拉抽水马桶，水流将纸屑冲得无影无踪。

凯丰从容地打开厅门。

巡警如饿狼般冲了进来。

进屋的巡警兵分几路，翻箱倒柜地搜查着。经过一通折腾，最终只搜到一些毫无价值的纸张。

进门后一直不说话的巡警队长，见一无所获，把手一挥说：“没有搜到东西，就把人带走！”

不由凯丰他们争辩，粗壮的巡警四人抓一人，粗暴地将何克全、廖似光、史志

刚拖出房间，塞进警车。

凯丰和廖似光、史志刚被分别关押。

凯丰所在的审讯室又闷又热，充斥着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墙上挂着、地下放着的刑具应有尽有，嗜血的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发出贪婪无比的叫唤。

阳光从窄小的窗口射进来，照在凯丰的身上。凯丰的脸上和肩上，交织着一条条鞭痕和血痂。白衬衫上两条袖筒早已被打没，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此时，他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一把破椅子上。

因前两次审问没有一点收获，这次巡警队长要亲自过凯丰的堂。

背对着阳光的巡警队长，有张刀条型脸，这脸显得十分阴沉。巡警队长以带着粤地口音的北京话问：“姓名？”

凯丰答：“已经回答过两遍。”

“姓名？！”

“张有文。”

“籍贯？”

“湖南醴陵。”

“什么时候来香港的？”

“三天前。”

“来香港做什么？”

“想在香港报馆找个事做。”

“找到了吗？”

“香港失业人多，个个都为活命奔忙，找不到。”

“你在香港的住所是哪个介绍的？”

“一个湖南老乡，姓金。”

“现在在哪里？”

“前天去了新加坡。”

“新加坡？这么巧？”

“无巧不成人间。如果不是他走了，我会遭你们恶魔一样的折腾吗？看看我身上，我要到港督府控告你们！”

“啪！”探长一拍桌子，呵斥道：“一点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比起你们共党

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均贫富那是小巫见大巫。在你们棍棒下，有多少地主老财被你们活活打死？有多少富豪商贾被你们砍了脑壳？你这共党头目还敢在我面前讲控告！”

“我不是共产党。”

“不是共产党？”巡警队长将一份从凯丰办公处搜到的文件拍在桌上，问，“这是什么？”说完叫下属拿给凯丰看，又道：“别以你们处理文件诡秘快捷，告诉你，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是从你们住所搜出的。白纸黑字，还想过关？！”

凯丰一时语塞，这是那份来不及处理的广东团省委工作简报。

“你是何克全，中共青年团的头头！还兼广东团省委书记！广东共党、共青团在广州被围剿得站不住脚，逃到香港避难，哪个不知道？告诉你，香港不是共党分子的避难地，也不是共党的避风港。这里是赤色分子的绝命场、阎王殿！”

“我不是何克全，更不是共青团的头头。”

“哼哼，这份文件长了翅膀，自己飞到你房间的？告诉你，你的同伙已经招供了一切，别想在我面前撬口不开。”

凯丰笑了，笑得很得意。敌人既然取得了廖似光和史志刚的口供，还用得着在自己身上费时费力吗？敌人这是想利用廖似光、史志刚和自己分开审讯之际，让三人在互相不知底的情况下，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以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凯丰心想：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可以被敌人消灭肉体，但绝对夺不走他们为事业献身的信念。凯丰在心里对巡警队长说：“长期跟你们这帮人面兽心的家伙打交道，这点雕虫小技还敢在我面前玩弄？”

受巡警队长“撬口不开”的启示，凯丰不再说话了。他相信，廖似光和史志刚也会跟他一样，正在坚守党的秘密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廖似光、史志刚和凯丰是心灵相通的，敌人的严刑拷打，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队长见凯丰身躯后仰着，盯在天花板上，气得跳了起来吼道：“何克全，我的忍耐非常有限，再不招出共党在广东香港的机关，我马上送你去广州，交给国民政府问你的死罪！”

凯丰眯缝着眼，斜看着队长。他知道，这家伙已黔驴技穷，再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了。

队长气急败坏。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港英当局此前已经领略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的声势。那声势来得山呼海啸，用地动天惊、气吞如虎、大有把英国人赶进海里喂鱼虾的气势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此时此刻，港英当局必须毫不手软地配合国民党的“剿共”行动。“赤匪”不除，港难未已啊！一星期前，当局已经责成警方，本月之内，必须剿灭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以切断由此通往赣南的人员、枪弹和药品的运输线。现在，留给巡警队的时限已经不多了。巡警队长怕上司撤他的职，砸他的饭碗。他抓起靠墙的一根粗警棍，冲到凯丰面前，点着他的额头喝道：“何克全，你招还是不招？”

凯丰闭上眼，像睡熟一样，干脆打起鼾声来。

队长挥起棍棒，气急败坏地挥打在凯丰头上，
何克全身子一歪，瘫倒在地上。

他的额头、耳朵被打破，鲜血爆了出来，很快流下地去。

巡警队长累得气喘吁吁，破口大骂下属说：“妈的，你们愣着做什么？赶紧给他泼凉水。泼醒了再上烙铁、老虎凳！我就不信，他的身子不是血肉之躯！”

凯丰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之时，谢启大通过隐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了解到，凯丰表现特别出色，意志非常坚定。谢启大高兴之余，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谢启大报告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没有凯丰同志的守口如瓶，没有凯丰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广东的党团组织不知要遭到多大的损失！同志要付出多大牺牲！凯丰同志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干部。

在中央的指示下，谢启大为营救凯丰等同志四处奔波。

他找了一位亲近共产党的外国律师，为凯丰进行无罪申诉。

他紧急动用了广东省委的所有力量，打通了香港警方关节，叫他们别把凯丰引渡给广州国民党军警，叫他们在香港从轻发落。

后来，凯丰在个人自传中回忆了在香港被营救的经过：

“因为我没交代组织的任何一件事，港方就判决我三个月徒刑，把我转到正式的监牢里。在监牢里，为抗议警方对我们非人的折磨，我组织全狱人开展了绝食斗争。由于斗争进行得很坚决，最后取得了斗争的全面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善我们的伙食。……在牢里，有个外国人来找我，说是我的朋友要他来的。这个外国人华语说得非常流利，我估计他是我党的地下组织派来的。他问我对自己的下一步

④

有什么打算？我说就想出去。他问我出去后到哪里去，是不是去上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启大替我请的外国律师。三个月徒刑期满后，这个外国人送来两张邮船票，让我和廖似光赶紧离开香港。”

凯丰通过律师给谢启大带去话，说出狱后还想继续留在广东工作。谢启大给他带话说：鉴于你在香港的身份已经暴露，党中央根据你在广东香港工作的出色表现，决定调你回上海，进中央机关。中央将给你安排更重要的职务，让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凯丰回忆说：“第二天，香港政府派来一人，押送我和廖似光上了法国邮船。这个人同时交给我一张驱逐出香港的票子，叫我十年内不得再来香港。”

于是，凯丰和廖似光踏上了回大上海的法国邮船。

十四、第二次婚姻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扶植建立所谓的“满洲国”，之后，向绥远扩张。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同仇敌忾地掀起一场抗击日寇侵略的汹涌浪潮。

一本新创办的《东方青年》杂志醒目地出现在了读者面前。

杂志开宗明义地向世人宣布：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武装侵略！号召广大青年学生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红旗周报》上，也出现了与《东方青年》相类似的文章。《东方青年》和《红旗周报》上的文章遥相呼应，使青年学生和广大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有文章写道：“全国的青年们，紧急地动员起来，参加到各个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去，这是每个中华儿女的神圣任务。我们的祖国已经在危机中，正要我们每个青年抱定牺牲的决心，拿出自己的头颅和热血，来挽救我们的祖国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侵略中国的战争，强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掠夺我国的财产，破坏我国的文化，奸淫掳抢，杀人放火，野兽成性，到处横行，尤以我青年男女，遭祸最惨。为着保卫我们的家乡、父母、妻子、土地、财产、文化，为着保卫我们自身的生存，为着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青年只有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到

抗战中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文章中不甘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直指人们的心底，从而激起了人们对日本侵略的满腔愤怒和仇恨。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凯丰。

《东方青年》的创办者不是别人，也是凯丰。

原来，凯丰与廖似光回到上海不久，就找到了党中央。

在凯丰离开上海的日子里，党中央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故。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二十四日在龙华遭枪决。

向忠发被捕后经不住敌人刑讯逼供，写了一份十大部分的《自供状》，将党的很多机密供给了国民党。为什么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的总书记这么快就被处决？原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抓到向忠发后，立即向远在庐山的蒋介石发电报报功，蒋介石复电：“就地枪决。”熊式辉发这个电报时，向忠发还没有吐露秘密。后来，向忠发经不起拷问，供出了党的高层机密。他想以出卖党的机密来换取自己的性命。熊式辉又向蒋介石发电报报喜，蒋介石立即回电：“暂缓处决。”但是，当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到达时，熊式辉已按蒋介石的第一个命令将向忠发枪决了。

向忠发死后，王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的一把手。

王明官瘾很大，但胆子很小。在党组织因向忠发出卖大量机密而遭到严重破坏、白区局面日益陷入严重的恐怖之时，王明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不敢在中央会议上露面。因为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王明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出席工人联合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英国巡捕抓获，转送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后经党组织的全力营救，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才从监狱中出来。经过三个月铁窗生活，王明患下了“心惊肉跳”病，党内大小事全交给康生、陈云去办，自己则搬到上海郊区一所疗养院里躲藏起来。七月间，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又被国民党破获后，王明再也不敢待在上海，他借共产国际需要一名中共常驻代表的机会，决定去莫斯科。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莫斯科既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能背靠共产国际这棵大树，遥控指挥整个中国革命。他的想法经米夫打通共产国际的关系，得到斯大林同意。在离开上海前，王明没有忘记安排在国内最可靠的代言人。经过再三考虑，王明选择了秦邦宪。因为在莫斯科的同学中，秦邦宪对他言听计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局里，他是支部书记，秦邦宪是支部委员，他相信，他走后，秦邦宪一定能在中国革命中体现他的意志。于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

④

候补委员都不是的秦邦宪，一下进入党中央领导层，竟然当起了中央一把手，主持中央工作，名称是“负总责”。

秦邦宪在中央负总责之前，担任团中央局书记。担任党中央负总责之后，秦邦宪把团中央局书记的职位交给了顾作霖。顾作霖此前为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凯丰这时从香港回来，恰是时候。秦邦宪正需要帮手，特别是凯丰这种从苏联学成归来、又经过对敌斗争严峻考验的同志。

那天，秦邦宪把刚来中央报到的凯丰、廖似光迎进他的办公室，指着廖似光问凯丰说：“如果我没猜错，这位就是谢启大同志给你介绍的小廖同志吧？”

凯丰点了下头说：“是的，她叫廖似光。”

廖似光礼貌地欠了欠身子说：“秦书记好。”

秦邦宪听了廖似光的问好后，收敛笑容说：“小廖，我可不是书记，是负总责！今后可不要这样称呼我，免得别人听了以为是我叫你这样称呼的呢。再说啦，这样叫也是对王明同志的大不敬。天无二日，党无二主，王明同志才是我党的中心，才是我们的书记。”

凯丰插话说：“是的，这不是在地方工作，这是中央机关，一言一行都得讲规矩，不然，很容易犯政治错误的。”

刚跟中央负总责见面，就被他“教导”一番，廖似光很有些意外。不就是个称呼嘛，犯得着那么认真？有人把副司令叫成司令，难道副司令敢在司令面前发号施令？由此看来，这位“负总责”是个原则性特强的人，既呆板，又教条，还很不讲情面呢。廖似光很想回敬一下“负总责”，让他知道她这个基层来的人是怎么的“不讲规矩”。但刚刚见面，面对的是中央“负总责”，她不想让“负总责”下不了台。于是，她把自己的不悦发泄到凯丰身上说：“凯丰同志，你不是不知道，我在地方工作野惯了，为了避免以后犯政治错误，今后你就多规矩规矩我吧！”

凯丰没有说话，他知道廖似光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如果把她惹急了，真会叫秦邦宪难堪的。

见廖似光生了气，秦邦宪缓和了语气，脸露笑容说：“到底是基层来的同志，说话办事真是直率得很嘛。小廖，听谢启大同志报告，你在香港和两广工作时，跟凯丰同志配合得很好嘛。特别是在香港敌人的监狱中，在跟敌人的斗争上，跟凯丰同志完全称得上是一唱一和，假夫妻扮得跟真夫妻一样。”

廖似光被秦邦宪说得脸热起来。

秦邦宪不失时机地说：“小廖，为了在白区工作更加方便，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你们就变假夫妻为真伴侣吧。”

廖似光虽然知道，她和凯丰的结合是革命的需要，但这时秦邦宪就要他们成亲，还是使她感到有些突然。当然，秦邦宪对她和凯丰的婚事如此关心，也使她受了感动。自从受广东省委谢启大书记派遣，同凯丰一起工作后，廖似光从不认识凯丰到完全熟悉凯丰，从完全熟悉凯丰到非常爱恋凯丰，已经使她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走过了人生一大重要抉择的过程。她认为，女子要嫁就该嫁凯丰这样的男子。凯丰有崇高的信仰，有坚定的意志，办事果决，襟怀坦白，敢担责任，敢于斗争，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很厚的文化功底。凯丰平日很少说话，内向。从事地下工作，他的这种性格成了他的一大优点。因此，在广东、广西工作期间，廖似光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凯丰的爱意。同时，作为党员，她也向谢启大书记坦白了自己的心思。只是凯丰至今还没有向她表明自己的态度。

秦邦宪问凯丰说：“凯丰，你表个态，小廖正在望着你呢。”

凯丰说：“邦宪同志，你不是不知道……”

秦邦宪打断凯丰的话说：“什么知道不知道，这事就么定了。我给你们当证婚人。从今天起，你们就是革命夫妻。”

凯丰想作解释，但秦邦宪不让解释。他吩咐廖似光说：“小廖，你去买点糖果来，等下我叫几个机关同志，就在我这里热闹一下。一来为你们平安回到上海接风洗尘，二来为你们结成百年夫妻祝福。”

廖似光听了非常激动，爽快地答应秦邦宪，之后，小鹿一般地奔去街上买糖果了。

廖似光走后，凯丰很是不安地说：“邦宪同志，你是知道的，我已经结过婚了。”

秦邦宪反问：“你不是说你的婚姻是父亲包办的，是旧式婚姻吗？新陈代谢，是旧式婚姻就该由新式婚姻代替嘛。恋爱自由，我们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革命战士。革命青年就该冲破旧礼教的束缚！退一步说，你老家的妻子，见你这么多年没回去，说不定早已改嫁了呢。即使不改嫁，你投身革命，整日在外奔波，不可能为她挑一担水，不可能为她耕一块田，不可能为她分担任何一次忧，何必让她为你苦扛着那个名存实亡的何克全婆娘的名字呢？人家还年轻，就让她获得应有的自由吧。”

④

凯丰说：“邦宪同志，我觉得这样做很对不起她。毕竟，她非常孝敬我的父母，又跟我生了女儿。”

秦邦宪摇了摇头，说：“凯丰，你写文章时的文风那么干脆利落，那么畅快淋漓。怎么在儿女事情上却这么婆婆妈妈、畏畏缩缩？非常岁月，这事由组织说了算。”

一听“由组织说了算”，凯丰就无话可说了。凯丰认为，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个人的婚姻确实没有太多自己做主的权利。

秦邦宪转了话题说：“凯丰同志，言归正传，我以党中央负总责的身份同你谈话。”

凯丰正襟危坐。

秦邦宪说：“顾作霖同志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后，他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正空缺着。我和中央局其他同志研究决定，由你来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职务虽然是部长，但鉴于顾作霖已经去了江西苏区，团中央在上海的工作由你全部负起责来，等于是代理团中央书记。”

凯丰一听，内心十分惊喜和激动。但他也清楚，职务的上升意味着责任的加重，自己能在党的事业处于低潮时挑起这副重担吗？因此冷静地说：“风雨如磐，我怕辜负了中央的厚望。”

秦邦宪说：“我比你小一岁，党中央负总责的职务我都敢担任。你是老兄，还怕代行一下团中央局的书记吗？激流勇进，这事就这么定了！”

凯丰全身心地投入到团中央的工作中去了。

在白色恐怖中，他冒着随时可能被帝国主义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叛徒出卖和敌特暗杀的危险，多次深入老怡和公司、沪东纱厂、吴淞永安二厂等工人中间，广泛调研工人运动的开展情况。对工人的疾苦及诉求，进行细致的了解。他认真总结了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他白天置身一线，晚上将体会和经验写成稿件，及时在《红旗周报》等刊物上登出，以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老怡和的斗争》、《吴淞永安第二厂的斗争》、《关于沪东某纱厂内一个斗争的教训——机会主义的领导是斗争的葬送者》等文章，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右倾问题进行了纠正。在《关于沪东某纱厂厂内一个斗争的教训——机会主义的领导是斗争的葬送者》中，凯丰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资本家地主绅士的领导之下组织了所谓的“日本厂抗日救国会沪东办事处”。这一机关除了御用很少几个黄色工会的领袖之外，实在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官僚机关。在大部分的工人群众也知道这是资本家的组织。他们不愿意加入，要组织自己的反日会。但是我们的同志为要“执行”“下一层统一战线”，结果加入了进去，并且还当选为执行委员之一。这是曲解正确的下层统一战线……

经过这样的不正确的领导，斗争的开展的前途是受着非常大的阻碍，在厂内的工人对我们的领导同志是失去了以前那样的信仰。以前是经常的能召集群众大会，现在群众大会也召集不起来了……

同志们！要把这样的教训紧紧的记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是加紧革命工作的话——一定会遇着重复的机会。

作为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凯丰把大量时间放在对青年学生运动的关注上。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凯丰在《红旗周报》发表一万余言的《目前学生运动的状况与团的任务》，代表团中央对当时学生运动的状况，作了最具权威性的分析。文章在第一节“经济恐慌中的学生”中指出：

中国经济的浩劫，空前的水灾旱灾，不单是造成千百万的工人失业，一万万以上的灾民失地，同时也使广大的劳苦阶层出身的学生，因为父母的失业，家庭的破产感受着痛苦。许多的学生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许多的学生儿童饿着肚皮去上学（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失学）。……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压迫与剥削，搜刮工农的血汗，残酷的压迫革命，首先是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将原来少到万分的教育经费（由八十万减少到四十万——见汪精卫所发表的报告）停付，用作进攻红军，把大批的学校关门、解散。增加在学学生的学费，使着一部分劳苦出身的学生无法负担。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领，使得大批学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毁灭。满洲的学校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在中国不识字的人占百分之八十。如果是我们拿比较开化的省份浙江来看，我们就知道：“前据浙江省政府的调查，该省学龄儿童有二百五十万人，全省入学儿童，仅五十万

人，统计起来，入学儿童只占全数百分之二十。”……

文章还对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热烈的礼赞：

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真正的提高了劳苦群众的文化水平线，劳苦的青年儿童真正的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和自由。

在1931年苏联的教育经费为40.899亿卢布，如果是1914年的教育经费为3.814亿卢布，那末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的教育经费超过沙皇时代的教育经费11倍。如果是国民党政府1931年整个的收入为5.39亿元。以俄国的一个卢布当中国的一元计算（事实上是要二元才能换一个卢布），那末苏联的教育经费超过国民党政府整个收入八倍以上，如果是1931年国民党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为6000万元，那末1931年苏联的教育经费超过中国的教育经费68倍，如果是中国的人口为四万万，那末苏联的教育经费平均分给中国人每人可得十个卢布（合中国洋20余元，可以维持一个人两个月的生活），而中国的教育经费平均给中国人每人只得一角五分（只能够吃一碗面）。

在1931年苏联有五千万儿童就学，入工场附属学校者达120万。入高小学校或专门学校达25.8万人。如果是苏联的人口为1.7亿人，那末就是说在苏联在三人已有一人学校读书，1931年百分之九十五的儿童在学，如果1920年每千人中有680个文盲到1931年减少到300人……中国的苏维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向着苏联的道路走。在苏维埃区域内，劳苦的学生获得了解放。虽然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和封锁之下，苏维埃政府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劳苦青年的文化。开办学校，发展文化运动，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教育。虽然是没有大规模的造纸厂和最新式的印刷厂，但是苏维埃将一切的印刷机关和纸张交给劳苦群众自己管，将大的房屋交给群众作为集会的场所……

凯丰综上所述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展，不得不以极大的刺激，推动着劳苦阶层的学生一天天的走上革命化，为着危机中革命的出路而斗争。”

这篇文章的发表，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愤恨，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向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膨胀，得寸进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策划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军事侵略阴谋。他们派遣三十艘军舰和数千陆战队军人登陆上海，并通过驻华军队唆使日侨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还在闸北区制造五名日僧和三友实业社工人的殴打冲突事件，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紧张。日本领事还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面对严峻局面，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的部署下，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准备。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向闸北驻军发起攻击。蒋光鼐接到报告，迅即赶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与蔡廷锴、戴戟决定作战方案后，三人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份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民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兵一卒，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二十九日清晨，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并出动坦克、装甲车，组织冲锋，企图突破我闸北防线。在十九路军的坚强抵抗下，敌寇各路进攻均被击退。往后，日军的进攻更加疯狂，十九路军的抵抗更加英勇……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跟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得逞，中国十九路军饮恨退出防区。

这期间，在上海亲身感受了“一二八”事件发生全过程的凯丰，以手中之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对全国抗日运动的掀起进行了推波助澜的鼓动。凯丰在文中写道：“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无耻投降和逆来顺受，激发了劳苦学生的民族觉悟。‘九一八’事件以后，广大学生群众投入到了汹涌的反帝国主义的巨潮之中。从北平、济南、南京到广州，从成都、武汉、湘潭到上海，学生激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南京的示威与军警武装冲突，太原、上海、济南、北平各地捣毁国民党的机关，人民群众甚至用自己的力量组织民众法庭，判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实行血腥镇压，凯丰以大量事实进行揭露：国民党无耻地投降签订《停战协定》，出卖满洲，出卖淞沪，迫退抗日的十九军士兵。他们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指导下，大批地关闭解散学校（如在中央、

④

青岛、保定），停办或缩小学校范围（如劳大、中公以及上海、北平、广州各学校）。济南第一中学风潮后，警方逮捕学生六十余人，不久兖州又逮捕了二十余人。陕西因戴季陶而演成惨案。天津扶轮学校因校长问题而罢课，保定志存学校因反日运动开除九十余人，徐州中学因反日罢课，北平师大为校长问题南下示威，农大反对并系，北平大学驱逐沈尹默，保定第二师范的武装冲突，中大殴打段锡朋，青大驱逐杨振声……无不遭到残酷的镇压。

面对反动势力镇压学生运动，面对反动派利用青年缺乏经验的弱点，喊着“左”的口号极力争夺学生来拥戴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局面，凯丰对共青团工作如何解决过去的问题，和对如何做好学生的领导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保证无产阶级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共青团在学生运动中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许多地方团组织“以学生为骨干”，认为“学生是反帝的主力军”。必须坚决与那些在学生运动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错误观点作斗争……

二、学生必须与工人联合，达到最高限度的学生与工人的联合。必须反对这种反动理论，那就是认为“学生自己必须解决工人的问题”。……必须指出，学生运动必须从工人方面得到帮助和领导，如果学生运动与工人农民运动隔离孤立，这明显表明学生运动无目的，结果是什么也干不出来……

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共青团在革命学生运动中没有实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去反对一切妥协的反革命派别。这一错误明显地表现在，没有坚决地反对改组派、孙科派、第三党、国家主义以及一切的反革命。在许多地方团表现出对反革命的妥协……

四、必须领导学生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放弃领导学生的日常斗争，是团在学生运动中的主要错误之一。必须领导劳苦阶级的学生反对克扣教育经费用于进攻红军，武装青年进行民族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

五、坚决反对学生运动中的“左”的清谈主义。投身到工人中去援助工人的斗争，投身到农村中去援助农民的斗争，投身士兵中去援助士兵的斗争，投身到东北去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才是真正的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

六、在学生运动中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强拥护红军苏维埃、拥护苏联的宣传工作。必须加紧做好解释党的基本口号的工作……

出生入死在 中央苏区

第四章

十五、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明去苏联以后，苏区中央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

会议在项英和任弼时的主持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说：“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立三路线。”

这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不点名的批评。

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规定了全国红军统一由中革军委领导，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称。

毛泽东被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地位。

但是，王明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挤打击留有余地。因为在赣南苏区，党内和军内很多大事还离不开毛泽东。赣南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主席。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二年底和三三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上海党、团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党、团中央局在上海已经面临生存危机。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干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西也遭逮捕。秦邦宪和中央临时中央局不得不作出决定，党、团中央机关迁入江西革命根据地。

这期间，上海团中央除部分同志陆续转移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外，余者被捕的被捕，入狱的入狱，被杀的被杀。

作为团中央最后一名坚守者的凯丰，他和廖似光等突破层层封锁线，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从上海坐船到达汕头，住在上海中法药店汕头分店秘密联络站。两天之后，坐轮船到达三河坝，又乘小船到粤北大浦。后经福建上杭、汀州，来到江西瑞金。从闽西到瑞金，担任组织领导护送任务的，是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保卫局局长是邓发，执行局局长为李一氓，具体工作由中央秘密交通站“奉星社”完成。负责护送凯丰一行的是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卓雄能双手使枪，一支精干的护送队由他调遣。由于夜行晓宿，尽走人迹罕至的山路，凯丰等得以安全到达瑞金。

到中央苏区不久，团中央书记顾作霖调任党的领导岗位。凯丰出任团中央局书记。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由刘英接替。刘英是长沙人，一九二九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一九三三年初进入江西苏区，长征后由毛泽东介绍，成为张闻天的妻子。张闻天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当过刘英的老师。

党的中央局到达江西后，王明教条主义力量进一步扩大，为了推行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他们一开始就反对所谓的“罗明路线”，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错误地批判。原因是，这些人执行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土地政策的主张。他们名义上批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批毛泽东，对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进行削减，以达到从上海来的留苏人员掌控整个党的中央局和中央红军的目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以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围剿”。以从苏联回来的张国焘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因为执行王明的教条主义，尽管

英勇作战，但没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于当年底经由陕西进入四川北部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组织十万兵力，对洪湖根据地发动攻击。由于从苏联归来的、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同样执行教条主义主张，使洪湖根据地丧失，红三军只能转至湘鄂川边。

蒋介石在两处“围剿”得手后，于一九三三春，组织五十万大军，企图一举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

面对第四次“围剿”的大兵压境，周恩来和朱德回瑞金时，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请教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略。

那天，秦邦宪和凯丰正好在场。作为两个进入苏区已有一段时间了的“大城市人”，他俩是以党、团最高领导的身份来看望“井冈山人”毛泽东的。

这是秦邦宪、凯丰跟毛泽东在苏区的第一次见面。

受到排斥的毛泽东，对秦邦宪、凯丰的到来不冷不热，公事公办地寒暄了一番后，“东边日出西边雨”、“柴米油盐酱醋茶”地说着别话。这倒不是因为秦邦宪、凯丰年纪太轻，毛泽东小看他们。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知道年轻后生很是可畏。儿子辈的陆逊，不就打败过皇叔辈的刘玄德吗？他只是希望两个朝气蓬勃来到江西的年轻人，别以为有共产国际和王明做后盾，自身职位高本领就大，能力就强。“是骡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毛泽东很赞成北方人这种鉴人的说法。

留着乌黑长胡须的周恩来侧着身子，面对坐在他与朱德中间的毛泽东说：“泽东同志，蒋介石这位老兄又给我们出难题来了。你看，我们该怎么迎接他呢？”

毛泽东将整个身子斜躺在松木椅子上，对着屋顶吐了一串烟雾后，将布鞋脱下，全然不顾旁人的存在，侧着在凳脚上拍打起来，一时间，拍得满屋子都是灰尘。他说：“对不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朱德知道，毛泽东这是对周恩来有看法。

尽管接替他书记之职的周恩来给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苏区后方领导对恢复毛泽东军队职务非常不满，认为毛泽东抵制王明遥控指挥红军攻打赣州是“右倾危险”。于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召开的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再次提出撤销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负战争总责，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在那次会议上，王稼祥坚决反对撤销毛泽东的军职，王稼祥说：“大

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当然有他的来由。刚进入苏区时，王稼祥因为跟王明、张闻天、项英、秦邦宪同过学，喝过苏联的洋墨水，受过马列的所谓正统教育，便先入为主地把毛泽东这个“山大王”当另类看待。但从一九三一年四月随任弼时、顾作霖来苏区后，尤其是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攻打赣州失败的教训，使王稼祥发现，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毛泽东的战法完全是从实战中学到的，符合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他所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和决策也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已经被中央根据地广大红军指战员接受、拥戴，如果这时把毛泽东的军职撤销，对整个中央红军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根据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我来负指挥战争的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或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是中央局最后决定，调毛泽东去“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由此，毛泽东被架空，没有了半点军权。加上毛泽东曾在“宁都会议”上，遭到周恩来的批评。尽管批评是温和委婉的，但叫毛泽东无法接受。他俩的隔阂就此产生。

井冈山朱毛会师，两位战友并肩作战多年，朱德摸透了毛泽东的脾气。这时，朱德要站出来替周恩来说话：“老毛啊，蒋介石大军压境，恩来百里之外来你这里，还不是把你当负指挥战争全责的领导看吗？怎么能一副不理不答的样子呢？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面前，你就在乎那么一点名义上的东西吗？”

朱德的话使毛泽东的眉头动了一下。井冈岁月，赣南风云，他俩尽管也有过意见上的不一致，甚至引起分歧和争吵，但从来没有分开过。所谓“朱毛朱毛”，就是对他俩关系密切最简明扼要的赞扬，毛泽东非常尊重这位朱德大哥。毛泽东望了朱德一眼，感觉大敌当前，确实不能把个人间的意见看得太重，自己即使能驳周恩来的面子，也不能驳朱德的面子啊！为此，他长叹了一口气，欠起了身子，坐正了一些。

朱德说：“老毛啊，黑云压城，山雨将至，打好这一仗再说。出水还看两腿泥嘛。等反‘围剿’胜利了，再跟那些争夺军权的人‘打官司’也不迟嘛。”

朱德的话把毛泽东说舒服了些，毛泽东就喜欢听这种话，特别喜欢听朱德老大哥说这种话。于是他的眉头舒展开来了。

但朱德的话却让坐在一边的凯丰惊愕了。凯丰瞥了眼这位衣着破旧的朱德，心

想：“这位中革军委主席话中有话啊。”特别是看到朱德和周恩来众星拱月一样簇拥着毛泽东，凯丰认为，这不正常，既然共产国际已经确定秦邦宪为中共支部局的负总责，中共就该以秦邦宪为中心，不能又多个中心啊。

秦邦宪的脸色更是不好看。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根本没把他当中央负总责看待。在赣南，中央红军在朱毛的纵容下，一直把他看做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毛泽东没有注意到身边两位党、团总负责人的表情变化，把喇叭烟“啪”地扔到地下，站了起来。他稳步走到土墙边，将一个斗笠和一挂蓑衣取下。

于是，像变魔法一样，藏在衣帽下的地图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周恩来不看地图不要紧，一看地图眼睛就闪亮起来：这真是敌我态势一卷尽收啊。周恩来想：泽东虽不在其位，但仍在谋其政，仍在谋划反“围剿”的胜利啊！

周恩来赶紧弯腰，把毛泽东丢在地下的烟头捡起，捻灭烟火，丢进了门外的灰斗里。他走到毛泽东身边，望着标满蓝、红敌我态势图标的地图说：“泽东同志，你真是身居斗室，心忧天下啊！”

毛泽东望了下已经相处两年多的周恩来，感觉眼前这位浓眉大眼的美男子、曾经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正如熟悉他的人所介绍的，是一位善于化干戈为玉帛的才俊，也是一位懂得尊重人、团结人的好同志，于是说：“恩来呀，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我怎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呢？我还想留着这颗脑壳，将来去南京秦淮河边吃红烧肉啊。”

“是吗？哈……”周恩来双手一张，仰天笑了起来，这一笑，使屋里气氛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指着地图，给四位“来客”一一介绍说：“……敌人虽有二十多个师，五十万人马，分三路进攻，其实我们只要把它当三个师、五万人枪看。”

凯丰与秦邦宪对视一下，不解地同时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朱德则对毛泽东满怀期待。

周恩来问：“十去八九，有什么说道？”

毛泽东说：“敌右路军余汉谋部，全是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直跟蒋介石不和，出兵助‘剿’，主要是怕我军进入广东他们的地盘。我们不犯他们，他们怎会为蒋介石卖力？左路军蔡廷锴部，是十九路军班底。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

①

享有盛名，获得国人的敬仰，对蒋介石调他们下抗日前线打红军，表示强烈不满。官兵未曾出师就对最高统帅不满，他们会以红军为敌吗？因此，对这两路大军不必费大多的兵力，只要地方红军应付应付就行了。”

周恩来心中豁然亮堂起来：“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面上去？陈济棠、蔡廷锴虽然跟蒋介石同睡一张床上，却在做着不同的梦呢。利用敌军内部矛盾，让其互相掣肘，让其鹬蚌相争，这可是克敌制胜、坐收渔利的要诀啊。”

毛泽东说：“这次反‘围剿’的重点，就是对付中路军陈诚部。陈诚部尽管来势凶猛，但也有软肋可击。陈诚仗着是蒋介石的干将，为人骄横，排斥异己。在这之前，他吞并了非中央的第四十三师，又改编了川军的第五十二师。所以中路军十二个师中，只有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可以自成一个纵队，听陈诚的指挥，其余各师都怕被陈诚吞并。他们与陈诚若即若离，保持距离，不肯为其出力。因此，我军只要集中兵力，给敌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以迎头痛击，其余各部将会望风披靡，不战自退。故，五十万敌军只要当五万人看。”

朱德疑惑地问：“孙子兵法讲避实击虚，即我们常说的‘柿子专拣软的捏’。你这次提出将我主要兵力去对付陈诚的三个主力师，会不会犯了兵家之大忌？”

毛泽东说：“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古人用兵，也无常法，一切皆因情势而定。在井冈山，我看过山人捕蛇，也看过山人打蛇。有一次，一个捕蛇人把钻进洞去的一条大蛇的尾巴死死抓住，想把它拖出来。按照常理，捕蛇人即便使用最大的力气，也不能把蛇拔出，因为进洞的蛇已经把浑身的鳞甲张开了，鳞片倒插在洞壁上，形成了极大的阻力。但捕蛇人很聪明，有办法，只见他取下咬在嘴上的喇叭烟，往蛇尾巴上猛地一按，蛇突然被烫，周身一紧缩，鳞甲随即收拢。就这一瞬间，捕蛇人一抽，蛇就被轻松拖出洞穴，这就是山人捕蛇的简易办法。打蛇就不要说了，打在七寸上，再长的蛇也只能是条无头的废体。”

周恩来极为感兴趣地问：“泽东同志的意思是，只要把陈诚那个号称二十万大军之王的第十一师打败，陈诚的意志也就彻底被摧毁；他的意志一溃，其余各部也就斗志全无，作潮水般退去？”

毛泽东说：“你不是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吗？应该懂得攻心为上！”

周恩来以手拍额，连连点头，脸颊也倏地红了。

秦邦宪的脸变得更难看了。毛泽东当着他的面，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以

难堪，明显是对“山外来人”的讥讽和蔑视！秦邦宪不想袖手旁观，他说：“老毛啊，有话说话嘛，何必对同志那么不礼貌！”

凯丰也说：“泽东同志，你应该懂得怎么对待程门立雪者吧？听说过周公吐哺的典故吗？”

毛泽东认认真真望了一会凯丰。这是一位个头适中，脸色白净的后生。这后生有一个悬崖似的额头，一条挺直的鼻梁和两块凸起的颧骨，给人以气势逼人的感觉。尤其两片薄薄的嘴唇，能给人以刀锋剑刃的逼命感。此前，毛泽东对凯丰有一定的了解。在《红旗周报》上，他看过凯丰的文章，尤其是那篇《目前学生运动的状况与团的任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万余言，似大河奔流一气呵成，如雄鸡唱晓一呼百应。毛泽东认为，二十多岁的人，能写出大气的文章，不仅中共党内少见，就是放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可以肯定，凯丰大材可造，将来一定能成为如椽大笔。只不过高兴之余，毛泽东又感到遗憾，文中洋气、稚气太重，“土气”、“老气”太少。但这不要紧，初生的牛犊，早晨的太阳，有的是时间进行打磨和历练。在读到凯丰写自上海的文章时，他盼望能早日见到这个萍乡人。可是凯丰来苏区的表现，使他大失所望。因为凯丰百事都听秦邦宪和张闻天的，对从井冈山上下来的，有种天然的生分、戒备和反感，就像一座山上一群新来老虎看待一群坐山虎一样，眈眈而视，经常为一些事发生冲突。凯丰和那些苏联回来的干部一样，看不起“山大王”毛泽东。现在，凯丰居然要他“周公吐哺”，看来这“牛犊子”真是个不惧“大老虎”的角色。于是，毛泽东笑了，笑着对比自己矮了半个头的凯丰说：“凯丰同志，既然是程门立雪，又何必在意周公吐哺不吐哺呢？”

凯丰一听，脸色变了。毛泽东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受不了毛泽东这种神态，凯丰要发作。

“凯丰同志，先听泽东同志讲破敌之法吧。”周恩来生怕闹出不愉快的事来，影响商讨对敌作战的方案，赶紧调和说：“泽东同志，你说，请你继续指点。”

.....

在毛泽东“打蛇打七寸”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进行得有板有眼。

周恩来、朱德以佯攻南丰县城，将合击红军的陈诚第一纵队三个师诱至既定地

④

域，集中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军团和第二十一、二十二军，由林彪负责战役指挥，聂荣臻、彭德怀、董振堂率领各部，对敌五十一师、五十九师发起攻击，结果三小时全歼五十二师，击毙师长李明。其后，歼灭五十九师四个团，师长陈时骥率残部逃跑时被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活捉。此次反“围剿”，歼敌两个主力师，其中一个装备精良的王牌师，俘敌一万九千人，缴枪一万五千多支。战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道：“唯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中央红军为了反“围剿”的胜利浴血奋战之时，凯丰踏着硝烟，穿越于枪林弹雨，深入兴国、赣县、宁都、公略、永丰、石城、广昌、宜黄、乐安、信丰等县，结合自己所担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职务的职责，对苏区共青团组织如何发展壮大、教育文化如何普及、苏维埃出版事业如何管理、劳动竞赛如何开展、贪污腐败如何惩治、少共国际师的组建等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写下了《苏区团的组织状况与我们的任务》、《在全苏区教育大会的前面》、《我们的奢侈与我们的吝啬——关于苏维埃的出版事业的管理》、《按照新的生活着，按照新的工作着——提高劳动纪律与反对危害苏维埃害虫的斗争》、《二次全苏大会的开幕与福建“人民”政府的破产》、《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公布的对十九路军的协定》、《应当把少先队变为红军的后卫军》等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全都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显著位置上发表。这批文章，对指导青年团、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反腐败斗争工作和对处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所突发的事变等，都有重要意义和影响。

作为团中央书记，凯丰参与过中央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并组织领导实施。

在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壮大方面，江西、福建两省，一九三二年春的团员数不过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名，到一九三三年六月猛增到七万三千七百八十名，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生力军。

根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健全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组织，使他们成为红军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和地方部队”的精神，经党中央同意，凯丰决定创立一个直属于中央的少共国际师，“在前线出现一个新生的力量——少共国际师”。他要以少共国际师为样板，在中央苏区以及各根据地青少年武装起来。

凯丰首先对领导少共国际师的骨干进行了考察挑选，使一批年轻的优秀干部进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后来很多成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的瑞金，嫩绿是山山岭岭的主色调。火红的杜鹃花像战旗和火把，缀满林间山头。耕牛在新翻着土地，马群和羊群在啃着地皮，鸡鸭鹅在舒展着翅膀，燕子和百灵鸟在空中放声高歌。河边此起彼落的棒槌，不时“敲打”出大姑娘、小媳妇们一阵阵欢快的歌声：

哎呀呐——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打灯笼，
哎呀同志哥，
……………

这首歌曲一旦被人领唱，立即被众人附和：

……………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打灯笼，
……………

歌声中，凯丰站在苏维埃中央政府门前的大操场上，望着刚组建起来的少共国际师第一团战士在肖华的口令下迅速集合起来，心里特别高兴和欣慰，脸上露出少见的笑容。

这支队伍是这样年轻，战士大的只有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多数脸上还留着绒毛和稚气。

他们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像雨后的春笋，正一天天地蹿向天空，向着四周、向着青壮年迅长。

在组织少共国际师的过程中，凯丰遇到不小的阻力。有人认为，“让他们参军打仗不人道，他们还是孩子”；有人认为，“即使让他们参军，他们的家人和他们自己也不一定响应”。凯丰说，蒋介石人道吗？茅草里要过火，摇篮中要过刀。国民党军的枪炮从来不认男女老幼。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未雨绸缪。特殊时期，必须采取特殊手段！少年参加少共国际师，从小得到军事训练，可以成为红军的后备军，战时可以及时补充减员，平时可以保卫生产，帮助生产，突击抢收、抢运粮食。至于他们的家长和他们自己愿不愿参加红军，共青团组织可以做工作，只要工作做到家，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凯丰在共青团中央局会议上，向与会干部要求说：“今年的国际青年节，我们将在革命和战斗之中度过。我们要求每个团员不能按照往常那样纪念，而是要以战斗的姿态，创造一个少共国际师，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必须向每个团员提出在创立一个少共国际师时的任务。必须将中央局的决定拿到每个支部中去讨论。要发挥每个团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决定好自己的扩红计划，动员好团员到少共国际师去。要保证征调五千个团员到少共国际师去……党的领导是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保证，党必须经常去监督和检查共青团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工作，给团以帮助。每个共产党员对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成功与否是负有政治责任的！”

凯丰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通过党的号召和各地共青团的动员，通过共青团员带头参加红军，青少年参军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一个月内，光瑞金县河东区就组建了五百人的少共国际师模范营。在《送郎当红军》的歌曲传唱中，少共国际师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立正——”肖华一声口令，少共国际师第一团的战士昂首挺胸，顿时凝成一块一动不动的整体。肖华正步走到凯丰面前，请示说：“凯丰同志，少共国际师第一团集合完毕，请您指示！”肖华十二岁加入共青团，十四岁加入共产党，十七岁的他现在就当上了这个师的政治委员。

凯丰给肖华回了礼。在热烈的掌声中，凯丰清了清嗓子，挥手让大家肃静下来，大声说：“同志们，今天是‘五四’国际青年节。今年的青年节非比寻常，我们给她献上了一份厚礼，那就是我们在工农红军英勇战斗的精神激励下，用列宁青年的刚毅和顽强，成功地创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队伍——少共国际师！少共国际师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劳苦青年最光荣的旗帜。创建少共国际师，是我们党粉碎国

民党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剿’的迫切需要；是承担中国革命伟大历史任务的迫切需要，是我们红军队伍后继有人的迫切需要。我们青年团是党最忠实的拥护者，是党最有力的助手。作为由团的中央局刚刚创建的少共国际师，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武装上前线，去前线杀敌立功！在战斗还没打响之前，我们应当在中央军事机关的领导下，积极接受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我们真正成为政治上合格军事上过硬的队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哪？”

“有——”方阵中爆发出强有力的回应。

“好！同志们，党的中央局决定，今年‘八一’建军节，要以军区为单位，举行阅兵，我们少共国际师也在被检阅之列。希望我们加紧训练，让我们在‘八一’阅兵方阵中，叫全苏区人耳目一新。让我们的队伍在战场上叫敌人闻风丧胆！”

不久，少共国际师壮大到了一万多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少共国际师表现特别出色，付出了巨大牺牲，受到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表彰。

为褒扬中央红军为胜利而牺牲的精神，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凯丰为瑞金红军烈士塔题了词，题词说：“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是反帝的土地革命中所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它是中国工农自己的武装，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的基本的武装力量。红军指战员和战士——工农国家觉悟的男儿——担负着解放中国工农和保护苏维埃政权的伟大事业的责任！用鲜红的热血创



凯丰为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

造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广大的领土上建立起来。红军烈士塔就是英勇牺牲的红色战士的热血的结晶，它们的光荣将永远在苏维埃的领土内照耀，在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心坎中照耀。这个灯塔，指示着全中国的劳苦大众：你们朝着我来，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

对苏维埃的出版事业，凯丰进行了最直接的指导。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出版工作存在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很少人注意到正确的组织苏维埃的出版事业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有许多东西在今天我们的物资水平线很低的条件下可以缓一点出版，可是我们先印刷了。有些东西有广泛的群众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却没有出版。譬如最近红色中华社出版的《革命诗集》，可以缓一点印，却先印了。有千百万的成年、青年、儿童在那里等待着的他们的课本，却被拒绝印刷……又如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却又一二三次的重复印刷。我想，在这里，我们没有注意正确的组织出版事业。有许多的奢侈，然而却又有许多的吝啬。”

对于苏区的反腐败工作，凯丰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根据举报，他组织反腐调查队，对宁都少共县委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从郑茂德担任书记起，他的继任赖辉良、张用群，无不按照郑茂德的腐败模式前“腐”后继，胆大妄为地贪污公款，无所顾忌地克扣经费。他们的丑恶行径公开之前，曾经有人要揭发。可他们三人均采取卑劣手段，威胁、恐吓揭发人，死捂腐败的盖子。凯丰将问题查实后，毫不留情地将三人送交法庭，给予了严厉制裁。由此开始，凯丰与有关中央领导一道，建议在苏区掀起一场反腐败斗争，以纯洁革命队伍。

在这场反腐斗争中，中央总务厅主任左祥云贪污建造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工程款（一个月就浮开预算经费五千元）的案件被揭发出来；瑞金苏维埃财务部长蓝文、会计唐仁达和杨达财互相勾结，采取隐瞒打土豪的罚款、虚报办公经费和纸张洋油费，虚报客餐费（一次竟将二百多人虚报为一千二百多人）等方式贪污公款二百八十多元的案件也被查了出来；一九三〇年入党，时任叶坪村苏维埃主席的谢步升，私自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变卖，将钱装进自己腰包里，并诱逼奸淫妇女的案件也被揭发出来……这些蛀虫一一被清除，使党、政机关的干部队伍得到纯洁，腐败之风得到的惩治。凯丰在中央召开的反贪污会上指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国家的、集体农庄的、合作社的公共财产，就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那些想谋取公共财产的人，应当被视做民众的敌人。’在阶级斗争最为紧要的关头，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是与腐败分子从苏区内部危害苏维埃的阴谋互相配合着的！”

为了防止堡垒被从内部攻破，凯丰认为，党和政府要从以下方面吸取教训：

“第一，为什么很长时间才发觉这些贪污腐败分子？这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警觉性非常之不高，某些领导机关对这些人熟视无睹，姑息纵容，反应冷淡；

“第二，我们要在这些教训面前，认真检查各部门的工作。光一个瑞金县苏维埃就有这么大数目的贪污，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全苏区的贪污分子手里查出几万甚至是几十万赃款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不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

“第三，我们应当根据瑞金和宁都的教训来检查瑞金和宁都的全盘工作。这种腐败的领导，不能不是那里的工作发生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这种腐败的领导，阻碍了群众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我们应当根据瑞金、宁都的教训，在各地方、各部门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

“第四，这些案件的揭露查处，证明党和政府提出的反贪污腐败决策是正确和及时的，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只有把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从苏维埃的机关清理出去，我们党和政府的肌体才能保证健康。”

凯丰与贪污腐败问题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对铺张浪费、人浮于事等现象也撰文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在《按照新的生活着，按照新的工作着》一文中指出：最近，在许多地方发现浪费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有些部门吃饭的人多，做事的人很少；破坏劳动纪律及用人不适当非常普遍；事务人员、职务人员庞大，而做实际工作的人员很少……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应当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着战争……如果我们在节省运动中不集中力量去反对浪费，即使每个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浪费者他一天就可以花费一万几十万！……浪费苏维埃的每一个铜板，就意味着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取得胜利！

.....

由于凯丰对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有着高度一致的组织观念，有着出类拔萃的理论水平，有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有着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有着敢抓敢管大事的胆识和勇气，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江西瑞金召

①

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他与王稼祥、方志敏一道，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政治局改选时，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朱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凯丰和刘少奇、关向应、邓发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秦邦宪负总责。

十六、大难临头抱成团

如果把方圆五百里的井冈比做一座大山，那么，距井冈山中心三百里远的三角池村，就是山脚下一粒小石子。村子虽小，发生在村里的事却越来越多。

这天上午，何家祖堂斌公祠里坐满了人，来入都是各房的房长，年龄大的八十高龄，年龄小的刚满三十岁。

开春不久，由于倒春寒，天气显得非常的冷。与会的房长们大都把手插进棉衣的袖子里，脸上显露着严肃的表情。他们抽烟的抽烟，窃窃私语的窃窃私语，仿佛面对着的是一场十分艰难的考验。

前天晚上，老关乡一个大恶霸被“黑杀党”劫了，他的所有金银细软被洗个精光。俗话说，打狗欺主。恶霸遭劫，如同“黑杀党”当众给当地国民党政府一个响亮的耳光。萍乡县首脑岂肯罢休？好在这类事经常发生，县里头头才没有亲自到场处理，他们只对老关保安团下了一道严令：“七天之内，务必追回全部金银细软，将劫匪绳之以法！”

魏炽鸣望着县里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恨地说：“县里的老爷们，全是些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畜生！‘黑杀党’来无影，去无踪，就靠保安分团几个破兵、几条破枪，老子到哪里去找他们？”

纪在兴正用一根洋火棍认真地掏着耳朵。听了魏炽鸣的叫骂，他不紧不慢地说：“不找到行吗？这次被劫的人，得过省主席熊式辉亲手颁发的慷慨助‘剿’奖。如果抓不到‘黑杀党’，被劫的人把状告到省里去，你我就会有好日子过了。”

魏炽鸣说：“妈的，这个被劫的家伙，平时在保安团面前一毛不拔，却把欺男霸女搞来的金银孝敬到省里去，真是吃里爬外的畜生。现在一出事，还得我们这

班统狗为他看家护院、赶山搜食，这世道真他妈的邪了门啦！”

纪在兴说：“团座，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如今这世道就这么势利，有钱的人宁可得罪一方百姓，也不能得罪半个上级。那个被劫的家伙，之所以不给我们一点施舍，可是摸透了国民党官场的风气，有省主席罩着他，哪个敢不给他笑脸？哪个敢碰他一根汗毛？”

魏炽鸣说：“这回我可要栽在这畜生面前了！”

纪在兴把耳屎搅松动后，将头先侧左边，再侧右边，分别将左右手小指伸进耳内旋动着。纪在兴小指上蓄着青玉色的长指甲，长指甲真好使，不一会儿，就将绿豆大的耳屎挖出来。挖出之后，他先研究似的看了看，再鼓着嘴，吹开去说：“团座，怕什么，上有指示，下有把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活人几时被屎尿憋死过？”

魏炽鸣问：“你小子有办法把被劫的财物找回来？”

纪在兴说：“浮财到了最缺钱的共匪手里，成老虎嘴里的肉。”

魏炽鸣问：“与虎谋皮、火中取栗，那你放什么屁？”

纪在兴说：“你知道不知道，前天夜里，是何克全带领红军下山，把那个恶富人劫了？”

“去！”魏炽鸣耻笑着说，“何克全？是你爷爷吧？”

“团座，确实是何克全。”

“你是大白天你看见神了！”

“没看见怎么了，我们不能说看见了吗？”

“你的意思是……”

“子债父偿，就叫何秋美赔恶富人被劫的东西。”

“何秋美这些年，被我们榨得富人变穷鬼，穷鬼变甘蔗渣了。老鼠尾巴上的疖子，再挤再压也就那么点脓血了。”

“何秋美家小，可斌公祠很大，还怕填不了那个被劫人的窟窿？”

“上次为还我们两人的赌债和风流债，不是敲过斌公祠一回竹杠了吗？为了那竹杠，何家老族长何庆泉差点被老子崩了。”

“上次向他们要钱，是我们还风流债。斌公祠人知道内幕，当然要跟我们拼命喽。这次要钱，冠冕堂皇，是叫他们为教子不严受惩罚付款！赣南匪患那么严重，

④

前不久又把国军的第四次‘围剿’打垮了。这一次，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大张旗鼓地办！抓不到共党红军，追不回被抢的钱财，杀杀他们家族的嚣张气焰还不应该吗？”

“由斌公祠出钱填洞？”

纪在兴站了起来，说：“何止填堵？翻他一番！多出的部分，留下来你我对半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逮住一回，就狠狠地干他一家伙！”

魏炽鸣问：“要是他们不给呢？”

纪在兴说：“何克全家穷钱不穷人，把何克全的婆娘送县里，就说前天夜里，是孙氏仇恨我们抓过她，是她给何克全一伙带的路。”

魏炽鸣一拳头打在纪在兴胸前，大笑着在原地转了一圈后，食指戳在纪在兴的心窝上说：“你小子真是狼心狗肺啊！”

.....

族长何庆泉，这回是拄着拐棍进的斌公祠，路上走得颤巍巍的。

何庆泉沙哑着声音，把今天开会的由来告诉大家后，要大家拿主意。

听说又要用族里的钱去填那恶人被劫的钱窟窿，大家都不吱声。

过了一袋烟的工夫，有个年龄稍小点的房长终于忍不住了，他目光绕过何庆泉，压低声音对何秋美说：“秋美哥，人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累族上吧？那年，克全去武汉读大学，族上帮了不小的忙。去年，说他当上共产党的头头，国民党要处罚你家，我们又为他出了一大笔钱。这次克全下山，不去别乡，却单单洗了自家门前的人，这不是惹火上身、烧自家的祠堂吗？这次如果又要族上去填那个老虎的嘴巴，族上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有人开了头，就有人跟上。跟上去的人声音明显大了起来：“是啊，秋美哥，读大学，走正路，帮个学费伙食费什么的，那个也没什么说的。可参加共产党，造国民政府的反，那可是下大牢杀脑壳的买卖。要是族里给钱，去塞那个被劫的大洞，等于告诉别人，我们何姓人家都跟何克全一样，想叫现政府倒台。我这个人胆子小，爸妈没给我生两个脑壳啊！”

有人声音更高了说：“子不教，父之过。秋美，你生了这么个有能耐的儿子，你就替他去还那笔债吧！”

有人简直在喊着说：“秋美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齐保安团所要这笔钱的零

头！”

“那就按保安团说的，把克全的婆娘交出去，让她去抵那笔债！”

“对，就叫他婆娘去抵债！”

“我赞成，杀一儆百嘛，多事之秋，我看族上就该杀只鸡给猴子看看了。不然，今后何家子孙都不会安分，都会到外面去惹是生非！”

“祠堂里的会费不是专给何秋美家集的，为什么每次都要给他救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下就把祠堂的气氛搅热闹了。

首先说话的人一看势头，感到是时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站了起来，说：“总在这里磨牙帮，屁用都没有！走，把孙氏绑了，送保安团去，以证明我们跟何克全没有任何关系！”

“好！”所有说话人都跟着站了起来。

“爷爷！”一个声音传进祠堂来。

大家转头往门口一望，全都闭了嘴巴。

只见何克全的妻子孙氏，满头大汗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

孙氏手里拿着一根棕绳。孙氏走进祠堂后，站在何庆泉面前说：“爷爷，克全连累了族里。我这个婆娘应该替他还债，您就让族里人把我吊了，送到县里去吧。”

老族长何庆泉家离斌公祠较远，平时很少关注这个孙媳妇，只听说何克全被通缉后，孙氏为了他吃过不少苦头，受过不少折磨。但她吃苦不叫苦，受折磨不喊冤，劝她改嫁她摇头，家里的苦活累活争着做，顶了一个男劳力。在何庆泉的心目中，孙氏应当是挑得百斤起，放得一担下的那种女性。但他一点也没想到，今天站在自己面前的孙氏，竟是这样的文静，身子竟是这样的单薄。

就在何庆泉审视她的那时候，孙氏转过头来，望着关注自己的各位房长说：“爷爷、伯伯、叔叔、大哥，大家放心吧，克全的婆娘再无能，今后也不会连累大家了。”

孙氏这么一说，说得那几个站起来的男人只差没把脑壳塞进自己的裤裆去。

何庆泉问孙氏：“孙媳妇，你真的愿意替克全还债？”

“愿意。”

“真的不怕挨保安团的枪子？”

“爷爷，人生一世，也就草木一秋，总是要死的。为了自己男人去死，我觉得

值。”

“你舍得丢下你两个小小年纪的女儿？”

“克全说过，舍得舍得。人只有舍了，才能得到。我为克全死了，我的女儿今后就会跟我学样，也会为他们将来想做大事的男人去死的。”

因儿子的原因，儿媳妇一再受到连累，羞愧难当的何秋美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突然起身，“扑通”一声，跪在何庆泉面前，失声哭喊着说：“大伯，我求求你，祠堂不能送克全家的去县里。克全的所作所为，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要送就把我这个当爸的送去，我替克全去死，去还那阎王债！”

何庆泉紧抿着乌黑的嘴唇，半眯的眼睛里放出令人发憷的光。他的下巴在抖动，灰白的长胡须也在抖动。他双手紧握拐棍的顶部，缓缓站了起来。

何秋美知道，老族长要宣布最终决定了。

在当时的乡下，什么是一言九鼎？老族长的话就是一言九鼎！他一开口，就成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

何秋美抓住最后一点时间，仰望着何庆泉的嘴巴，声泪俱下，说：“大伯，就让我去吧！我何家已经对不住克全婆娘了，我不能再对不起她啊，大伯！”

何庆泉看都不看何秋美，却把目光射向刚才说话的那几个人，轻声召唤说：“你们几个过来。”

那几个人听到召唤，赶紧过去。

当那几个人成一字排在何庆泉面前时，何庆泉抬起棍子，指着孙氏说：“你们都站好了面对着她。”

那几个人赶紧转过身去。

何庆泉突然发声说：“都给我跪下！”

那几个人以为听错了，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何庆泉。

何庆泉眼睛一鼓，朝每人身上狠狠抽了一棍，厉声怒吼：“你们都给我跪在孙氏面前！”

挨了打的几个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同时跪了下去。

何庆泉指着跪地的人，对各房房长说：“你们看看，这就是何家的子孙，这就是我们何家的子孙啊！大家说，丢不丢人？”

祠堂里的人回答：“丢人！”

何庆泉加大声音问：“丢不丢人？”

声震屋宇：“丢——人！”

何庆泉说：“是丢人，这人丢大了！就这几个何家子孙，他们不但不愿替何家人受‘罚’，还要把嫁进何家的孙家女子推出去，替何家人还‘债’，他们是男人吗？不是人，是浑蛋，是畜生！”

跪地的人知道，今天他们犯了何家宗祠的大忌，他们坏了何家祠堂仁义道德的规矩！于是，他们全都急促地向老族长磕着头，把头磕得山响，乞求老族长说：“老族长，我们说错话了，做错事了。您大人不记小人过，高抬贵手吧！……”

何庆泉根本不答理他们，问全体房长说：“大家说，该怎么处置他们！”

房长们异口同声说：“按祖上规定，各打三十大板！”

何庆泉挺直身子，郑重宣布：“好，执行家法！”

“爷爷！”孙氏急得再次跪下地去，恳求道，“执行家法的应该是我，不能打他们啊！”

何庆泉没听孙氏的求情，高声宣布：“保安团要的钱，祠堂出一半，其余的由我何庆泉补上。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德是安身之本，生可领人走正路，死可令人静夜思！大家别这样看我，这钱我何庆泉愿意出。在这里，我再问各位房长，还知道不知道什么是何氏家族的祖训？”

全祠堂人昂首挺胸，齐声高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何庆泉高声说：“大声一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好，给这几个不守祖训的家伙上家法！”

十七、赣南的冰刀霜剑

一九三四年赣南的深秋，比往年冷多了，一些不该飘落的树叶提前凋零，一些还不该枯萎的茅草提前枯死。

大片大片的晚稻因为秋旱，颗粒无收，干稻草立在田野里，就像火灼过一样，焦黄焦黄。

大雁排着人字形队伍，在深秋的天庭下，一拨又一拨地迁往南方。

入夜以后，寒风骤起，枯枝败叶被摇得沙沙作响。林间的獐子、麝子等野兽，把身上的寒冷通过声音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

“嗷——”

“嗷——”

已经是凌晨一点时分，凯丰推开卧室门。

豆大的美孚灯光中，廖似光还在缝着衣服。

凯丰把马灯捻灭，挂在墙壁上，问：“怎么还没睡？”

廖似光瞟了眼凯丰说：“没看到你快要当爸爸了，我在为他的出生做着准备呢。”

“什么？”凯丰像被火灼了一下，吃惊地转过身，打量着灯光中的廖似光。这一打量才发现，廖似光的腹部果然隆起老高了。这段时间因为忙工作，经常不回家，即使晚上回到家里，因累得太狠，往往倒头便睡，对妻子关心太少。他又犯了大错了啊——在这非常时期，廖似光怎么能怀孩子呢？

廖似光想孩子的心情是能理解的。凯丰和她在上海生过一个女孩。正当廖似光为她和凯丰爱情的结晶高兴之时，组织通知才分娩三天的她赶紧离开上海。因为她和凯丰的身份因叛徒出卖已经暴露，必须转移到江西苏区。通知的同志说，凯丰已经在开往广东的轮船上等她，一刻都不能耽误。为了路上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组织决定他们将孩子暂留上海。面对组织的决定，廖似光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当红十字医院的护士把孩子从廖似光怀里抱过去时，廖似光晕倒在了地上。上海的孩子现在是生是死，凯丰和妻子一无所知。没想到对上海女儿的牵挂刚刚有所缓解，现在遇上一道难题。

廖似光没有注意凯丰的变化，继续走着针线说：“凯丰，我们在上海的毛毛要是在身边，该缠着你和我叫爸爸、妈妈了。”

“似光……”凯丰被廖似光告诉的消息闹得不知所措。他不是不喜欢孩子，有时恨不得马上把家乡和上海的孩子都接到身边来，让自己担当起当爸爸的责任和享受做父亲的快乐。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四面楚歌，遍地狼烟，别说是孩子，就是手里有枪的红军官兵都前途未卜、生死不知。妻子这时怀孩子，等于雪上加霜啊！

“怎么了，凯丰？”廖似光停住针线活，关切地望着凯丰。此时此刻，她希望从丈夫的嘴里，得到她想知道的东西。

凯丰欲言又止，紧锁着眉头说：“没什么，眼下的战争生活，险象环生，食不果腹，日子过得极度艰难。我对不起孩子，也苦了你这做母亲的，好好保重身子吧。”说完，就要脱衣上床。

廖似光赶忙放下针线，嗔怪说：“又不洗脸上床，这样不卫生。我给你打洗脸水去。”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惨败后，于一九三三年九月重新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主力分四路对中央根据地实行铁桶式“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德国顾问赛克特的建议，以持久战和堡垒战的新战法，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企图一步步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消灭红军。

王明的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和秦邦宪掌控着。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〇〇年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伊斯玛宁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支持左翼社会主义，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情报处工作。一九二六年因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送进监狱。一九二八年四月，他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到苏联，不久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李德以优异成绩毕业，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专事情报工作。李德不但有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而且懂俄语、德语、英语，加上德国与日本是盟友，日本人不杀德国人，李德的国籍就是一道最好的护身符，这便于李德在中国开展工作。李德以俄文名字利特罗夫前两个译音为在华的化名，取义为姓李的德国人。李德一九三二年来到上海，经常跟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和张闻天见面。由于秦邦宪和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与李德有过交往，他们之间以俄语交流没有一点障碍。一九三三年春，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秦邦宪和张闻天考虑，李德是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才生，经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将李德要到了中央苏区任军事顾问。其实，李德只是间接地从情报中了解了一些国民党军和红军的情况，对中国的现状只能算得上是雾里看花、摸象瞎子之流。如果从事情报工作，说不定他能成为优秀的专家，但要他指挥十万中国工农红军，就非常勉强。但是，三十多岁的李德心高气傲，很想在中国南方广袤的山区放手一搏，给自己的人生写上最精美

④

辉煌的一笔。李德的到来，对在军事上一无所知的秦邦宪无疑是天降大喜。说雪中送炭、旱地降霖一点也不为过。因为秦邦宪太需要一位红军的军师，因此李德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他住进了秦邦宪早就为他在瑞金沙洲坝田垅中专建的一座房子里，由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陪伴着。这座房子四周，拱月的众星一样分别排列着党中央、团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等党政军各大机关。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就是从这座房子送出去的文件、传出去的声音，再通过相距两华里远的军委总司令部，发往前线各部队，指挥着红军赴汤蹈火、浴血奋战。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反“围剿”在“地图上作业的指挥家”李德的全权指挥下，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与国民党军打了整整一年。最后，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减员越来越多，苏区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军地干部意见越来越大。李德的指挥最后导致广昌失守，要塞崩溃。为躲避敌机的轰炸，中央党政军机关不得不迁至瑞金城西十六里远的云石山里。

廖似光先用木盆盛上洗脸水，端到架子上，再把装有热水的木桶拎到椅子边，试探着问：“凯丰，中央机关和红军什么时候走？”

凯丰吃惊地问：“走？走什么？你怎么知道？”

廖似光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简报，放在桶边的椅子上，用手指点了点着说：“两个多月前，毛泽东对记者发表的那番讲话，我看很像是一个预告。”

凯丰洗脚、如厕喜欢看书看报，细心的廖似光经常为他预备着。

凯丰洗完脸，坐在椅子上，脱了鞋子，把双脚放进热水里，之后将简报展了开来。于是，毛泽东的讲话内容立即映入他的眼中：“苏维埃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可以逼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遭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北上的路，但红军决定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一定大举北上。”

廖似光说：“毛泽东两个多月来，不在云石山里露面，开始我以为他是被中央软禁了。昨天，我在刘英那里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受张闻天之托，去了宁都，说是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探路去了。”

凯丰守口如瓶说：“探路？探什么路？我怎么不知道？”实际上，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和应邀参加会议的李德就作出了计划：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而且报请共产国际获得批准。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织“三人团”，负责全盘筹划准备；政治由秦邦宪负责，军事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跟中央“一把手”关系密切、跟李德又是老相识的凯丰，不会不知道中央在做什么，只是认为这是核心机密，天机不可泄，就连自己的爱人也不能透露。

可廖似光就是想通过凯丰，了解到确切情况，以便在工作上给他以支持。

廖似光跟凯丰，经过香港敌牢中的严刑拷打，经过上海白色恐怖的考验，经过苏区反“围剿”血与火的洗礼，患难与共，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廖似光不希望凯丰对她设防，继续说：“秦邦宪、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鸭子死了嘴还硬，不甘向毛泽东认输，不愿放下‘太上皇’的架子。张闻天这个时候主动在他们中间搭桥是明智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只有这样，秦邦宪跟毛泽东关系的僵持才有可能打破。毛泽东在南方打了八年游击战，从打长沙到撤往井冈山，从井冈山打到赣南，从江西打到福建，哪座山、哪条路、哪条河，他不熟悉？有了他，党中央和红军就有了向导。”

凯丰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高级军事指挥家。秦邦宪不让他指挥作战，难道还听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法？要知道，蒋介石用的是德国洋军事顾问，我们还用土办法、游击战去对付，不等于堂吉诃德挺着长矛去阻挡坦克车，能行吗？我相信李德的战法，要追究这次反‘围剿’的失败责任，我看主要是红军将领受毛泽东影响太深，没有很好地贯彻李德的意图。”

廖似光说：“我跟不少红军指挥员接触过，他们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他们说，去年九月，反‘围剿’刚开始，第七军团长萧劲光因为寡不敌众，丢了黎川，被李德看做是退却逃跑，结果被撤职、开除党籍军籍、判了五年徒刑。有萧劲光的下场，红军指挥员哪敢违抗李德的命令？后来大到每次战略部署，小到每一阵地上每颗地雷和每个陷阱的设置，指战员们都得遵照李德的意图办。”

廖似光说得不错，李德是个容不得别人提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否则轻者革职，重者法办。

当年二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之后，将入闽的部队全部压向中央苏区。

广昌是瑞金的门户，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为此，秦邦宪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可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军事助手的刘伯承因跟李德作战意图不一致，被秦邦宪派到后方管理红军学校和医院。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则被安排做总参谋长工作。李德一到前线，就拉开与敌人打阵地战的架势。四月二十五日，《秦邦宪朱德李德关于广昌战役部署的意见》指出：“广昌战役成阵地战性质，敌我均无力迅速解决此战役。”但在敌出动七个师、一个炮兵旅，在三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红军发动进攻后，我军用竹签设置的陷阱、五十厘米直径的松木做的工事顶部、靠麻绳拉火的土地雷等“永久性”防御工事，均如篱笆墙拒虎，不堪一击。血战十八天后，一、三军团和十三师及守广昌的九军团九个师，共伤亡五千五百人，广昌防线最后崩溃。

凯丰叹了口气说：“睡觉吧，在家里别谈公事。”尽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但凯丰不想听到人们对秦邦宪和李德的非议，因为否定秦邦宪和李德，就等于否定了凯丰自己。在中央六届五次会议上，他能进入中央决策中心，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能说秦邦宪没有起关键作用。大处从共产主义理想、革命斗争的需要上，小处从个人感情、老同学的关系上，凯丰都不能让别人耻笑秦邦宪。

廖似光是个有话憋不住的女性，问：“听说李德为了消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影响，建议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养病，秦邦宪非常同意。只是共产国际认为，目前苏区和红军还少不了毛泽东，没有同意秦邦宪和李德签发的请示电文，这件事才没做成。”

凯丰当然知道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李德和秦邦宪确实想借鉴处理李立三的办法，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洗脑子”。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李德和秦邦宪只好放弃送毛泽东去苏联的计划。在带毛泽东上路前，有人还建议把毛泽东留在赣南，但项英和陈毅曾经在党内军内排斥过毛泽东，怕毛泽东留下对他俩构成威胁，加上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致要求与毛泽东同行，于是秦邦宪只能把毛泽东夹带在长征队伍里。凯丰不希望党内斗争让廖似光知道，因此说：“你不说话，我不会把你当哑巴！”

廖似光偏不听凯丰的，继续问：“这次转移，听说中央党政军领导名单上没有

瞿秋白、项英、陈毅、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人？”

凯丰没有说话。

廖似光则愤愤不平地说：“秦邦宪这样做太过分了！”

廖似光的消息是准确的。

廖似光所说的那些人，确实已经由核心领导决定留下。留下来的人，大都是秦邦宪等人不喜欢的高级领导。把他们留下的理由冠冕堂皇。比如项英、陈毅，理由是在江西负责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工作。但没担任重要职务的瞿秋白留下来做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把他甩在生存条件极端困难的赣南闽北打游击。作为曾经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刚开始还做好了随军转移的准备，也向秦邦宪请求过参加长征。后来听说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便凄然一笑，两肩一耸，把自己最心爱的战马和马夫都送给准备上路的老同志徐特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是该遭报应了呵。”这时的瞿秋白，只能在心里无比悲哀地自语着。

凯丰尽管知道这些内幕，但不会回答廖似光。现在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对王明、秦邦宪和李德的意见越来越大，如果让这些机密暴露出去，将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麻烦，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凯丰吹灭油灯说：“廖似光，你官不大，想知道的事却不少。睡觉！”

廖似光重新把灯点燃，跟凯丰对着干说：“我劝你好好跟秦邦宪说说，毛泽东虽说不上吃的盐比他吃的饭多、过的桥比他走的路多，可他比秦邦宪大十四岁。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大角色大对手没会过？秋收起义到现在，江西苏区由小到大，红军队伍由弱到强，哪时哪刻离开过毛泽东的领导？”

凯丰是个最不愿多说话的人，也最烦他人跟他说不愿听的事情。见廖似光今晚似乎不打算睡觉，要针对中央领导谁对谁错的问题同自己理论下去，知道再这样只会让住在左右隔壁的秦邦宪和李德看他的笑话，已经躺下的他不得不重新下床，穿上衣服，走出门去。

万水千山长征路

第五章

十八、出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怒斥为“崽卖爷田心不痛！”

骂也好，恨也罢，大错铸成，兵临城下，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不能等死，只有一条路可走——突围。

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七万二千二百二十三名官兵，握着三万三千二百一十四件枪炮和二万五千一百三十五把大刀、梭镖，掩护着一万四千七百四十六人组成的中央机关和庞大的后勤辎重队伍，于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冒着凛冽寒风，在蒙蒙细雨中，开始向最初的目的地湘西进发。

湘西是红军二、六军团的根据地。

为什么二、六军团在湘西？

原来，为了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压力，牵制、调动和迷惑敌人，七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作出决定，红七军团由军团长寻淮洲、政治

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带领，于七月上旬向闽浙赣边前进，队伍名称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六军团在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悄悄撤离湘赣苏区。全军九千多人于八月七日踏上西征之路，向湖南中部进军。六军团与贺龙的二军团（当时为红三军）取得了联系。六军团为红军主力实行战略突围探了路。二、六军团会合后在湘西开辟了根据地。

中央主力红军这支长征队伍，蜿蜒于长达百余里的山地，就像一条纤柔细长的溪流，缓缓流动着。

队伍是这样组成的：中央军委纵队为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由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部队组成，是长征大军的统帅机关。秦邦宪、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在里面。李维汉纵队为第二野战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机关、总工会、共青团等组成。后勤辎重分两大部分，一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和干部休养连，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同志，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刘群先（秦邦宪夫人）、廖似光等都在这个特殊连队里；二是叶季壮领导的后勤供给部门，携带中央苏区所有家产，其中包括兵工厂的机床、子弹、手榴弹、六百万石粮食、大量被服、各种文件、档案、图书资料、成箱的银元金条、发动机、大捆的电线、石印机等，行李担子多达三千余副，由几千名新兵和一天一块银元雇来的挑夫专事搬运。

林彪率一军团、彭德怀率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周昆率八军团和罗炳辉率九军团为两翼护卫，董振堂率五军团殿后。董振堂一九三一年率国民党军第二十二路军在宁都起义，五军团由二十二路军改编，武器装备十分精良，干部战士训练有素。

长征前的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凯丰接到通知来到秦邦宪办公室。

没等凯丰坐下，秦邦宪就说：“凯丰，你马上去第九军团，担任九军团的中央代表。”

凯丰感到非常突然说：“我可从来没在部队待过。”

秦邦宪指着凳子让凯丰坐下，说：“正因为我和你都没有在军队工作过，没有领军作战经验，更有必要去部队锻炼、补课。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就得马上统军，马下治学。”

凯丰承认这是事实，于是问：“我的任务是什么？”

秦邦宪说：“让中央的指示在九军团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同你一起去部队的还有刘少奇，他去五军团任中央代表。”

能到军队中跟官兵打成一片，凯丰认为确有必要。武将打江山，文官治天下。在这逐鹿中原的岁月里，哪位有志男儿不想有号令三军、攻城拔寨的生活？读过不少中外名著的凯丰，深谙秦邦宪的良苦用心。只是这一走，团中央的工作将由谁来负责呢？

秦邦宪知道凯丰要问什么，就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踏上战略转移的路程，主要任务就是行军、作战。你走后，团中央局的工作暂时由刘英同志负责。”

凯丰点了点头。

秦邦宪吩咐说：“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你应该知道，他是云南人，一九二一年进入军阀朱培德的部队，担任过排长、兵工厂护厂队长、副官和营长等职务。一九二九年调到江西吉安后，任吉安的保安大队长，不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领导了吉安、吉水、泰和等八个县保安队一千多人起义，参加了红军。起义后，先任独立第五团团团长，后任十二军军长，参加过各次反‘围剿’，是一位打过很多硬仗、胜仗的猛将。你一去，九军团就如虎添翼了。”

凯丰说：“九军团不是有蔡树藩同志任政委吗？难道还不够？蔡树藩在安源路矿当工人时，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青团。后来被派往苏联，又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高才生。他有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亲身经历，党的理论知识丰富。在中央苏区红军大学教课时，他的授课水平可是被学员们看做跟李德不相上下，是位优秀的教官。”

秦邦宪推了下那副深度近视的眼镜说：“我当然清楚他很有能力。但九军团这次负责侧翼掩护，任务非常艰巨，我和恩来不能不考虑加强那里的力量。蔡树藩不久前作战负伤，被打断一条胳膊，身上中了九发弹子，我担心他在行军作战时旧伤复发。”

见中央机关人进人出，紧张忙乱地做着转移的准备，而且不时有人来向秦邦宪请示工作，凯丰不敢久留，喝了口茶水，说：“我一定按党中央和你的决定办。”说完，就要出门。

秦邦宪叫住凯丰，交代说：“你不要回家了，马上去九军团。会昌县离瑞金有很远一段路程，早一天上任比晚一天上任好。”

凯丰想回家跟廖似光道个别，因为前天晚上跟廖似光不欢而散，到现在还没见面。他怕不辞而别让廖似光产生误解，进一步加深夫妻间的矛盾。

秦邦宪看出了凯丰的心事，安慰说：“似光同志我已经安排好了，她跟刘群先她们一起走。几个孕妇待在一起，中央卫生队也好照顾。等下我会把派你去九军团的决定告诉她，你就放心去吧。”

见秦邦宪为他考虑得这样周到，凯丰还有什么说的？他伸出手，跟秦邦宪紧紧握了一下，之后，走出低矮的房屋。在警卫员的帮助下，凯丰跨上战马，双腿一夹，向着九军团驻地疾驰而去。

警卫员紧随其后。

马蹄溅起一路灰尘。

十九、血战湘江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呀，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芭谷，（介支个）金灿灿。
 芭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芭谷棒棒咱们穷人掰。
 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呀，
 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

在萧瑟的寒风中，在淅沥的秋雨中，队伍出发了。

今天的人们，唱起这首《十送红军》，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懂得当时红军指战员离开根据地时难舍难分的心情，只有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日子的人们，才能真正懂得它的深刻含义。

是啊，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红军将士历时七年，在无数次前仆后继的战斗中，用无数战友的生命和鲜血开创出来的。赣南、闽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二十一座县城、五万平方公里面积和二百五十万人的规模，来得多么不易！而中央红军队伍，则是江西人民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用乳汁哺育成长壮大起来的。今天，当看到自己的家园就要葬送在敌人手里，当看到自己的子弟就要踏上生死未卜的漫漫路途，红军指战员和老百姓能不泪水长流吗？

然而，红军队伍不能不走，百姓想留也不能留。

十月十六日深夜，凯丰随九军团二十二师行动，与罗炳辉、蔡树藩一道，率领军团从会昌城西珠兰埠出发，悄悄离开驻地。九军团原有兵力一万零二百三十八人，在雩都又补充了一千三百人，总共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兵力排列第四。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九军团是中央红军的尖锐之师。十月十八日，九军团进入白区。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别躺在三副担架上，离开了雩都。

毛泽东身患疟疾，而奎宁药的副作用又使他严重缺血，身体还在缓慢恢复之中。王稼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敌人的飞机炸伤，弹片还留在体内。张闻天身体太虚弱，长途跋涉十分困难。

九军团主要担任左翼掩护任务，但在险象环生、瞬息万变的征途上，有时奉命殿后，阻击追兵；有时奉命转头充当先锋，杀开血路。在不断有人牺牲、有人补充部队中，掩护着中央机关突破了敌军设在赣南、粤北、湘东南三道封锁，于十一月二十日进抵湘西南地域。

坐镇南昌指挥作战的蒋介石，居心险恶地把重兵全力调往湖南。李延年、刘勘主力配合薛岳、周浑元纵队，沿铁路进至长沙、衡阳，先头部队于二十一日到达绥宁。湖南军阀何键第八军三个师全部兵力，二十一日在湘江至全州一线布防完毕。李云杰和李韞珩两个师，分别由嘉禾、临开和宁远、江华、远明继续尾追。广西军

阙李宗仁、黄旭初部四个师则集中在兴安、灌阳地域……国民党四十万军队形成的合围圈，要利用湘江这一天然屏障，将红军在此全歼。

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新闻发布会上胸脯高挺，得意地挥舞着戴着白手套的手高声宣称：“我们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他们彻底消灭！”

二十四日，九军团浴血苦战五小时，占领了湖南最南面的江华县城。

江华与广西交界，距桂林不远。

桂系军阀唯恐红军攻入广西，集结的“围剿”部队迅速向江华扑来。

二十五日，红军总部命令九军团：“掩护我野战军西进”。命令强调，“无论如何，二十六日不能放弃潇水西岸”，“至少要拒阻周（浑元）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两天”。

军团长罗炳辉接到命令后，立即在江华城郊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总部命令，并对坚守任务作了详细部署。蔡树藩做了战前动员。

会议结束前，凯丰作了言简意赅的讲话。他神情严肃地说：“同志们，刚才，炳辉同志下达了拒阻命令，树藩同志作了战前动员，我无异议。这次九军团阻击敌人能否坚持两天，关系中央机关、红军总部能否渡过湘江，能否实现西进战略大转移的目的。这次作战，指战员只有两种选择，不死即生！死有两种死法，一是死在敌人的枪炮下，二是死在军团执法队的子弹中。勇者的弹孔在胸前，懦夫的弹孔在背后。这是考验九军团全体指战员的关键时刻。我提议大家起立，为了渡江的胜利，向党庄严宣誓！”

“死守江华！”“突破湘江！”“敌败我胜！”在凯丰的带领下，干部们的口号声惊得林间一群鸦雀四散逃去！

二十六日午夜，石桥地区的枪炮声越来越紧密，冲天的火光疯狂地焚烧着黑夜，连片的喊杀声越来越惨烈。而江底地区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死一般的寂静，这寂静已经持续好一段时间了。

“喂！喂！……”罗炳辉脖子上青筋暴突，对着电话筒大声呼叫。可电话线的另一端却没有一点音讯。

凯丰将大半截香烟摁灭在桌上，站起说：“炳辉同志，我去江底看看！”

罗炳辉将话筒撂到桌上，望了眼凯丰说：“凯丰同志，九军团哪怕打到最后一人，也轮不上你去拼刺刀！”

凯丰问：“为什么？”

罗炳辉说：“你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必须对你的安全负责！”

凯丰全身一热，说：“在敌人的子弹面前，中央代表和大家一样，都是父母所生，都是血肉之躯！战友死得，我怎能例外？”

罗炳辉说：“心脏与手脚完全不同，子弹打在手脚上，不会致命，心脏中枪，必死无疑！”

凯丰感激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自从来到九军团，罗炳辉和蔡树藩一直都把自己当客人对待，险境不让去，领军冲锋陷阵全是军团长与政委的事。记得离开中央苏区的第三天，为了摸清当面之敌的情况，罗炳辉亲率军团侦察连，摸到龙布圩进行侦察。那一次侦察，敌人突然射出的一阵冷枪，把罗炳辉的军帽都打飞了。进入广东的那天拂晓，当总部紧张通过敌军封锁线时，为使总部安全得以确保，凯丰建议将本部防御线前移几里，即与总部前进方向背道而去。罗炳辉二话没说，与蔡树藩一道，带领二十二师向追赶上来的敌人迎面拼杀。那次反击，出其不意，一举击溃敌人两个团，使总部顺利通过封锁线。那次行动，罗炳辉、蔡树藩也没让凯丰参加，而是让凯丰带领后勤辎重部队先行撤离。这次突破湘江之战，蔡树藩率部去了石桥打阻击，再次将凯丰留在军团指挥部。现在江底情况非常不明朗，亟待有人去探明虚实。江底失守，敌人便可从左侧威胁中央和总部，直接影响首脑机关横渡湘江。

凯丰认为，这种时候，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再待在指挥部里，于是说：“炳辉同志，我不仅仅是中央代表，还是九军团的一员。在决定中央、总部能否安全渡过湘江的时候，我只能是战士！离坚守两天两夜的时限还有六个小时，我必须去江底探个究竟！”说完，不待罗炳辉表态，他拔出勃朗宁手枪，走出指挥部。背影一下就消失在漆黑的旷野。

罗炳辉见状，喝令军团警卫连连长：“快，必须绝对保证中央代表的安全。要是凯丰同志出了事，拿你人头来见我！”

江底情况非常不妙，在打退敌人十二次冲锋之后，阻击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当敌人调集兵力、准备再次发起攻击的那刻，凯丰率领的警卫连及时赶到。为了凯丰的安全，警卫连连长指挥战士，要将战壕里战友的尸体一具具地码到被敌炸开缺口

的战壕上去，给凯丰形成一个掩体。凯丰脸色一黑，喝令：“撤下来！烈士们已经慷慨捐躯，难道还要让他们为我挡子弹？！”

“首长，罗军团长有过交代，为了您的安全，我只能再次请求烈士们原谅了。”

“再这样做我可对你不客气！”

在骤起的炮声中，在呼啸的枪弹里，凯丰跃上制高点，大声动员：“同志们！九军团是一支摧不垮、压不弯的铁血之师。狭路相逢勇者胜！在阻击任务即将完成之际，我们必须使出最后拼劲，与敌人作最后一搏！坚守住阵地！”

.....

就在九军团顽强阻击敌人、完成任务由江华向永明转移的五天中，率先强渡湘江的一、三军团，在湘江西岸与国民党第一路“追剿”军进行了激战。

三军团第十团击溃了国民党军十几次冲锋，沈述清团长和续任团长杜仲美相继牺牲。三军团以付出四百多人的伤亡完全控制了战略要地界首。

第五师为保护红军右翼安全，全师伤亡两千多人，师参谋长、第十四团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等全部牺牲。第十五团团团长、政委和十四团政委均负重伤。

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随后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十二月一日，九军团从石塘圩出发，尾随红军总部左侧后，开始在凤凰嘴渡湘江。

“轰！轰！轰！”

“哒哒哒！”

湘江江面上，到处是炮弹手榴弹炸起的水柱，到处是子弹划破空气的呼啸。

两岸的战火越烧越旺，不少山头在熊熊燃烧！

弥漫的硝烟中，到处是催促过河的呼喊。

一具具红军的尸体，从上游流下来，残臂断腿不时从渡江战士中漂过。这中间也夹杂着敌军的尸体。有的红军尸体与敌军尸体扭作一团，怒目圆睁，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在厮打时的惨烈。

绝大多数烈士的身体都被枪弹穿破。他们双脚是烂的，双肩也是烂的。脚烂是因为翻山越岭强行军跑出来的，肩烂是因为中央根据地搬家搬那些笨重机器磨出来

④

的。有的战士的肠子流出体外，仔细看去，里面竟然没有一点食物，有也只是一些青菜。

被鲜血染红的江水中，文件、报纸、公文包、纸币、斗笠、棕衣、草鞋、拐杖顺流而下，这些都是从中央苏区撤离时带出来的。

凯丰行至江心，环视了一遍江面后，立马江心，一动不动。

正在前面指挥部队渡江的罗炳辉，见凯丰立马江心，急得大声催促：“凯丰同志，快走，站在江中非常危险！”

凯丰回答说：“敌人专寻骑马的打。我在这里可以吸引敌人的火力，你带部队快上岸！”

“不行，快走！”只听得“啪”的一声，一条皮鞭凶狠地抽在凯丰的坐骑上，战马一惊，奋起四蹄，载着凯丰与警卫员挟风带电般向江对岸冲去。

凯丰回头一望，取代他立在江心的是蔡树藩，那凶狠的一马鞭子，正是出自蔡树藩之手。

江心中，独臂将军蔡树藩的空袖管，正被强劲的西北风扯得旗帜般地挥动着。

九军团渡过湘江的第二天，完成阻击任务的红三十四师被国民党桂系四十三、四十四师阻于湘江东岸。红军殊死战斗，损失惨重。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壮烈牺牲。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渡湘水抢占西岸时，被敌人围困，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押送途中，陈树湘用手从伤口处拉断肠子，壮烈牺牲。

九军团进抵临江口、木路口一线。总部电令九军团和其他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地域，控制瓜坪以北及地阳坪的西进道路，以掩护后续红军渡江。

渡过湘江，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不足三万人。尽管九军团不像执行后卫任务的五、三军团那样死伤惨重（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六师几乎全军覆灭），但伤亡的人数已经超过大半。想着往日齐装满员的队伍，现在成为连军团建制都无法保持的状态，罗炳辉一到宿营地，就将手枪扔在桌子上，骂了起来：“妈的，真不知道这仗是咋打的，一夜之间，我这军团长几乎成光杆司令了！这么多干部战士，这么多武器弹药，眨眼工夫都到哪里去了？”

蔡树藩摸着隐隐作痛的伤口，紧锁眉头说：“湘江变成了红色，江面上浮着一层尸体，一眼望去，与天相接，这就是我们昨天的红军官兵啊。军团长，什么叫血流成河、陈尸百里，这回我可是大开了一回眼界喽。”

罗炳辉一拳头砸在桌子上，问凯丰说：“凯丰同志，你是中央代表，来部队之前，肯定经常跟那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李德顾问打交道，你说说，那家伙懂得打仗吗？”

蔡树藩说：“怎么不懂？满腹经纶呢。在瑞金红军大学，你又不是没听他讲过课，说起凯撒大帝、古斯道夫、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的军事理论，哪次不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真是瓷器铺老板卖东西，一套又一套啊。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建议，哪能进入李德大顾问的耳里去？彭德怀的战前万言建议书，在他面前如同一把废纸！……”

凯丰没说话。罗炳辉和蔡树藩的话使他想起刚刚听到的传闻。彭德怀渡过湘江后，因三军团死伤惨重，瞪着血红的眼睛，拍着桌子在电话里大骂李德瞎了眼，恨不得来总部找李德算账！李德听到翻译后，咆哮地挥动双拳说：“不懂军事，不懂战争！军事是什么？就是慈不掌兵！就是血流成河！哪有战争不死人的道理？西洋有位军事家说过，一场战争就是一部搅肉机，搅肉机其实就是绞杀生命。中国古代的将领，不也赞成‘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说法吗？”

彭德怀在电话那头听到李德被翻译出的话后，气得大叫！

罗炳辉见凯丰沉思着不说话，恳请说：“凯丰同志，你能不能去一趟总部，向‘三人团’转达我跟树藩的意见，路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仗如果再这样打下去，九军团非灭了建制不可！”

凯丰此刻的心情非常难过，这么多干部战士，一下子牺牲在湘江两岸，确实叫人惊心动魄，心如刀绞。打仗固然要死人，但不是这样的死法，不能割稻草样一片片地倒地。敌众我寡，敌军武器装备精良，加上以逸待劳，当然是使红军遭受惨重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路怎么走、仗怎么打，则更是一个值得思索、探讨的根本问题。现在虽然过了湘江，但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异常严峻的形势依旧没有改变。作为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眼下凯丰只能听从中央和总部的决断，让中央精神在九军团得以贯彻执行，除此他还别无选择。因此，他耐心说：

“炳辉、树藩同志，你们的意见我有机会一定会转达。我相信，由周恩来、秦邦宪和李德同志组成的‘三人团’，一定会吸取失败教训，妥善处理好眼前这种被动局面的。毕竟，李德顾问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周恩来同志也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罗炳辉说：“凯丰同志，我对这样指挥有很大意见。想想，从秦邦宪同志到中央负总责之后，在李德担任顾问决断中央红军的军事以来，我们先是丢了中央根据地；这次转移，据总部通报，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损失了三千七百人，过第二封锁线损失了九千七百人，过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八千六百人，过第四封锁线损失了三万多人，像这样走下去，只有穷途末路会等着我们。”

凯丰说：“炳辉同志，邦宪同志作为中央总负责，从去年一月到江西苏区不过一年多时间。李德这个军事顾问，从去年秋天到赣南，至今不过一年时间，他们得有一个熟悉认识的过程。”

罗炳辉说：“可我们就这么一把本钱，容得李德一再折腾吗？”

蔡树藩说：“是啊，凯丰同志，李德来中央苏区之前，中央红军一天天壮大，根据地一天天扩大，他一来，怎么就……有时间，请你把九军团干部战士对李德的不满情绪反映上去。告诉他们，仗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打下去了。”

凯丰点了点头说：“好，我会转达的。”

二十、遵义会议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抵达湖南与贵州的边境。

敌人知悉我军希望进入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追剿”第一兵团陶广部主力，李云杰、李抱冰师，第二兵团薛岳部，周浑元部已进至预定地区。桂军也已设防。黔军到达锦屏、黎平一线。“全歼”红军的阵地再一次布好。

面对又一严峻形势，十二日到达通道的中央领导人秦邦宪、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李德，不得不临时召开紧急会议。

这是一次决定党和红军出路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黔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

但秦邦宪和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北进。他们认为，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实际上已经溃不成军，如果不去湘西休整，如果没有二、六军团兵力的并入，中央红军随时都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

其他同志认为，再往湘西，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因此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进

军贵州。

在多数人的坚持下，红军转向贵州。十六日，红军总部进驻黎平县城。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红军总部驻地举行会议。会议地址选在一座宽大的老式房子里，房子砖木结构，有高大的封火墙，五间大房。这次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秦邦宪、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凯丰出席会议。李德因为感冒发烧没能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日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

会议开完后，十二月二十日，在行军途中，王稼祥问并肩前进的张闻天：“中央红军的最后目标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说：“没有现成确定的目标。仗这样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比张闻天早到江西苏区，比张闻天更了解毛泽东，早就希望能从张闻天这里听到这话。现在张闻天把心里话说出来，王稼祥心里就有了数。当天晚上，王稼祥把张闻天的意见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彭德怀听了之后当然高兴。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凯丰所在的九军团强渡乌江，宿营熬溪。五日深夜，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率部智取了遵义城。九军团进入湄潭、牛场地域。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向各军团长发布《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的命令》。

六日，九军团攻占湄潭县城。部队驻扎下来后，既负责拱卫中央、总部，又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相继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湄潭县革命委员会”和“湄潭县抗捐委员会。”

七日，红二师进驻遵义。红军总部电告各军团首长：“我军已经成功渡过乌江，现已占领湄潭、遵义及其附近地区，准备在此地区打击追敌及进行赤化，创造川黔边新苏区。”

八日，红军总部进驻遵义。

九日，中央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从南门关进城。

从江西会昌到贵州遵义，走过荒无人烟的山路，蹚过咆哮湍急的河水，熬过风雪刺骨的寒冬，穿过一道又一道九死一生的封锁线，凯丰累倒了，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他凭着自己坚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与罗炳辉、蔡树藩一道，将九军团带到了遵义，完成了三个多月来对中央和总部的护卫任务。但凯丰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的自传中，把自己在这险象环生的日子经历以寥寥几十字就概括了：“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党中央决定派我到第九军团任中央代表。九月就到了会昌二十二师。以后就随第九军团一直到遵义。”凯丰之所以写得这么平淡无奇，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自己所经历的凶险，比起牺牲在湘江两岸的大批战友，算得了什么！就是跟特殊连队的女性相比，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炫耀。

凯丰得知，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渡过湘江后，看见负伤断腿的三军团师政委钟赤兵所躺的担架还暴露在江面上，而敌机正向江面俯冲，她不顾怀有身孕，返回来路，冲了上去，用身子扑在钟赤兵的身上。结果，钟赤兵免遭再次受伤，贺子珍却身中数弹，十七处受伤，变成了大血人。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因长途奔袭，饥饿寒冷，加上精神高度紧张，在进入贵州前的湖南境内，怀孕七个月的她下身突然来血。面对早产信号，在邓颖超、蔡畅等人的搀扶下，廖似光躺在灌木丛中。军委野战医院政委贺诚，面对四面紧逼的敌军，命令警卫连成环形状，将廖似光护卫起来，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枪声中，孩子一声啼哭，来到了世上。邓颖超脱下军装，将新生儿一裹，交给担架上的廖似光。警卫人员抬着担架，一路狂奔，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在一座茅草房前，看到浑身血伤的警卫人员，廖似光不忍再坐担架，滚下担架，支撑起身子，抱着孩子进了一座茅屋。屋里有位白发奶奶和一位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少妇，廖似光二话没说，双膝一跪，请求说：“奶奶，请您收下我的孩子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您的恩。”说完，不管老奶奶答应不答应，她支撑起身子，转过身去，撕肝裂肺一声大哭后，冲出了茅草屋。

正因为像廖似光这种早产事件在战场上经常发生，党中央到达延安后，在制定干部履历表时，专门设置了“军事生活期间遇小产否（何时何地）”一栏，将小产与作战负重伤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来看待。

正因为有那些惨烈悲壮的场景在凯丰眼前发生过，凯丰一直把自己长征中所经历的惊险和所参加的战斗深埋在心里，从来不向别人炫耀。

进入遵义，队伍进行休整。

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黎平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这是一次不得不开的会议。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宅。

这是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红军总部的临时驻地。

会议召开前，派往军团的中央代表凯丰和刘少奇回到中央驻地。凯丰和刘少奇同住柏辉章大楼的一层一房间。一九五四年，凯丰在给老战友尹自勇的侄儿尹敬达的一封信中，说到了自己是怎样进遵义城的：“我记得一九三五年长征至贵州，一月七日我军攻克遵义城。周副主席电告我、蔡树藩、罗炳辉，十五日在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必十四日赶到。当时，我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的后卫任务，在军情瞬息万变的紧急情况下，为了确保驻遵义主力安全，树藩、炳辉留下，着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我是九军团中央代表，自勇同志是九军团党委委员。十四日傍晚，我和自勇同志到达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候补政治局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后，秦邦宪显得十分疲惫。这个年方二十八的小伙子，全然没了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苏区时的那种凌人盛气。进入江西之初，他以为有共产国际做后台，有王明的遥控指挥，有李德做他的军师，红军将无往而不胜。没想到赣南的山山岭岭，比莫斯科的楼房要高得多，赣南的田埂比莫斯科的铁路公路难走得更多。秦邦宪、李德等对敌作战的主张，不但不被毛泽东接受，也不被中央红军多数指挥员接受，就连从上海来的同学张闻天、王稼祥，也对此产生了怀疑。当然，不接受和表示怀疑本也无所谓，问题在于，由他担任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竟以失败

④

告终。这一失败，使他从人生巅峰跌入了深渊，逼得中央机关和红军不得不大搬家、大转移。大搬家三个月来，几万红军陈尸湘江、销声路上，所付出的巨大损失让他不堪回首。眼下，队伍不能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已经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为关注的热点，也是全党上下议论的焦点。彭德怀曾经当着他的面，大骂丢失江西苏区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讥笑他和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太自不量力了。毛泽东等对他们的评论，已被中央机关和红军官兵普遍认同，并在全党上下和红军中间广为流传。眼下，一股针对王明、李德和他的不满情绪，已在队伍里愈演愈烈。作为负总责的秦邦宪，当然不愿意担任负总责不久就被证明自己无法负总责。他不能就此断送人生刚刚开始远大前程。因此，当毛泽东等人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他不乐意接受，但也没有反对。他没反对是想通过这次会议，向与会者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以求得大家的谅解。他还想通过这次会议，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以便“三人团”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望过到会的同志，秦邦宪以那带着明显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开口说：“同志们，现在开会。首先，我代表中央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作一个总结报告。等一下，恩来同志再作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后，大家针对报告的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对接下来的行动，提出自己的看法。现在我开始报告……”

秦邦宪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白区反帝反蒋的运动没有很好地配合反“围剿”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很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行动协调不密切；同时认为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总之，一切的失败，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三人团”无力改变。当然，对于“三人团”军事指挥，秦邦宪也作了不及皮毛的自我批评，并将这些轻描淡写的错误归结在自己身上。秦邦宪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如果单从报告的条理、逻辑和修辞上看，无法否定这是一篇很好的报告。加上秦邦宪报告得口若悬河、抑扬顿挫，不知内情的人听了，一定佩服得五体投地。报告的精彩程度，从坐在秦邦宪一侧的凯丰的神色上看得出来。凯丰是党内笔杆子，口才一流，连毛泽东都看重他。凯丰能以这种赞叹的神色向着秦邦宪，只能说明秦邦宪的报告无懈可击。

秦邦宪报告完后，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周恩来的报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

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承认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周恩来最后说：“……客观原因当然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可能是指挥上犯了错误。”

这句话虽然语气不重，但却震动了秦邦宪。秦邦宪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会以这句话作为结束报告的用语。秦邦宪想：“怎么能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往‘三人团’身上揽呢？这不是惹火烧身吗？恩来到底想什么？……”秦邦宪的不解可以理解，他怕有人钻他报告的空子，把这次会议的意图改变掉。这次会议目的很明确，就是总结经验，以利“三人团”继续指挥红军。要不是这么多人在场，秦邦宪真想说周恩来几句，说他这个时候不跟中央负总责保持一致。可是，周恩来的嘴巴长在周恩来的鼻子下面，他无法阻止他说话。更何况，周恩来的话已经说出，覆水难收啊。无法可想，秦邦宪只好采取补救措施，把绷紧的脸部肌肉放松了说：“同志们，恩来同志高风亮节，把失败的原因过多地往自己身上揽，大家应当向恩来同志学习，多作些自我批评。下面围绕两个报告发言吧。”

秦邦宪说话之后，会议沉默了好长时间。这种沉默，并不比强渡湘江、身陷真枪实弹和硝烟炮火之中轻松多少。

平时，大家不太注意立在地上的自鸣钟的摆动声，今天，这钟摆声就像放在自己耳朵里，“噤噤”地响着。

毛泽东不满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习惯性地咳了两下。之后，他把吸进嘴里的那口烟吐了出来，将烟头丢到地上，用黑面白底鞋蹭了蹭说：“我不同意邦宪同志的报告，为什么？文过饰非嘛。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我们有多大的地盘，有多少人枪？在座大多数人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想一想赣南那块洒满我官兵鲜血的土地，想想湘江放竹排一样多的官兵尸体，这样的报告，怎么能让牺牲的同志闭上眼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今天我们不从根子上找出失败的原因，采取断然措施，那么，正如罗炳辉等同志所说的那样，等待我们的将是穷途末路！”

潭水里扔进一块巨石，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

张闻天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说：“我也不同意，这样的报告不能服众嘛。”

王稼祥跟上说：“这个报告通不过，没有实事求是。”

三个重量级人物一一表明态度，为那些曾经畏惧有共产国际作背景的秦邦宪的

人壮了胆。他们纷纷发言，都表示不同意秦邦宪的报告。

秦邦宪惊愕了。如果仅仅是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报告，他不会感到意外。毛泽东没有留过苏，跟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想不到一块去，这很正常。秦邦宪大感意外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附和了毛泽东。难道这是一同在苏联留过学，耳提面命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教导的同志？秦邦宪这才感到，从瑞金出发时，不该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行军。让张闻天、王稼祥跟毛泽东走在一起，住在一处，等于为毛泽东把张、王二人拉到他的主张上提供了很大方便啊！特别是进到遵义城，更不该按毛泽东的要求，将他们三人安住在市郊古寺巷川军旅长易怀芝的官宅里。他们三个人的语气这样一致，这样一唱一和，分明早就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

张闻天不等秦邦宪从呆状中缓过神来，站了起来，从衣袋里取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一边看着，一边发言：“‘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上，犯了严重的指挥错误……”

张闻天严厉批评“三人团”在指挥红军中的战略错误。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不集中；在军事上没有利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时，硬要红军机械运动，造成重大损失……张闻天指出，秦邦宪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人民力量的薄弱，必然会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机会主义结论。而事实上，“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还批评秦邦宪的重大失误是，拱手让权给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张闻天发言完毕，毛泽东接着发言。毛泽东针对秦邦宪的报告谈了看法。毛泽东认为，秦邦宪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没有实事求是，“三人团”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其表现在，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就像一个跟人搏斗的楞头青，根本不懂战术，先是凭着一股子蛮劲死冲。可几回合打下来，见打不过人家，就只能招架，不能还手，再接下去就慌不择路，落荒而逃。……”对于李德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说：“李德同志只懂得纸上谈兵，只知道图上作业，把军事学院的教程生搬硬套到实战中来，完全是瞎指挥、瞎折腾！”毛泽

东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作了有理有据、人情入理的分析。

毛泽东的发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说得对“三人团”早有看法的人拍案叫绝。整个红军总部驻地，只能听到墙外街区传来的喧哗之声。

那些抽烟的人，把香烟举在手里，生怕在抽烟的刹那间漏听毛泽东的发言。

就像车轮战术一样，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等在毛泽东发言后，也把压在心头对“三人团”的意见争先恐后地吐了出来。

这些发言，说得秦邦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说得周恩来脸上发热，不停点头；说得李德怒火满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此前的失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再由“三人团”来领导红军，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

军中元老朱德率先摊牌说：“泽东同志说得好，其他同志的发言意见也非常一致，这就是说，如果红军继续让‘三人团’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

王稼祥说：“橘生淮南即为桔，橘生淮北即为枳。地球那边的战法，硬要生搬硬套到地球这边来用，我认为这就是失败的根源。我建议，必须取消李德、秦邦宪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由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

“对！”

“我看应该这样。”

“早就该采取措施了。”

.....

与会人员纷纷同意王稼祥的建议。

一边静观会议进程的凯丰，被这种场面惊呆了——都是自己的同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计划进行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如此一呼百应的效果，确实展示了他们的才干。

在震惊之中，凯丰也看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疏忽，真可谓“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凯丰认为，毛泽东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有三方面的问题

④

违反规定。一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组织法。“三人团”指挥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是失败了，湘江一战更是不堪回首，但要追究责任，这责任得由共产国际和王明来承担，因为是王明遥控指挥反“围剿”。即使纠正错误，也得由共产国际来纠正。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的大事，居然会前不请示共产国际。会中提出解散“三人团”，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还只是共产国际中的一个支部，一个支部能擅自决定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变更吗？二是不符合中共组织的原则。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十六名，这次出席会议的只有十名，王明、项英、张国焘、关向应、康生、任弼时没到会，到了会的秦邦宪和凯丰自己当然不会同意毛泽东等人撤销“三人团”的建议，周恩来和邓发两边不得罪，等于毛泽东等人只是政治局会议中的少数，党内哪有多数服从少数的？三是人难免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把人处置到一边去，这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在这之前的一九二七年，不也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执行过瞿秋白攻打长沙的计划，最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而转上井冈山吗？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就能保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

综上三点，作为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凯丰，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战士，他认为，这种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地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维护党的组织纪律，维护中央负总责秦邦宪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他热血沸腾、不计后果地站起来说：“我对泽东同志的发言有看法。”

晴天里炸响一个惊雷，惊得毛泽东也转过头来。当毛泽东的视线直指发言人时，眼睛睁大了，他没想到说话的会是凯丰！

毛泽东惊诧过后，与会者的议论声，很快变得饶有兴趣了。他们盯着凯丰，想看看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往下该说什么。

凯丰直冲毛泽东说：“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哪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照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毛泽东本来不会生气的。大哲人苏格拉底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凯丰毕竟年轻，年轻气就盛，火就旺，容易冲动，老大哥犯得着跟小弟弟较劲吗。但没想到凯丰一上来就讽刺、挖苦人，眼中充斥着一种小看人的神色。凯丰抓住他没出过国、没留过洋来攻击他，而且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这是他没想到的。

毛泽东尽管有雅量，但也格外看重自己的尊严。他动气了，而且动了大气，他真想将刚刚点上的烟摔在地上。但毛泽东克制了情绪，问凯丰说：“凯丰同志，你说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凯丰没想到毛泽东会利用他的鲁莽，给他来这样的发问。身上还带着前方的硝烟味、头上还留着征途风尘的凯丰，被问得不知所措起来。

毛泽东继续问凯丰说：“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因经不起毛泽东的追问，凯丰只能坐回原处，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反正邦宪同志不能交权……”

针对发生在遵义会议上的这段风波，现在许多党史专家认为，凯丰虽然不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他的言行在党内生活中是允许的。在党的会议上，在没有形成决议之前，只要是正式党员，都有提出个人不同意见的权利，有亮明自己的观点、立场的自由。即使形成了决议，个人也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凯丰不随波逐流，不投机取巧，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其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是有原则性的。当然，在这种事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会上，凯丰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不作深思熟虑，而轻率表态，说明他年纪轻，受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影响太深。试想，如果中央红军继续让“三人团”带领下去，后果将会怎样？

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张闻天不再等待了。他趁热打铁提出：“根据王稼祥的提议，应起草一个会议决定，即让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中来。”

“我同意。”

“我赞成。”

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

根据陈云一九三五年所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会议形成如下决定：

- 一、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 三、中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

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立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后，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经过常委修改后发到全党各支部。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秦邦宪）同志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然军委内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李德同志与秦邦宪同志是徒然的。这一切造成了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

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秦邦宪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对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反而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

尽管秦邦宪对会议将他中央负总责的权力转给张闻天、将他的军事指挥权转给毛泽东想不通，但是，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他还是服从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交了权。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凯丰抢白了几句之前，确实没有很好地研读过《孙子兵法》。但是，从那次会议后，凯丰的话刺激了他，激发了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通过对《孙子兵法》的反复研读，他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充实自己，战略思想更加深邃，用兵视野更加开阔，指挥艺术更加高超。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孙子兵法》助他时常展示神来之笔，创造出一个个克敌制胜的奇迹。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不无骄傲地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

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了。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因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曾被暂时停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随中央纵队行动。

二十一、孤军作战建大功

遵义会议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行军中进行了重新分工。张闻天在毛泽东的力举下，取代秦邦宪，成为中央的负总责（总书记）。

遵义会议结束后，凯丰在给尹敬达的信中回忆说：“开了三天会。会一开完，我和自勇同志立即返回部队，传达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两个多月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新房子驻地，在张闻天、毛泽东的建议下，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小组，即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以确保正确的军事行动。新的“三人团”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长征途中最为重要的领导机构。

至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从遵义会议到组织整顿结束，看到毛泽东在党内、军内这样受拥戴，回忆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凯丰从内心深处开始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大浪淘沙，真金火炼，毛泽东不愧是在中国革命的战火中产生出来的优秀领袖。尤其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了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刘湘、龙云、薛岳之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击，令随着中央和红军总部行动了两个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政委的凯丰看得暗自赞叹。尽管在这期间，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中央红军大规模迂回机动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而且积极活动要彭德怀出来指挥。甚至不顾聂荣臻反对和劝阻，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攻击四渡赤水战役。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

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所谓的“风潮”就是，遵义会议以后的战况还是使一些人不完全服气。他们有不少议论和小活动，当时流传说毛泽东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尽管有这样的风潮出现，凯丰没有随波逐流。他以自己的判断力，认为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中国革命才能走出险境。因此，遵义会议两个多月后，在一个名叫威信的地方，在中央召开的领导干部会上，凯丰完全自愿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其他中央领导的面，对遵义会议自己的发言作了深刻的检讨。检讨最后说：“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领导得了我们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

在后来的自传中，凯丰更加冷静地剖析了自己在遵义会议上所犯错误的原因，写道：“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时期内就了解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上，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

威信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过乌江，彻底甩掉敌人的“追剿”。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领着凯丰、何长工来到九军团驻地桑树湾，向罗炳辉、蔡树藩传达中央两项决定。一是任命何长工为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接替何长工的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凯丰继续任九军团中央代表；二是给九军团下达新的作战任务。

周恩来说：“经过四渡赤水，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红军主力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准备突围北上。为了确保突围成功，泽东、我和稼祥研究，决定以九军团牵制和调动敌人，给敌人造成红军主力东进的假象。这次牵制任务非常艰巨，一是长征三个多月来，九军团为了完成侧翼护卫任务，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兵力锐减到不足三千人；二是与红军主力分兵后，得独立作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借助；三是贵州山高路险，是我红军非常陌生的地方。凯丰、炳辉、长工，你们对这次任务的完成有没有把握？”

板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以两千多兵力引诱十多万敌军，相当于一只羔羊背对一群饿狼，凶多吉少啊！

九军团党政军领导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

可是，中革军委除了作这种战略选择，还有什么良策能使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呢？

几乎同时，三位负责人都表示了各自的态度。

凯丰说：“我是中央代表，无条件服从中央决定。请中央和军委放心，我和炳辉、长工同志将竭尽全力，保证完成这次牵制任务。”

罗炳辉说：“周副主席，九军团有独立作战能力，加上我老家是云南，云贵川云贵川，云南的地形跟贵州相差不大，我算半个贵州人，熟悉这里的地形。这次迷惑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除了九军团，我看没有其他军团更合适了。”

何长工说：“声东击西，非常必要。局部服从全局。如果九军团能以自己的牺牲换取红军主力彻底突围，指战员将死而无憾！”

周恩来感动地望着三位战友说：“同志们，我衷心希望九军团不死一个人。可是战争非常残酷，九军团这次独立行动，既要保证完成任务，又要尽可能地减少牺牲。八万多中央红军，打到现在不足三万人，每个人都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凯丰同志，你和廖似光同志的两个孩子，一个被迫留在上海，一个被敌人追得早产留在长征路上，静心想一想，真是叫人揪心啊……”

望着周恩来眼里饱含的泪水，凯丰知道，那是周恩来对即将离开大部队担任独立作战任务的九军团将士的无比担忧，也是对牺牲在长征路上那些将士的无限怀念。男儿有泪不轻弹，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周恩来是在为革命队伍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而痛心疾首啊。

周恩来抬起头来，问道：“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比方说给你们补充兵员，增加武器，给足弹药。”

凯丰说：“恩来同志，我们即使想要，也不能向你伸手。红军主力更需要兵员枪弹。有蒋介石军队紧跟着我们，我想炳辉军团长肯定有办法解决！”

何长工说：“是的，炳辉身经百战，智勇双全！”

罗炳辉说：“周副主席，放心吧。”

周恩来抬高声音说：“同志们，我们就此分兵吧。这地方叫马鬃岭，请大家记住这个地名。”

马鬃岭分兵后，罗炳辉、凯丰、何长工率领部队向东北方向前进。

在行军过程中，罗炳辉、凯丰、何长工一反常态，要求指战员“违反战场纪

律”：白天行军要大声说话，要大刷标语、大散传单，晚上行军要打火把、放烟火。

干部战士大惑不解，说：“这不等于惹火烧身、自取灭亡吗？”众所周知，中央红军中江西人多，敌军一听到江西口音，枪炮就往死里打，此前红军已经吃过大亏。因此规定不该说话时不准说话，违者严惩。而晚上行军打火把，则犯了兵家突围之大忌。

“不该知道的别问！”军团司令部命令部属按规定做。

当装成红军主力的九军团，摆出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势，把大量敌军吸引到东北方向时，主力红军抓住机会，迅速渡过了乌江。

九军团完成牵制任务，返回到沙土镇，准备渡乌江时，官兵们全都傻了眼，因为浮桥早已被毁掉。

望着滔滔江水，不少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失声大哭起来。

因为此时身后正有敌军追赶过来。

九军团被逼进了绝境。偏偏这时电台又与中革军委失去了联系。

有人骂道：过江部队真是过桥抽板啊！

有人知道自己是因牵制敌人被落下在乌江北岸的，就骂：他们这是忘恩负义！

其实，这不是过江主力有意为之。宋任穷后来回忆说：“南渡乌江我们干部团走在最后面，等待留守的九军团过江后拆桥。当我们得知九军团已经从另一渡口过江后，中革军委一位参谋口头命令我们把浮桥拆了。当行军四十里赶上中央主力军后，才知道九军团还没过江。很少发脾气的朱总司令这回把我们大骂了一顿。我和陈赓接受了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天亮以前一定把桥架好，把桥交给九军团。我们连饭都没吃，带领工兵连急行军返回江边。当桥架好后，我们等九军团的到来，没想到九军团在约定的时间里没有来。我们不得不将桥又拆了。后来才知道，九军团在我们返回架桥点前已经来过江边。”

罗炳辉、凯丰、何长工面对严峻形势，非常沉着和冷静，他们在稳住部队情绪后，立即召开军团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不能渡江的情况下，部队立即转移，与敌周旋。在部队转移途中，黔军魏金镰师穷追不舍。在召开对追敌打与不打的会议上，部队发生了激烈争论。不主张打的认为，在敌占区孤军作战，兵力对比

如此悬殊，地形不熟，很难取胜。主张打的认为，黔军是弱旅，找其薄弱部队打，可一战而胜，震慑敌人。罗炳辉分析认为：魏师已经“咬住”了九军团，不如争取主动，打他个猝不及防，以此来扭转被动局面。凯丰支持罗炳辉、何长工的主张说：“只有打败当面之敌，才能保存自己，跳出重围。”意见一致后，九军团在鸡爪山下设置“迷魂阵”，主力却在菜子坳埋伏。待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红军发起攻击，一举消灭魏金镰师三千多人，俘敌一千八百人，毙、伤敌人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菜子坳之战，创造了红军史上孤军获胜、以少胜多的奇迹。此战不仅消灭了当面之敌，粉碎了敌军包围，迫使川军二十多个团纷纷返回赤水河一线，同时迟滞了进到息烽、扎佐一线追击红军主力的敌中央军六个师的行动，使中央和红军主力从容经过黔西南向滇东挺进。九军团也在转危为安的同时，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九军团由此获得了“战略奇军”的称号。鉴于九军团一时过不了江，牵制敌军又非常需要，中革军委电令九军团暂留江北与敌周旋。在此后牵制敌人的五十二天里，红九军团穿行于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足迹遍及十七个县，行程长达三千余里。他们比红军主力所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多走了三千余里。因此，九军团被称做“走了三万里长征”的部队。九军团这五十二天的转战，给蒋介石造成了红军夹江而战的错觉，使他不敢从围追九军团的东线、北线抽兵，只能就近从云南调兵救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喜过望，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只有这样，中央主力红军才能大踏步西进云南。无意之中，凯丰、罗炳辉、何长工又为长征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五月十一日，九军团突出重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会东，与中央主力部队会合。

这时，凯丰奉命调离九军团。

凯丰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九军团党代表一职由王首道担任。

离别之前，凯丰、罗炳辉、何长工、王首道四位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的战友热泪盈眶，紧紧拥抱在一起，作着互祝平安、胜利的别离。

凯丰一九五四年回忆说：“……不久，主席着何长工同志来我九军团接替树藩政委职，王首道同志接替我中央代表职。我也就离开了九军团。”

二十二、反对分裂

走过寒风刺骨的冬天，步入万木竞秀的春夏，按理说，红军可以享受阳光带来的温暖和轻松。可是，川西北高原昼暖夜寒的气候，山巅“千年积雪万年冰”的寒流，无视明媚季节的到来，拦路劫杀一样，把攀越雪山的红军队伍磨难得不断减员，红军伴随冷热交递的天气走到懋功。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提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占领川、陕、甘，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的行动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至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进剿’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如果发展受到限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于红军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接到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后，认为东出川北打松潘，地形与敌情对我不利，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占阿坝，四方面军则从茂县、理番北上进占新疆，致力寻机东向陕西发展。

鉴于张国焘对中央战略方针有不同意见，中央通知张国焘来懋功开会商议。

在懋功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主持。张闻天发言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并着重就两军会师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作了说明。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和中革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周恩来就中央制定的目前战略方针作了详细解读。他强调，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统一指挥，军队指挥权要集中在中央军委。

彭德怀、林彪、秦邦宪先后发言，赞同周恩来对敌情的分析和提出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秦邦宪发言完毕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着重讲了五个问题：一是建立根据地，二是战争性质，三是高度机动，四是集中兵力，五是统一指挥。

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相继发言，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进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周恩来报告后，对自己与中央的不同意见作了辩解。张国焘之所以与中央的意见相左，除了他个人的见解之外，对中央红军目前的

状态有些小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见中央红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样子，心中立即闪出四个字——残兵败将。

一方面军的现状使张国焘大失所望。

会师之前，张国焘和陈昌浩为了鼓舞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士气，曾经以“中央红军马上就到，加上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和中央红军并肩作战的日子就要实现了”做动员，并对指战员虚张声势说：

“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

“两军会合，没什么敌人不能战胜！”

会师以后，张国焘为摸清中央红军兵力底细，曾曲里拐弯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打探过。

毛泽东、张闻天对此有所提防，因此“东扯葫芦西扯瓢”地避而不谈。

张国焘只好找周恩来。

周恩来在张国焘的一再追问下，告诉他说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人。

张国焘听后倒吸口凉气，心想：“就这么点兵？！”张国焘原听说中央红军有十万，纵使长征路上损兵折将，再不济也得有七八万啊！

张国焘是位雄视天下的男儿。

在中共领导人里，只有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

张国焘最喜欢四方面军官兵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这句话说：“斧头劈开旧世界，镰刀收获新乾坤。”他认为，这句话气势豪迈、壮志凌云，革命者就该有气冲霄汉、问鼎中原的气概。

一九三一年三月，张国焘途经上海，来到鄂豫皖苏区。在鄂豫皖苏区，他借助共产国际肃清“立三路线”、“肃清反革命”的名义，削职、查办、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大树自己的权威。在肃反中，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等二十五名师团干部被杀，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四军政委曾中生被撤职。这次“肃反”，使干部队伍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红四方面军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被共产国际看重的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与陈独秀有着

④

深厚的革命友情。张国焘也颇得孙中山的赏识。

当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巴山蜀水，开始川陕苏区的拓展时，他凭着在鄂豫皖摸索出的经验教训，凭着川陕边的天时地利，干得很有成就。他的人生之路迈上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张国焘只用十个月时间，就以仅仅牺牲两万人的代价，换来了粉碎刘湘“六路围剿”、歼敌八万的重大成果，使川陕苏区总面积一举扩大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四百余万，建立了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五千多人，发展到四个军八万之众。

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底细后的变化，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凯丰请示张闻天说：“闻天同志，我想写一篇文章《列宁论联邦》的文章，在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

张闻天问：“为什么？”

凯丰说：“你不是说，张国焘在西北组建联邦政府，要跟我们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背道而驰吗？两个政府，今后听谁的？”

张闻天点了点头说：“是啊，你这位萍乡老乡，现在是人多枪多，有些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喽……”

实际上，凯丰和张闻天早就感觉到了张国焘的变化。

为了融洽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关系，张国焘来懋功两河口参加政治局会议前，张闻天就派凯丰前去迎接。张闻天用意十分明显，凯丰与张国焘既是同乡，又同在苏联相处过，有利于两者的亲近。凯丰非常乐意接受这一任务。六月二十四日，先期来到懋功的红四方面军军政学校的校长何畏，红三十军军长余庆云、政委李先念，红九军军长王宏声、政委詹才芳，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陪同凯丰前去迎接张国焘。

毛毛细雨中，前往懋功路上的张国焘，见了迎接队伍，立即从马上跃下，向凯丰大步走来。

凯丰一见，快步走向张国焘，激动得放声高喊：“国焘同志！”

张国焘也快步走近凯丰，兴奋地叫：“凯丰老弟！”

当两位在莫斯科分手五年之久的同乡，在几乎认不出对方的情况下相拥而抱，都激动得流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

血雨腥风，生离死别，一晃就是五个春秋啊。

一阵狂喜之后，高大白胖的张国焘握住单瘦的凯丰的手臂，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后问：“凯丰老弟，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凯丰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八个多月的刀削剑砍、炮火硝烟，能不把人整瘦、烤干吗？”

“是的，是的，久戍人易老，长征马不肥嘛！”张国焘点了点头，用有力的手掌在凯丰肩上重重地拍打着说，“现在好了，九九八十一难，现在终于走到我的地盘上了。老弟，大哥会用大肉大鱼把你养大喂壮的。走，带我去见润之他们。”

初听张国焘的话，凯丰十分高兴，但细细一咀嚼，觉得有些不对味。张国焘说“我的地盘”？这等于说这块根据地就是张国焘的了，张国焘就是这地盘上的主人，中央和中央红军就是他的客人了！这么一想，凯丰惊出一身冷汗。心想，如果张国焘把这种心态带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肯定会惹出大麻烦。可凯丰不敢把自己的担心暴露出来，因为毕竟张国焘比凯丰年长九岁，是党的第一任组织主任。前些年，张国焘还是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很受共产国际看重。如果这时冒犯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凯丰既为党和红军担心，也为战友、同乡张国焘担心。因此在陪着张国焘回往懋功的路上，凯丰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处理好这件迫在眉睫的事。后来，他决定请示张闻天，以写文章的方式，先旁敲侧击提醒张国焘，让他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与中央保持一致。

凯丰听张闻天介绍张国焘一些不正常的表现后说：“正因为发现国焘同志有些不把中央放在眼里，我才认为有必要趁早提醒他，以免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中央和红军经过这两年来挫折，现在最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加强团结。”

对凯丰的请求，张闻天很赞同。在这之前，他正为张国焘的变化感到棘手。现在有凯丰的请求，去“敲山震虎”，说不定张国焘会收敛一些。于是说：“老乡的善意提醒，有时比他人的提醒更中听。这样吧，凯丰同志，这篇文章在起草时用词尽可能委婉一些，不要点国焘同志的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会把握好分寸。”

于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当天晚上，刊有《列宁论联邦》一文的《布尔什维克报》，送到了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手里。文章引用列宁的论述，对张国焘擅自组建川西北联邦政府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和规劝。

张国焘哪能接受这样的规劝？当天晚上，他找到张闻天，将那张《布尔什维克报》拍在桌上，指着《列宁论联邦》的标题气冲冲地说：“看看，我一到懋功，你和中央就叫凯丰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列宁反对‘欧洲联邦’，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我们成立川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川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的一员，怎么能同列宁反对的欧洲联邦相提并论呢？”

张闻天因为有思想准备，所以对张国焘的表现并不感到意外。既然问题已经公开，就没理由回避，张闻天招呼张国焘坐下，耐着性子说：“国焘同志，凯丰同志引用列宁的话，并没有错嘛。”

张国焘说：“问题不在列宁的话错与不错，而在凯丰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川西北少数民族，也没有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更没有承认少数民族可以组织单独政府。他只是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地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张闻天说：“共产国际只指示我们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这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相符嘛。”

张国焘辩解说：“凡事得从实际情况出发，怎么能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教条，捆住我们的手脚呢？一方面军吃教条主义的亏还少吗？一方面军离开江西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政府能行驶职权时，仍是它的一部分，这样做有什么错？”

张闻天叫张国焘消消气，有话慢慢说。

张国焘根本不听，说：“请问闻天同志，凯丰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授意写的？”

面对张国焘的逼问，张闻天没有吭声。如果承认这篇文章是他同意写的，张国焘今天非跟他闹崩不可。

张国焘说：“如果这是中央的决定，为什么不等我们到了两河口，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拿去发表？又为什么我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不拿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

张闻天静静地听着，让张国焘把话说出来。他希望能从张国焘的话语中，听到

他有认识错误的迹象。可是遗憾得很，张国焘不但没有认错的意思，相反，还对张闻天大发雷霆。按照张闻天现在的身份和脾气，非指出张国焘问题的严重性不可。但是，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敌军对我军的围追阻击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一、四方面军必须加强团结，密切行动，如果此时去过多争论谁是谁非，必然产生更大的隔阂和危机。既然凯丰的文章已经让张国焘看到了，并在他心中产生了这么大的震动，已经达到了打招呼、敲警钟的目的，因此没有必要使双方的关系搞得更紧张。张闻天一改刚才严肃认真的样子，变得像和事佬一般劝慰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这几年，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中央苏区没有丢失之前，面积不过二十一个县，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四方面军所开辟的根据地就达二十五个县市和四百多万人。这次又竭诚拥护中央红军的会师，真是给一方面军雪中送炭啊。国焘同志领导四方面军有方，成绩有目共睹。我一看到四方面军，就感到这是一支强大的队伍，中央哪会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呢？凯丰同志的文章，只是他个人的有感而发，国焘同志不必在意。我们党内不是常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听了张闻天的称赞，张国焘心中得到一些慰藉，暂缓了对凯丰文章不满的发泄。但是，他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念头还是没有消除。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不听中央领导的警示，把中央的宽容当做软弱，把同志的忍让当做好欺，一是迫使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之职，由他担任；二是在芦花会议上，提出九人名单，企图改组中央；三是改组中央不成，则违反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决定与中央摊牌。张国焘在给陈昌浩的密电中表示说，要与中央“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要中央服从他的意志。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当叶剑英把此份电报密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张国焘会以这种态度对待中央和中央红军。

为了避免党内、军内发生内讧，他们不得不于当天晚上十一时，从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的驻地芦花，赶到第三军团驻地巴西，与患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碰头，召开了史称的“巴西会议”。会议上，大家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态度，毅然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连夜离开驻地，立即北上。

会后，张闻天吩咐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立即带领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迅速出发，一刻都不能耽误。

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凯丰匆匆来到驻地，悄悄通知中央机关的所有人员紧急集合。

面对紧急集合，睡梦中惊醒的人员茫然不知出了什么事，互相询问说：“半夜三更，火上房了？紧急集合做什么？”

凯丰压低声音，厉声命令：“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来。”

后来，毛泽东把这个夜晚称做长征路上“最黑暗的时刻”。

紧急行动中，由于凯丰、林伯渠、杨尚昆组织指挥得当，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三大机关行动迅速，如期脱离了危险境地，到达了预定集结地。

中央和中央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张国焘见中央和中央红军悄悄离开驻地，继续北上，就派人去追赶。中央不但没有答理他，反而命令他立即北上。

张国焘不屑地笑了。

他没有按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总方针办，而是一意孤行，继续他的南下计划，开始与中央北上的战略背道而驰。

后来的结果证实，张国焘南下计划是错误的。

最后，在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红军将领努力劝说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在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所率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之后，开往中央所在地陕北。

从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全过程看，凯丰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企图是最早觉察者之一。凯丰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洋洋一万余言的《列宁论联邦》，不仅预示了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不可避免，同时，也反映凯丰通过遵义会议后，政治敏感和是非分辨能力大为增强。

陕北的冬夏

第六章

二十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中南部、陕西北部，距古都西安三百多公里，属黄河中游地区。

延安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文化。“黄帝崩，葬桥山”，延安南部的黄陵县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的陵寝地。“龙的故乡在黄陵”，桥山是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民族圣地。而延安人民是中华民族 的守陵人。“禹治水，壶口始”，离延安城一百多公里的黄河壶口瀑布，雄浑壮美，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大禹治水的头功之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延安因其“襟带关陕”、“五路襟喉”、“边陲之郡”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古代名将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杨家将等在此大展文韬武略，上演一场又一场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壮烈史剧。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大门吴起镇。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凯丰 作词
凯丰 作曲

1=E 4/4
♩=88

(混声合唱)

| | | | | | | | | | | | | | | |
|----|----|---|---|---|----|-----|--------|-----|-----|---|-----|-----|---|-----|
| 女高 | 1. | 1 | 1 | 5 | 5. | 5 6 | 3. 2 1 | 1 1 | 1 7 | 6 | 6 5 | 3 4 | 3 | 1 6 |
| 女低 | 1. | 1 | 1 | 5 | 5. | 5 6 | 3. 2 1 | 3 3 | 3 2 | 1 | 1 1 | 2 2 | 3 | 1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男高 | 1. | 1 | 1 | 5 | 5. | 5 6 | 3. 2 1 | 5 5 | 5 5 | 6 | 6 6 | 2 6 | 1 | 1 1 |
| 男低 | 1. | 1 | 1 | 5 | 5. | 5 5 | 5 1 | 1 1 | 1 2 | 3 | 3 3 | 2 2 | 1 | 1 4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5 | 5. | 5 6 | 3. 2 1 | 1 1 | 1 7 | 6 | 6 5 | 2 4 | 3 | 1 2 | - - - |
| 1. | 1 | 1 | 5 | 5. | 5 6 | 3. 2 1 | 3 3 | 3 3 | 3 | 3 3 | 2 2 | 1 | 1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5 | 5. | 5 6 | 3. 2 1 | 6 6 | 6 5 | 3 | 3 3 | 2 4 | 2 4 | 1 5 | - - - |
| 1. | 1 | 1 | 5 | 5. | 5 5 | 5 1 | 6 6 | 6 7 | 1 | 1 1 | 2 2 | 2 | 1 5 | - - - |

| | | | | | | | | | | |
|----|-------|----|---|---|---|----|-------------|-----------|----|---|
| 5. | 5 1 0 | 4. | 5 | 6 | 6 | 1. | 1 1 1 1 1 1 | 7 7 7 6 3 | 5. | 0 |
| 5. | 5 1 0 | 6. | 1 | 4 | 4 | 1. | 1 1 1 1 1 1 | 2 2 2 2 | 7.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5 1 0 | 4. | 5 | 6 | 6 | 5. | 5 5 5 5 5 5 | 4 4 4 2 | 3. | 0 |
| 5. | 5 1 0 | 6. | 1 | 4 | 4 | 3. | 3 3 3 3 3 3 | 2 2 2 7 | 3. | 0 |

| | | | | | | | | | | |
|----|-------|----|---|---|---|----|-------------|-----------|----|---|
| 5. | 5 1 0 | 4. | 5 | 6 | 6 | 1. | 1 1 1 1 1 1 | 7 6 6 5 3 | 2. | 0 |
| 5. | 5 1 0 | 6. | 1 | 4 | 4 | 4. | 4 4 4 4 4 4 | 2 2 2 7 1 | 2.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5 1 0 | 4. | 5 | 6 | 6 | 6. | 6 6 6 6 6 6 | 5 2 2 5 | 5. | 0 |
| 5. | 5 1 0 | 6. | 1 | 4 | 4 | 2. | 2 2 2 2 2 2 | 5 5 5 5 6 | 7. | 0 |

凯丰为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词

这时的凯丰，随中央机关行动，参加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直罗镇战役。这一役，歼灭围堵红军的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奠基仪式。

一九三五年九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年十一月，担任刚刚恢复工作的青年团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也是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秦邦宪任主席，凯丰任粮食部部长。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凯丰参加了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后，一九三五年又继续南进，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变华北为第二“满洲国”。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这种紧迫的形势，要求中共中央迅速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然而，从长征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直被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与外界基本断绝联系，与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电讯已中断近一年之久，很难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变化。这对中共中央准确地分析中国的政治局势，作出重大策略是有很大影响的，此时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任务，虽然《宣言》已通过法国巴黎《救国报》传入国内，但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却不了解。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根据世界反法西斯的紧迫形势，批判了关门主义，提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了让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到这些重要精神，共产国际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国，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张浩装扮成商人，历经艰险从莫斯科经外蒙回到陕北。张浩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大上所作的报告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为安全起见，张浩回国时没带文字材料，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竟将会议内容传达得非常完整。《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对中

④

共中央全面准确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调整自己的政策作出重大的策略转变，和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址就设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张浩、杨尚昆、罗迈等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同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总的决议》。二十五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在讨论政治决议时，对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要不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凯丰在会上认真听取了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深刻领会了会议精神，参与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的拟定，并坚决拥护会议的两个决议。

一九三六年一月，凯丰任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年七月任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主任是毛泽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一九三六年二月，凯丰随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从延水关至河口渡过黄河，参加了东征。

同年十月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我党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事变。

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

在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离开延安地区保安县，十二月十八日进驻延安城区。

一九三七年二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西安事变爆发期间，国人尤其是广大年轻人，面对内忧外患，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极“左”者认为不能释放蒋介石，极右者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深入人心。延安灯火，彻夜不熄，中央领导人在夜以继日地操劳着。

这一天，毛泽东来到凯丰住处，要与凯丰商量统一战线方面的宣传工作。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看到凯丰在思想行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毛泽东格外高兴。毕竟，凯丰在苏联学习多年，有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这对中国革命很是需要。凯丰经过大革命和长征中血与火的考验，革命意志坚强如钢。凯丰血气方刚，坚持原则，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难能可贵。凯丰文化水平高，政策观念强，领会主要领导的意图敏捷，又如饥似渴吸收新事物、研究新情况，这对宣传理论战线的负责人格外重要。喉舌作用，党的主张得靠人先“说”出啊。遵义会议后，在跟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凯丰发现苗头敏感，立场坚定，斗争果敢，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意志。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张闻天面前夸奖凯丰，说凯丰是可造大材，可堪重用。是的，在懋功，在写《列宁论联邦》那洋洋大书的篇章时，寒风凛冽，凯丰席地而坐，在低矮的土砖屋里，双臂伏在弹药箱上，借着昏暗的马灯光，焚膏继晷，奋笔疾书。这一情景，被顶着星光、踩着月色悄悄出来思考问题的毛泽东看见。万籁俱寂中，毛泽东面对凯丰，心里感叹说：“萤窗雪案，全神贯注，哪有不‘笔落风雷动，诗成泣鬼神’之理啊？”

今天，毛泽东走进凯丰家窑洞之时，凯丰刚吃午饭。见毛泽东突然到来，凯丰赶紧放下饭碗，站起相迎。

毛泽东问：“下午一点多了，怎么才填肚子呀？”

凯丰说：“赶一篇稿子，怕断了思路。”

“唔，灵感如闪电，稍纵即逝嘛。”毛泽东边说边点头，满脸笑容地走近饭桌问：“吃的什么饭呀？”

凯丰让到一边说：“没吃饭，吃的是小米粥、窝窝头。”

毛泽东“扑哧”一笑说：“小米粥、窝窝头就不是饭啦？”

凯丰一愣，之后，以手拍额笑了说：“看看，我这个吃惯了大米饭的江西老

④

表，总不习惯把米饭以外的粮食当饭看。”

毛泽东说：“我也一样。那年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总喜欢问人家吃什么菜，问得北方人莫名其妙。北方人吃菜的种类，并不像南方人这么多，他们多的是饭的品种，比方馒头、包子、面条、油条、煎饼、饺子等等。后来我才知道，我应该问人家吃的是什么饭，人家才好回答。这叫在什么山，只能唱什么歌啊。”

凯丰说：“是啊，小时养成的生活习惯，就是很难改过来。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有时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也没什么不好，像你和我，不都反抗过不准我们读书的父亲吗？结果怎么样？在我们的勇敢坚持面前，他们都妥协了，让步了！他们的妥协让步，不是让我们反抗强权霸道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吗？不是让我们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了吗？”

毛泽东的话使窑洞中的气氛和谐了起来。

一边立着的廖似光，赶忙把自己的凳子让出来，搬到毛泽东跟前说：“泽东同志，请坐。”

毛泽东转过头来，笑容满面地对廖似光说：“似光啊，窑洞里只有两张凳子。你把凳子让给我，你能站着吃吗？”

廖似光玩笑着说：“我听您说过，站着吃饭可以多吃一些，我今天想站着试一回。”

“是吗？哈……”廖似光的话引得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起来，说：“湖南和江西都流传一句俗话，叫做‘雷公不打吃饭人’。可见吃饭人的身份很大哟。你饭没吃完，就把凳子让给我，我如果坐了不有违天理了吗？”

“哈……”凯丰夫妻俩都被毛泽东逗乐了。

毛泽东止住了笑，指了指桌上的饭菜对廖似光说：“叫勤务员把饭菜热一热。凯丰同志肠胃不好，应当少吃冷东西。”

凯丰感激地问：“泽东同志，你有事？”

毛泽东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这些人有永远做不完的事呢。”

廖似光赶紧与勤务员将饭菜弄去加热了。

毛泽东坐了下来，也招呼凯丰坐下：“凯丰同志，我看了你昨天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大作。那篇文章，对西安事变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有很好的

导向作用啊！……”

毛泽东所说的那篇文章，是凯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这篇文章，对抱有极“左”或极右态度的那部分人进行了纠错和规劝。文章指出：从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北方青年就开始一个针锋相对的立场。这两种立场于北方青年运动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利。极“左”派坚持不主张释放蒋介石先生，极右派则坚持主张武力讨伐。这种对立态度的发生，不应当责备一方面，而应当责备双方面。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面看法的胜利都是中华民族的损失，而使得日本“渔翁得利”。极“左”派既不能代表共产党的主张，因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我想极右派也不能完全代表国民党整个立场，因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开明的人士都是主张和平解决。这两派的争斗只能说明他们双方的幼稚，表现出青年的暴躁，以及缺少阅历。如果双方面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由这种因幼稚行动而引起的误会，理所应当自动化除，使北方青年运动重归于统一的一致行动。……愿北方青年以抗日为重！在团结救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这样的文章，你这个宣传部部长应当多写几篇，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嘛。”

凯丰说：“我怕不能完全阐明中央的意图。”

毛泽东说：“你都说不明白，延安还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你可是党内的笔杆子。应当多写，还要动员其他同志一起写……”

其实毛泽东不说，凯丰也在悄悄地写，今天赶的这篇稿子就是这方面内容的。

凯丰没有辜负毛泽东寄予的厚望，接下来又写了《寄语北方青年》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解放周刊》上。

在《寄语北方青年》中，他写道：“对于北方青年运动的希望，已经在《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那篇文章内，将我们的基本的意见提了出来。……在最近的事实来看，北方青年的大多数，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北方青年应坚持既定的方针，即是以抗日为方针，以民主为方法，继续地努力，以达到青年的团结统一。……”

凯丰这一阶段撰写的大量文章，对诠释我党抗日方针，壮大我党统一战线队伍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十四、敢于斗争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央在延安安顿下来后，开始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清算。

其实，对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早在保安红军大学时，毛泽东就在给红四方面军人员的授课中作了定论。毛泽东在这个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了过来。”

尽管张国焘当时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毛泽东任主席），但是听了别人告诉他毛泽东作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后，他认为自己日过中天，大势已去，认为不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检讨是过不了关的。因此，他斟字酌句，向中央写了《从



延安政治局会议期间合影（前排左二为凯丰）

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在检讨中，他列出了自己五种错误观点：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客观情况，过分估计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观错误。

第二，抹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

第三，过分估计了第五次反“围剿”所受的损失，因而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北上方针理解为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提出在比较更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另一战略。

第四，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面建设工作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导致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张国焘在对错误根源的检讨中还说：“对于五次‘围剿’中，和中央万里长征中所受到损失的过右估计，和夸大领导的错误，对五次‘围剿’后，正是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应当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来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不了解，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对估计当时的军事方针，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彷徨。对于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估计不足。对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军阀主义倾向得以发展……因此在过去一个时期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尽管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但检讨时依旧遮遮掩掩，只触及皮毛，希图应付过关。

二月二十七日，凯丰写了一篇题为《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文章以层层剥笋的文法，以犀利的笔调，以三万字的篇幅列出十三个问题，系统总结了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历数了张国焘从进入鄂豫皖苏区到三军会合这一过程中的种种错误，以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这十三个问题是：

- 一、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 二、军事战略问题；
- 三、南下北上的问题；

- 四、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
- 五、红军和苏维埃建设问题；
- 六、根据地问题；
- 七、肃反政策问题；
- 八、党的建设问题；
- 九、民族问题；
- 十、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 十一、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
- 十二、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 十三、党的统一问题。

这十三个问题，无疑是打向张国焘的十三发重磅炸弹，给张国焘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以致命一击。

凯丰以大河截流的方式，在列举十三个问题后戛然而止，写道：“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路线上的争论。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是中国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是由于国焘同志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同志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有彻底肃清自己的错误。他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

凯丰深挖了国焘路线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明确地说：“国焘路线的社会基础是：一、农民狭隘意识与流氓的破坏性的反映；二、中国军阀土匪主义的反映。国焘路线的历史根源是：一、与国焘过去一贯的错误相联系；二、与他的思想方法论相联系，即与他的狭隘经验论相联系；三、与他的宗派主义与派别成见相联系。”

凯丰在文章中暴风骤雨般地批评张国焘，应该说是他政治上的成熟，也是党和红军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

尽管凯丰当时对张国焘的批评言辞激烈、态度严厉，但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这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张国焘问题的结论完全一致。

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的住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和红军军以上干部共五十六人。

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揭批。

面对会场上的全体人员，久经岁月沧桑的张国焘迎着大家关注的目光，背靠在木椅子上，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不紧不慢地汇报了四方面军的工作。之后，对自己所犯错误作了检讨。他说：关于我的错误，前次在《从现在看过去》的书面检讨里已经讲过，但觉得不够。我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中央的错误。在鄂豫皖工作期间，路线是正确的，但错误也不少，没有巩固政权的观念，因此发生了失败的后果，开始在肃反中发生“左”的错误。在反第四次“围剿”中，以为国民党军队是“偏师”，发生“左”的观念，影响到粉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肃反错误是进一步发展，一直到陕北。在川陕苏区时期，一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在城市政策中，发生“左”的现象，肃反错误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在党内形成家长统治。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发生了路线上的错误。由于对民族运动估计过低，对敌人力量估计过大，对中央红军的胜利估计不足，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怀疑北上方针，发生向西退却，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由于军阀主义等的错误，发生反抗中央的表示，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以后就南下，南下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党、反中央，而且在战略上也是错误的。发生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对党的领导的忽视。

张国焘虽然笼统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确凿事实上，却又为自己进行辩解。

彭德怀、贺龙等三十多人先后发言，他们从政治、组织、军事、苏维埃问题、肃反政策、群众运动等方面，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长期受张国焘压制和迫害的部分四方面军干部，说到自身受到的迫害时，有的人声泪俱下。

在批判张国焘时，贺龙的表现最突出。他不时用握着烟斗的右手敲着桌子，指着张国焘猛批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也可以说是军阀出身。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

①

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人物？”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言认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问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西安事变我们接到捉到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有战略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看不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做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拿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不慎重，就会打起来的。

三月三十一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在对革命估计不足，以为反动时期又到来了，夸大敌人的力量。他的军阀土匪主义首先表现于在军队中个人的独裁制度，因此反对他而忠于党的同志就被“肃”掉了。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不同，是为保障个人统治的。其次他是标准的“实力派”，枪杆子高于一切。我们与他会合时，他一看到我们只有这么多枪，于是乎一切的手段和阴谋就都来了。后来发展到公开要书记当，要总政委当。可见他是军权超出了一切。

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决定》历数了张国焘九大错误，决定暂时保留其党籍，给张国焘一个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批评张国焘期间，凯丰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章，并积极地参加了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

工作。

为了发动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揭批张国焘的错误，凯丰多次主持小会议，作启发式发言，引导与会人员对张国焘进行批判。

那些不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听了凯丰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介绍，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纷纷诘问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你们乱杀过人吗？”

“私自打过土豪吗？”

……

在诘问者看来，张国焘既然犯有军阀、土匪主义的错误，所带领的军队自然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四方面军的少数同志忍无可忍，他们认为，这是对四方面军干部的侮辱。有人拍案而起，对凯丰提出抗议说：

“凯丰，你如果再召开这样的会议，我就离开会场！”

“我们决不受这窝囊气！”

……

会场内出现了严重的争辩局面。

“啪！”凯丰一掌拍在桌子上，问：“怎么，拒绝接受批判教育是不是？告诉你们，没有同张国焘划清界限，就得接受批判！”

会场鸦雀无声了。

原四方面军第四军的政治委员王建安，对凯丰把他跟张国焘划在一起想不通，散会之后，悄悄来见生病卧床的许世友，将开会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许世友一听，怒眼圆瞪，他没想到中央会这样看待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于是把被子一掀，跃下炕来，在房子里像困虎样走动。

许世友是第四军军长，跟王建安是老搭档，长期在张国焘手下带兵打仗。张国焘十分赏识和偏爱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里，一般官兵不能进张国焘的卧室，而许世友例外。张国焘那里有打胜仗缴来的烟酒，经常招许世友来对饮。许世友还经常在张国焘那里挑选好烟好酒拿走。行军打仗时，张国焘允许许世友的警卫员背酒、炊事员担酒、战马驮酒。许世友打了胜仗，张国焘亲自上门看望慰问。许世友发脾气，张国焘从不计较。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经常在不同场合向毛

④

泽东、周恩来、朱德赞扬许世友，为他扬名。因此，许世友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特别关注。最近，许世友确实感到延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不利于红四方面军的高层领导，担心这样下去自己的脑袋还能不能长在自己脖子上。

“娘的，欺人太甚！”许世友对王建安说，“走投无路我们还有四川。去，把几个老兄弟叫过来！”

经过预谋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五名军级、六名师级、二十多名团级、两名副营级干部和二十几名武装警卫员，准备悄悄离开延安，回四川打游击去。

可就要离开延安时，王建安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认为这样做太过火了，中央既然已把张国焘问题定为党内矛盾，就完全可以在党内解决，没有必要把矛盾进一步激化。许世友气得瞪圆了眼，要把王建安捆起来强行带走。在此状况下，作为抗日军政大学保卫处处长的王建安，就不得不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谢富治。

毛泽东听到消息大吃一惊，赶紧招来张闻天、朱德、林彪，进行紧急磋商。磋商之后，抗日军政大学的刘亚楼、傅钟、莫文华、邓富连、谢富治等负责人在林彪的部署下，迅速行动，将准备离开延安的干部全部逮捕起来。

对被关押的干部，毛泽东像对待一座即将爆炸的火药库一样，非常慎重地做着排险工作。

在部署分头做工作的同时，毛泽东把许世友当做此次事件中最重要的人物来对待。

他先是派许世友的老上级徐向前去做许世友工作。徐向前刚从惨败的西路军的尸体堆里爬出来，回到延安。当徐向前走进关禁闭的房内时，老战友相见，许世友抱着徐向前失声痛哭起来。

徐向前也禁不住地眼泪长流。他刚刚揩干从西征路上带回的血迹，打心眼里不希望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再发生不测，他们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都是我党革命力量的中坚啊。

徐向前对许世友说：“张国焘同志过去确实犯过严重错误，中央对他的批评帮助是对的。我们这些跟过他的高层领导，应当从中吸取教训。遇事不要太冲动，要好好想一想……”在徐向前的劝说下，许世友渐渐平静下来。

毛泽东见许世友心态有所变化，便去监牢跟许世友交心。毛泽东开诚布公地

将许世友等人与张国焘区分开来，说：“张国焘的错误是他自身造成的，你们这些下级受到株连是不公道的。当然喽，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你们这些下级也不应该生气、上火、出走……你许世友少林寺出身，重感情，讲义气，这是优点，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能感情、意气用事……你许世友打过许多仗，吃过许多苦，对此我毛泽东非常敬佩……”

毛泽东最后说：“在揭批国焘同志的会议上，我们少数同志对你们说了些过激的话，对此请你们谅解。”说完，竟脱下帽子，向许世友鞠了三个躬。

许世友站了起来，呆成一座石雕像。

许世友没想到毛泽东对自己会这样宽容。于是，张国焘刚愎自用、不服从中央决定、执意率四方面军南下的种种表现，也像过电影一样在许世友脑海中出现。

许世友再也忍不住了，冲到毛泽东面前，单腿一跪，仰面大声说：“毛主席，许世友服了你。”

剑拔弩张的局面被平息下去了。

对张国焘的批判引起的麻烦，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因此，毛泽东对引发许世友等人“出走事件”非常生气，把问题的起因归结在组织批评的同志身上。那天，他把组织者之一的凯丰叫到自己的窑洞，批评说：“凯丰同志，怎么搞的嘛，弄得这么多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

凯丰对毛泽东的批评感到非常委屈，辩解说：“泽东同志，我们可是按照中央意图进行的。”

毛泽东说：“主持批评会的是你们，能说你们的做法没有问题吗？”

凯丰还要争辩：“泽东同志……”

毛泽东抬手止住了凯丰，站了起来。毛泽东背过身去，将烟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抽着。抽了一会儿，高大宽实的背部渐渐平静下来。他转过身来，脸色好看许多。

毛泽东咳了一下，声音柔和了许多说：“凯丰啦，出现这样的问题，看来不能全怪你们，我也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经验不足吧。看来对张国焘个人严重错误的批判，严厉一些是可以的，但不能涉及其他人，更不能过火，过了火，就会把人逼上梁山！你和我的家乡不是流传一句话，叫‘大火煮粥，细火炖肉’吗？粥稠了才好吃，粥稠就得靠火力不停地拱动。红烧肉要熟透才可口，肉要熟透，就得耐着

④

性子，从外到里用细火慢慢去炖。火大了，就会造成外面的烂了里面的还没熟的问题。好吧，我们就从对张国焘的挽救中学会‘煮粥、炖肉’吧。”

毛泽东态度的改变，所作的自我反思，使凯丰的委屈一下子消除了。毛泽东的服众之处，就在他能及时发现别人和自身的错误，并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不放过对自己的反省。

凯丰感到，自己在主持四方面军干部对张国焘问题的批判时，确实说话过了头。如果不是毛泽东和中央及时妥善处置，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于是，凯丰说：“泽东同志，等下我去许世友等同志那里，向他们赔个礼、道个歉。”

毛泽东非常赞赏凯丰这种爽快作风，满脸笑容地说：“好，很好。在我们共产党里，秀才遇到兵，没有什么说不清的道理嘛。”

第七章 稳坐「波涛汹涌」的 长江局

二十五、在国共合作中明方向

陕北的炎夏，顶着烈日的庄稼像疯了一样生长。

漫山遍野的苞谷、粟苗、地瓜，绿油油的染得整个原野春色一片。

羊群东一处、西一处地游啃地面，像黑白棋子在绿色的棋盘上移动。

沟这边有牧羊的小伙子在与沟那边的姑娘以歌传情：

山丹丹里那个开花哟，
红艳绝，
咱们中央啊红军，



到陕北，

.....



凯丰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排右一为凯丰）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史称“洛川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日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凯丰出席会议。凯丰、彭德怀、邓发、林育英（张浩）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张闻天（一说凯丰）、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任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萧劲光任参谋长，杨尚昆任秘书长，任弼时兼政治部主任。

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抗日的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这个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它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等。

年轻气盛的王明，在十二日会上，以激情四射的口气，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

日与争取抗战》的报告。报告特别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并强调：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要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在军事上，他主张打阵地战，主张集中，将我们的部队编成正规军，和国民党军队一起上战场打击日本，进一步说就是保卫苏联。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与会人员感觉王明的报告与洛川会议精神显然不同。但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这是因为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回国前，他又受到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他的讲话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军事干部对洛川会议中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抱有不同的看法，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这样既可以振奋我们的斗志，又可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这两种思想都促使不少人同意王明的观点。可见这些人没有正确估量形势。我们只有三万军队，配合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去打阵地战，这支军队能打几次仗？再说，如果跟着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我们既无后方，又无根据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会议期间评价十二月会议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削弱独立自主呢？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呢？”

王明的报告没有形成正式决议。

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凯丰被确定为二十五名筹委会成员之一。

会议根据南京失守，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心转至武汉的情形，加上蒋介石的邀请，决定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等领导南方的工作。

十二月十八日，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希望王明“在汉相助”。

经中央同意，王明留在武汉。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凯丰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同时兼管湖北省委工作。

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原日租界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四楼的大石洋行，成了中共长江局机关的办公处。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危难的时候，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时候，在与王明右、“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身处长江局的凯丰，始终维护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尽管当时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但在副书记周恩来的实际领导下，凯丰和秦邦宪、董必武等长江局领导，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长江局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同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开展对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和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工作；

二、领导南部各省党的工作，迅速恢复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做好新四军的工作，独立自主地准备与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推动和帮助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积极作战。

按照任务规定，长江局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挫败了蒋介石的“溶共”政策，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巩固和扩大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重建了在大革命中破坏十分严重的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吸收了大量先进分子入党（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十三省，党员发展到六万七千七百八十人（军队党员未包括在内），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加强了各地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指导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广泛开展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全面开展了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将领以及地方势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在国统区内组织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各种抗日团体，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长江局的宣传部部长，凯丰说：“宣传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已为抗战的实践所证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抗战的“宣传工作无论对国外或对国内都做得不够，没有充分地使用宣传的武器，没有充分发挥宣传工作的效能。中国的抗战是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自卫战，是保卫祖国和保卫和平的自卫战、正义战，因此中国人民是站在理直气壮的方面，更能把握客观的真理和事实来发挥宣传工作的效力。”

凯丰和周恩来、王明、秦邦宪一起，在同蒋介石谈判中，经蒋介石“完全同意”后，争取到了创办一份新报——《新华日报》的权利。《新华日报》组建后，由王明任党报委员会主席，报馆设立董事会，成员是王明、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凯丰、邓颖超。《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一张公开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机关报。它在山西、广州、重庆、西安设立分馆。在长沙、郑州、潼关、洛阳、宜昌、黄陂、南昌设立分销处，销量最多时达三万多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作为一张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和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战争上起到了重大的号召和鼓动作用。

凯丰作为党报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新华日报》的采编、出版、发行工作。凯丰对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指出说：“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来做宣传材料，应当在一切文字的或口头的宣传上，揭露日寇一切的残暴兽行，激发每一个中国人对日寇侵略者的民族仇怨；用革命仇怨态度来教育每一个中国人去对付日寇侵略者；发挥中国抗战中每一次英勇事迹的教育作用，激发每个中国人的民族热忱；用忠实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教育每一个中国人，使他们抱定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使他们抱定中国抗战必定胜利的信念。”

由于《新华日报》缺少强有力的编辑人员，在范长江的介绍下，凯丰得知陆诒能够胜任编辑工作，凯丰就和秦邦宪、潘梓年、华西园在普海春餐馆找陆诒面谈，请他担任《新华日报》的编委兼采访科主任。陆诒曾在几个报社担任过外勤记者，但不了解“编委”是什么意思。凯丰、秦邦宪一一向他解释：我们通过党组织来领导报纸工作，具体地讲，党组织领导编辑委员会的工作。编委会是报社内部的集体

④

领导机构，每个编委都是集体领导成员之一，不论党内或非党人员，只要参加报社工作都是报社的主人翁。我们这里没有老板和伙计之分，办报靠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集体努力，还要依靠广大读者和通讯员的支持，就是这一点与其他各报有所区别。

凯丰还对报社同志讲，我们过去有过办秘密报刊的经验；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在苏区办过报刊。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要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大家都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不要紧，经验从实践中来，我们可以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们共产党人对不懂的事情就要学习，只要我们发奋努力，在实践中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新华日报》出刊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广泛而巨大的反响。一星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受曾经的中共党员、后叛变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叶青的调唆，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指使数十名暴徒，手持铁棍、利斧闯进报馆，割断电线，捣毁物件，推倒排字架……企图阻止《新华日报》的继续出版。

长江局对此作出强烈抗议，并电告蒋介石，请他设法制止。

周恩来、叶剑英和凯丰等分别专访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要求采取有效办法，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凯丰依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就职时所提出的“以民族精神对抗强敌，以民主制度集中国力，以国防计划建设经济，以科学原理健全思想”的“四个原则”，前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与周佛海严正交涉。他指出：“……如果不及早设法调整，将要妨碍抗战宣传工作的进行。”

凯丰还将近来《新华日报》被捣和全国各地不少进步报刊被查禁等情况，对周佛海进行了通报。

面对凯丰的到来，和出具的暴徒的确凿罪证，周佛海洋装不知地说：“凯丰先生，有这种事，会不会是亲日分子挑拨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

凯丰说：“如果不信，周部长可以派人调查。”

周佛海说：“调查当然会进行，不过……”

凯丰不容周佛海闪烁其词，指出：“……自抗战爆发以来，有人以为对理论的研究将会失去它的地位，但是恰恰相反，理论书籍的销路反倒激增起来。这是为什

么？这是因为抗战的环境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激烈变化，以前不问国事的人现在都被战争的炮火所惊醒，使他们不得不问政治；平时注意政治的人们，现在对于一切事物不能不求进一步地认识。对这种现象，国民政府本应求之不得，怎么反过来还要对政治书籍进行查禁呢？你这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说出的‘四个原则’摆在那里，不能会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吧？”

周佛海脸红如煮虾，却仍继续装聋扮哑说：“凯丰先生，你反映的情况我的一无所知。如果查清中央和地方确实存在以上问题，我马上纠正。”

凯丰说：“光纠正还不够，我认为必须作出一个明确规定，将全国有利于抗战的言论和文章都充分讲出来、登出来。”

周佛海问：“你认为这个规定要表述哪些内容？”

凯丰说：“第一，应当确定，凡是不违背三民主义的原则和不违背统一团结的书报，均应予以发行和出版的自由；对于学术的研究，凡是为国内或国际上公认的学说，譬如科学社会主义，已成为全世界所公认的一种学说，应当有研究的自由。

“第二，在组织上，应当统一书报的检查。近来检查书报既无一定的组织，又无一定的标准，甲机关可查禁书报，乙机关也可查禁书报。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有组织的现象。中央不查禁的书报，而地方又要查禁，这样使言论出版也如像遭受‘关卡厘金’重重障碍。因此必须有统一的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书报应当归统一检查机关负责。凡中央不查禁的书报，应当在全国各地通行，不得受到查禁。

“第三，确定书报检查与著作人发行人的关系。凡被查禁的书报，应当通知著作人发行人，指出被查禁之理由，使著作人发行人能依指出之理由加以更正重新出版，或查禁之理由不适当时依法申辩。……”

在凯丰的强烈要求下，周佛海无言作对，最后不得不松动进步报刊、书籍的出版。

这一松动，使我党抗日主张在国统区得以迅速传播，并使之深入人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凯丰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根据时局的变化，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撰写了《抗战中的宣传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撰写了《保卫武汉中动员民众的几个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撰写了《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刊载在《解放周刊》上。文章对宣传我党抗

战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名文章起了很好的作用。

凯丰在《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胜利是属于中国。他说：‘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是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与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与人民是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与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与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与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一真理已经逐渐地为各方面所认识，为各方面所公认。这正成为是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发展民众运动与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的先决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凯丰撰写的长达十万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是一部鸿篇巨制，是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教科书，对《抗日十大纲领》进行了全面解读。该文分“民族危机下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前途”、“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四大讲和“中国一般的状况”、“中国怎样沦为半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九一八后民族危机之加深”、“中国经济之危机”、“九一八后中国政治形势与反日民族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能否胜利”、“中国抗日民族自卫战争能否胜利”、“反对民族失败主义的各种论调”、“中国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等二十节。这部著述，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为全国军民坚定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十六、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凯丰参与了张国焘叛逃前对他的挽救和劝阻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张国焘借口去黄帝陵祭奠，企图与国民党特务联系，背叛革命。

毛泽东对张国焘去黄帝陵不同意，但不好阻拦，因为张国焘是军委副主席。

张国焘祭奠完黄帝陵，去了西安。在西安，他不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劝阻，又去了武汉。

十一日晚上，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赶到江汉关一条小街的旅馆里，与张国焘见面。他们批评张国焘来到汉口不报告中央是错误的，希望他住到长江局办事处去。

但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抱悲观态度，拒绝了他们的帮助，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到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有饭吃，我以后再不问政治了。”在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的一再批评、劝说下，张国焘不得已向中央发了个电报，电报说：“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经研究认为，张国焘这次行动是有准备的，劝他回党工作困难很大，于是立即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并提出建议：“国焘今日十九时抵汉口，仍与胡宗南所派的一个便衣住旅馆，我们已经去与他谈话。他表示是否可在相对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同时认为边区是丢了可惜，吃了没味的问题。”现请你们电告：一、究竟联络参谋交机密文件是否属实，内容如何；二、对国焘问题如何处理；三、对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及其孺子，请勿予以难堪。

中共中央经研究，十二日，以书记处名义电王、周、秦、凯，为表示仁义至尽，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

根据张国焘的要求，十六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见到了蒋介石。张国焘对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周恩来马上说：“你糊涂，我不糊涂。”当时因周恩来在场，张国焘有话也不好多说。见了蒋介石后，张国焘对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的劝告依旧置若罔闻，表示坚决不回去。四月十六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利用教育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错误应由他个人负责，对红四方面军干部应当做到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

④

开张国焘问题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议不要因为张国焘叛变，增加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当更加团结起来。四月十七日，鉴于张国焘的表现，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再次和张国焘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劝张国焘采纳一、二点意见。但张国焘坚持错误态度，当即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条、第三条中考虑，准备在两日内答复。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走后不久，张国焘约了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来旅馆谈话。当晚十一时，胡宗南司令部派车把张国焘接走。张国焘在房间留下纸条，对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写道：“弟已决定采纳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王明在武汉在长江局期间，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宣言。在宣言中，王明不但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批评，反而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表示不满，提出了许多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王明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其要旨是把抗战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正规战，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

王明甚至认为，蒋介石希望他“在汉相助”，等于承认他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

王明还认为，到中共七大召开时，自己坐上党的总书记的位置肯定不会有问题。

王明甚至想在武汉建立党的第一中央。

毛泽东看出了王明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如不尽快消除这一事态，将危害党的肌体，涣散党的团结，断送革命的大好形势。

这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日军逼近武汉，武汉的沦陷近在咫尺。

毛泽东抓住王明从武汉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机会，郑重提出说：“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毛泽东对王明人身安全的关怀。

王明看出了毛泽东的用意，不露声色地说：“润之兄，国难当头，武将战死在沙场，文臣累死在书房。作为我党一位领导干部，我得身处抗战最前线，与国人同生共死！……”

毛泽东一时被王明说得无言以对。

但是，毛泽东想要解决的问题，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以解决。毛泽东稍作思考后，一语双关地说：“为了安全起见，王明同志必须回延安！”

由于毛泽东坚持己见，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会议结束，王明离开延安回到武汉后，根本没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放在眼里，就是拖着不回延安。他自恃有共产国际这一靠山，毛泽东等人奈何不了他。他还自作主张，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同时送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毛泽东看了提议认为，这个提议对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明确阐述，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另外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并将八项建议电告王明。王明却以来不及送达为由，拒绝将八项建议送交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

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已经公开化了。

解决王明的问题已经成了我党迫在眉睫的要务。

机会终于来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王稼祥乘苏联军用运输机飞到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再从迪化乘军用汽车风尘仆仆回到延安。

前头说过，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腹部留着弹片，长征途中还在化脓，参加遵义会议都是用担架抬去的。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王稼祥不得不离开延安，去苏联治伤。王稼祥去苏联时，恰好王明回国。中央决定王稼祥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归来，为解决王明企图争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原来，在共产国际中，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共过事。季米特洛夫

④

在工作中发现，王明喜欢夸夸其谈，根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却又与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格外紧张。王稼祥治好伤的时候，任弼时被中央派往苏联汇报工作，同时接替王稼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季米特洛夫借王稼祥回国的机会，请他给中共中央带来口头批示。批示说：“应当承认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实际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

八月二十九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主持长江局工作的凯丰和董必武、叶剑英，就武汉工作布置方针作出指示，武汉紧急，他们应依下列方针布置：“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分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五个方向布置；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办事处一起入川，武汉人员仍以一部分到中原，一部分入湘，小部分留汉随周、叶行动”；“必武即入川，凯丰在恩来到后入川，剑英、克农（李克农）、文杰（黄文杰）暂留汉”；“湖北省委仍如前”，“仅留极少几个人在汉主持工作，随办事处行动”；“周、项（项英）即去汉，博随周行”。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会上，王稼祥在与会人员极为关注的目光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应当承认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实际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王稼祥还告诉与会者，过去代表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发号施令的米夫，已经遭到苏联专政机关的逮捕，并被处决。

王明一听，如五雷轰顶，脸色顿时灰白，整个身子似乎矮了一大截。王明终于失去了“王牌”——共产国际的纵容和庇护。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尽管王明任长江局书记时过分相信蒋介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鼓吹正规战、运动战，忽视游击战；鼓吹死守武汉，以及阻止《新华日报》及时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行为，产生过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只在局部范围内。这一点，在一九八四年三月

二十五日，曾经在长江局工作过的邓颖超在同廖似光的谈话中指出：王明的右倾错误“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

当王明犯错误必须调回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凯丰留长江局工作”，这是凯丰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信任的明确表述。

二十七、自古忠孝难两全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不暂时搁置，这让国统区的共产党人能由“地下”走上“地面”，他们的家属也不再是“另类”。

这样的政治局面，对于凯丰的亲人无异于是天大的喜讯。

何秋美却没有享受到不是“共匪”父亲的喜悦。

他劳累了一生，为儿子担着惊，受着怕。自儿子一九二六年离家后，从没得到过儿子一个字的问候和一分钱的报答。何秋美囿于文化太低，视野有如坐井观天，加上身处赣西山区，消息十分闭塞，不知道儿子在外是在干着惊天动地、改朝换代的大事；不知道儿子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事业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不知道儿子在呕心沥血地协助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谋划着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方针政策；不知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个中道理。他带着对儿子的强烈不满，带着对儿媳孙氏坚守妇道的无比歉疚，一一浏览完空荡荡的何家四壁，于一九三七年秋天恋恋不舍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何秋美死后的第二年春天，凯丰终于来信了。那信是由在武汉做事的何裕芳带来的。

来信说，他在武汉一切都好。过去之所以没给家里写信，是因为时局不允许，写信回家对家人和他本人都会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自德国往家里寄那些书籍后，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按理现在应该回来看看，但公务在肩，实在太忙，没法抽身，等将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再回家看望父母和家人。

接到凯丰的来信，全家人欣喜若狂，悲喜交加，他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只

④

有这时，积蓄在他们心头的压抑、愤怒、痛苦、煎熬才得到彻底的释放。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说老天爷真是有眼睛，保佑了他们的何克全。凯丰的母亲金氏和妻子孙氏经过商量，立即张罗着让在国民政府工作的何裕芳，带着凯丰的大女儿何明清去武汉，去见离家十一年的父亲。

何明清去了武汉之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不闻音讯。

一九三八年十月，何裕芳让人从武汉捎回来一条消息，说日军进攻武汉时，飞机向武汉市区扔了许多炸弹。凯丰在轰炸中被炸死，何明清是死是活没有消息。

如同晴天霹雳，家人惊呆了。

人有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再大的苦难也能承受。一旦希望破灭，再坚强的人也很难挺直身子。

孙氏垮了，彻底垮了，垮在凯丰已经死亡的消息上。

孙氏在何家十几年，说白了是为凯丰活着。只要凯丰还在，哪怕他永远不回来，她也不会埋怨他。毕竟，她是有夫之人。凯丰死了，她的精神支柱折断了。她认为，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年的惊吓、劳累和苦痛，加上日益严重的肺病，使她经常吐血，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凯丰死亡的噩耗突然传来，如同雪上加霜，给了孙氏致命一击，将她击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是个深秋的夜晚，蟋蟀经不住寒风的侵扰，发出颤抖的呻吟。

孙氏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感觉全身能被风吹起。她扶着床架、床梆、墙壁，一步一步地下床来，再一步一步地挪往方便处。

山乡是那样的宁静，宁静得连树叶落地都显得特别地响。

她通过窗口，抬头望着天空。天空像一口倒扣的硕大锅底，蓝黑蓝黑的。月亮像被恶狼趁着夜黑咬去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像在汨汨流血，在无声地哭泣，在畏寒中哆嗦。她太同情那瓣月亮了。她想将自己化做另外半瓣月亮，去堵那瓣月亮的血流，去补那半瓣月亮的残缺，去暖那半瓣月亮寒冷的身子。她需要那瓣月亮啊。在她的记忆中，只要两瓣月亮合在一起，再寒冷的天空也显得温馨，再离乱的世界也显得圆满。宁为太平狗，不做离乱人。她曾经听婆婆说过这话。她太渴望成为那瓣月亮了。

这时的孙氏，将两条臂膀像翅膀一样张开，张开之后，使尽全身气力，朝月亮一伸，又一伸。“扑”的一声，孙氏没抱着月亮，却重重地摔在地上。

小女儿何淑英被母亲的摔地声惊醒。她赶紧点燃油灯，向响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当她看到母亲倒在地上时，惊得赤足跳到地上，直奔母亲而去。“妈妈！妈妈！”何淑英一边惊叫，一边去抱母亲，要把母亲抱上床去。无奈何淑英力气有限，怎么也抱不动。“奶奶！……”何淑英只能求助于隔壁的奶奶。

金氏闻讯奔来。

祖孙二人将孙氏抬到了床上。

孙氏凄切地笑着，笑着对婆婆和女儿说：“妈、淑英，请你们帮我把身子揩洗干净，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好吗？……我要去……去克全、你爸那里了……”说完，她闭上了眼睛，两行泪水滑过脸颊。孙氏走向了永远的黑暗。

一首赣西民歌，在静夜的山乡里被人幽怨无比地低哼起来：

正月里个望郎啊，
是新那个年，
妹子门前狮子笼灯闹翻天哪呵嘿！
我的哥哟，
你为什么不回家里大团圆哪呵嘿！
……………

二十八、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

凯丰并没有被炸死。

在孙氏去世的时候，周恩来、凯丰和秦邦宪等人，带着原长江局机关的人员，分别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初陆续来到大西南山城重庆。

原来，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向中央建议，在武汉失守后，将中共中央长江局与东南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将华南局及西南局合并成立西南局，由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十三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但周恩来、秦邦宪和凯丰认为，西南局名称与所辖地区不符，建议将西南局改为南方局。

中央书记处经研究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同意南方局名称，以周（周恩来）、博（博古）、凯（凯丰）、吴（吴克坚）、叶（叶剑英）、董（董必武）六人为常委。”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凯丰负责宣传及党报工作，兼任宣传部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还一度兼管过川东、川西省委工作。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部部长由秦邦宪兼任，统一战线委员会书记为董必武，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为邓颖超，华侨工作组由叶剑英负责，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孔原。

南方局办公地设在八路军驻渝通讯处所在地机房街，离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不远。

时任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主任是邓颖超）的廖似光后来回忆说：“办事处是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它专门管财务、交通等方面的事务，同国民党打交道，而南方局却是我党设在国统区领导南方党工作的秘密机关。”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把南方局的办公地点炸毁了。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只能搬到红岩近郊龙桥附近的红岩嘴大有农场。

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中国南部地区的代表机关，主要负责如下工作：一、除了直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外，还直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香港、长沙（后迁至邵阳）、广州（后迁至韶关）、衡阳、贵阳等地的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二、领导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及设在桂林、昆明、成都等地的《新华日报》的分馆、分销处；三、负责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南部分）、江西、江苏及港澳地区和海外等地的中共组织。

廖似光回忆说：“南方局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的党组织发展时期和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反共高潮开始后转入隐蔽待机的时机。”

“当时南方各省党的负责人分别是：湖南省委书记涂振龙，后任高文华；湖北省委书记郭述升，后任何伟、钱瑛；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闽粤赣特委书记方方、王唯一；云南省委书记马子卿；贵州当时称特委，负责人是邓止戈、秦天真；江西省委书记是郭潜；广西是李克农负责；四川分为两个特委，廖志高任川东特委书记，罗世文任川西特委书记，罗被捕后由邹凤平继任。除此之外，南方局还与上海地下党有联系，饶漱石、刘晓去延安开会，经重庆时，曾来南方局汇报工作。同时香港党组织也属南方局领导，负责人是廖承志、连贯。”“南方局定期将各地负责人找来个别谈话，听取汇报，部署工作。”

廖似光的回忆是准确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南方局领导听取湖北省委书记钱瑛报告湖北各地的工作情况及今后的工作安排。钱瑛十二日又报告了湖北各地

④

党组织在二月整理和扩大原有组织，建立新的基础，加强党的干部教育与训练工作的情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在座。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



凯丰（右一）在重庆南方局期间与博古（右二）等人合影

南方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听取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汇报新四军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出席，袁国平、饶漱石、李克农、刘晓参加。袁国平汇报后，会议就新四军过去和今后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六月十六日，南方局常委（扩大）会听取钱瑛报告鄂西工作和徐特立报告湖南工作，董必武、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徐特立、孔原、李克农参加。会议肯定湖北的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做好学生工作，注意工作方式，防止过“左”。在统战方面，要巩固原有关系并发展之。六月十六日，常委（扩大）会听取李克农汇报广西一年半来的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廖承志、邓颖超参加。六月二十五日，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并听取廖承志汇报香港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

席，邓颖超、李克农、刘少文参加。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电，提出时局的建议，由秦邦宪起草“七七宣言”发回延安，建议中央采纳。七月二日、六日，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廖志高汇报川东特委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邓颖超、孔原和刘晓参加……

廖似光还回忆说：“南方局还办过两期训练班，培训县区级领导干部，学员每期三十人左右。学员主要来自川东、川西，以川东为多。讲课主要是董老、秦邦宪、凯丰、邓颖超和黄文杰，周恩来也来做过形势报告。黄文杰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他死后负责人是我。”“在训练班上，董必武讲党的建设，罗世文讲马列主义，凯丰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颖超讲妇女工作。”

在重庆期间，作为南方局六常委之一的凯丰，呕心沥血地主抓着宣传和党报。为了检讨过去，勉励将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重庆西三街营业部，凯丰主持了招待重庆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各界贤达对《新华日报》办报的批评和指教。《新华日报》那时每天发行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份。到会人士认为，发行量已相当可观。但凯丰认为，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少了三千份，只与《大公报》相仿，这还不够，还要扩大《新华日报》在全国的涵盖面和影响力。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在化龙桥总馆举行创刊两周年纪念会，参加会议的来宾有五百多人。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到会祝贺。凯丰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战的意义》的报告。凯丰勉励报馆的同志说：“当前我们的面前摆着严重的危机这是事实。鲁迅先生说过，道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天生的道路。革命的战士是不畏困难的，一定要从困难的过程中创造胜利，才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革命的战士会从困难中创造道路。我希望《新华日报》的同志就是这样的战士。”

在军事方面，凯丰参与了新四军发展壮大、战略转移及应对“皖南事变”后局势变化的决策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凯丰与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他们共同讨论后，取得一致的关于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处境及宜采取对策的建议，建议说：“甲、目前国民党内落后与顽固势力仍占上风，对我党我军关系日益变坏；乙、江南新四军目前处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区域被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部队是处于敌寇与顽固派夹击中挣扎；丙、只有坚决秘密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并继续发展；丁、为达到此目的，新四军要

④

立即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做政治工作准备，须将子弹、药物移到江北适当地点，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须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进驻地区主要在津浦路以东，指挥机关移到江北去。”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新四军九千多人在皖南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之后，新四军死伤惨重。“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和王稼祥立即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指出：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分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凯丰按照电报指示精神，与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一道，在公开场合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严正抗议，并组织文章刊登在报刊上，在重庆上层人士中大造舆论，对国民党诬蔑新四军、打压新四军的真相进行了驳斥和披露。周恩来在一月十七日愤然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诗，在《新华日报》上及时登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活动，为新四军正了名，对争取社会各界对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凯丰一九三九年四月写下《全国总动员与精神总动员》，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写纪念下《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两周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下《斯大林同志与中国革命——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等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均刊载在《群众》刊物上。这批文章为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争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方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二周年等重要会议上，凯丰发表了重要讲话。

凯丰还经常指导《新华日报》与《群众》的征稿、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一九四〇年一月，凯丰在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集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日的意义》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国统区的党组织（敌占区的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南方局接到这

一指示后，于十月四日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提议的南方局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问题。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邓颖超、刘晓出席。会议决定下设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统委）、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宣传部、组织部、国际问题研究室、华侨工作组、社会部、秘书处。统委由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刘晓、张晓梅、王梓木九人组成。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叶剑英。下设军政、党派、社会、青年、妇女五个组。文委由凯丰、周恩来、徐冰、胡绳、冯乃超、潘梓年、沙汀等八人组成。书记凯丰，副书记周恩来，秘书徐冰。下设书店、社科、文化、文艺、宣传、新闻六个组。在以凯丰为书记的南方局文委的组织领导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一直在斗争中健康发展。凯丰与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老舍、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向他们传达党的指示，通过他们指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他们还想方设法营救了一批进步文人。

与此同时，凯丰还负责了大后方的青年工作，召开了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会后的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国统区青年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一是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两者不可偏废，而其统一的中心一环，就是党员必须加强社会活动，取得社会地位”。

一九三九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南方局报告工作后，称赞南方局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毛泽东从六个方面指出南方局取得的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发展了党的工作；（三）推进了战争动员；（三）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展了工农运动；（六）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等。

二十九、怜子如何不丈夫

在武汉期间，凯丰给家里写过信，但因日军占领了武汉、南昌，长沙也因危在旦夕，所有邮路都被掐断，他的信怎么也到不了三角池这个小山村。

何明清也没有失踪。她在武汉找到了父亲，并随父亲来到了重庆。

何明清在武汉见到凯丰的那天，武汉发生了大事。

④

那天，凯丰见到阔别已久的女儿时，激动得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好久都没说出话来，眼泪禁不住往下淌。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街头有留声机在高亢地演唱这首歌。

廖似光提醒凯丰，该问问老家的情况。

凯丰这才擦干眼泪，问何明清说：“家里人都好吗？”

何明清一边抹眼泪，一边回答说：“爷爷去年过世了，其他人都好。妈妈想你，想得快要发疯了……”

听女儿说到第一任妻子，凯丰尴尬地望了眼廖似光。

廖似光并不觉得难堪，落落大方地问何明清说：“明清，妈妈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这里找爸爸？”

何明清说：“妈妈很忙，爷爷过世后，家里吃的穿的都靠妈妈想办法，哪有时间出来？就是出得来，又去哪里借来武汉的路费？”

何明清的话把廖似光的神色说凝重了。好久好久，她才自责地对何明清说：“明清姑娘，我对不起你妈妈。”

何明清不知廖似光这话从哪里说起，疑惑地望了下廖似光，问凯丰说：“爸爸，她是你……”

凯丰说：“哦，明清，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廖阿姨，也是你和淑英妹妹的……又一个妈妈。”

何明清惊诧地望着廖似光。

廖似光走近何明清，抓起她的手，歉意地说：“明清，对不起，爸爸离开老家闹革命后，怕连累你们，改了名，换了姓，断绝了跟你们的联系。你爸爸身体不好，为了照顾你爸爸，帮助你爸爸更好地工作，我就……”

“别说了！”何明清这才知道，爸爸身边穿八路军军装的女人，就是爸爸在外面的妻子。她打断廖似光的话，不让她继续解释下去。何明清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不能接受爸爸舍下受苦受难的可怜妈妈。因为爸爸，全家的田地都被保安团抢走了。因为爸爸，妈妈险些被保安团打死。为了全家活命，妈妈差一点累死。爸爸怎么能这样对待妈妈呢？她使劲从廖似光手里抽出双手，怒目向着廖似光。

“呜——”刺耳的防空警报突然拉响。

“明清，快走！去防空洞！”廖似光抛开眼前发生的一切，拉起何明清，冲出她和凯丰的住房。

天空中，贴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向廖似光、何明清所处的居民区俯冲下来。很明显，日军已经获悉中共长江局的所在地，派飞机来炸这片居民区，就是冲着中共长江局来的。眼看着日军炸弹兜头而下，从没见过轰炸场面的何明清吓得挣脱廖似光，撒腿就跑。

“明清，卧倒！快卧倒！”廖似光大叫一声，冲上前去，将何明清扑倒在地上。

“轰！”“轰！”“轰！”炸弹爆炸了，炸得整个地皮就像抽搐一样颤动。

被炸弹掀起的砖瓦、土块、人体、家什，先像裂岸的惊涛，冲天而起，紧接着铺天盖地，砸得地面像下了一场陨石雨。

硝烟在滚动，呛得人禁不住地咳嗽。

尘土在涌动，弥漫了整个居民区。

惊吓中，何明清以为自己被炸死了。

“明清！明清！……”有人在叫她，使劲地叫。何明清从昏迷中醒来，仔细一听，那是爸爸的声音。她这才知道自己没死。她惊喜万分地要回答爸爸，可任她怎么努力，也发不出声来，因为她上身压着一个沉重的躯体。

“似光！似光！……”有人在叫，使劲地叫，那也是爸爸的声音。

何明清感觉身上的物体动了一下。这一动，很显然是爸爸叫动的。不久，那物体又动了一下，并且发出低低的回应。何明清这才恢复了记忆，她记起自己倒地时是廖阿姨将她扑倒的，那身上压着的物体肯定就是廖阿姨。想到这里，何明清憋足全身力气，身子猛地向上一拱，就听得“哎哟”一声，压在她身上的物体被何明清掀在了一边。

何明清爬起掀倒，一看果真是廖似光。

廖似光脸上、手上全是血。

何明清扑在廖似光身上，大叫起来：“廖姨！廖姨！你醒醒！爸爸，廖姨在这里！……”

“明清！似光！……”凯丰急奔过来。

邓颖超、刘群先也闻讯奔了过来……

④

“明清，你没事吧？”廖似光问何明清。

何明清泣不成声说：“没事没事，廖姨！……”

在这一次轰炸中，日军的野蛮、粗暴和凶残，把何明清与廖似光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感情一下子加深了。廖似光奋不顾身地掩护何明清，使何明清亲身体会到了舐犊之情，亲身感受到这位红军母亲的慈爱之心。

到达重庆后的一天，廖似光将一套新八路军军装送到何明清手里。

何明清死活不肯接受。

廖似光问：“为什么不要？”

何明清指着廖似光身上的军装说：“你身上的衣服补丁压着补丁，我怎么好意思穿你的新衣服？”

廖似光说：“阿姨老了，穿旧一点没有关系。姑娘年轻一朵花，你现在是大姑娘，正是花样的季节，红花要用绿叶衬。穿上这身新衣服，你会让小后生们喜欢的。”

“廖姨！”何明清被说得脸红了起来。

廖似光把新军装给何明清换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又把军装脱下来：“这军装大了。我给你换套小点的。”说完，穿上衣服就出门。

后来，当何明清穿上合体的军装时，廖似光像欣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着何明清。何明清情不自禁地走近廖似光，感激地问：“廖姨，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廖似光把何明清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后，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廖似光说：“明清，我和你爸爸在上海生过一个孩子，在长征路上也生过一个孩子……”

听着廖阿姨对亲生骨肉深情的追忆和怀念，听着廖阿姨讲她和爸爸的革命经历和战斗生涯，何明清惊呆了。她这才知道，廖阿姨和爸爸这些年活得比爷爷、奶奶和妈妈还要艰险百倍。爸爸和廖阿姨是在做大事，爷爷和自己责怪父亲是不应该的。

凯丰不久前收到老家来信，信上说，孙氏不在人世了。

当凯丰把消息告诉何明清时，她为失去妈妈大哭了一场。

廖似光以慈爱之心安抚何明清说：“明清，我失去了两个孩子，你失去了妈妈，我们俩都是苦命人。可是老天爷有眼，把你和我安排到了你爸爸身边。今后我们就相依为命，我一定像亲妈妈一样对待你和你的淑英妹妹。”

何明清感激地看着廖似光，毫不怀疑地点头。

在延安大显身手

第九章

三十、协助领导整风运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凯丰和秦邦宪回延安。

凯丰离开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一职由董必武继任，秦邦宪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一职由孔原继任。

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五里处的山沟里。山沟的北坡上，从里到外挖了不少窑洞，南面是延河。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职工、妇女、青年等工作委员会都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就在这些窑洞里作息。凯丰和家人住在新挖的两孔窑洞里，离毛泽东所住的三孔窑洞很近。窑洞中的的陈设非常简单，就一张双人木板床和桌椅板凳。

一九四一年二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张闻天），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一九四一年七月，凯丰兼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④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了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至此，中共中央建立了以书记处工作会议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

王明在党内右倾或“左”倾的统治的结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定，为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扫清了障碍。

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张闻天曾多次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没有同意，仍然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的负责人。

张闻天很知趣，从那时开始，便渐渐地总负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凡是重大的事，都让毛泽东拍板。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他也有意地安排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张闻天让政治局成员众星拱月一样趋向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已经确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即在全党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是一次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运动。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一百二十多名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七月和八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两项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王明和秦邦宪等作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

治，比李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加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惨重。这是因为他们自称是‘国际路线’，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望了眼会场，心里充满喜悦，因为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听他报告。

毛泽东就希望看到这个效果。因为这次会议上，他要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定一个基调，否则，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会对自己的问题轻描淡写、遮遮掩掩。

毛泽东把脉看病一样，有理有据地分析主观主义的遗毒，认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是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在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毛泽东在指出问题的要害之后，立即提出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他说，首先要在理论上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一套彻底打碎；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要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任务，掌握思想教育是第一等业务；在延安要召开一个动员大会，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最后说：“两个主义要打倒，但是要把犯过错误的人留下。”

张闻天在毛泽东的报告后第一个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报告。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我党的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导致我党的损失与失败是非常惨重的。作为共产国际派回的中央领导，遵义会议之前我虽然没有负主要责任，但开始时我是米夫共产国际代表的真心拥戴者，唯他的马首是瞻。我要承担很重要的责任……”

秦邦宪也走上台去，作了检讨，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个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遵义会议前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是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跟稼祥、王明同志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对的，只不过我们是洋教条，李立三是土教条。我们是洋教条反土教条。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回了一些苏联社会

④

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之后，我才真正感到我在这个时期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根据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会议记录记载，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秦邦宪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还在作着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是怎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指向忠发被捕）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主义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也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到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了一推：‘请别的同志担任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在谈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时，秦邦宪说：“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了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秦邦宪很坦率地讲到个人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他说：“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

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绝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的最后一次。”

王稼祥、李维汉、任弼时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尽管不少同志做了自我批评，但在涉及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时，与会者的认识不统一，比较多的人并没有完全否定它。

特别是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中央握有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实际“一把手”，不但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讨，反而肯定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会上发言时，他振振有词地说：“……六届四中全会有错吗？简直笑话！那次会议至少反掉了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严重路线错误，这功劳还小吗？不反掉立三路线，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开会？……我看要检讨错误，应该检讨抗战以来中央路线的错误，这段时间来的路线才是错误的……”

毛泽东见王明顽固不化，就问：“王明同志，你说抗战以来的路线有错，请你说说它错在哪里？”

张闻天看不惯王明这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做派说：“对，王明同志，你说错在哪里？”

王明看了眼张闻天，不屑一顾地说：“我在这里说话方便吗？不方便！要说我们到共产国际去说，去斯大林同志那里去说。打官司就得到莫斯科去打！”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王明同志，你以为现在去共产国际打官司你还会赢？你这种态度非常有问题！”

“问题？”王明“噉”的一笑说，“我看你老毛才有问题！听一些同志讲，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要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到会的人是怎么表态的？多数人表示，同意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这结论就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你毛泽东那时难道没有表态？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位子坐稳了，要翻过去的老案？”

经王明这么一提，当年参加了沙窝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军事路线错误的同志就把目光投向了王明，认为王明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毛泽东没有想到王明会来这一手，会以这种手段吸引与会者的目光。

是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曾经发言，要彻底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

④

错误。可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承认，刘少奇当时提出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可见刘少奇确是个洞若观火的中央领导。可刘少奇刚从白区回来，对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注意到。毛泽东认为，在长征路上清算王明路线为时过早，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去触及决策中心的敏感问题，势必波及相当部分人，搞不好会闹出大乱子。在那时，只能谈军事路线，因为军事路线就涉及“三人团”里的三个人，而“三人团”还就是李德最顽固。提“三人团”的错误，大多数与会者都好接受。而解除“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也正是当时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否则，中央主力红军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触及政治路线，只说军事路线是错的。至于在沙窝会议上，为什么不同意张国焘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这是因为，如果同意张国焘所认为的中央政治路线失败了，那么，从江西来的人都有责任，“败军之将何言勇？”“成者王侯败者寇！”那样一来，中央领导就得拱手让位，就得让握有八万虎狼之师的“胜利者”张国焘来执掌中央最高领导权。

一句话，那时如果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错误，张国焘就是看着鹬蚌相争的渔翁！

现在，张国焘的问题已经解决，而六届四中全会的遗毒还在，正是清算的大好时机。王明这时以沙窝会议多数人形成的共识来做文章，不但暴露他对所犯错误不承担责任的恶劣态度，而且还暴露了他企望将一些跟他犯过同样错误的同志拉到他身边去的小伎俩。

毛泽东感到，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整风运动将成“鸭背上泼水”的态势。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王明同志，现在看，不帮你把错误的严重性认识清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建议，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时间要延长，不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决不收场！”

王明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有病，我要去医院治病，少陪！”说完，一扯衣摆，大摇大摆地向窑洞口走去。

张闻天大声提醒说：“王明同志，你别错上加错！”

王明很是不满地瞪了眼张闻天，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十一、提出整顿“三风”

一九四二年一月，张闻天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主动要求担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团长，带队前往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张闻天这时的请求，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因此获得毛泽东的批准。

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到陕北的神符、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几十个村子，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调查工作之细微，到了对牲口拉出的粪便的组成成分都进行了细致分析的程度。

张闻天的离开是明智的。

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工作的侧重点一直在党的理论宣传方面。王明倒台后，张闻天在党内，就依旧存在共产国际的潜在影响，尤其是洋理论方面的影响，他不走，不利于毛泽东放手领导整风运动。张闻天曾听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过人。毛泽东说，一切听任共产国际的就是洋教条；“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连肥田都肥不了”。张闻天认为，毛泽东想通过整风运动，把党的思想统一在他的“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做法是正确的。

张闻天走后，凯丰代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能在张闻天走后担任宣传部部长，这与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深刻、宣传工作经验丰富、文化教育行家里手有关。而更主要的是，遵义会议之后，他在参与一系列党的重大决策时，都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践行了自己在遵义会议后威信会议上“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的承诺和誓言。

漫长的冬天已经快走到尽头。

但黄土高原上延安城的山顶、洼地，依旧残留着冰碴和雪团。寒冷的风从西北方刮过来，直灌人的领口和袖管，冷得叫人直打寒噤。

凯丰戴着棉帽，穿着棉衣棉裤，走上刚刚建成还没来得及粉刷的中央大会堂的舞台上。

舞台上立着一个讲台，讲台刚做好，还没来得及油漆，非常白。

作为会议主持人，凯丰望了眼整个会场。

会场坐满了人，呈现一片灰蓝色，与会者全穿着八路军军服。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坐在最前排。他们的左右和背后，簇拥着延安所有的军队、地方干部。

中央宣传部三位同志在忙着发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叫《宣传指南》。这是凯丰根据整风运动的需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加班加点赶写出来的。

凯丰觉得军服风纪扣有些紧，加上走进会场后，人气很旺，并不觉得冷，他解开风纪扣，清了下嗓子说：“同志们，一个星期前，也就是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那个报告，等于宣布我们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二月八日，我们还得请毛泽东同志作一个重要报告。这个报告连同《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是指导我们进行整风的重要文件，请大家认真做好笔记……下面欢迎泽东同志给我们作报告。”

在与会者的掌声中，毛泽东拿着一沓讲稿走上讲台。

凯丰将讲台后的那把木椅子送到毛泽东的身后面，小声说：“请坐吧。”

毛泽东笑着向凯丰点了点头，以示谢意。坐定之后，他点燃一支烟，将启封的那盒烟连同火柴丢到讲台上，用手在上面点了点说：“哪个同志想吃烟，就到我的烟盒里来拿。我这个人不怕烟熏，不怕火烤，地道一个湖南蛮子啊。”

“哈……”会场里响起了开心的笑声。

毛泽东向大家摇了摇手，开始他的报告：“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者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毛泽东给党八股列举了八大罪状后，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

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对凯丰组织宣传部编写的《宣传指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 and 情绪。’……”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了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几条来说一说。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写小说。’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那天，凯丰坐在听众中间，认真听了毛泽东作这场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连同二月一日那场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凯丰由衷地赞叹和佩服毛泽东，赞叹和佩服毛泽东在报告中言语的生动活泼，道理的深入浅出，逻辑的严谨缜密。会场上不时发出一阵阵会心的笑声，爆出一阵阵掌声。笑声和掌声是对毛泽

④

东由衷的赞颂与诚服，是由衷的景仰与拥戴。遵义会议以前，凯丰和苏联回来的同志对毛泽东是那样的不屑一顾，把他看做“山大王”，是那样地认为他不懂马列主义。现在看来，真正无知的是自己，是那些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的同志。凯丰认为，他和那些苏联回来的同志才是幼稚可笑的，才是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在列举党八股的八条罪状时，言简意赅，直指要害。他在列举第二条罪状时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毛泽东报告后，凯丰宣布：延安整风运动现在全面展开。并对如何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如何去掉自己身上的“党八股”，向到会者提了要求。

这次大会之后，凯丰通过认真领会毛泽东的两个报告精神，联系党内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实际，经深思熟虑后，向中央提出了中央宣传部目前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的整风建议。这一建议因为概括得准确、全面、切合实际，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认可和批准。因此，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按照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内容进行的。

“整顿三风”的提法，是凯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大贡献。

中央宣传部在整风全面铺开的阶段中，担负着对整风学习的具体组织和指导、担负着制订学习计划、编印学习文件和进行结业考试等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宣传部在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干部大会。凯丰在会上进行整风学习动员。六月八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的指示》，指出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万多干部，要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发扬“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通过激烈的毫不留情又与人为善的思想交锋，经过心灵深处巨大的阵痛，才能卸掉包袱，解放思想，挣脱本本主义的锁链，完成一次思想飞跃和升华。

三月十六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连

成一气，反映党的工作。

四月三日，中宣部又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学习文件和学习检查，作出明确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二十二个必读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地进行。

为了更好地领导整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成立了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是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在成立会上，毛泽东笑着对走进窑洞的凯丰、陈云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嘛。”

六月二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总学习委员会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合并，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三十二、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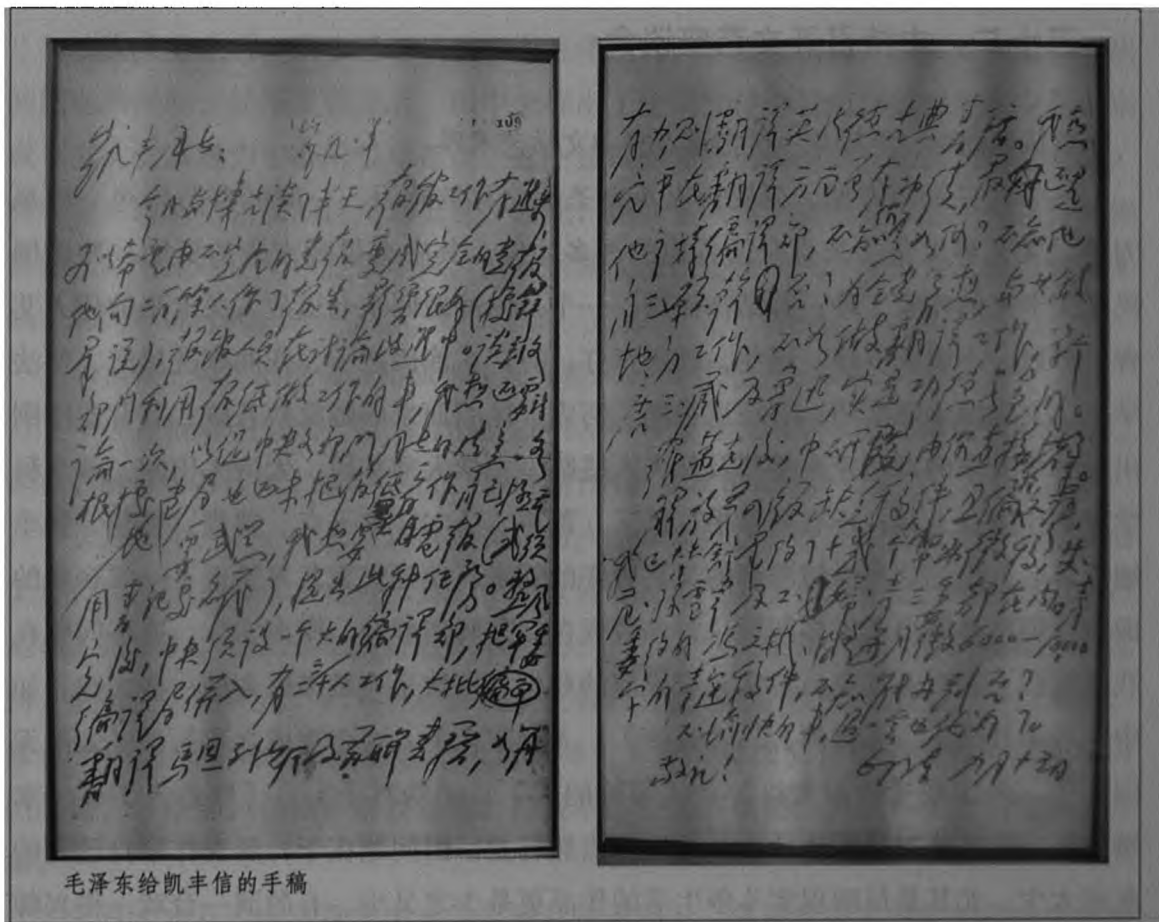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度把重点投向文学艺术界。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延安因有革命圣地之称的感召，一时间群贤毕至、群星闪耀，文艺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才俊。其中有得到宋庆龄资助、冲破国民党关卡来的作家丁玲；有结伴而行、一个月内冲破四十七道敌人关卡来的诗人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逯斐，画家张仃；有广东渔民之子、作曲家冼星海，留法学生、文学博士陈学昭；有绕道香港、河内、昆明而来的画家蔡若虹；有背着刚刚出生的小女来的舞蹈家吴晓邦及其夫人盛婕，文学大师茅盾，大诗人田间，著名科学家和作家高士其；还有柯仲平、萧三、萧军、公木、朱子奇、魏巍、鲁藜、张季纯等著名人士。这些激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到来，使延安文艺界呈现了一派崭新的面貌。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表现在文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些问题在戏剧舞台上表现尤其突出。文艺家导演的戏，大多数是大城市搬来的一些大戏，如中国戏《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钦差大臣》、《带枪的人》、《伪君子》、《悭吝人》、《求婚》等。这些戏对活跃生活、开阔视野当然有益，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尤其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有的演一台戏，得兴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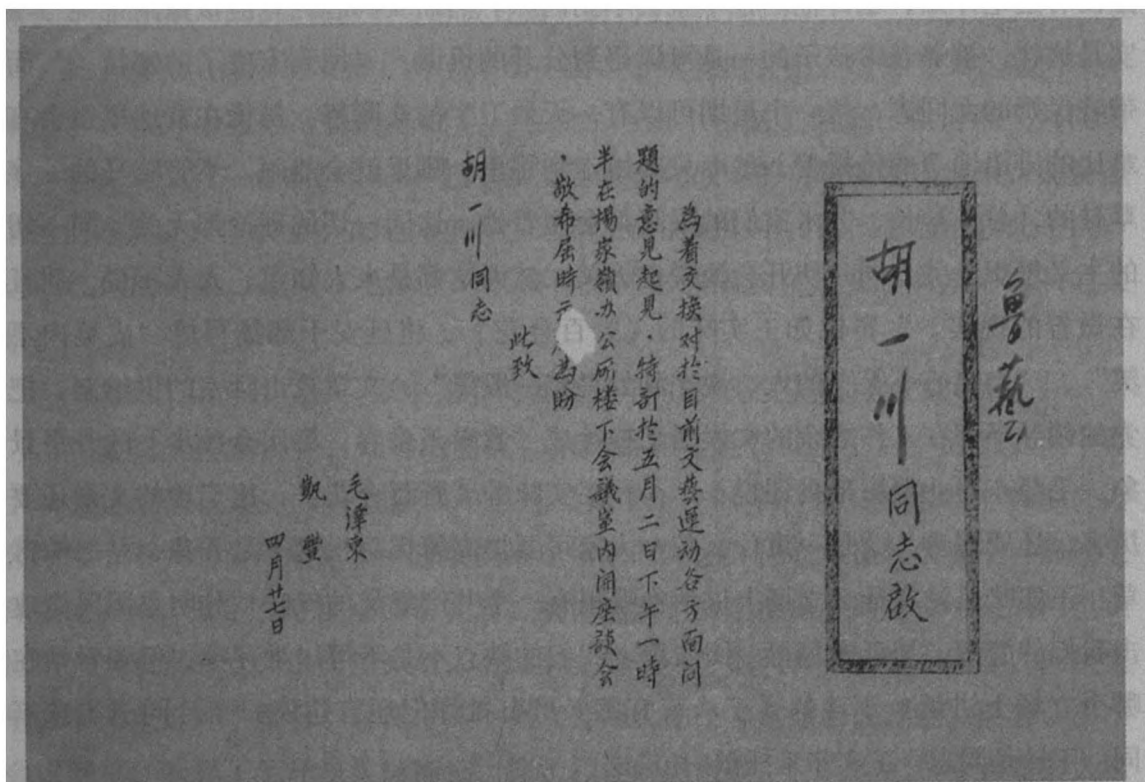
凯丰

④

动众，道具要装几汽车，严重脱离延安实际。其次是闭门造车，学用脱节。鲁艺教员周立波回忆当时情景说：“鲁艺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是农民的场院，我们与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一井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和农民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再是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对工农兵不熟，也不了解他们，只好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找朋友。有人主张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更为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领导与下级、长官与伙夫的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导致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结果。比如，



毛泽东给凯丰信的手稿



毛泽东与凯丰联名发出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



被毛泽东诗赞“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丁玲，在描写延安妇女生活的《三八节有感》中写道：“……她们都得生孩子。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

④

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给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是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带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的主义思想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再比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延安干部描写成“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的人，说“到处乌鸦一般黑”；文章攻击延安的供给制，把党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的文艺活动描绘成“歌啜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毛泽东对此严厉地批评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比丁玲的文章还要厉害，还要恶毒，这是一束什么花？大家可要提高警惕啊！这不是香花，是一株毒草！王实味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哪里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味！分明是国民党攻击我们的腔调，把延安写得一团漆黑。我们的缺点不是不可以批评嘛，但要看站在哪个立场上讲话？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把“笔杆子”视同“枪杆子”一样重要，决定把延安的文艺风气扭转过来。

那天，毛泽东来到凯丰的窑洞，与他商量解决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思想混乱的问题。毛泽东把一本国民党特务机关编成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放在凯丰面前，指着说：“凯丰同志，看看吧，这就是王实味等人的‘杰作’！”

凯丰拿起小册子，看了下小册子前面加上的编者按。编者按说：“延安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到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毛泽东说：“国民党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来攻击我们。”

凯丰点了点头说：“是啊，我这里就有一本，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在整风运动中，凯丰担负着对中央文委系统和延安学校（中央研究院和鲁迅艺术学院）整风运动具体指导的重担，这时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在总学委副主任康生的指导下，延安批斗王实味的会议不断升级。王实

味被开除党籍。丁玲则被撤销《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职务。

凯丰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与毛泽东一道，分别找柯仲平、舒群等艺术家们一一谈话。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毛泽东与凯丰印制了请柬，在请柬上共同署名，向在延安的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发出请柬，盛情邀请他们参加文艺座谈会。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发出的请柬中，共同署名的仅此一次。这些红色的请柬，记录了毛泽东与凯丰作为同志和战友在延安时期亲密无间的关系。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举行。

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的盛况，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凳上，静候毛泽东的到来。来了，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的宿舍一头的门里走出来。大家都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一一与他们握手，互相问候。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发表重要讲话时，从远方隐隐传来国民党军队的炮声……”

座谈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

在五月二日的会上，毛泽东紧握着为《八路军进行曲》作词的公木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会上，朱德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的观点，鲁迅是革命的、没有什么转变的观点，以及鲁迅从来不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这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转变立场的问题，他说：

④

“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我是一个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了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党。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

毛泽东五月二十三日以《结论》为题目，为座谈会作总结时，说：

“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的话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当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

一九四三年五月，《解放日报》刊载的一篇通讯评价这次会议说：“……抗战以后，许多作家都提出了文艺入伍、文艺下乡的口号，也有不少实际行动了，比以前是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些行动多半还是浮在表面，就连在延安和华北华中抗日前线的许多作家，对于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作家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目的，也还是没有能真正达到。这种情形的显著表现，就是他们的许多作品，还不能写出群众的真实面目和真实感情，有的则简直是把群众写歪了。这是因为这部分作家虽然自己以为已经完全用了工农的新眼睛看世界，其实却还在常常袭用着小资产阶级的旧眼睛看世界的缘故。去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和凯丰同志召集延安党内外文艺界同志开了三次文艺议会才把这个矛盾从思想上解决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为促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为了确保文艺运动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的新方向前进，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中央文委还专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在延安的五十多名从事文艺工作

的党员出席了会议。凯丰、陈云、刘少奇、秦邦宪等讲了话。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说：“在这个会上，凯丰同志和陈云同志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应该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刘少奇同志勉励大家到几个最好的学校里去长期学习。这次会对到会同志影响极大，对实现毛泽东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新方向，可说有决定的作用。”

在这两次会议之后，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去前线。萧三、艾青、塞克去了南泥湾，陈荒煤去了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到村里和连队，高原、柳青去了陇东，丁玲去了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和前线。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生活，与军民打成一片，鲁艺师生率先推出了歌剧《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看了之后，都觉得耳目一新。周而复、黄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非常大。此后，《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等作品催人泪下，以至于在《白毛女》演出时，有战士因被戏剧感染，把扮演大恶霸的演员陈强误当做现实中的恶霸，当场举枪，朝戏台上射击，差点将陈强打死。

在繁忙的工作中，凯丰经常以面谈和书信方式，向毛泽东请示或一起研究工作。在研究党报的办刊方针和编译工作中，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给凯丰写了《致何凯丰》的一封信，信中说：

“凯丰同志：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领导。

“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部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

④

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毛泽东亲自为凯丰起草了第四版的征稿办法：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此外并作图画。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五千字。王震元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

在这时期，凯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撰写了《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翻译了一批马列主义文献，满足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急需。

凯丰对教育工作极为重视，经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他还为抗日军政大学写了校歌。

毛泽东对凯丰送来的歌词给予了高度评价：“写得不错！它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歌词中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后来被毛泽东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作风。

这首歌的歌词是：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努力工作、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

歌词配上吕骥创作的激越、雄浑、催人奋进的曲调，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担承民族解放的责任，发奋学习、英勇杀敌。

凯丰在抗大创作这首歌词时，教室里学员们端坐正听，操场上学员们步伐坚定，射击场上枪炮声此起彼伏，旷野操战法虎跃龙腾……凯丰受“红埔”（时有国民党有“黄埔学校”、共产党有“红埔学校”之说）生龙活虎气氛所感染和激励，一挥而就就将这首歌写成。

在这之前，当南京沦陷在日寇铁蹄下后，凯丰还写下了《保卫南京》的歌词。歌词是：

我们的首都，
正在危急之中，
同胞们，
快快动员起来，
武装起来，
保卫南京！
实现全面的抗战，
全民族的抗战，
这是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驱逐日寇出中国，
把我们的首都，
搬回南京！

把我们的首都，
搬回南京！

这首歌词也是吕骥谱曲。歌曲朗朗上口，便于普及，很快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对中华民族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三十三、提出宣传毛泽东主义

整风运动结束前的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这一决定，“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政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加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这一天，结束了张闻天自遵义会议以来长达九年之久的中共中央总负责的职务。会上，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

会议《决定》还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一九四三年，既是毛泽东集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书记处主席于一身的一年，也是他诞辰五十周年的纪念年。

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一百余年的革命斗争和自己政党二十年的革命斗争，已经具备了产生自己的正确理论的条件。但这个理论如何提出，怎么命名，还没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理论工作者张心如和《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相继提出“毛泽东主义”，认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之后，党内一些同志要求在毛泽东五十岁生日时为他祝寿，并要求宣传毛泽东主义。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顺应大多数同志们的愿望，专门写信向毛泽东提出了宣传毛泽东主义的请示。

但在这之前，犯过“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暗地里却反对提“毛泽东主义”。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凯丰给他写信前的一次中央党校会上发言说，这不是

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对于宣传他的思想，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给凯丰回了信：

凯丰同志：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结。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中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尽管凯丰建议“宣传毛泽东主义”在当时没被采纳，但为当年七月五日由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四十四名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朱德代表党中央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十二个大字写在会场上，以党内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将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曾经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仍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任弼时成为中共五人领导核心之

④

一，张闻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当选为中央委员，王明称病不参加会议仍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后，毛泽东提议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结果成为候补中央委员。

这次会议，凯丰没有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他只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其实，在大会召开前，毛泽东是建议凯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他让凯丰在会上发言，对过去所犯错误再一次检讨，以求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替凯丰做了解释工作。在五月二十四日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的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尽管凯丰的名字上了中央委员参选名单，最后还是落选了。

伍修权在《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中记述七大召开时的情景说：“记得我没有参加小组会，只参加了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我发了一次言，就是讲遵义会议时凯丰同志的问题。我见原来提名他为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讲了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他当时是顽固地抵制遵义会议决议的，我认为他不宜参加新的中央委员会。后来的中央委员名单中果然没有他了，也许当时还有别人提了这个意见。”

对于凯丰的落选，毛泽东颇感惋惜和无奈，为此，专门去凯丰住处作解释。

凯丰的勤务员吴德明，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毛主席来凯丰同志家里时，凯丰同志赶紧为毛泽东让座。记得那是一张躺椅。毛泽东坐上去后，凯丰搬了个马扎子，坐在毛主席面前，他们面对面，谈得很轻松、愉快。凯丰的表情展示了他能正确对待七大落选的事。”

凯丰坦然面对选举结果，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凯丰认为，自己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很自然的事。王稼祥虽在遵义会议前犯过错误，但在遵义会议上，他站在正确立场上，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后来，他从苏联回来，如实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确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像他这样的同志都落选了中央委员，后来通过做工作才选上候补中央委员，自己没进入中央委员会算得了

什么。吴德明回忆说：“……七大召开前，凯丰生病住院。七大闭幕后，凯丰身体好了一些，常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前的枣树下，认真学习大会文件，还不时做着笔记。特别是对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更是反复地阅读，认真领会精神实质。”

凯丰的优秀政治品质使他不计个人得失，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他依旧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着。

三十四、婚变风波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广泛宣传，以及国内外许多进步媒体的热情推介，使成立二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力愈加广泛和深入。她的政治主张越来越被人民所接受，她的民族脊梁形象已树立在广大人民的面前，加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的形成，延安成为很多进步人士和热血青年共同向往的地方。

凯丰、廖似光、何明清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不久，一个二十岁的女子悄然来到凯丰身边。这女子叫房月明（到延安不久改名为王茜）。

王茜是山西平定县人。父亲是县城很有名望的教师。书香门第加上教子有方，房老先生的女儿王茜和一个儿子都考上了国内名牌大学。

王茜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

北京沦陷后，王茜辗转来到延安，在陕北公校续读。

陕北公学设在枣园后沟。它的校门前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相继办起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妇女学校、青年学校、陕北公学等一批学校。陕北公学主要接收从沦陷区来的大学生和青年，帮他们完成学业，进行专业培训。在这里学习和培训的学生、青年，均被中共中央社会部进行秘密的政治审查。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初，丁玲九十高龄的丈夫陈明向采访者披露：“当时，为了便于学员将来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学校对全体学员都进行编号。组织规定，不准教员、学员之间互称名字，只准叫每人的号数。号数代表名字，上课点名也是这样。”

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成仿吾参加过长征，是著名的教育家。王茜在公学

廖似光今天一改星期六回家的习惯。

昨天才离家的她今天来个突然“查岗”。

面对廖似光，凯丰和王茜惊呆了。

“好亲热嘛！”廖似光冷冷地盯着凯丰和王茜说，“怎么不继续亲热下去？”

凯丰忙作解释说：“似光，你别误会，听我说……”

廖似光怒目相向说：“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廖大姐，我跟……凯丰同志……只是工作上的关系，真的……没什么……大姐……”王茜身着月白色紧身衬衣和黑色裙子，廖似光身裹着蓝灰色八路服装，腰扎牛皮带。一文一武，一民一军，一个小知青一个老红军，王茜像羊羔见了虎，浑身禁不住地战栗起来。

廖似光冷冷一笑，只见她右手一伸，将藏在袖筒中的小刀抽出，对着王茜的右眼就刺。

王茜见状，身子往后一仰，刀没有刺中眼睛，却刺在右眼上的眉毛中。顿时，王茜脸上鲜血直流。

“吴德明，刘占武，快来！”凯丰一见突发事件，奋力上前，一把抓住廖似光握刀子的手。

廖似光用力一抽，刀子将凯丰的手掌猛地划破，鲜血流了出来。

吴德明、刘占武听到凯丰的招呼，冲进窑洞。

窑洞中发生的一切让他们惊呆了。

吴德明一点也没想到，廖似光会拿刀子刺人。吴德明在二〇〇六年写的《在凯丰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回忆中，是这样记述廖似光的：“廖似光同志对人也和气，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关心，她看我没有换洗的衣服，就送给我几件衣服；见我睡觉的木板床只铺一条毡子，还给我弄一条褥子；我扫地有灰尘，就给我一个口罩。与此同时，她还教我怎样洗衣服，并督促我学习文化。”面对今天的廖似光，吴德明根本不敢相认。他叫了声“大姐”，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

“似光同志！”刘占武一手抓住廖似光的右手，另一只手迅速将廖似光的刀子夺下。

“大姐，你冷静点……”廖似光被吴德明和刘占武架着，推出了窑洞。

凯丰右手捂着王茜的伤口，左手搀着王茜快步往朱仲丽的卫生所奔去。

朱仲丽是王稼祥的爱人，此时担任中央机关卫生所的所长。

廖似光刺伤王茜的消息迅速在中央机关里传开了。

廖似光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面对廖似光告状，犯了大难。

四年前，毛泽东遭遇过与贺子珍的婚变。

年轻美貌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后，使延安的跳舞之风掀起高潮。史沫特莱经常在王家坪桃园举办交际舞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贺龙、林彪、徐海东、左权、萧克等是那里的常客，毛泽东则是史沫特莱经常邀请的舞伴。时间一长，史沫特莱还把艳丽的英语翻译吴莉莉介绍给毛泽东，让她陪毛泽东跳舞。美国女性格外开放，除了跳舞，史沫特莱和吴莉莉还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她们的住房讨论时局。由于双方对世界政治局势看法一致，往往一谈就到深更半夜，甚至一个通宵。邓颖超、刘英、朱仲丽等对待丈夫的“舞瘾”不但不予以制止，而且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并主动参与进去。

贺子珍出生在井冈山下的小镇永新，对都市现代生活不能接受。她不允许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吴莉莉搂搂抱抱，更不容毛泽东“夜不归宿”。一天深夜，贺子珍来到史沫特莱的住处，一把推开毛泽东的勤务员小贺，闯进史沫特莱的窑洞，将正跟毛泽东和史沫特莱交谈当翻译的吴莉莉打了。史沫特莱看不下去，扬起巴掌打了一下贺子珍。为此，贺子珍与毛泽东彻底闹僵。贺子珍不听毛泽东和很多中央领导的劝解，执意离开延安，后来去了苏联治病。

“清官难当家务事”，毛泽东面对又一个中央领导的婚变，感觉不便亲自出面处理，于是好言安慰一阵廖似光之后，请王稼祥去做凯丰的工作。

凯丰经历过父母包办婚姻在所思所想上的差距，又尝试过地下工作身不由己的特殊婚姻。作为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作为思想观念相当前卫的领导干部，凯丰渴望人生能有一次自由婚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认为裴多菲说得好。

他没有接受王稼祥的劝阻，坚持要跟廖似光解除婚姻关系。

鉴于廖似光不同意离婚，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认为，中央领导应当碰一次头，妥善处理好这件事。

④

碰头会上，有同志从维持凯、廖夫妻关系，以免事态扩大造成不良的后果出发，建议采取组织措施，将王茜调离中宣部，安排去百里远的绥德工作。

有的领导不同意，认为共产党人得有婚姻自由。

有的领导主张给予组织处分。

毛泽东见众口不一，而陈云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表态，就征求他的意见说：“陈云同志，你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你说，该怎么办？”

陈云笑了笑，眯着眼，用浓浓的上海音普通话说说：“我说？……那我就表个态吧。王茜还是个女孩子，从北平名牌大学来到延安这个大山沟子，千里迢迢的，人生地不熟，已经很难。如果为了这件事，把她调到绥德那么远的地方去，会使一些已经在延安、或者想来延安的同志，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人之常情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间的隔阂。这样不利于我们队伍的壮大。但是，如果不对这件事有所表示，又不好向廖似光同志交代。这样行不行，泽东同志，王茜同志不调那么远，就放在甘泉县，让她在县政府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不再说话，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一踏说：“捆绑做不成夫妻，就按陈云同志说的，王茜调甘泉县。”

当年七月，王茜去了甘泉县政府。

然而，两地分居的生活，并没有阻隔凯丰跟王茜的感情。忙碌的工作间隙，他们多有书信来往。

廖似光见凯丰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心要跟她解除关系，一天，她对何明清说：“明清，你爸爸怎么会这样对待我？”

已经十六岁的何明清，当然懂得男女间谈情说爱的事理，但不好介入父亲的选择，只知道廖似光舍身救过自己，只知道王茜很有文化、很有女性柔情，因此只能说：“廖阿姨，我不知道。”

廖似光不肯罢休，审视着何明清，很想从何明清的眼睛里看到坚留她在凯丰身边的眼色。廖似光问：“明清，要是让你在我跟王茜中间选一个母亲，你会选哪个？”

何明清大眼睛忽闪一下，欲言又止，最后低垂下长长的睫毛，很是为难地说：“廖阿姨，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廖似光大失所望地把头低下，不久又大“唉”一声昂起头，呆呆注视着窑洞顶

上的白石灰，泪水像涌泉一般流了出来。

“伤什么心嘛，花有蝶，石有苔，天下女人不愁没有男人。大度一些，给凯丰一个自由吧。”说话的是康克清。她迈着大步，走进窑洞，安慰廖似光。

“大姐，我心里像刀绞一样痛啊！……”廖似光委屈得双手握拳，擂鼓一样一下又一下地擂在桌上，放声大哭起来。

康克清走到廖似光身边，抚着她的背部说：“凯丰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你要学文化，没时间照顾家里。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你跟凯丰同志各自的事业，好合好散吧，我的好妹子。”

毛泽东对凯丰与廖似光的离异，采取了尊重自由选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最后说的“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的话，应该是对凯丰与廖似光婚变事件顺其自然所表的态度。这句话，并不像有的同志认为的，是毛泽东在安慰遵义会议上犯了错误的凯丰。想想看，遵义会议距一九四二年已经八年，毛泽东不可能在这封很平常的信里旧事重提，揭凯丰的伤痛。况且毛泽东与凯丰那时已经亲密无间。而毛泽东给凯丰写这封信时，正是凯丰跟廖似光闹离婚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位全程走完长征的老红军女干部之一的廖似光，担任过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工交委书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二〇〇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七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费侃如同志专程赴广州，在廖似光家里进行了专访。廖似光不记与凯丰分手时的不快，依旧给凯丰比较客观的评价。鉴于当时解放思想运动才开始，廖似光没有更多谈及和凯丰相处多年的工作生活细节，致使这篇传记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一九四三年的七月，王茜调回到延安，与凯丰结婚，继续在中宣部工作。

吴德明回忆说，那时在延安，干部离婚、结婚，没有什么结婚登记和结婚证明书，只要组织上同意，就可以成为夫妻。

一九四四年，王茜为凯丰生了第一个儿子，起名何明。又过了一年，第二个儿子出生，起名何亮。加上女儿何明清、何淑英，由此可以看出，凯丰通过给儿女们起名，真心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清白、英勇、明朗、响亮，这与他爷爷当年给三个孙子起名希望他们“万、全、贤”一样，对后代都寄予了殷切期待。

何明、何亮的出生，使凯丰在延安的家除了妻子王茜、女儿何明清、儿子何明

④

与何亮、勤务员吴德明、警卫员刘占武外，又增加了另一个人——保姆韩玉霞。

韩玉霞，河北抚平人，来凯丰家时十六岁，比何明清还小两岁。

同韩玉霞一起来延安的女子共二十人，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选定。为了确保中央首长安全，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审查程序。二十名女子到达延安后，又从她们中间选四个政治上最可靠的女子，给中央领导的孩子当保姆。韩玉霞是四人中的一人。其余十六名女子送到保育院带孩子。韩玉霞来延安时叫韩玉果。王茜认为这名字不雅致，叫她改成韩玉霞。韩玉霞欣然接受改名。王茜见韩玉霞不识字，就给她买铅笔、纸张，手把手地教她写字、识字。到一九四六年九月，经王茜介绍、凯丰证婚，吴德明和韩玉霞结为了夫妻。

据吴德明、韩玉霞夫妇二〇〇七年初冬回忆，尽管那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但分大、中、小灶吃饭。大灶一般工作人员吃，中灶处长以上干部吃，小灶部长以上领导吃。说是小灶，也只是隔三岔五可以分配一点牛羊肉和鸡蛋，平时一律以土豆、萝卜、白菜和瓜类为主菜。生活十分艰苦，穿着格外朴素。

东北的紧张岁月

第十章

三十五、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神州大地，狂欢相庆。街头的鞭炮全卖光了，商店的酒水大都脱销。苦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终于脱离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恐怖和苦难生活，脸上绽开了胜利者的欢笑。

额手称庆之际，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一架绿色军用飞机离开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抗战胜利后的和平谈判。

谈判成了马拉松式的对话，双方在军队编制、政府组建方案上讨价还价，争来论去。

在重庆，毛泽东步履匆匆，白天频繁接待来客，登门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晚上则与周恩来、王若飞守在电台旁，与延安交换情报，磋商问题。

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较量之际，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悄悄调动，开始向东北大举进军。

进军东北，绝不是中共中央的临时决定，而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不少延安干部说，当年的北洋政府背后有天津，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背后有上海，我们共产党的背后有人民做靠山的同时，必须有一个现代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做人力、物资基地。

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强调：“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毛泽东之所以盯住东北，就因为这个地区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四百万，有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交通便利，地理位置特殊，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更为重要的是，东北原来属张作霖统治，后被日本侵占，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谁捷足先登，谁就取得夺取天下的主动权。

毛泽东去重庆时，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刘少奇在窑洞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原来，曾克林部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攻下了由日军残部把守的山海关，先期进入沈阳。部队驻扎下来不久，曾克林即坐苏军飞机飞回延安，向中央紧急汇报沈阳的现状。

曾克林的汇报，使中央领导个个惊喜、兴奋不已，他们被那里的大好局势感召着，只想立即奔向东北、奔向革命急需的新根据地。

曾克林见中央领导如此关注自己，更加绘声绘色地报告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武器和物资，而且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可以随便拿走。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出进。在东北扩军很容易。他

前头进到沈阳的四个连，一个礼拜就扩大到四千人，还收编了一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进驻沈阳的部队已经看住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

那是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

那是改天换地必备的资源啊！

听完曾克林的汇报后，中央领导当晚继续开会。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随苏军飞机飞往沈阳。

会议明确规定：“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会上，张闻天、李富春、高岗、凯丰纷纷要求去东北工作。

凯丰说：“我在苏联留过学，会说俄语，也懂得怎样跟苏联人打交道。”

会后，彭真带领第一批干部，陈云带领第二批干部，先后开赴东北。

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作了专门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东北的战略作了大幅度调整。为了建立统一的东北军事指挥部，十月三十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命令，同意东北局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决定：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同时为开辟东北后方工作，决定组织东北局北满分局，以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为加强东北局的工作，决定再增加几位领导干部由延安去东北。

听说要增派领导去东北，凯丰找到毛泽东，要求前往。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凯丰，给他让座，并将两盒东西送给凯丰。毛泽东指着盒子上的英文字说：“你的老肺病该好好治疗了。这是我从重庆带回来的药，美国货，听说疗效很好。”

毛泽东在重庆日理万机，还惦记着凯丰的肺病，这使凯丰格外感激。

毛泽东把凯丰送回椅子上，给凯丰递上烟，点上火说：“你跟我一样，都有个坏毛病，喜欢吞云吐雾。这嗜好不改，迟早会被烟草要了命去的。”

凯丰感慨地说：“是啊，我戒过很多次，就是戒不掉，几个指头都熏成焙肉色

④

了。”凯丰把手指伸向毛泽东。

毛泽东情不自禁，也把手伸出来，两人相互看了一下，自嘲地仰面大笑起来。

毛泽东说：“在重庆那段时间，整日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操心费力，口干舌燥，身体都拖垮了。刚才医院催促我，叫我去住院治疗，看样子，这回不去是不行的了。这样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去医院，把身上的零部件好好修理一下？你那病不治不行，夺取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建设人民的新中国，等着我们有副好身板啊。”

凯丰说：“泽东同志，前段时间我住过院，养精蓄锐，现在就想把全身的能量释放出去。这次给东北增派干部，就让我去吧。在彭真同志去东北后，我组织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对眼下东北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写成了材料，供中央决策时参考。”说完，把亲自写好的材料送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看了下材料，非常高兴地说：“好。我们过去对东北研究不够，你这是给我送了及时雨啊。这材料我得好好看一看。”说完问：“东北局确实需要加强力量，可你有病，那里的气候你吃得消吗？”

凯丰说：“怎么吃不消？长征路上，行军作战条件那么恶劣，天气变幻那么无常，我不过来了嘛，不碍事。”

毛泽东经不起凯丰的强烈要求，同意他跟李富春、张闻天、高岗，以及原八路军五师代师长陈光等二十名高级干部一道，一同前去东北。凯丰走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由王明接替。据吴德明回忆说：“在等飞机赴东北的空闲时间，凯丰还帮助曹靖华同志翻译着俄文书籍。”

十一月一日，凯丰一行乘坐美军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太行山，再转东北，与先期到达沈阳的彭真、陈云会合。

先期到达沈阳的彭真，将中共中央东北局设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里。

十一月上旬，凯丰到达山海关，立即着手创办我党在东北的第一份党报——《东北日报》。

东北局领导进入东北后，发现沈阳的形势并不像曾克林表述的那样好，相反，还十分严峻，因为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斯大林许诺：东北、新疆主权回归中国；苏联保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让中国共产党人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十月十六日，国民党军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由新任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

挥，攻占了山海关，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国民党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面对山雨欲来的急迫形势，不得不兵分三路，仓促撤出沈阳。

凯丰和高岗、张闻天奉命去了长春。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凯丰随部队刚刚在长春安顿下来，就为长春的解放撰写了《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长春而奋斗》的社论。社论在长春广播电台里反复播出：

当东北民主联军清除了盘踞长春市为害人民的汉奸、土匪、日本人及铁石部队后，长春市八十万人民又开始呼吸到了和平、民主、自由的空气，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回想十四年来在国民党当局的“睦邻友好”和“不抵抗政策”下，长春市的八十万同胞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过的是“出荷”、“劳工”、“经济犯”、“思想犯”饥寒、鞭打、牢狱和亡国奴的生活……民主联军应长春人民之请求，进入长春后，长春之气象又为之一新。今天的长春已经生活在和平、民主、自由的空气中了。今天的长春又摆脱了黑暗、独裁伪匪的统治，正向着建设新长春、和平民主自由的新长春前进。要建设一个新的长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全长春人民的努力是办不到的。放在今天长春全体人民身上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只有长春全体人民一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担负这一严重的任务。因此全长春的人民，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首先要做到下列几件事情：（一）全长春的工人、贫民、市民、学生、青年、知识界、职业界、工商界、妇女等等必须立即动员进来，组织起来，肃清敌伪残余势力，铲除敌伪势力，巩固人民力量，建立人民的秩序。（二）全长春市必须由长春人民自己来管理，实行民主选举，实行地方自治，选出为人民办事的代表，撤除压迫敲诈人民的官吏，没收敌伪财产，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全长春人民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迅速完全恢复市政、交通，恢复商业、工业，恢复学校。（四）全长春人民必须认识，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是不会轻易得来的。在我们前面还有严重的困难，还有严重的战斗，因为国内法西斯反动分子还没有放弃内战计

划，还没有放下他们的屠刀，他们还在向东北进攻，还在向长春进攻。我们要保卫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就必须动员全长春人民的力量，帮助民主联军，支援前线，击败法西斯反动派的进攻。我们是有这种力量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是能够保卫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的。

但是，占领长春不到两个月，迫于全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往哈尔滨。

凯丰秘书李士彬后来回忆，撤离长春那天，情况非常紧急、仓促。“我们进长春后，事情很多，干部又少，凯丰同志派我去接收广播电台（这是伪满洲国的电台），另外还从新华社派林超同志去管机务。机务在郊外，编辑部在斯大林广场，其他都是敌伪人员。突然一天中午，凯丰同志给我来电话，要我十二点前撤退，并要我物色几个能干的广播员一起带走。我理解成明天十二点前撤退（其实是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前撤出）。因时局关系，当时很多广播员没有上班，我说我去找一找。凯丰同志听后有些急了。说今天晚上就要撤退，来不及去找人了。这件事情说明，凯丰同志对干部很关心，在很紧张的形势下，他其实用不着亲自打电话，派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说实在的，要不是凯丰同志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我就做了国民党军的俘虏。”

北满是大东北的大后方，背靠苏联。

东北局北满分局的设立，反映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实践证明，它的设立对后来全东北的解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因为在重庆谈判中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

鉴于东北严峻的形势，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彭真：“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刘少奇还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电告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彭（真）林（彪）电：十一月十九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蒋，有（苏联）红军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此后成了东北方面的战略方针。

接下来，陈云给中央和东北局发出电报，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占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林彪、罗荣桓综合东北的现状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建议中央和东北局“对东北斗争须作长期打算”。“凡愈靠近城市与铁路的地方，人心愈浮动，群众难争取……故我群众工作的布置，应将重心布置于边缘地区。先把那一带搞起来，然后用群众运动的影响，来向城市扩张群众运动。”同时，林彪建议：“我绝大部分军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

医院中的毛泽东，抱病仔细阅读这些电报，之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即《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批示，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英明预见，成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指南。

由于东北局领导层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中央向东北局下达指示：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局长兼副政委，并以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常委。

林彪主政东北的决定一下来，林彪就被高岗、谭政从前线接到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工作。

七月初，在东北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的领导云集哈尔滨，举行东北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

凯丰出席了会议。

凯丰此时担任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同时兼管哈尔滨市委工作。

在调整领导班子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东北局委托陈云起草了《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

林彪一面组织大家讨论决议，一面向中央报告。

毛泽东亲自动手，对决议作了很多修改。

七月七日，东北局通过了这个决议（后称《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决议指出：能否发动

④

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就有失败的可能。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奖励，不愿意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形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村的热潮。

白山黑水间，那积蓄已久的暴风骤雨，早已按捺不住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来势，正待着《七七决议》这道惊雷紫电划破长空。

三十六、在《七七决议》下组织领导土改

动地的惊雷炸响了。

一场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拉开了序幕。

在东北，这场伟大运动从一九四六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



凯丰在东北土改动员大会上作讲话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九月初，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抽调出五分之三的干部，其中五分之一是喝过延河水的老干部，共计一万二千人，组织工作队，下乡搞土改。

东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还是一个空白地带。日本占领东北不久，就破坏了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后来东北抗日联军也被日军压到苏联境内，几年之内东北都没有共产党人的活动。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八路军基本不了解，相反，国民党政府倒是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国民党地下军人员活动频繁，鼓动老百姓迎接“国军”接收东北。苏军占领东北后，将“满洲国”伪军武装全部解除，总共十七万人溃散在各地。苏军在东北到处拆卸工厂、拆卸武器，将日本人财产没收后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千万工人失业，日本侨民和家属流浪街头……面对如此复杂混乱的东北局面，要白手起家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

凯丰带着体弱多病的身子，凭着多年在战斗中积累增长起来的知识和经验，日理万机地工作。

东北局宣传部当时人手特别少，没有副部长，宣传科就科长王兰西（后任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一人，文艺科就舒群一人（后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创始人之一），协助凯丰工作的就秘书任荪一人。凯丰知道，要开辟东北根据地，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站稳脚跟，首先得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东北人民。凯丰将长春接收到的伪满洲国的广播电台和敌伪时期的工作人员带到哈尔滨，立即开设了我党在东北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并亲自为广播电台写社论、评论文章。

为了扩大《东北日报》的影响力，提高它的声望，凯丰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寄送他亲自购买的新书，并请毛泽东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凯丰的请求，给凯丰回信说：

凯丰同志：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得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尽管哈尔滨与延安远隔千山万水，然而凯丰把毛泽东一九四三年给自己复信时说过的“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的话，始终牢记在

④

心。一九四六年，刚在哈尔滨安顿下来，凯丰就将毛泽东的嘱托付之行动。他亲自动手，编辑了六卷本《毛泽东选集》，并在东北各书店出版发行。这是毛泽东最早出版发行的选集之一。一九四九年，苏联准备将这套《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行。但当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告诉他经毛泽东校订的《毛泽东选集》将于当年六月底正式出版，希望苏联不要翻译出版东北书店的《毛泽东选集》，这样苏联才停止了翻译出版凯丰编选的《毛选》。李士彬回忆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促使《毛泽东选集》的尽快出版、对当时和后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凯丰的领导下，通过报纸、电台大造声势，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很快在黑土地上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作为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的领导，凯丰一方面安排干部深入工厂，抓生产恢复，抓战时武器、弹药和装备等急需物资的筹集；一方面部署人员抓城市水、电、煤的供应，抓交通运输的畅通和社会治安的稳定。

面对广袤的东北农村，怎样进行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凯丰派秘书李士彬走屯串户，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写成材料供他阅读。碰到棘手问题，他亲自带着身边工作人员，一头扎进田间、地头，作深入的调查，与农民交朋友。中央从延安传来《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凯丰即根据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的讲话精神，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亲自起草了《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社论，在《东北日报》上发表。

一九四七年，凯丰前往王鹤寿、范式人任省委负责人的北安省（当时东北划分为九个省）视察。视察后，与工作人员一道，写出了大量农村调查材料，编印出了《东北农村调查》，他指示将该书发至各级领导干部手中，并在新华书店发行，供广大干部在进行土地改革中借鉴和参考。

李士彬回忆说，一些好的工作经验，如“马斌工作方式”和“呼兰县经验”等材料，凯丰亲自修改润色，在《东北日报》上刊登推广。

“马斌工作方式”，是我党东北土地改革打开局面的第一个成功范例。

东北广大农村解放前，社会经济基础和土地占有情况，与关内有很大的差异。东北大量土地被日本人收购、兼并和掠夺，如凯丰所调查过的北满的宁安，百分之

八十的耕地都被日本人占夺。这些土地由数十万日本移民组成的“开拓团”经营。

“开拓团”种不过来的，又反租给中国人耕种。耕作者大多数是闯关东来的关内农民，他们实际成了日本人的农奴，过惯了逆来顺受的生活。一九四六年四平保卫战失利后，我军大量撤到松花江以北。部队吃、穿等生存条件成了大问题。北满分局根据东北局一九四六年三月发布的《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派出工作队下乡，进行反奸清算。一九四六年五月，马斌带领的工作队进驻了松花江北岸铁路小站的一个屯子。他拒绝跟原日伪政权有关联的乡长的安排，毅然住进破庙里。尽管如此，可召开两次会，来的全是老人小孩。马斌认为，光住破庙还不行，于是决定队员分头住进百姓家里，提出“不怕虱子咬，不怕家里脏，吃饭给钱，说话算话”的要求。第三次开会时，青壮年来了一些，但很不理想。马斌一打听才知道，过去区里的工作队也说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要让穷人吃饱饭，可开完会没有行动。马斌一听，立即起身，带领农民就到大地主家里取粮。地主们没想到共产党带着穷人动真家伙，气得四处放风威胁说：“中央军快到了！”“等中央军来了再说！”为了稳住那些胆小的农民，马斌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发给他们枪，还带他们到地主家缴枪。穷人碗里有了粮，手里有了枪，热情空前高潮，参军的青年变得十分踊跃。共产党、八路军很快赢得了人心。马斌工作队的经验，通过凯丰的调研报告，得到了陈云的重视和赞赏。陈云要求广大下乡干部在开辟工作地区时，要推广“马斌工作法”，实行“蝗虫政策”，即一片一片地开辟。陈云和凯丰把发动群众斗争的做法概括为一个公式：经济——武装——再经济——再武装。

所谓“呼兰县经验”，就是“扫膛子”。“扫膛子”是从呼兰县长岭区兴起的。当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成立雇贫农会后，呼兰县委书记和县长召开动员大会，要求雇贫农会打着红旗，声势浩大地抄地主的家，分地主的财产。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扫膛子”。雇贫农先是扫本屯的地主，之后还可以扫外屯和城里的地主、富豪，谁扫的财产就归谁。记者张蓓在记述这场“扫膛子”运动的文章《消灭封建，彻底翻身》中说：“雇贫农整个阶级起来进入运动，就显示了他们浩大的气魄，津河第十九、十三乡是著名的‘一扫光’队伍，他们的口号是‘打遍天下封建，走到哪打到哪，天下地主是仇人！’第四乡的雇贫农队伍，举行了来回六十里的远征，三天两夜未归本乡。”“地主们战栗在这个强大的攻势下，以前那种威风、那种抗拒，现在是基本消灭了。双河山阎家屯到地主阎占魁家扫荡，阎家老娘们要求给她

④

家留下几个枕头。雇贫农瞪她一眼说：‘你想想咱们以往好多年没有枕头怎么过的？而今让你也把麦秸草当枕头吧！’地主要求雇贫农给他们多留些粮食，雇贫农答复得很干脆：‘你们从前不是说过，锄头在房檐挂二十年也不愁吃穿吗？扛走！’”

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的两个多月里，东北解放区“扫膛子”之风刮得极为猛烈，给著名作家周立波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提供了真实生动的素材。

凯丰当时对“扫膛子”运动是赞赏的，批示将“呼兰县经验”在《东北日报》上刊载，进行广泛宣传。

后来，由于运动出现了“左”的倾向，“扫膛子”运动扩大了打击面，有的在划分成分时任意提高、打击中农；有的将对“扫膛子”有看法的干部当“石头”搬掉，使基层组织陷于瘫痪；有的进城没收商店，导致工商业混乱；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地区任意处决和打死人，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地主恶霸，而是无辜家属或有些问题但罪不当死的。

毛泽东了解到来自解放区的情况反映后很着急，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延安召开了在陕北的中央委员和陕甘宁、晋绥边区的领导同志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越来越严重的“左”倾进行了坚决纠正。

凯丰将呼兰县的做法当做经验推广的出发点是好的，对极少数人使用霹雳手段，给绝大多数人施以菩萨心肠，是那个时期的迫切需要。但下面矫枉过正，采取过火行为，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东北局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批示，及时进行纠正，使土改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三十七、严己宽人

延安干部去东北不久，他们的家属也开始向东北跟进。

凯丰的爱人王茜、女儿何明清、儿子何明和何亮及警卫员李顺清、勤务员吴德明、保姆韩玉霞，由喻屏的妻子李风带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

吴德明本来不能去东北。凯丰走后，他被安排给刘少奇当勤务员。可东北解放隆隆的炮声，强烈地感召着这位年轻的战士。他很想去前线参战立功，加上王茜想带他去东北，他就向组织提出要去前线。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认为他组织纪律差，不服从分配，专门召开支委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后，找到支部负责人，说吴德明要求上前线是好事，应当批准他去东北。这样，吴德明才得以离开延安。

吴德明在《离开延安去东北》一文中记述：“为了首长夫人和小孩路上走得安全舒适些，组织上给安排了两匹骡子和两头毛驴。两头毛驴驮行李，并供三个女同志累了骑。两匹骡子架一个架窝子，供首长夫人和两个小孩坐。架窝子是陕北和晋西北农民想出的巧妙办法，即将两根三米多长的木杆的两端，分别固定在前后两匹牲口的左右驮架上。一张软床固定在两根木杆中间。上边和左右用席子围成圆形的棚，前面挂上布帘，样子像轿子，只是前后抬轿的轿夫换成了骡马。王茜和何明、何亮都坐在架窝里。这在当时的交通工具中算是最高级的了。”

离开延安的第一夜，他们住在青化砭兵站。以后经清涧、绥德渡黄河，到达山西，再经五寨、平鲁、右玉、左云到绥远省的丰镇县城。到达丰镇兵站时，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恰好在兵站。同是江西人，余秋里对凯丰很尊重，专门前来看望王茜和其他人员，并指示兵站尽快安排汽车送他们走。

王茜一行到达河北省张家口，与在那里调往东北的干部、家属会合。之后，五百多人乘坐二十多辆卡车，由中央候补委员古大存带领，一路风尘仆仆、浩浩荡荡，经内蒙古开往东北。

吴德明回忆说：“我们由陕甘宁警备旅旅长贺晋年具体指挥，另有一队武装人员负责保卫着出发了。为了照顾王茜同志和她的小孩，负责同志特意安排他们和古大存同志乘一辆卡车。记得司机是日本人，驾驶技术不错。与他们同车的还有女作家草明同志和邓发同志的弟媳，加上古大存同志的随行人员，人很多。因为卡车上没有坐的地方，只好把个人行李当坐椅。女同志抱着小孩，天又热，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没有车棚，晴天太阳晒，下雨了也只能用自己带的雨布挡一挡。赶上刮风，就没有办法了。”

后来，草明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写成《沙漠之夜》等散文，陆续发表在《东北日报》上。

④

王茜一行于七月底到达东北解放区齐齐哈尔。由于从延安来的人多，哈尔滨的住处还没有安排好，大家只好在齐齐哈尔等待进城的通知。

等着与久别的亲人相见的心情是急迫的。

吴德明见王茜老问去哈尔滨的通知来了没有，就知道她迫切希望看到凯丰，于是说：“王茜同志，其实你不用等，现在就可以去哈尔滨。”

王茜问：“为什么？”

吴德明说：“这里去哈尔滨有铁路直通客车，乘三四个小时车，你就可以见到凯丰同志。”

王茜说：“这样做行吗？”

吴德明说：“怎么不行？你是首长夫人，这点特殊是可以享有的。”

王茜摇了摇头说：“不行啊小吴同志，如果从延安等地来的人员都想走，这支队伍怎么带？首长家的人应该做表率。从延安来这里，这么多苦都吃了，不在乎再等几天，你说是吧？”

吴德明还能说什么？只能打内心敬重王茜。

几天过后，王茜一行离开齐齐哈尔，到达哈尔滨。

凯丰乘坐大卡车来南岗火车站接人。见到久别的妻子和孩子，凯丰格外激动。尤其是看到王茜怀里的何亮，他一把抱过，不停地亲吻着。凯丰离开延安时，何亮还没有出生，想想自己离开延安后王茜所受的苦累，凯丰十分内疚地说：“别怪我没有关照好你。”

王茜鼻子一酸，心里一热，眼泪就流了出来。她能听到凯丰说出这种话，很是难得。在凯丰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凯丰不肯随便开口，更不肯轻意向人吐露心声，包括他的亲人在内。有这句话，王茜养育儿女的一切艰辛和烦恼也就被抛到脑后去了。

凯丰与吴德明等一一握手后，抱着何明、何亮，亲切地招呼着女儿说：“明清，走吧，我们回家去。”

凯丰住在哈尔滨南岗区的龙江街上。这条街实际上是一条大一点的胡同。这里驻扎着东北局的大部分机关。林彪夫妇、陈云夫妇、李富春夫妇、张闻天夫妇、罗荣桓夫妇、林枫夫妇、高岗夫妇、后来从苏联回来的李立三夫妇也住在这条街上，并在这里办公。

凯丰和家人所住的这户人家的户主姓傅，是马家沟比较富裕的人家，有很多房屋出租。他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在市政府工作。

吴德明、韩玉霞和警卫员李顺清依旧分配在凯丰身边工作。

吴德明到了东北后，为什么还能留在凯丰身边，不再要求去前线？吴德明说：“一是那时东北局势很严峻，敌特暗杀、破坏经常发生，首长安全保卫必须加强。二是那时我很单纯，跟凯丰同志久了感情太深。刘少奇同志当时虽然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是大领导，但因跟他时间不久，不熟悉领导的生活习惯，只想跟在老领导身边。”

吴德明说：“凯丰同志宽宏大量，从不对同事和下级发火。在延安，刚到凯丰身边工作时，有一次为他倒洗澡水，木盆没把水装住，结果把窑洞的地面都打湿了，让凯丰洗不成澡，办不了公。因为窑洞既是凯丰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我吓得不敢见他的面。凯丰同志知道后，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笑着对我说：‘你年纪小，没做过家务，如果这时你还在家里，还是母亲给你倒洗澡水呢。不要紧，实践出真知，以后你就会知道怎样倒洗澡水的。我告诉你，木盆里的水为什么会漏掉呢？现在是夏天，干燥的气温早把木盆烤裂了，水放进去，还不是烂筛子装泥鳅一样，走的走溜的溜吗？你应该在没倒洗澡水之前，先将木盆放在水里浸泡一会，让木板膨胀起来，将木盆的缝隙挤紧，这样才能让热水规规矩矩待在木盆里。’我听了他的指教，以后就照他教的法子做了。一九四七年春天，苏联给了我们一批苏式吉普车，分给每位首长一台。我对开车很感兴趣，就悄悄学了起来。就像小孩刚刚学会爬就想走一样，有一天，我开车去松花江边兜风，结果把一个工人师傅撞倒了，差点撞进江里。师傅住到卫戍区医院后，凯丰同志没有批评我，专门到医院看望师傅，向师傅赔礼道歉，还给了师傅慰问金。一九四七年冬，凯丰同志的小车由吉普车换成卧车。一次，我开他的车进库，因为方向没把准，撞到墙上，把汽车的油箱撞坏了。汽车一时修不好，害得他只能坐大卡车去开会。我爱人韩玉霞埋怨我，说我耽误了首长的工作。我以为这一次凯丰同志一定不会原谅我。当我写好检讨，送到他手里，请求处分时，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了下我的检讨说：‘学车就像学走路一样，跌了一跤，用不着这么严肃对待这事。就怪苏联老大哥的油箱钢板太薄了，不然汽车是不会开不动的。你说是吗？’凯丰的大度和幽默大出我的意料。凯丰同志说：‘学开车是好事，将来在战场上，在建设中，肯定能派上大用场。只是驾驶时要小心谨慎，尤其在大城市，人多车多，开不好就会出大

事……’ ”

吴德明对凯丰体谅和关怀下级的评说，秘书董连璧也给予了认同。

二〇〇七年董连璧七十九岁，离任时为辽宁省体委主任，退休后住在沈阳干休所。他说：“凯丰同志牙齿不好，用不得硬毛牙刷。有一次，他叫管理员为他买一只软毛牙刷。可交代好几天，也不见管理员把牙刷买回来。那天我正准备去找管理员，管理员却焦急万分跑到我这里，问我沈阳市哪有羊毛牙刷。我这才知道，管理员还在为凯丰同志找牙刷呢。我想，再软的牙刷也不至于用羊毛做，就问管理员是不是把话听错了。管理员满头大汗说没有听错，凯丰同志要的就是羊毛牙刷。我去问凯丰同志。凯丰同志听了‘扑’的一笑说，不是羊毛牙刷，是软毛牙刷，是管理员听错了。其实管理员真没听错，是凯丰同志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加上镶有假牙，把‘软’说成‘羊’了。管理员敬畏领导，当时不敢多问，因此耽误了采购时间。凯丰同志知道原因后，没有批评管理员，而是作着自我批评说：‘看来我的萍乡普通话跟张国焘一样，说不好，这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打仗的时候，如果传错话，那是要付出大代价的。连璧同志，你和管理员是北方人，今后要多多给我纠错，不用怕。’ ”

凯丰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延安，还是东北，对中央领导的称呼都在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笔者认为他们有些古板，因为在记述他们的原话时，作者要增写好多文字。看看当今，有几个人对上级不是以“书记”、“部长”、“省长”、“市长”相称？副职通通不带“副”字，一律以正职相称，唯恐不恭冒犯了领导。有的甚至将领导称做“老大”、“老板”、“头”……可凯丰身边的工作人员众口一词地告诉我，名字后面加“同志”的称呼，是那个时代的严格要求。你若称他们的职务，他们会批评你。工作人员说：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现在想改也改不了。他们还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现在能继续这样称呼首长，相信首长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忘记首长当年的教导啊。

三十八、拂晓中的哈尔滨

逃进深山老林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土匪，和潜伏在城市里的日伪特务、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时，开始在解放区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暗杀。

哈尔滨的形势最为严峻。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在一次赴约中，误入国民党特务窝点，喝了女特务孙恪龄的茶水后中毒，被三名手持短刀的特务连刺七刀，当场死亡。

林枫的警卫员陪同林枫去南岗铁道俱乐部看戏回来，被特务的子弹击中右臂。

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花江地区，先后有一百五十四名干部被杀害。

整排的苏联红军战士被打死。

一些干部战士被土匪特务开膛剖腹，暴尸街头，惨不忍睹。

.....

敌人的疯狂进攻一时间搅得人心惶惶。

为了安全起见，一九四六年十月，东北局机关家属一度搬到总部后方的佳木斯市，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搬回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不分兵打匪，到处不能站脚。不仅城市被土匪占据，乡村也是土匪的世界。”因此，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组织指挥部队，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在林海雪原中深入剿匪，在夜幕下的哈尔滨里加强锄奸、反特和肃清土匪恶霸的工作。

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的凯丰，与东北局其他领导一道，在调查摸底清楚后，指挥部队迅速出击，处决了作恶一方的张作霖时代的大汉奸、恶霸姚锡九、李九鹏，捕获了国民党地下军头目姜鹏飞和大特务李明信，平息了八月二十日准备在哈尔滨进行的大暴动。这些行动为稳定东北局势，震慑敌对势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凯丰经常去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次去北安省调查时，在火车上，他被一双有劲的臂膊抱住。

凯丰一看，抱他的竟是何长工！凯丰为在东北见到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激动得跳了起来。

凯丰与何长工分别很长时间，知道他现在任职军政大学校长。一阵寒暄过后，凯丰就说：“长工同志，东北要干部，将来全国解放更需要干部，你的任务很重啊。”

何长工说：“是啊，百废待兴，纲举目张，干部是决定因素。凯丰同志，你是宣传部部长、大理论家，有时间给我的学员讲讲课怎么样？”

凯丰说：“就怕难当此任啊。”

何长工说：“宣传部部长都讲不好课，你还坐在这把椅子上做什么？”

“这……哈！”凯丰和何长工都笑了。

凯丰欣然应何长工之请，去军政大学讲了课。

直到今天，那些听了凯丰报告的学员，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依旧流露出对凯丰醍醐灌顶似的报告的敬佩。凯丰以《学习贯彻〈七七决议〉》为题，结合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以及在东北农村调研的成果，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一讲就是大半天。他的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当他以《七七决议》最后一段话作为报告结束语结束演讲时，会场上的人都站了起来，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凯丰高亢地说：“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向着奋斗目标前进，就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董连璧回忆说：在当时，能请凯丰作一次报告，真是莫大的荣幸。

王茜是位胆小而又文弱的女性。进哈尔滨之前，她经常听到和见到土匪对革命干部的极端残忍行为。因此凯丰每次外出，她不但要反复叮嘱小心，而且亲自检查警卫员的枪支子弹上膛了没有。每天夜里，凯丰不回到家，她绝不上床睡觉。

韩玉霞回忆说，一九四六年冬天一个冰雪夜晚，凯丰从乡下回来，又去督促有关单位给群众供暖，直到凌晨还没有回家。王茜由韩玉霞陪着，一会儿屋里，一会儿屋外，焦急不安地等凯丰回来。等到后来实在放心不下，她带上全副武装的吴德明，在城里四处寻找。天将破晓，当看到凯丰正在工人中间嘘寒问暖时，走了好几个小时的王茜终于瘫倒在雪地里。

回到家里，凯丰一边脱棉大衣，一边埋怨王茜说：“为什么要这样玩命？”

王茜接过大衣，挂往墙上说：“你才玩命呢！下了一天乡，连晚上都不回家。”

凯丰说：“十年军阀混战、八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现在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啊。全国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你看看，林彪、彭真、

陈云、高岗、李富春、林枫等同志，哪个不是枕戈待旦、夜以继日地战斗着、工作着？”

王茜接过吴德明端来的一盆热水，蹲下地去，为凯丰脱下满带雪水的靴子，将他的双脚放进热水盆里，说：“你总是有理由，如果以后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那我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

“外面太乱，我要为你挡一挡敌人从暗地里射来的子弹。”

凯丰一愣，睁大了眼睛望着王茜。

如果说盆里的水烫热了凯丰的双腿，那么王茜的话语更温暖了凯丰的心窝。

凯丰伸出手，为王茜扫着头上的积雪。当他的手抚到她柳叶眉下的伤疤时，停住了。

王茜抬起头，知道凯丰又在内疚自己和廖似光之间发生的那场不愉快的婚变，于是说：“不知道廖大姐现在在什么地方？日子过得怎样？”

凯丰的手在王茜的伤疤上轻轻地摩挲着，没有说话。

王茜说：“我对不起她。在白区，在长征路上，她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伤。我不知道以后的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之间发生的事。”

凯丰叹了口气说：“都成往事了，别提它，我们只要好好地工作。”

王茜说：“我一定照顾好你，不使廖大姐失望。我要让廖大姐在全国解放后，再看到你时，你没有失去一根头发，全身的病全都治好了。”

愿望是美好的，也是温暖人心的。可愿望要得到实现，需要经过太多太多的、不可预测的曲折过程。有的愿望，往往就破灭在实现愿望的中途上。王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九四七年七月，凯丰带着李士彬、吴德明，由李顺清领着一个警卫班警卫着，前往北安省（现在齐齐哈尔东南）调查土地改革情况。王茜要跟着去。

凯丰吩咐说：“你的任务就是看好孩子。”

王茜要争辩，凯丰没让她开口。

王茜只能忧郁地望着凯丰走出家门，登上火车。

下乡不到半个月，凯丰接到紧急电话。电话说，王茜因为担心凯丰会遭土匪袭击，心情过于紧张，突发精神病，现在谁也控制不了她，她说她一定要亲眼看到凯

④

丰安全回来。

在王茜的家族中，上三辈没人患过精神病，由此可见，当时东北的匪患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由此可见，王茜对凯丰爱有多深，情有多重。

王茜患精神病后，经哈尔滨、沈阳等各大医院治疗都没能治好，恢复不了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何明、何亮去医院看她时，她把兄弟俩锁进柜子里，并持水果刀，指着吴德明等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带走，说土匪要杀害老革命的后代。韩玉霞带着两个孩子睡觉，常常深更半夜被王茜吵醒，说特务来了，叫她赶紧带孩子转移。

韩玉霞说：“凯丰忙工作时，王茜经常去楼上办公室，为凯丰当‘警卫’。有时突然叫凯丰赶快走，说敌人马上就到，吵得凯丰无法工作。久而久之，两人发生了争执。有一次，凯丰不小心还把王茜从楼梯上推滚到了楼下。”

东北局领导见凯丰无法静心工作，经请示中央同意，就让王茜长期住在沈阳医院，由辽宁省委派专人护理。

王茜的疾病在东北治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治好，一九七三年病逝于沈阳。

殚精竭虑于中南海

第十一章

三十九、入主东北重镇沈阳

进入东北，凯丰的身体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但仍然坚持工作。李士彬说：“到一九四八年初，除了开会，凯丰同志很少出去活动，有时仅在院子里散散步。”

“凯丰同志抽烟很厉害，一支接一支，这是得肺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来他下决心戒了，很不容易。”

与凯丰朝夕相处的林彪、彭真、陈云等东北局领导，见凯丰病情加重，在哈尔滨久治不愈，经请示中央同意，批准他去苏联治疗。

凯丰不肯离开，他指着窗外传来的铿锵劳动号子声，指着不时隐约传来隆隆炮声的远处，对前来劝他出国的同志说：“在党的事业最需要人的时候，我离开国内，不合适。我身边有医生，有药吃，就一边工作一边治病吧。”

林彪面无表情，但不容争辩地说：“我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延安，去苏联治病，难道不妥吗？”

凯丰被问住了说：“林彪同志，你是受了重伤，不得不离开。我只是……”

④

彭真满脸笑容劝道：“凯丰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磨刀不误砍柴工，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呢，先把身上的部件修理好了再说吧。”

陈云说：“我和你在延安就是邻居，组织部和宣传部又紧挨着，你的咳嗽常常咳得人揪心。那时我就劝过你，叫你去苏联治病，可你说整风运动任务重，走不开。结果怎样，现在不是又咳出血来了？看样子这病不是一般的病，得认认真真检查一下。眼下苏联的医疗条件比中国好，就按林彪同志说的，丢下手头的工作，去苏联吧。”

在组织和战友的重视和关心下，凯丰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乘飞机离开哈尔滨，飞往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苏联之行。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长春解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沈阳解放。

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取得胜利而兴奋不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文章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入关，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远在莫斯科医院里的凯丰，读了毛泽东的文稿后，再也躺不下去，坚决要求出院。

主治医生说：“你的病还没治好，需进一步卧床服药。”

凯丰说：“医生同志，如果不让我出院，我会在医院憋死的。眼下治我病的最好地方，就是我们国家的最前线！”

凯丰的心情很好理解。从一九二六年离开家乡，走上革命道路，二十多年了，湘鄂赣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莫斯科如饥似渴的求知生活、沪粤港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二万五千里枪林弹雨的长征路和党内错综激烈的路线之争，哪时哪刻不使他希望能早日看到革命的胜利？现在，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胜利指日可待。在这车轮滚滚、战旗猎猎、征马萧萧、百万大军挥戈入关的时候，他这位党的领导干部怎能躺在异国他乡的医院里，做一个旁观者呢？

凯丰说动了医生。

他带着一大包药，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回到了东北。

一九四九年六月，凯丰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特别市（中央直辖省级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沈阳卫戍区政委（司令员为贺晋年）。

在这之前，由于林彪、罗荣桓率大军南下，高岗接替了林彪的东北局书记职务。

东北局领导预感到胜利将会很快来临，为了做好接管沈阳等大城市的充分准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在高岗住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接管沈阳的具体方针和办法。那次会议决定：陈云任沈阳军管会主任，伍修权为副主任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陶铸为副主任、中共沈阳特别市工作委员会（后为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沈阳卫戍区政委，朱其文为沈阳市市长。

一九四九年五月，陶铸离开沈阳后，接替他职务的是李富春。李富春一九四九年六月离任后，凯丰接替李富春的职务。

东北全境解放后，恢复东北经济成为东北局的首要任务。身为东北局常委、沈阳市委书记的凯丰，工作特别忙。据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任凯丰秘书的董连璧回忆，在沈阳期间，在政治上，凯丰要求市委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工作部署。他非常注意抓班子的团结共事。他说：“我们这些干部来自全国各地，个人出身、革命经历、生活习惯、性格脾气都不相同，大家都要在革命和建设的大前提下，取长补短，团结成一个人一样，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凯丰看到中央宣传部二月十九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某领导人的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获悉这一情况后，很不高兴，认为凯丰跨过他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对他的大不敬。二月二十六日，高岗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给高岗复了电报。电报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凯丰。”

凯丰非常注意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强调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位同志不能个人说了算。董连璧清楚地记得，当时市委班子中有位负责行政工作的领导，由于资格老，立功多，在陶铸任书记时就是搭档，喜欢专权，个人说了算。凯丰不讲情面，多次在会上批评过他。刚开始，那位同志不肯接受。凯丰就拿自己的经历说事：“我过去就吃了想当然的亏，遵义会议上，凭着在苏联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以为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先入为主地认为毛泽东同志只读过《孙子兵法》，

④

没有站到大多数同志一边，一意孤行地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结果怎样？实践证明我是多么的主观、幼稚。想想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我们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吗？”由于凯丰的现身说法，那位同志改变了态度，变得民主起来。

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先抓日伪留下的工业体系的恢复，加快企业生产，以满足全国解放中武器弹药和装备粮秣的急需。紧接着对企业实行国有化改造和探索国营企业的领导体制建设问题。在凯丰主政沈阳期间，沈阳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在《沈阳日报》上的《在东北工会第二届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行了简要概括：

我这里只举一些沈阳市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你们就会知道沈阳是东北制造工业的中心。这里是全国和东北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拿国营工业生产总值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〇年为百分之三百三十五……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四百一十六；拿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来说，一九五一年较一九五〇年提高百分之十五点五；拿国营工业工人人数增加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〇年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六，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二百二十八；拿国营工业工人工资增加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〇年为百分之一百〇七，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现在我根据沈阳的情况来说这些新的变化——三个主要变化：第一、国内工业市场空前的扩大。……一九五一年以来，经济的逐渐恢复与发展，经济改组的进行，特别是全国土地改革的接近完成，城乡物资交流，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改变了过去产品积压的现象。从一九五一年春季以来，沈阳市的市场开始特别活跃，过去成为积压品的，现在都成为畅销品。许多工厂的订货，特别是基本建设各项器材的订货，有的三个月六个月的产品都预订完了。这是发展工业的有利条件，在我们工业前面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途。第二，有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开始走向正常化，新的先进工作经验的创造，快速劳动工作方法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开始出现……这一先进工作方法，不仅带有全东北的意义，它将带有全国的意义。这一新的工作方法，打破了企业管理上的陈旧保守思想，打破了在技术和科学上的陈旧的保守思想。第三，工厂内部领导加强了，步调一

致，更加进步了。

在国营企业实行怎样的领导体制，当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要实行厂长负责制，一种认为要实行党委集体负责制。董连璧回忆说：“凯丰同志为此召开了好几次座谈会，最后确定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国营企业中，被采纳实行了很长一段时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应该说是凯丰同志对新中国国营企业管理模式的一大贡献。”

在抓工业恢复发展的同时，凯丰还重点抓了商业。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凯丰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了《做一个人民的商人、革命的商人》一文。这篇文章，是凯丰在沈阳市国营贸易企业联营公司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股长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稿。从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出凯丰对改变商业战线的风气是何等地焦虑和热盼。他说：“要达到建立国营商业中新的革命的作风，必须做到下述三点：第一，必须下定决心肃清旧商人的传统恶习——贪污、行贿、欺骗、走私、偷税、盗窃。旧商人只要能挣钱，一切事情他们都能干得出来，甚至贩卖人口，贩卖毒品，开娼设赌，拐骗欺诈，无所不至。所谓‘商人道德’，就是损人利己地作恶的代名词。……第二，建立人民商业员的革命作风。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革命的作风呢？就是廉洁、奉公、守法、不贪污、不受贿，忠诚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爱护国家的财产，遵守国家的法令，遵守国家的纪律，遵守劳动的纪律，用新的态度对待劳动。……第三，钻研商业业务和精通业务。搞商业要懂得商业，要了解人民的需要，要了解市场的情况，要了解货物的情况，要精通这门业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召开商业书记和劳动模范的座谈会和表彰会时，他说：“新中国的商业工作者，是企业的主人，是人民的服务员。从现在起，要让被我们服务的对象感到，新中国的商业战线焕然一新。”

在文化建设方面，一九四五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迁至东北后，凯丰在学院建制、机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方面都给予了指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凯丰还专门到学院讲话，对鲁院在东北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他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推动东北文艺运动。凯丰组织成立了

④

东北文化工作者协会，改造、培养了大批京剧、评剧演员和文化人。在哈尔滨，他改造和培育了夏青、秦友梅、马知良和华君武等一批艺术家。当延安大批文艺工作者进入东北后，在舒群的协助下，文艺队伍得到迅速壮大，文艺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一批优秀剧目如《白毛女》、《李闯王》和《三打祝家庄》等，为配合东北的解放和土地改革，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

凯丰在离开东北局去北京赴任前，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对自己担任东北局委员、常委、宣传部部长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的工作进行了自我鉴定。从鉴定书的字面上看，写得很匆忙，语法逻辑、遣词造句等都有瑕疵。但通过这份鉴定，不难看出，凯丰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无限忠诚的，个人胸怀是十分坦荡的，对自己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对组织和他人是非常谦虚谨慎的。鉴定说：

在沈阳市（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两年（实际为三年）的工作中，深深感到自己的了解非常不够、不深入，因此对工作不能具体地帮助下面解决问题，还是多于一般的指导。自己因为身体的关系做的工作很少，同干部经常接触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及时给以帮助更是甚少。

思想方法的不够全面也经常有，强调一面，没有对工作做多方面的考察的现象常有。对市的主要干部学习的领导没有做好。

但对沈阳市主要干部间的团结是做到了，对主要工作中心工作经常还是能抓住了。对党内原则性的坚持及民主的讨论还是做到了。从沈阳市一时期的工作更感到自己经验不足。

对工业部、商业部、组织部的工作经常过问还多，对宣传部在工厂宣传上也过问一些，但对青年、妇女、统战各部门几乎很少过问或完全没有过问，这是非常不对的。对政府财经、公安各部门过问还有，但对文教、民政、卫生等方面没有过问，这也是不对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沈阳市委对凯丰表现进行了如下评定：

一、凯丰同志理论修养深，思想水平高，因而在沈阳工作的两年中能深刻地体会中央与东北局的指示、决定的精神，结合沈阳的具体情况，加强了党对

工业、商业、合作以及其他工作的领导，正确地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并取得了经验，也适时地提出了反贪污浪费的任务。在日常工作中善于抓住中心，有原则又具体、尖锐、明确，这一切对于干部的教育与提高都是大的。

二、在组织领导上善于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善于从组织推动工作，能广泛地听取意见，但又果断地决定问题。对市委的领导上增进了原则的团结与领导的统一集中。

三、工作作风。虽然身体不好，但工作深入，亲自到工厂、仓库检查。送给他审阅的文件能及时处理，细心修改。

四、联系群众的面还不大。由于身体的缘故，也很困难这样做。只是尽可能地注意联系面。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在恢复和发展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工厂、矿山沸腾了，交通、商贸活跃了，社会治安稳定了……

这是新中国生产力大解放的反映，是人民群众建设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表现。沈阳生机活力的焕发，为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援。

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凯丰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以便对一些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正确的思考和选择。一九五〇年七月，凯丰去了北陵公园避暑休养。

警卫员于珍回忆，那次凯丰去北陵，险些被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所害。



凯丰在中共东北局建党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

于珍跟凯丰之前，担任张闻天的警卫员。张闻天出任苏联大使后，于珍被调给凯丰当警卫。

于珍给张闻天当警卫期间，张闻天给林彪、高岗、陈云的信件和文稿，经常由他送达。一天夜里，大雪纷飞，他送文件给林彪时，在林彪家门前站了两小时，腿都冻僵了。原因是林彪和叶群看戏去了，大门紧锁着，警卫排也随首长外出了。林彪、叶群回来见他冻成这样子，非常心疼。叶群赶紧开门，让他进屋里暖和。林彪则将身上脱下的呢大衣递给于珍说：“盖在腿上暖一暖。”于珍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参加过四平保卫战。他说四平保卫战打了五十六天，天上看不到太阳，全被硝烟炮火遮住了。他说：“在保卫四平的战斗中，楼上有敌人瞄准，地下有暗堡射击，我猫着腰，在战壕里送信，帽子都被子弹打飞了。后来，一发炮弹飞过来，把我炸昏过去。在医院醒来时，才知道自己伤着了脑袋，嘴里还在流血。妈的，害得老子半年都不能说话，差点成了哑巴。后来，经陆军总医院治疗，两个月才治好。”于珍急性子，说话像打机关枪，接受采访时，一讲到激动处，嘴里就蹦出“妈的”、“老子”等字眼，身上依旧保留着当年东北军人的作风和豪气。

于珍跟凯丰时，已经是警卫连的排长，他能双手使枪。卡宾枪和“勃朗宁”不离身。

凯丰去北陵时，于珍以自己警卫职业多年的习惯，将园里园外仔细查看了一遍。后来发现，北陵地处市郊，范围大，有前后门，尽管园子的围墙上安有电网，倘若不加强大门和后门的警卫，很可能被人混入。于是，他向沈阳市公安局要求增派人员，结果公安局增加了五个战士。

第二天夜里，特务组织知道凯丰在园内避暑，派两名特工，三更时分摸到围墙边，企图趁站岗人员瞌睡时从大门或后门溜进去。由于加派了警卫，特工无从下手，只能爬围墙进入。特工因刺杀凯丰的压力大，心情过于紧张，一不小心触着电网，一名被当场电死，一名被电击后掉到围墙外，被于珍当场活捉。于珍因警卫凯丰有功，当年被评为“模范警卫”。

四十、奉调进京

新中国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建设、努力奋斗，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全国人民将从一九五三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不失时机地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目标。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写了好几次，一直没有获得通过。这时，毛泽东想到一个人，这人就是凯丰。

凯丰从一九四五年起，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和担任沈阳市委书记有七年时间，通过摸索和实践，已经积累了不少改造与建设新中国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制定和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很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况且，凯丰有理论、政策水平，调他进京，加强中央宣传部的工作，通过宣传把中央意图灌输到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去，正是时候。

为此，毛泽东提议凯丰进京。

一九五二年九月下旬，凯丰被调往北京工作，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那一年，中央调了不少地方大区的负责人进京工作，其中有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这五位同志进京后，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东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因为进京的几位领导的权力地位极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那“一马”说的就是高岗。从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职位上来的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董连璧、于珍回忆，凯丰对进北京工作没有他俩想象中的高兴，个中原因到底是在东北工作多年对东北有了深厚感情，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董连璧和于珍都不知情。凯丰平素沉默寡言，守口如瓶，从不向身边人吐露不该让人知道的事情。董连璧说：“凯丰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说：‘高层机密多，口要紧，保密有一定时期，在保密期内一个字都不能吐。’”

凯丰动身之前，中央曾派徐特立和胡乔木来沈阳，催促他前往。徐特立和胡乔木是凯丰的老同事，关系十分密切。后来朱德也来了沈阳，专门到凯丰家，叫他赶快起程。

凯丰终于动身前往。

离开沈阳前，凯丰对呆在一边的董连璧说：“还愣着做什么？跟我走哇。”

董连璧手足无措起来说：“我能去北京？我？……”

凯丰非常奇怪地问：“怎么不能？你是我的秘书。”

董连璧抓着头皮说：“我还没有做进京的准备呢。”

凯丰右手划了一下说：“有什么准备的，革命者除了为人民打下了江山，自己就只有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壳。”

董连璧想想也是，自己除了一个背包和一支凯丰送的钢笔，什么都没有。

看看凯丰的家当呢，除了几硬纸箱书籍，也就是妻子和孩子了。

离开沈阳时，董连璧写了一首感慨万千的诗。诗道：“五二初冬际，奉调北京行。随同凯丰去，难舍同志情。”

长白山、黑龙江越来越远了，南下的火车急速告别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告别一片连着一片的白桦林。

山海关离凯丰越来越近，火车在河北大地上向着北京疾进。

凯丰依依不舍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思绪万千。

王茜患病五年，没有好转，组织和同事都动员凯丰另找对象。

凯丰因经常需要护士送药、打针，沈阳市胜利医院十八岁的小陆姑娘成了凯丰家的常客。

小陆长得漂亮，对凯丰非常敬慕。

凯丰对小陆的人品和工作态度也很满意。

董连璧看出些端倪，就问小陆是否同意嫁给凯丰。

小陆红着脸，羞怯地说：“首长会看上我吗？”

董连璧心中有数后，就给凯丰介绍起小陆来。

凯丰不等董连璧把话说完，就摇头说：“小陆年纪太小，不合适。”

当董连璧把凯丰的原话转告小陆时，小陆大哭了一场，因为她对凯丰患了单相思！

为了不使小陆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凯丰拒绝小陆再给自己送药、打针。

组织上只好将小陆调离凯丰身边，护理员调换成了赵淑璧。

赵淑璧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科的护士长，年纪比小陆大三岁，是辽宁省庄河县青堆子区人。其家庭非常富有，父亲是当地绅士。赵淑璧高中毕业，在学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清秀贤惠。相处不久，赵淑璧与凯丰有了共同的语言。

凯丰认为，赵淑璧除年龄小一点，其他方面最合适成为他的妻子。本来，凯丰想在年底跟赵淑璧结婚，但中央调令已下，只能放弃结婚，先进京报到。

离开沈阳时，赵淑璧来火车站送他，哭成个泪人儿。赵淑璧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凯丰多病的身体担心，又为他的儿女没人照顾犯愁，更为凯丰此次进京是否还能记住她悬着一颗心。

凯丰没有多说话，只将一块手帕送到赵淑璧手里说：“我是个说话算话的人，况且，我这一生已经离不开你了。”

进京一年后，凯丰因治病来沈阳小住。凯丰通过沈阳市委转东北局，申请与赵淑璧完婚。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沈阳市委请东北局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为凯丰提出结婚申请。请示如下：“凯丰同志的爱人王茜自一九四七年发疯病后，即与凯丰同志分开了。王茜的疯病养治了五年，未见好转，将来也恐无望。因此凯丰同志在沈阳工作时，有意找对象，解决婚姻问题，并曾向中国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科护士长赵淑璧同志表示过，赵是同意的。后因凯丰同志调动工作，故未向组织上正式提出这一问题。此次凯丰同志到沈阳治病，曾表示想趁此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要该院对赵作过进一步的了解，根据该院所提供的一些材料来看，我们认为赵不会有政治问题。我们同意凯丰同志在沈阳与赵淑璧结婚。但我们对赵的看法和同意凯丰同志结婚的意见，不知是否正确，兹将赵的简单材料一并报送你们，请予批示。此致，敬礼！”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如下：“东北局并告凯丰同志：转来沈阳市委的信已收到。关于凯丰同志的婚姻问题，已经仲勋同志与高岗、漱石、乔木同志商议并在电话中答复了（张）秀山同志，即由你们对赵淑璧作负责的审查，只要政治上无问题，应予同意。”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旬，凯丰与赵淑璧在沈阳完婚。

四十一、参与中央重大事项的决策

在北京，凯丰的家安排在中南海永福堂的四合院里。左边是胡乔木，右边是陆定一。陆定一家后那个院子是习仲勋家。

一到北京，凯丰就全身心地投入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工作。

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开始，中共中央在讨论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过渡的主要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年十月，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征求意见时说：“在中国现实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明显的优势。这是中国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这一看法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为了确切掌握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研究和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形式，中央指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工作组，于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间到武汉、上海、无锡、常州、济南等地进行调查。五月，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个报告后，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政治局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目前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同年十二月，凯丰撰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送达毛泽东后，毛泽东对提纲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

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而凯丰为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撰写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达洋洋数万言。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学习和宣传提纲》的实施。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董连璧至今还记得，毛主席在修改《提纲》的稿子上，写上了“请凯丰同志再斟酌一下”的批示。

为了让凯丰有机会参加中央领导核心的会议，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暂离职位负责主编《毛泽东选集》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示说：“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将暂离宣传部工作的时候，凯丰同志已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宣传部是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工作的，而习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考虑。”

为此，毛泽东于当年十二月十日在信上作了如下指示：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邓（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经中央核心领导同意，凯丰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

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经常把要件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受信人就是凯丰。董连璧回忆，毛泽东请凯丰“斟酌文稿”有许多次。

④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凯丰的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底相当看重，凯丰享有毛泽东给予的“再斟酌一下”的殊荣。

凯丰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很高的文化水平，来自他的勤奋读书和苦心钻研。凯丰一生手不释卷，一有空就读书、看报。上厕所如果没有报纸、书刊，文件也要带着看。他对董连璧说：“到里边没东西看，比什么都难过。”

凯丰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得最多，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至少读过三遍。”

有一次，他对董连璧说：“你怎么老看武侠小说？”

董连璧说：“整天跟文件打交道乏味，想轻松一下。其实除了武侠小说，我还喜欢看高尔基的作品和《金瓶梅》。”

凯丰说：“小说可以看，但不要多看。你年纪轻，今后要担当大任。建议你多读一些马列的经典，就说《资本论》吧，你读过吗？”

董连璧不好意思地抓着头皮说：“在老领导面前说实话吧，《资本论》几次想读，可就是读不进去。”

凯丰说：“读不进也要读，在中央宣传机关工作，不读这部大书怎么行？告诉我，为什么读不进去？”

董连璧说：“书里那些典故我弄不清楚。”

凯丰说：“不耻下问嘛，为什么不问我？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正因为凯丰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一九五三年三月，党中央决定凯丰兼任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现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

凯丰兼任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后，董连璧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出去马列学院学习。

凯丰说：“你去做什么？在马列学院院长身边工作还怕学不到东西？从现在开始，我来教你。要是你提出有关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我都解释不清楚，中国就不会有几个人能解释得清楚了。”

凯丰话锋一转说：“不过，读书不能读死书，要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年轻时，我就吃过照搬书本和教条的亏。中国革命运动，偏要生搬硬套苏联的模式。共产国际没有点头的事，就不敢做，就怕犯天条，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

董连璧认为，跟凯丰当秘书，案头工作是轻松的。凯丰从不用秘书起草文稿，

全是自己动手。动手之前，先搞调研，让秘书四处找参考资料参阅，之后，拿出两套提纲，念给身边工作人员听，广泛征求意见。提纲定下来，只身来到打字室，一边走动，一边口述，让打字员为他打稿。口述一完，一篇不用修饰的稿子就出来了。

一九四九年全国政协第一次会上，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后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委员会主任。

饶漱石进京之后，高、饶就有了合流的机会。饶漱石进京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前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想趁召开一届人大和酝酿召开党的八大之机，把刘少奇、周恩来挤到一边，由他俩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总书记，担任政务院总理，以后逐步夺取最高权力。高岗的野心源自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器重，还有东北老领导林彪的支持。进京不久，高岗四处活动。他找过邓小平、陈云，争取他俩一起拱倒刘少奇。但邓、陈坚决拒绝，还将高、饶的阴谋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使毛泽东对此有了思想上的准备。

凯丰在东北长期跟高岗共事。高岗看过的文字材料，大都叫凯丰再仔细审读一遍，以免出错。他们都喜欢胸前挂餐巾布，两手持刀叉，吃西餐和奶制品。高岗性格豪爽，喜欢着西装，梳着油亮的大背头，穿皮衣时不忘配上闪亮的皮靴。工作之余，高岗、凯丰经常与工作人员一起打乒乓球。高岗有时被凯丰和其他人员打败了，哪怕胜者是自己的勤务员，说话算话的高岗也趴到地上，勾头钻桌子，受处罚从不怕下级笑话。

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高岗进京后搞私下活动时，不可能不找凯丰。

或许在遵义会议上发生的错误在时时警醒着自己，凯丰十分内敛，办事谨慎。高岗要来串门，凯丰以身体有病为由，将其拒之门外。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七届四次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高、饶阴谋被揭批。高岗面对强大的批评攻势，开始时一言不发，后来突然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就扣扳机。好在会议前中央有了准备，高岗的枪被当即夺下。

会后不久，高岗写了《我的反省》检讨书，准备送呈中央。检讨书送出之前，他派人送到凯丰那里，请凯丰看一看。

凯丰瞄了一眼装有检讨书的信封，一句话不说，叫来人赶紧拿回。

董连璧茫然地看着凯丰，不知道凯丰为什么要这样冷对自己曾经的同志高岗。

董连璧后来才明白，说：“当高岗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以后，当饶漱石以包庇反革命罪被公安部逮捕审查之后，我才吓了一跳，才知道凯丰为什么跟高岗保持距离，拒绝跟他交往。他这是严守党的纪律，有着坚强的党性观念啊。我打内心里敬佩他。”“可以说，凯丰在高岗的阴谋面前能保持清醒头脑，与他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已经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原则性有关。”

四十二、艰苦朴素地生活

凯丰的二女儿何淑英，比她的姐姐何明清生活要艰难很多。

何明清来凯丰身边后，母亲孙氏去世。

一九四五年初冬，祖母金氏也永远离开了她。

何淑英二〇〇七年三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祖母去世后，伯父、叔父给爸爸去了信，叫他回来见祖母一面。可他回信说回不来，原因是‘工作很忙’。”

凯丰说的是实话。那时他正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争分夺秒地奔赴东北最前线，为全中国解放开辟新的根据地。自古忠孝难两全。凯丰把对母亲去世的无限悲痛，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连身边的女儿何明清也没有告诉。

何淑英说：“母亲去世后，我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外婆家里。伯父、叔父毕竟是伯父、叔父，不可能像爸妈那么疼爱我。外婆家很穷，但外婆对我特别疼爱。冬天我只有单裤，外婆就改她穿过的棉裤给我穿。她家有吃的，一定不会让我饿着。

“我没有读书，也读不起书。即使想读书，伯父、叔父也不让我读。我是女孩子，那个年代乡下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认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

“听人讲，爸爸在东北工作期间，间或有点钱寄回来。但伯父、叔父不让我知道。他们用这些钱，凑上他们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钱，拿去买田，去买因我爸爸参加革命后，反动派夺走我家的那些田。他们想让他们的子孙将来过好日子。当伯父、叔父把想法告诉爸爸时，爸爸来了信，叫他们不要买田。爸爸那时正在东北搞土地改革试点，在给人定成分。他是党的土改政策制定者之一，当然知道家里有田地的严重后果。但爸爸没有告诉他的兄弟有田地的严重后果，因为这是党内机密。

伯父、叔父没有听爸爸的，继续省吃俭用地买田置地。结果，在土地改革时，我们家因为有田地划成地主成分。伯父、叔父对划地主成分不肯接受，拍着桌子，红着脖子与工作组争辩，说：‘从全伢子（凯丰乳名）参加革命时起，我们家就因为他的原因变成了贫农，田地都卖光了。近几年我们省吃俭用才买了几丘田，怎么能把我们划成地主呢？’他们一边争辩，一边把我推到贫雇农团人面前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全伢子的二女。她身上穿的衣服，哪件不是烂布兮兮的？柴样的手、篾样的脚，一身瘦得皮包着骨头。这是地主老财家的子女吗？’但贫雇农团人不听我伯父、叔父的辩解，说我家有田地就是比贫雇农好。叔父气不过，就给东北我爸爸写信，叫他写封信给萍乡县的领导说一说，叫组织上主持公道。父亲回了信，拒绝出面，只给叔父说一句话：‘不要争吵，一切听组织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熬过苦难岁月的何淑英，经过多次转乘火车，行程几千里，来到沈阳，来到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凯丰身边。

见到二十三岁的何淑英，凯丰双手剧烈地抖动着，他抚着女儿的双肩，仔细地端详起来。

一边站着的何明清向父亲介绍妹妹说：“爸爸，淑英妹妹已经出嫁了。她给你写过信，就是不见你回信，她好想你啊。她嫁到了我们老关乡的荷叶塘，男人叫丁大发，现在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淑英来东北时，你的外孙女追着她的后背，也要来看外公啊……”。

看到何淑英脸上呈现明显的菜色，身上穿着补丁压着补丁的衣服，凯丰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滚。

何淑英大声哭诉着：“爸爸，你走后，妈妈好想你，奶奶好想你，爷爷好想你，我也好想你啊……我们受过的苦、受过的罪太多太多了，爸爸！……”

凯丰一把将何淑英带往怀里，紧紧地抱住，内疚得心里隐隐作痛。

住了几天，父女关系融洽之后，何淑英提出，想来沈阳父亲身边，在沈阳安排工作。

面对女儿的请求，凯丰没有吱声。

董连璧见何淑英没有得到父亲的首肯，大失所望地走出办公室，赶紧说：“凯丰同志，就让淑英来吧。她来了，明清和她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

凯丰问：“她能来吗？看看现在沈阳大街上，想找工作做的人有多少，我能先

④

给自己的女儿安排工作吗？”

董连璧说：“人再多，也不多淑英一个嘛。”

凯丰说：“你一个，他一个，加起来就不是个小数字，我这个东北局的常委、沈阳的市委书记能开这个口子吗？”

董连璧不满地说：“凯丰同志，你怎么这么古板？”

凯丰说：“这不是古板，这是原则。我是党的领导干部，得带个好头。在长征路上，贺子珍把刚出生的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毛泽东同志对此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说法。”

董连璧说：“可你和廖似光大姐已经把两个孩子丢在上海和长征路上了。”

凯丰说：“比起毛泽东同志，我算得了什么？他家出了好几个烈士，丢失了好几个孩子，真正的满门忠烈。正因为有他做我们的榜样，革命事业才取得今天的成功啊。”

何淑英不能理解父亲，她无法理解离家二十多年的父亲会这样对待她。

当何淑英离开沈阳时，董连璧塞给她一封信，叫她带着这封信，去找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说王首道跟凯丰是老战友，会帮她解决工作问题的。

何淑英大惑不解地望着董连璧。

董连璧告诉说，这是凯丰的亲笔信。是他实在看不下去，在凯丰面前反复磨蹭才磨到手的。他说，当他说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给女儿安排个卖力气的工作不犯党纪国法”时，凯丰才拿起了毛笔。

看到爸爸亲笔写的信，何淑英感动了，感动之余反倒认为自己不该给父亲增加麻烦。

一九五一年六月，何淑英回到湖南，找到了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转送了凯丰的介绍信。

王首道见信后二话没说，马上交代办公厅的同志说：“凯丰同志的孩子吃了好多苦，他们就是不提出参加工作的请求，组织上也应该给予安排。何淑英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何淑英被安排进湖南省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财会知识。不久，被安排在湖南省合作社联合社供应部当出纳。

参加工作不久，何淑英和丁大发给凯丰写了信，向凯丰告知了自己的近况。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凯丰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信封和信笺给女儿和女婿回了信：

淑英、大发：

信均收到，因事未复。生孩子后身体好吧？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在省合作社工作很好。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我身体很好，勿念。问好。

工作一段时间后，何淑英又生了孩子，她和丁大发的工作、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夫妻俩一商量，还是给凯丰写信，要求来沈阳，跟着凯丰一起工作和生活。他们想得到父亲的关照。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凯丰给何淑英回了信：

淑英：

信收到。带着两个小孩，无法学习，也无法工作。你和丁大发还是回家去种田好了。不必来我这里，我很快也要离开沈阳。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问好。

凯丰调到中宣部后，一九五四年的秋天何淑英去过一次北京。

现在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深居中南海中央机关的凯丰，在女儿离京返家时，打发的竟是两件这样的东西。

那天，他把女儿带到卧房，打开那只唯一的白皮木箱，翻了半天，只翻出两件衣服，一件是中山装，一件毛线衣。毛线衣的袖口和肘部都烂了，边也散了，稀稀杂杂的。中山装的领子和袖口都磨烂了，肘部还打了补丁。凯丰把衣服装进女儿的行李袋，不无愧疚地说：“淑英，爸爸没有钱，只能把两件好点的衣服送你，你能穿就穿，不能穿就给大发穿吧。”

今天，当何淑英向人讲起五十多年前父亲打发她的两件衣服时，眼中饱含泪水，脸上露出十分苦涩的笑容。何淑英说：“我爸爸没有钱，很穷很穷，那时的中

④

央领导人都这样。父亲的警卫员于珍带我去习仲勋、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家串门时，我看到他们都跟父亲一样，穿得非常朴素，吃得非常简单。他们一天到晚忙工作，家里的事根本顾不过来。他们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压着补丁。”

何淑英没有虚夸，从凯丰给家人的几封回信中，今天我们还可见一斑。

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他给何淑英回信：

淑英：

小孩病得这样厉害，是什么病？是否是出疹子？是否是肺炎？如果是出疹子或转为肺炎则宜注射青霉素。兹寄给伍拾万（相当于现在五十元人民币）元，给小孩治病用。问好。父。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给何淑英、丁大发回信：

淑英、大发：

信收到，知你们进步非常高兴，参加业余文化学习非常好，必须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淑英还是要继续学习，最好也能参加业余中学学习。两个小弟都好，也在念书，现在放寒假，都在家里。你姐姐也有信来，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上次寄了点（钱）给她。你们要的书先寄一、二卷，三、四卷以后寄给你们。问好。父。

四十三、功记人民心中

一九五四年底，过度劳累使得凯丰病情加重，再也无法工作，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档案记载，凯丰“中学时就得了肺病。参加革命后，工作紧张，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又得了肠胃病。一九四八年肺病大发，大口吐血”。

一直陪伴凯丰检查身体的董连璧说：“凯丰同志除肺病、肠胃病外，这次确诊为肝癌，以前给他治过病的医院都误诊了，认为他是肝硬化，其实是肝癌晚期。”

由此可见，凯丰全身都是病。

在凯丰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叹地说：“经常看见凯丰皱着眉头，捂着腹部，但从来没有听见他呻吟，真不知他是以什么力量支撑自己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住院期间，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周扬等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并对他的治疗方案给予了特别关照。

但是，凯丰病至晚期，最好的医药也无法让他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赵淑璧是位一诺千金的女性，跟凯丰结婚三年，一直担负着妻子和护士的双重责任。她对凯丰的工作、家事和病重期间的护理，付出了一位妻子全部的爱。

在凯丰生命最后的日子，赵淑璧一直守在他身边，以泪洗面。于珍回忆说：“最后几天，凯丰不说一句话，赵淑璧也不说话，两人互相看着，像在用眼睛交流着内心的痛苦和不舍。”

凯丰辞世之前，嘱咐赵淑璧说：“淑璧，我一生无憾，唯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何明才十二岁，何亮才十岁。他们的亲生母亲患了疯病，希望你能像他们的亲生母亲一样，多耐一点烦，多尽一点心，把他们抚养成人。”

赵淑璧连连点头，悲痛欲绝地一再表示说：“他爸，我一定看护好咱家的孩子，保证把他们抚养成人，你放心吧，啊？”

赵淑璧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凯丰逝世后，才二十五岁的她一直未改嫁。她把何明、何亮当做自己的亲生骨肉，疼爱备至。在中宣部的关怀下，在往后的二十年里，她将自己有限的工资节省着用，不但供他们上学，抚养他们成人，还牵肠挂肚着他们上山下乡的生活，为他们后来回北京找关系、跑工作，张罗着为他们娶亲。在他们生了孩子之后，还为他们看护孩子。何明、何亮成家立业后，她才找了一位老伴，与何明、何亮分开生活。何明清、何淑英去北京时，赵淑璧献出了一位母亲的最大爱意。至今，何淑英和女儿一谈起赵淑璧，依旧心存感恩之情。并说在漫长的岁月里，赵淑璧过得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

二〇〇七年初冬，笔者采访这位老母亲时，她声情并茂地说：“凯丰是老一辈杰出的领导人，也是我的丈夫。我没有忘记凯丰临终前的嘱托。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一直恪守贤妻良母的古训，为何明、何亮尽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我无愧于凯丰，无愧于他们的孩子。我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我扶养革命后代的任务。”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凯丰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爱的祖国、伟大的人民、

④

并肩战斗的战友、相依相伴的夫人，以及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北京医院悄然逝世，年仅四十九岁。

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凯丰的去世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发布了讣告。讣告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同志，因病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十二点五十五分在北京医院逝世。凯丰同志的灵柩停在北京沙滩松府夹道十号（原来北京大学旧址）子氏堂，定于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六时举行吊唁，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开追悼大会，十一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公告了凯丰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同志追悼大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主祭，陪祭有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

中共中央还公告了凯丰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邓小平

副主任委员：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

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彭德怀、林彪、张闻天、章汉夫、郭沫若、吴冷西、张天翼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四日，在凯丰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块纪念文章，纪念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纪念文章说：

凯丰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

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工作，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凯丰同志在三十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凯丰同志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凯丰同志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丰同志还为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度自觉性。

凯丰同志一生对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他身上，体现出共产党人所有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

今天我们纪念凯丰同志，最主要的是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

这篇纪念文章对凯丰同志所给予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来到国防大学，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学校建校八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在看望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时期的老同志、老教员和学校历届领导时，胡锦涛打着拍子，带领大家一起唱起了凯丰作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旋律，雄壮嘹亮地响彻耸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天安门广场上。

这是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对凯丰所写歌曲的又一次肯定和赞扬。

当年，凯丰将他的战友和同志称之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而他自己，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杰出的一员。

后 记

凯丰诞辰一百周年那年，他的长子何明从北京回到家乡，提出要在凯丰曾经就读过的萍乡中学为父亲塑像。萍乡市政协领导特别热情，在同意派人帮他实现夙愿的同时，还提议为凯丰作传。我在市政协工作，此前利用业余时间已写过三百万字的小说，为凯丰立传的任务便不可推辞地落在我的肩上。

凯丰的传记很难写。一是传主战争岁月居无定所的革命生涯，建国初期的英年早逝，记下他为人民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非凡经历，为党和人民所作贡献的文字资料很少；二是因遵义会议上他说的那几句党内生活允许但实践证明错了的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少人还心有余悸谈及他的卓越贡献，故少有回忆文章可供参考；三是与凯丰一道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同志绝大多数已经辞世，少有对象可供采访。

我是个知难而进的文学工作者，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从二〇〇七年春天开始，我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查阅的资料不少于千万字，购买的相关书籍超过一百

册，采访的足迹遍布京、沪、鄂、赣、湘、闽、贵、渝和东三省。三年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大都用在了创作上。在写作这部传记时，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下，我拒绝神化，拒绝庸俗，将传主非凡的征战岁月、建设生涯，以及功勋业绩、家庭爱情、战友情谊作纪实性的创作，尽可能采用文学笔调，让传主和所涉及的人物血肉丰满、生动活泼起来，让读者愿看耐看，并能在社会各层面上广为流传和引起关注。

感谢传主和他的战友所经历的枪林弹雨、尸丘血海的革命生涯，感谢传主和他的同志所创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凡业绩，感谢传主和他的同路人生龙活虎、喜怒哀乐的感情生活，这些为我完成这部作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人物素材。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大解放所提供的广阔创作天地，让我拓宽思路，充分想象，大胆运笔，潜心写作，使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能够感受到革命先辈为理想信念奋斗的矢志不渝、打江山的艰苦卓绝、爱人民的一往情深、待亲人的血肉相连，由此更加珍惜今天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激发出为全面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奋斗精神。

二

传记创作，尤其是党的高层领导的传记创作，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一项非常难以把握的严肃繁重工程，缺少任何一方的支持、理解和帮助，都难如愿以偿。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及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新闻出版局对本传出版非常重视，对此进行了高度负责的审阅，对作品成稿过程进行了精心指导，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和建议，并专此下文批准公开出版发行。

本传创作过程中，中共萍乡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非常重视。市政协主席贺维林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精心指导；中共萍乡市委常委、秘书长孙家群给予了大力支持；市政协副主席李久龙在立项、采访、创作和出版中进行了全面组织协调督促；原中共萍乡市委书记刘南方进行了精心阅示；萍乡市史志办和萍钢公司为本传创作

④

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帮助和出版支持；凯丰家乡中共湘东区委、区政府、区政协，中共老关镇党委、镇政府、三角池村和何氏宗亲给予了鼎力相助。

重庆、延安、遵义、沈阳等地党史、纪念馆等单位，为采访提供了很大方便；凯丰的夫人赵淑璧，子女何明、何亮、何淑英，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凯丰的秘书李士彬与董连璧、警卫员于珍、勤务员吴德明和保姆韩玉霞，提供了情真意切的回忆、讲述和缅怀，为创作提供了亲历亲见亲闻的鲜活素材。有关记述凯丰生平、事迹的文章为这部传记创作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史料支持和重要参考。

凯丰的晚辈何柏桂竭尽全力，与何湘凡、何水等在成传过程中给予了密切配合和全面协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审张国功等同志在编辑本书时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辛勤劳动。

借本传付梓之时，谨向以上单位、地方、领导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三

大浪淘沙真金在。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凯丰。

家乡人民深切怀念凯丰。

凯丰老前辈在天之灵如若自知，当看到这部而且是第一部为他写就的传记时，一定会含笑九泉。

凯丰同志永生。

作者

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丰传 / 张学龙 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742-939-5

I. ①凯… II. ①张… III. ①凯丰 (1906 ~ 1955) —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4779号

凯丰传

张学龙 著

| | |
|------|-----------------------------|
| 责任编辑 | 张国功 |
| 美术编辑 | 梅家强 |
| 制 作 | 周璐敏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
| 邮 编 | 33000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6.5 |
| 版 次 |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字 数 | 25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80742-939-5 |
| 定 价 | 50.00元 |

赣版权登字-05-2010-18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张学龙，一九五三年生。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江西省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萍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福州军区二十九军从军十五年，在萍乡市机关工作二十六年。现任萍乡市政协常务委员、提案委员会主任。出版长篇小说《大清洋矿》、《安源往事》、《惊涛裂岸》、《日照苍山》等作品三百余万字。《大清洋矿》、《安源往事》分别入围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参评，《大清洋矿》获江西省第二届优秀文艺作品大奖。获萍乡市优秀人才奖。

ISBN 978-7-80742-939-5



定价：50.00元